



马克思恩格斯传

奥古斯特·科尔纽著



马克思恩格斯传

III

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

1845—1846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著

管士滨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uguste Cornu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TOME IV
LA FORMATION D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1845—1846)
PRESSE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70
根据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 1970 年法文版译出

马克思恩格斯传

第三卷

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

1845—1846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著

管士滨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266,000字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书号 11002·532 定价 1.20元

目 录

第一章 西欧状况 (1840—1847)	1
工业革命	1
1. 英 国	2
2. 法 国	4
3. 比利时	7
4. 德 国	9
德国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 (1840—1846)	12
1. 自由主义运动	12
2. 民主运动	14
3. “真正的”社会主义	19
4. 手工业共产主义	34
直到1844年织工暴动为止的无产阶级运动和共产 主义的的发展	37
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共产 党形成的开始	39
1. 威廉·沃尔弗	41
2. 格奥尔格·维尔特	44
3. 约瑟夫·魏德迈	48
4. 卡尔·路德维希·德斯特尔	50
第二章 弗·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52
弗·恩格斯在巴门	52
麦克斯·施蒂纳	58
恩格斯在莱茵省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	72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93

第三章 卡·马克思与弗·恩格斯在布鲁塞尔·····	140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生活·····	140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	151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布鲁塞尔会合以前的合作·····	166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的会合。英国之行 ·····	171
从英国回来以后到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期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从事的工作·····	180
第四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	203
著述与出版·····	203
历史唯物主义·····	210
对德国思辨哲学的批判·····	251
1. 布鲁诺·鲍威尔·····	255
2. 麦克斯·施蒂纳·····	268
A) 哲学的唯心主义·····	269
B) 政治自由主义·····	286
C) 社会自由主义·····	293
D) “人道”自由主义·····	297
E) 唯一者·····	298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305
1. 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307
2. 对莫泽斯·赫斯的批判·····	316
3.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个不同先知的批判·····	319
A) 《莱茵年鉴》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	319
B) 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 (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	332
C) “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 社会主义”的预言·····	338
结论·····	341

第一章

西欧状况(1840—1847)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民主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后，与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取得接触，并且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之作为在他们开始实际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之前的理论根据。

这种理论准备和这种革命实践，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之直接有关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

工业革命

关于这些国家在四十年代的状况，在这里，只是就它如何决定了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这方面加以研究；它的标志是每个国家中以不同方式生产的工业品产量以不同的速度在大大地增长。

那时候，法国和德国基本上是农业国家，在那里，工业品的生产方式还停留在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的阶段；而在英国，工业革命使农业退居次要地位以后，发展得越来越快；工厂代替了手工业工场，机器的使用以及作为动力的蒸气的使用已经开始普及。

手工业品需求的急剧增长，刺激了机器的发明和利用，从此以后，为了满足需要，机器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了。最初，人的需求特别是在消费品方面，这说明何以纺织工业得到了优先发展。大量机器以及铁路和汽船的急需制造，又给了冶金工业以巨大的推动力。从重要性方面说，冶金工业逐渐赶上而且后来竟超过了纺织工业。

工业的发展给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变化表现在贵族影响的消失——这是与农产品的相对的减少相符合的——，表现在大资产阶级的上升——它使工业和商业得到同样的发展——；表现在中等阶级、手工业者和小工厂主的日趋衰微——因为他们越来越不能抵抗大工厂的竞争——；最后，也表现在日益显示其重要性的、悲惨的无产阶级的形成——当它比较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时，它就变成了革命的阶级，而在社会演进中开始起决定性的作用。

1. 英 国

十八世纪末叶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到十九世纪则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由于人口增加和殖民地扩张所造成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向工厂生产的过渡。

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使棉花进口由1771年的一百万斤上升到1841年的五亿二千八百万斤；使手工业织布工人的数字在1820年到1844年之间由二十四万人下降到六万人，而在同一时期，在机器工厂里工作的织工数目，却由一万人上升到十五万人。

紧接着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之后，由于铁路和汽船的急需制

造，冶金工业的机械化从四十年代一开始便发展得特别迅速，铁路的长度由1841年的一千三百六十公里增加到1847年的七千七百公里。由于高炉的改进，铁的产量由1796年的十二万五千吨上升到1830年的六十七万八千吨，1850年更达到二百二十五万吨。冶金工业的发展带来了采矿工业的发展；所以煤炭的采掘量也由1790年的七百六十万吨上升到1850年的四千九百万吨。

铁路、汽船和运河的修建，便利了运输，加快了速度，降低了费用，对于最初只是迅速增加流动资本、建立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工商业的扩充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在农业方面也有着类似的发展。由于占有公共财富、淘汰小农而使土地集中，人们就可以通过使用机器、而更重要的是利用肥料，从土地中得到较好的收益。其次，由于人口增加，人们对食品的需求也同时增加，并且对于谷物税收规定了种种法律，这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虽然英国那时候在经济领域里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且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使它远比其他国家先进，但是它还没有达到1848年革命后期手工业工场完全被机器工厂淘汰的那种发展速度。

与经济方面的发展相并行的，是这个国家在社会机构内部也进行着一种深刻的变革。这个变革的标志是：一方面，大资产阶级迅速上升，他们拥有工业生产力，向封建贵族争夺政权；另一方面，封建贵族相对地日趋衰微，不过由于他们大量收买土地、使农业近代化并占有煤矿和铁矿，使他们能够参与工业上的扩张，因此也还能保住他们的大部分势力。封建贵族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保守的托利党与自由的辉格党之间的斗争。辉格党利用使他们在1832年取得政权的那次选举中所得到的胜利，用压低粮食税收的办法，竭力削弱大土地所有

者们的权势；这就说明谷物法从那时起在统治阶级内部两大集团的斗争中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

大资产阶级的势力在上升，大土地所有者们还差不多保持着自己的势力。这时候，那些越来越不能抵抗大工业和大商业的竞争的中等阶级、手工业者、小工厂主和小商人日益衰败的景况，就更加突出了，而同时，一个无产阶级的队伍却自行发展起来，人数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悲惨，然而，也越来越富有战斗性。

由于广泛地使用机器，可以廉价雇用妇女和儿童，在工人之间就引起日趋严重的竞争，导致了工资的不断下降和工时的不断增加；从事某类工种的工人每天工作竟达十八小时。遇到危机，便只有失业、挨饿，工人的苦难是难以忍受的。

贫困达于极点便会同时产生以下一些后果：酗酒、卖淫和犯罪的不断发生，以及工人们为反对身受其害的残酷剥削而产生的暴动。这种暴动，起初是此起彼伏的，逐渐变为一种不仅在工会领域里而且也在政治领域里的有组织的斗争。我们看到，工会运动在获得结盟、罢工和选举的权利以后，在工联(trade-unions)的指导下，力量确实是加强了。它成功地发动了1842年夏天的大罢工，而且，在宪章运动的指导下从事政治斗争，提出选区平等以及普遍选举、平等选举和无记名投票的要求。

2. 法 国

在法国，在比利时，特别是在德国，经济和社会并不象在英国那样快地向前发展。

工业革命在法国开始得比英国大约晚了半个世纪。在四十年代，英国已经大大地工业化了，而法国从整体来看还是一个农业

国家。

在工业领域里，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还占统治地位，所以，有六百万工人在作坊和手工业工场里劳动，而在机器工厂里却只有一百三十万人。不过，特别是在1830年的革命以后，大工业的迅速增加使手工业工场逐渐被大工厂所代替。因此，在纺织工业里，织布机器的数字从1835年的六百台上升到1842年的一万二千台。在冶金工业方面，象在英国那样，它的飞快发展也是由于急需修建铁路而激发起来的，铸铁的产量从1818年的二十二万一千吨上升到1847年的五十九万一千吨；用焦炭炼铁的高炉，从1839年的三十三座上升到1846年的一百零六座，蒸汽机则由1830年的六百一十五台上升到1847年的五千台。由于冶金工业的发达，煤炭和矿石的采掘也同样发展得很快；煤产量由1831年的一百八十万吨上升到1847年的五百万吨，铁矿石则由七十四万吨上升到一百六十五万八千吨。

正如在英国那样，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流动资本的增加以及银行和股份公司的普遍建立。但是，尽管有了这种跃进，经济的发展和英国的比较起来还是很落后的，特别是拿铁路网的长度来说，1851年在法国只有三千公里，而英国在同一时期却达到了一万零六百五十六公里，由此即可得到证明。

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和政治演进的不同，是与它们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同相符合的。在英国，由于征用土地，小农已差不多绝迹；在法国则正相反，小农和中农仍然占优势，虽然生活或多或少地比较艰难；土地分割得过小，使耕种方法不能改进。

至于贵族，如果说他们在英国还扮演着统治阶级的角色，那么在法国则由于1789年的大革命而败落下来，不得不让位给大资产阶级。后者在1830年的大革命中取得了政权；它听命于银行家，统

治着国家，让国家为它的阶级利益服务。

中等阶级，由于越来越受到大工业竞争的威胁，而且被剥夺了合法的选举权利，因此成了大资产阶级的对立面。

中等阶级在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由于受到知识分子以及自由职业者、医生和律师的指导，曾倾向于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因为对中等阶级来说，无产阶级那时还没有成为一种威胁。

那时候的工人阶级，大部分是由一些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劳动者组成，其境况是同英国无产阶级的境况相类似的。一天工作平均十五小时；一天的平均工资是：男的两个法朗，女的一个法朗，童工则是五十生丁到七十生丁。在家里工作的工人工资就更少了，一天不过挣三十生丁到四十生丁。参加组织的工人挣得稍多一些，而且每天工作只有十三小时。

由于经济落后，法国的工人阶级比起英国的无产阶级来还要软弱，他们没有结盟和罢工的权利，因此他们的斗争就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通过不合法的罢工进行斗争，比如从1830年来就不断发生的参加组织的裁缝工人、制鞋工人、木工以及里昂的丝织工人、昂赞的矿工等的罢工就是；通过由秘密结社所组织的暴动进行斗争，比如，由人权社领导的1834年的暴动，由四季社领导的1839年的暴动就是。起初，工人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在这些会社中特别是人权社中联合在一起。但是利益和目的的不同引起了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分裂，这分裂随着工人们具有更加明确的阶级意识而更加突出。这样，同革命的资产阶级占优势的人权社相对立，又建立了四季社，这个社是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在1837年创建的，它主要由工人组成。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种类似的分裂也发生在社会主义理论

家和共产主义理论家之间，前者如勃朗、孔西德朗、蒲鲁东，他们保卫日益无产阶级化的中等阶级的利益；后者如卡贝、德萨米、布朗基，他们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前一派人只是对一些改革备加赞扬，譬如对劳动组织这项改革，他们认为只有改革才能解决资产阶级社会领域里的问题；而后一派，目标则在于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消灭资产阶级社会，建立共产主义。

3. 比利时

比利时于1830年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独立国家，它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差不多与法国的类似。在四十年代，它仍然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在1846年时，有二千二百万人以农业为生，一千二百万人从事工业。

1845年，由于土豆病害和谷物歉收，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农业危机，这危机一直延续到1848年的大革命。土豆的收成减产百分之八十五，农产品的总收成减产接近三分之二。这种情况就引起了生活必需品的可怕的涨价，比如，一公斤面包的价格由十四生丁涨到四十生丁。

工业情况是比较好的，但弗朗德 (les Flandres) 地区除外。这地区专门生产亚麻布和苧麻布，由于英国的竞争，这些产品的出口量由1835年的四千五百吨下降到1848年的一千五百吨。而棉花工业、冶金工业和采矿工业，却如同在英国和法国那样，在迅速地跃进。比如，从1835年到1847年，煤炭的采掘量提高了两倍，铁的产量提高了四倍。

工商业的进步使流动资本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建立了大银行——“工商业促进总会”、“比利时银行”——以及股份公

司等等。

与工商业迅速跃进的同时，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被肯定下来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与大土地所有者们的利益相对立的。这种对立，反映在议会里就是保卫农业利益的天主教的保守派与保卫工商业利益的自由派之间的斗争。

被大工业的竞争所逐渐压倒、由于纳税选举而被排除于政权之外的中产阶级——在四百万人口中只有四万人有选举权——，对大土地所有者特别是对大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这个斗争以1840年创立的“民主协会”为中心，领导人是阿道夫·巴泰尔斯、亚历山大与菲力克斯·戴拉斯(Alexandre et Félix Delhasse)、吕西安·若特兰(Lucien Jottrand)和梅利奈(Mellinet)将军。

正如在英国和法国那样，工人阶级生活在日益深重的贫困之中。在1840年一天挣七十五生丁到一个法朗的织布工人，到1846年却最多只能挣三十五到七十五生丁；在1840年一天挣三十到五十生丁的纺织女工，到1846年却只能挣十五到二十生丁。由于荒年歉收，贫困竟到了使工人犯罪自投监牢以免于饿死的程度。随着这种贫困也带来了酗酒、卖淫和犯罪的不断发生。不过它却加强了由让·白勒林(Jean Pellerin)和雅克·卡茨(Jacques Katz)领导的工人斗争。前者在1833年创立了“工人教育会”；后者于1844年在他的《比利时人民年鉴》中提出由国家组织生产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要求。1845年，排字工人在一本呈给议会的小册子中要求普遍的选举权和建立劳动制度，并且，在1845年发表了《弗朗德人民的友人致所有真正的比国人书》，发行十万份，把工人阶级的灾难归咎于资本主义。

由于工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结果在资产阶级这方面从内部出

现了分裂。比较缓和的一派脱离了“民主协会”，在阿道夫·巴泰尔斯的指导下建立了“自由协会”；至于比较激进的一派，则在吕西安·若特兰的指导下，把“民主协会”引向同工人运动更加紧密团结的道路上去。

4. 德 国

在德国，工业革命产生得比法国和比利时还要慢些。只是在法国大革命和1814年的武装起义动摇了仍存在于乡间的行会系统和封建结构以后，以及在1834年创立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给德国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由于有了关税保护制度而使它可以更好地抵抗英国的竞争以后，工业革命的条件才算具备。

德国的工业化集中于拥有主要的煤、铁矿藏的莱茵省、威斯特伐里亚、萨克森以及西里西亚等地区。工业化起初所以缓慢，是由于销路不广，资本不够充裕和英国的竞争。

机械生产首先在纺织工业中得到发展。从1815年到1845年，棉纺织品增加了七倍；织布机的数目，从1835年的六百台上升到1844年的一万二千台，而棉花进口则由十万零七千吨上升到四十四万六千吨。正如在英国和法国那样，冶金工业的迅速发展也是由于修建铁路的需要而得到促进，1840年到1850年，铁路长度从九百四十九公里增加到六千零四十四公里，这个数字等于当时法国铁路长度的两倍。铁的生产，1820年时为九万吨，到1840年则上升到十九万吨，铸铁的生产则由1818年的二十二万一千吨上升到1847年的五十二万一千吨。采矿工业的发达伴随着冶金工业的发展。从1831年到1840年，煤炭的采掘量由一百八十万吨上升到三百四十万吨，铁矿石由七十四万吨上升到一百六十五万八千吨。

同时，在一个企业里的雇员的平均数字，由1800年前后的七人上升到四十年代的一百人。

正如在法国那样，工商业的跃进使流动资本急剧增长，这就有可能建立银行和股份公司；股份公司的数目由1825年的十六个增加到1850年的一百零二个，它们的资本总额在同一期间从三千四百万马克增加到六亿三千八百万马克。

尽管有了这样的发展，但毕竟由于被分割为很多彼此极不相同的邦而受到约束，德国在四十年代比起法国和比利时来，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和农业工人实际上构成劳动者总数的50%，手工业者占18%，手工业工厂和机器工厂的工人加起来不过占15%。

在德国东部和西里西亚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剥削现象。在这些地区，正如在英国一样，土地集中在大土地所有者（一般是贵族）手中。乡村士绅们，由于从小农那里——这些小农为交付在1814年后摆脱封建奴役所欠下的过高的赎金而破了产——抢夺土地以及占有公共财富，把自己的土地扩大了三百万亩；他们还由于垄断了酿酒业、制糖业和制瓦业以及西里西亚地区的矿源，而增加了他们的权力和财富。

在德国西部、中心地带和南部，相反地，是中小土地所有者占优势的地方。

德国工商业的发展，也正如在英国和法国那样，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特别是在普鲁士，贵族占有极为优越的地位，因为它拥有土地，并且它给政府提供人员因而在政府里找到了支持。中等阶级——小厂主、小农、手工业者和商人——，由于越来越难以抵抗大土地所有者和大工业的竞争，日益陷于贫困，而逐渐远离了中等

阶级的大资产阶级，则由于工商业的发达，权势日益增强。大资产阶级随着自己力量的日趋强大，也就越坚决地同反动政府展开斗争，特别是同普鲁士政府展开斗争。因为后者为了促进农业发展不惜使工业受到损害，而且不让资产阶级享有相当于其经济力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在同反动政府作斗争的同时，大资产阶级也越来越顽强地同它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作战，因为对它来说，无产阶级是最大的危险。

由于小农破产而使农业无产者增加的时候，在工业城市里也形成了一个人数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悲惨的无产阶级市民层。贫困的不断加剧，主要是由于工人同大量廉价雇用妇女和儿童的现象发生日益尖锐的矛盾所引起的。工资不断下降使工人得不到最低的生活必需品。工资最高的是冶金工人，平均一天挣三马克，而纺织工人则一周只挣九马克。妇女只能得到工人工资的一半，儿童是四分之一。农业工人和城市里的家庭佣人，工资更少得可怜，家庭佣人一季度才挣到十二马克。

工人的境况由于外国竞争的影响而变得更糟糕了，工资降到最低水平。比如在西里西亚，手工业织布工人在1844年平均工资一天不过二十分尼。碰上失业，工人们就惨不堪言了，因为他得不到任何社会法律的保障。

这种境况使工人走向道德败坏的道路，但同时也在他们心中唤起了对于剥削者的憎恨并推动他们去进行斗争。由于他们被剥夺了结盟和罢工的权利，他们的暴乱最初是带有自发性和零散性的。他们在战斗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贫困的原因和自己的阶级利益，于是工人们逐渐学会了如何组织起来。第一次重要的、范围广泛的武装起义，是1844年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的暴动，它标志着德国无产阶级伟大斗争的开始。

德国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

(1840—1846)

这些斗争表现在以下四个主要的运动中：大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中等阶级最先进分子的民主运动；符合于社会主义民主倾向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手工业者和无产者的共产主义。

1. 自由主义运动

在工商业的飞跃发展使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同时，也壮大了在政治上反映其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运动。正如易北河东岸几个农业省份是反对一切进步的反动中心一样，一些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如西里西亚、萨克森，尤其是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便成了自由主义运动的策源地。股份公司、工业团体以及商会——商会的成员可以讨论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提出的种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建立，加强了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他们对于用新闻检查来限制出版、借助于警察、法庭和军队来粉碎一切自由化措施的反动政府，特别是普鲁士政府，反抗得更厉害了。在经济压力下，这个政府曾极其勉强地让工业自行发展，但它拒绝充分提高保护法，怕因此反而束缚了谷物输出，它严密注意不让工业的发展危及自己并危及乡村士绅。它也象其他邦政府一样反对德国的统一，因为统一对它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发展是不利的。它的对立面自由主义运动也同样反对德国中部和南部的各邦，在那里，尽管已实现了立宪制度，但土地贵族却仍然占统

治地位。

大资产阶级反对一部分中等阶级中已经冒头的民主倾向，同时，它尤其反对那个已经同它开始坚决斗争的无产阶级。对于自由主义，它只看到对它自己有利的一些改革。它尽管承认了立宪制度，但是还愿意后者仍然保留有限制性的选举权制度，使中等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取得政权的机会，其原因就在这里。对于所谓社会问题，如西里西亚织工的武装起义所体现的这类问题，它认为政府对工人阶级的帮助，应只限于减轻贫困以避免暴乱为止。因此，它同意只搞一些慈善事业救济救济，而坚决反对任何社会改革计划。

在莱茵省，大资产阶级的活动最强，势力最大。它主要通过出版报刊和在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施加影响而发挥它的作用。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机关报是《科伦日报》，有九千读者，是莱茵省最大的日报¹；此外还有《爱克斯·拉·夏白乐日报》（《Journal d'Aix-la-Chapelle》）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这份报纸当时整个德国都在阅读。在议会中，特别是1845年的议会过程中，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决地要求建立立宪制度——这个制度允许它至少部分地掌握政权——和德国的统一。

德国自由主义的指导者是一些大实业家，如大卫·汉泽曼、鲁道夫·康普豪森和古斯塔夫·梅维森（Gustav Mevissen）。赞同贸易保护制度的大卫·汉泽曼，在1825年针对爱克斯·拉·夏白乐的失火而创办保险公司以后，于1830年上呈国王一份备忘录，倡议建立一种由纳税选举中选举议会的立宪制度。在四十年代，

1 1845年10月1日，亨利希·布勒格曼（Heinrich Brüggemann）顶替了卡尔·昂得莱（Karl Andree）担任主编，《科伦日报》停止保卫超蒙大纳主义（l'ultramontanisme），而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

他积极参与了修建铁路的工作。同汉泽曼相反，银行家鲁道夫·康普豪森保卫自由贸易论。作为莱茵拖船公司的创办人，在四十年代他也同样积极参加了铁路的修建。年轻的银行家古斯塔夫·梅维森，从1843年起改变了曾引导他与《莱茵报》合作的进步倾向，开始在自由主义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宪法最自由的大公爵的采邑巴德，自由主义的主要领导是弗雷德里希·丹尼尔·巴斯曼 (F. D. Bassermann)，他也象莱茵省的自由主义领导人一样，反对一切民主社会改革。

2. 民主运动

在大资产阶级进行自由主义运动的同时，发展着民主运动，支持这个运动的是中等阶级中的一些进步分子：手工业者、小厂商和商人，以及特别是自己的利益和倾向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越来越与大资产阶级迥然不同的医生、律师和知识分子——教授、作家、记者等。既然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不能实现种种为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所必需的改革，那么他们想，只有建立一个立足于人民至上的民主制度，才能公正地解决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特别是解决贫穷问题。

民主运动在四十年代受到约翰·雅科布 (Johann Jacoby) 医生的一本小册子的有力推动，这本小册子名叫《一个东普鲁士人对于四个问题的回答(1841)》，它不仅在普鲁士而且在整个德国引起极大反响。这个运动的主要中心是在科尼斯堡、汉堡、萨克森、西里西亚、柏林、大公爵的采邑巴德和莱茵省。

民主运动在科尼斯堡——科尼斯堡是普鲁士东部的大港口，这里谷物的出口贸易极为活跃——的创始人是《科尼斯堡日报》

(«Gazette de Königsberg») 的经理维特博士(Dr Witt)和约翰·雅科布,特别是后者,他所树立的民主原则从1843年起具有越来越激进的性质。雅科布在他的小册子«1845年的普鲁士»和«弗雷德里克·吉约姆第三的御上讲话1845» («La Prusse en 1845 et La parole royale de Frédéric Guillaume III, 1845») 中,倡议建立一种民主宪法,这宪法基于自由平等的普遍化应允许保证一切人得到人的生活条件,但不损害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秩序。他宣传的对象不仅是中等阶级,而且还有参加组织和没参加组织的工人。他得到了他们广泛的回响。为了给自己的活动以更为坚实有力的根基,他同在全德国已开始形成的其他民主运动的中心取得联系,这样,民主运动就更普遍地展开了。

汉堡这个巨大的海港,当时是个自由城市,也象科尼斯堡一样,成为民主运动的活跃的中心。出版刊物有«四季» («Les saisons») 杂志和«德意志电讯»日报。后者在1844年谷兹科夫放弃领导以后,表现出一种越来越激进的倾向。这两份机关报除探讨政治问题以外,还探讨社会问题。正如雅科布一样,其论点为:政治和社会的种种问题必须通过国家的民主化求得解决。「德意志电讯»的这种激进精神来自它的主编格奥尔格·谢尔格斯(Georg Schirges)。他是魏特林和A·贝克尔的朋友,由于他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处理的方式,成功地使这份日报成为宣传民主思想的主要工具之一²。

在萨克森,这个已经非常工业化的邦,拥有一个相对的自由主义的宪章,民主运动也同样依靠出版报刊的帮助。青年黑格尔左派、莱比锡的出版家奥托·维干德,当他在«哈雷年鉴»和«德国

² 谢尔格斯在1845年到1847年在汉堡另外还为手工业者们出版了一种杂志:«作坊»,先是月刊后来改为季刊。最初是技术性的,后来社会性越来越突出了。

年鉴》站稳脚跟以后，在1844年和1845年，出版了民主性质越来越明显的一种杂志《季刊》³。

在萨克森，对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样有贡献的刊物有：《边界信使》（《Le messenger des frontières》）、《政治与文学杂志》（《revue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德国信使》（《Le courrier allemand》）、《对生活和公共活动的人民之声》（《organe populaire de la vie et de l'activité publique》）以及《萨克森爱国报》（《Feuilles patriotiques saxonnes》）。

在萨克森，民主运动派的领袖是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Blum）。1807年，他生于科伦，1832年定居莱比锡，在这里，通过在《德意志电讯》、《萨克森爱国报》以及人民年鉴《前进》中发表文章，积极进行民主运动的宣传活动。由于他的努力，《前进》成为德国民主运动派的主要机关报。

莱比锡大学历史教授卡尔·比德尔曼（Karl Biedermann）也支持这一反对派，他在他的杂志《文学与公共生活的德国月刊》（《Revue mensuelle allemande pour la littérature et la vie publique》）和《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未来》中，为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并在他的讲课中对社会主义运动予以客观的描述。

在西里西亚，由于那里的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得到巨大发展，民主运动在《布累斯劳日报》、《西里西亚日报》（《Journal

³ 参阅《维干德季刊》（《Revue trimestrielle de Wigand》），莱比锡，1844，第1卷，第3—8页；奥托·维干德的《前言》；参阅同上书，1845，第2卷，第122页；奥托·维干德的《信仰的表白》（《Profession de foi》）。人们发现，在由弗吕贝尔（Fröbel）主编的《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的文学汇报》（《Comptoir littéraire de Zurich et Winterthur》）和《德国袖珍书》（《Le livre de poche allemand》）中，也有着同样的倾向。直到弗吕贝尔1846年失踪以前，他出版了一些被德国新闻检查所禁止的书。《德国袖珍书》是在1845年和1846年出版的。

de Silésie》)和《西里西亚年鉴》(《Chronique de Silésie》)的支持下,其社会倾向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这个运动的主要活动家是威廉·沃尔弗和爱德华·白尔茨(Eduard Pelz)。前者不久转向共产主义,后者则为民主的和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柏林这个拥有40万人口的、当时德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⁴,由于处在警察、法庭、国家职工和德国最反动的政府的新闻检查眼目之下,民主运动碰到的困难比别处大得多。

它的领袖是一些早期的青年黑格尔派。其中,柏林大学的privatdozent(大学讲师)卡尔·诺外尔克(Karl Nauwerk)对于民主运动所提出的任务有最明确的概念。从1844年起,在他讲授的《关于国家的几个主要哲学理论史》(《Histoire des principales doctrines philosophiques sur l'Etat》)中指出,民主国家是最合理的国家形式;这个国家的实现自然会使贫穷消除,而贫穷,责任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的漠不关心。在《西里西亚问题》(《La question silésienne》)⁵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工厂的制度必然要产生失业、乞食、酗酒和卖淫,他请求政府消除以无产阶级作为新形式的奴隶的现象。1846年他在《政治月刊》(《Revue mensuelle de politique》)中的文章也持相似的论点。鲁滕堡(Rutenberg)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月刊》(《Revue

⁴ 柏林在1847年约有作坊工人、工厂工人、商业雇员、手工业者和徒工七万人。手工业者或多或少是无产阶级化了的。三分之二的裁缝工人没有足够的工作,木工和锁工已逐渐失去其手工业的性质。大约有三十三个机器制造厂,雇用工人四千二百人——仅鲍尔西格(Borsig)的机车制造厂就占用其中的工人一千二百人;三十五个丝织工厂;二十二个印染工厂;十七个化学品工厂;十五个炼糖厂;三十一个造纸厂、印刷厂和制酒厂。

⁵ 见于《维干德的季刊》,1845,第一卷,第282和以下诸页。

mensuelle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vie sociale》)、泰奥多尔·弥格 (Théodore Mügge) 在《人民教育月刊》(《Revue mensuelle pour l'éducation du peuple》)、路德维希·毕勒 (Ludwig Buhl) 在《在普鲁士金钱与土地的独占》(《La domination du monopole de l'argent et du sol en Prusse》) (曼海姆, 1844) 和《对于工人阶级的贫困与为改善条件而给联盟提出的任务的考察》(《Considérations sur la misère de la classe ouvrière et les tâches qui se posent aux associations pour le relèvement de sa condition》) (柏林, 1845) 这两本小册子中, 以及格奥尔格·优利乌斯 (Georg Julius)、爱德华·梅因 (Eduard Meyen) 和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 (Karl Friedrich Köppen) 在不同的文章中, 也表述了类似的思想。

在还没有工业化的德国西南部各邦, 民主运动具有不同的特点, 因为它主要从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中得到启发。这个运动最初起源于纪念汉巴哈 (Hambach) 的节日 (1832) 和罗德克 (Rotteck) 与魏尔克 (Welcker) 那本博得极大成功的《国家字典》(《Dictionnaire d'Etat》)。它的主要中心是大公爵的采邑巴德。它在出版界, 特别是在《曼海姆晚报》(《Gazette du soir de Mannheim》) 方面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并且在议会中, 民主主义议员的讲话在整个德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回响。

最后, 在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这两个德国工业化最高的省份, 民主运动发展的特点是, 社会倾向特别突出。它的主要领导人是《莱茵报》早期的合作者: 陪审员格奥尔格·荣克、律师约瑟夫·G·孔帕斯 (Joseph G. Compes)、医生卡尔·路德维希·德斯特尔、作家伊格那茨·毕尔格尔斯。马克思所给予《莱茵

报》的这种社会倾向，在他曾参加的学习会的讨论过程中得到发展，在被织工暴动所引起的动荡不安的影响下得到加强。民主运动的小团体由于接纳了新成员而壮大起来了。新成员中有倾向于社会主义的B·拉弗欧（B. Raveaux），还有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军官弗里德里希·安纳克（Friedrich Anneke）、约瑟夫·魏德迈和奥古斯特·维利希，他们不久就放弃了军队生涯。

在联盟中，民主运动的成员们起初对工人阶级生活改善问题的纷乱思想，统一起来了，他们象科伦的德斯特尔和荣克那样，主张采取彻底措施消除贫困。在工人斗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在他们当中产生了分裂，比较温和的一派人如荣克，远离了共产主义，而另一派人如德斯特尔和魏德迈，则越来越与共产主义靠近了。

3. “真正的”社会主义

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基本上是由德国无产阶级的境况和它的斗争来决定的。1844年6月西里西亚织工暴动标志着斗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德国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政府压迫的自觉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从这次斗争开始的。

这次暴动，不仅对德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使得政府、特别是普鲁士政府和大资产阶级不得不改变它们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普鲁士政府被这次武装起义所吓倒，由于看到它在全民之中产生的反应而惶恐不安，假惺惺地装出同情无产阶级命运的样子。在一个夸夸其谈的诏书中，弗雷德里克·吉约姆四世号召一切有良心的人来为那些刚刚被他命令屠杀和投进监狱的工人们改善生活条件。他这样做是怀着双重意图

的：既可凭着搞一些慈善措施杜绝骚乱，也可把工人阶级贫困的责任推在资产阶级的头上。

这次武装起义也大大影响了大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大资产阶级和政府一样，担心止不住工人阶级的危险的动乱，最初积极参与了创立有利于工人的种种联盟，但坚决把它的援助限制在一些福利事业方面。这次武装起义，同时也使得大资产阶级对普鲁士政府的态度逐渐有所改变。它确实相信，对一个仍然处于半封建状态的专制政体不进行斗争，自己的阶级利益便不能得到全胜；但是它也考虑到，为粉碎无产阶级的暴乱，这个政府的支持对它还是必要的，因此反对政府的斗争不可走得太远。大资产阶级矛盾的政治态度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与大资产阶级不同，由于大工厂的竞争和反动政府的压迫而日趋贫困的中等阶级，是倾向于靠拢工人阶级的，但是留恋私有财产制度，反对通过革命途径使社会得到根本改变，他们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国家的民主化。

最后，织工暴动对德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个从1844年到1848年德国社会主义所具有的特定形式，是在西里西亚织工暴动把贫穷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诞生的。

它本质上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民主知识分子的产物。因为当时的德国与英国、法国不同，并不拥有构成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社会基础的强大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所以德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十分明显的理性的性质。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开始走向共产主义时那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酝酿他们的理论时，也是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出

发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把它抛开了，而他们却一直无法摆脱。费尔巴哈在他的《基督教的批判》一书中曾经指出，人通过把自己种属的特性外化而创造了神。而人却由于丧失了这些特性，变成了一个孤立的、自私的、甚至没有人性的个体。为了真正地再成为人，费尔巴哈说，人就应该废除宗教，从宗教那里把异化给神的种种特性再拿回来。从对于宗教的这个批判出发，他在1843年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提纲》（*Thèses provisoires pour la réforme de la philosophie*）和《未来哲学原理》（*Principes d'une philosophie de l'avenir*）中，阐发了一种基于人类学观点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人道主义学说，这就引导他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解决社会问题。

赫斯（Hess）在他的《论金钱的本质》（*De l'essence de l'argent*）这篇文章中，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抽出了一种共产主义理论，他指出，宗教的异化不过是在私有财产制中通过金钱而起作用的人的本质发生真实的异化的反映。在《共产主义信仰的表白答问》（*Profession de foi communiste par questions et réponses*）这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在这个制度中，人的活动——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对工人来说已变为一种异化了的的活动；他们劳动的成果转变为商品，这商品不归他们所有，而且，商品取得金钱的形式又成了剥削和压迫他们的工具。

为了把人从金钱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重新赋予他们的生命和活动以人的性质，就应该用那个能够消除竞争和利己主义的共产主义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另一些文章中，赫斯还不惮其烦地更加详细地阐明了这些思想⁶。赫斯说，费尔巴哈的功绩，

6 参阅《人的命运》，载 *Der Sprecher oder Rheinisch Westphälischer*

就在于通过他对宗教的批判，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真实的本性⁷，他的缺点是没有看到人的本质是由社会中人的集体劳动所构成的，从这里就产生了他的人道主义的过于笼统而抽象的观念。为要得到对于人道主义的最正确的观念，只要把费尔巴哈在他对宗教批判中的指导原则应用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中来就成了⁸。

只有这样，人们对于社会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观念。法国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对异化问题只从实践方面加以考察，而没有同时从理论方面进行思考⁹。

赫斯认为，只有劳动和快乐结合在一起的自由活动才允许人实现自己的本质，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追求利润和彼此竞争把人改变成为孤立和自私的个体，要进行上述的自由活动是不可能的¹⁰。从此，劳动者和他劳动的成果割裂开了，劳动成果变成了商品和金钱，而由于金钱统治一切，人逐渐丧失了人性，降

Anzeiger (№50, 22 juin 1844)

《进步与发展》、《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载 *Neue Anekdota* (1845) (《新秩文集》1845)。

《关于共产主义的两个演讲》，载 *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 (1845)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1845)。

《论我们社会的贫困及其补救方法》，载 *Deutsches Bürgerbuch* (1845) (《德国公民手册》1845)。

这些文章重印在：A. Cornu et W. Mönke, *Moses Hess, 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1837-1850*,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61. (A. 科尔纽与 W. 芒克：《莫泽斯·赫斯，1837到1850年的哲学和社会学的著作》，柏林，科学院版，1961)。

7 参阅 M. 赫斯：《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载 A. 科尔纽与 W. 芒克：《莫泽斯·赫斯》，第292页。

8 参阅赫斯：《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参阅同上书，第293页。

9 参阅赫斯：《进步与发展》，参阅同上书，第283及以下诸页；《论我们社会的贫困及其补救方法》，参阅同上书，第323页。

10 参阅《进步与发展》，参阅同上书，第283页；《人的命运》，参阅同上书，第275页。

低到动物的水平¹¹。

只有消灭这个制度，而代之以另一个制度，即随着消灭私有财产而消灭竞争、利己主义、人的孤立状态以及与人们对立的种种斗争的共产主义制度，才算是具备了为实现人的真实存在所必需的自由和友爱的合作的条件。

既然现社会的种种缺陷，不是个人而主要是环境造成的，那么，就有可能通过劳动组织、教育、训练以及友爱的普及，从资本主义和平地逐渐地过渡到共产主义¹²。

赫斯从共产主义中搞出来一个感伤的人道主义，他走得这样远，竟至对人类的命运作了一些暧昧的不着边际的考察，这些考察充满了说教和得自天启的预言¹³。

赫斯开始传播他的学说是在莱茵省，主要是在科伦，自他于

11 参阅 M. 赫斯：《论我们社会的贫困及其补救方法》，参阅同上书，第 313 页：“自私完成了它的循环，它在成为自私之古典的形式的竞争中，找到了它的完满的实现。”

12 参阅《关于共产主义的两个演讲》，参阅同上书，第 359 页。
参阅《论我们社会的贫困及其补救方法》，参阅同上书，第 318 页。
参阅《共产主义信仰的表白答问》，同上书，第 365 页：“有必要通过一道命令来消灭现在的所有制和金钱吗？这是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的。现实的所有制将会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所有制。一种合理形式的所有制是以一个合理形式的社会为前提的，而这个合理形式的社会，是以有教养的人为前提的。这种情况，就正如无机物之突然转变为有机物是不可能的一样。”
参阅《论我们社会的贫困及其补救方法》，同上书，第 315 页：“教育组织和劳动组织，我们正是应该用这些东西来代替我们现在这种天上的和地上的生活方式。”

参阅《关于金钱的本质》，同上书，第 334 页：“爱，到处显示的爱，说明它比自私还要强而有力。”

13 参阅 M. 赫斯：《关于共产主义的两个演讲》，参阅同上书，第 352 页。
参阅《人的命运》，参阅同上书，第 277 页。
参阅《论我们社会的贫困及其补救方法》，参阅同上书，第 320 页：“是的，

1884年初从巴黎回来以后便定居在这里了。由于当时贫穷问题引起人们的兴趣，以及由于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围绕着这个问题议论纷纷，使他在那些被社会主义吸引的知识分子当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门徒。他们积极宣传他的思想，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很快传遍全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人民的贫困，看到由于社会愈益分化为占有者和非占有者这两个对立的阶级而引起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¹⁴，于是他们从这个事实出发，认为斗争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使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人的本性——能发扬友爱精神——的话。

这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正如赫斯一样，把社会问题唯心化了，他们认为解决的办法就在于使人获得对于自己真正本性的意识，而这，通过教育和训练，是可以办得到的。

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唯心观点方面超过了赫斯，比赫斯更进一步，把目前人的非人状况不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归咎于它的某一特殊方面；在他们看来，竞争的恶果首先不是劳动人民的贫困，而是所有的人身受其害的日益普遍的利己主义

我们要把他的上帝、他的被异化了的权力和他的被异化了的的存在，归还给人类……是的，我们相信人们有一个比只是互相剥削更为崇高的命运。他曾向你们说过，人能同时侍奉两个主子：上帝和金钱；但是，我们，我们要对你们说，人哪一个都不要去侍奉，如果他有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的话……我们不愿意当着你们的面行使法官的职权；时间将要审判你们，并将实施它的判决，一个象世界末日审判那样的使人吓倒了的判决。”

14 参阅 O. 吕宁：《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中的《对现在的一瞥》一文，1845年，第1卷，第299页：“大资本越来越吞噬着小资本……从这里必然会得出这个结论：自由竞争最终只能产生一边是无穷的财富，一边是无穷的贫困，而社会因此不可避免地分为两个阵营，一面是一小群占有者，一面是一大片不可胜数的非占有者。”

和孤立¹⁵。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从竞争的作用和后果这个概念中，引出了对社会问题的乌托邦式的解决办法：消灭竞争，这就是说，在消灭利己主义的同时，把人的特性归还给人。他们认为，通过人道主义的实践——共产主义的要义正在于此——，社会的变革是可以办得到的¹⁶。

这种人道主义的实践将通过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紧密的结合来进行，这将使得合理安排劳动成为可能，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也正如对一切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一样，这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基石。通过竞争和利己主义的消灭，它将赋予劳动以一种真正的人的性质，使劳动成为快乐的源泉并使人的生命因此获得新生¹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劳动组织，正如对于利己主义和结合一样，是从一种绝对的观点去思考的，他们的观念，甚至比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更富于空想性，因为他们对劳动组织不分析它的现实条件和后果，正如他们在结合和爱情中所看到的那样，他们

15 参阅 O. 吕宁：《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中的《工资与劳动力》一文，1845年，第167页：“统治现实社会的思想是利己主义，这个社会的形式是孤立，是个体人彼此对立的敌意，它的原则是：人人为自己而反对任何人，这种思想的经典的说法是……自由竞争构成了利己主义的顶峰和极限。”

16 参阅《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中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文，1846年，第458页：“如果无产阶级不被消灭，那么人道主义是不能解放人类的，而且，如果作为现实社会之原则的孤立不被消灭，那么无产阶级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如果人道主义愿意看到成功的机会的话，那么它就应该转变为共产主义；人道主义不应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为精神的自由而斗争，它还应致力于实现物质的自由，致力于消灭压在人民肩上的贫困，消灭那些使精神的发展成为不可能的不道德的社会条件。”

17 参阅科尼克博士(Dr. König)：《社会明镜》中《劳动的快乐与痛苦》一文，1845年，第43页：“不伴有劳动的快乐不能使人真正地享受生命，而不伴有快乐的劳动则不能成为人的真正的活动。”

在劳动组织中看到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魔术的指环¹⁸。

这种对于社会问题的乌托邦式的看法，同样极好地说明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和法国社会主义的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绝对地非难自由主义，认为它在当时领导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他们斩钉截铁地拒绝自由主义，因为它反对工人阶级，并且尤其因为它加强了人的利己主义思想和孤立状态¹⁹。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非常傲慢地对待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们，责备他们没有能力把唯一能够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人道主义提到哲学的高度。

这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正如一切空想家一样，把这个问题给转到思辨的领域里去了，并且认为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是由精神的发展所决定的。从此，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们努力宣扬，要人们知道他们的计划如何卓越，要人们确信他们计划的实现必然只能引到美妙境地；从此，也出现了这种看法：精神的斗

18 参阅 O. 吕宁：《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中《工资与劳动力》一文，1845年，第167页：“统治未来社会的思想是爱、忠诚，它的形式是结合、兄弟般的团结、集体的活动，它的原则是：人人为全体，全体为人人，只有在这个旗帜下，才能实现一种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而和谐的幸福，一种每个人都满意的生存。”

19 参阅《社会明镜》中《文明世界中的社会状况》一文，1845年，№1，第2、3页：“在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的贫困面前，在利润满天飞的最自由的国家中已达最高水平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仍然忠实于它的幻觉，不断作出徒然和毫无成效的努力去消灭社会上的弊端，这只能使人厌恶……”

“人们还不愿去看到，只是自由竞争、个人的利润、以及缺少有组织的劳动、缺乏调整得很好的社会关系和一种合理的教育，才是我们社会里一切弊端的真正原因。人们总是相信，通过政治训练、警察制裁和种种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律，就可以清除那些弊端。”参阅(O)吕(宁)《世界大事》，载《威斯特伐里亚汽船》，1846年，第255页。

争、人获得对于真理的意识²⁰、教育和训练，具有了头等的重要性，因为正是由于它们，共产主义才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既然非难使用暴力，认为它是无用而徒然²¹，他们首先是诉诸理性和爱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所以，社会问题在他们那里已失去阶级的性质，社会上的真枪实弹的战斗，基本上被归结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

理性具有一种使它易于为一切人、特别是为开明的人所接受的普遍的特性，这一事实说明，何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很少向无产阶级作宣传，而是向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作宣传，在他们看来，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会更好地直接实现社会改革²²。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经常地诉诸理性，并且更经常地诉诸爱的魔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结果产生了他们的纯粹无稽之谈的倾向，这一点，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很突出，而对社会事实肯加以分析的却很少²³。也正是在这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彼此才有所

20 O. 吕宁：《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中《当代展望》一文，1845年，第62页：

“在我们人类的意识中，现在正展开一场比强大的拿破仑的军队更加重要、更加富有功绩的战斗。这就是精神，它现在正在展开战斗，让沉重的压在人类上面的成见在它的利剑前面化为尘埃，整个旧世界在它的一吹之下，爆破坍塌”。

21 O. 吕宁：《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中《为了新年》一文，1845年，第151页：

“骚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仍在使世界不安的那些问题要求用人类的精神作严格而深入的分析。高尔蒂欧斯的结子应该解开，不应用剑把它斩断。”

22 O. 吕宁：《德国公民手册》中《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1846年，第244

页：“但愿它（资产阶级）放弃自己是一个特殊阶级的偏见。事实上，只是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在最高的人类的概念中找到正确的解决的时候，革命中的种种残暴行为才能避免。”

23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1846年，第149页：“爱情哟！这是所有甲冑里面最好的。联合哟！如果这个有魔力的字用火焰的字母刻在你的胸膛上，你只要大胆地发出一声胜利的呼唤，那么，大地，我们的母亲，就将会在她的深处快乐地颤抖了。”

区别，人们甚至可以从那些在思想上对于经济和社会关系多少有点认识的人到只满足于对人道主义喋喋不休而不知所云的人，开列一个层次表。一些人，比如魏德迈和赫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努力把他们的思想建立在事实的分析上，而另一些人，比如奥·吕宁、海·皮特曼、而特别是卡尔·格律恩，则是信口开河，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

奥托·吕宁(1818—1868)，威斯特伐里亚的莱达地方的医生，他只在他的杂志《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从感伤的人道主义的观点评述每天发生的事件。

象吕宁一样，海尔曼·皮特曼(1811—1874)是通过赫斯皈依“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他同样满足于在他出版的杂志《德国公民手册》和《莱茵社会改革年鉴》上玩弄一套人道主义的无稽之谈²⁴。

这种做法，在卡尔·格律恩(1817—1887)的手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842年，由于他写给《曼海姆晚报》的文章的激进倾向而被逐出巴德以后，他首先又寄一些具有傅立叶主义倾向的文章给《停战报》和《维塞尔周刊》，接着，他就在一些华而不实的文章和他出版的《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和《从人的观点来看歌德》(1846)等书中，以报纸副刊的笔调，噜噜苏苏地反复着人道主义的论题²⁵。

24 参阅H.皮特曼：《莱茵社会改革年鉴》中《洪水之后》一文，1846年，第226页及以后诸页。

25 参阅K.格律恩：《Neue Anekdota》(《新秩文集》)杂志的序言，1845年，第Ⅵ和Ⅶ页：“另外，它还宣告了德国的一种新文学，一种年轻的文学。新，因为它是一种包含着新的东西的科学，一种新秩序的科学；年轻，因为它宣传要排除衰老的和老年的利己主义，而代之以一种人类爱情的再生，代之以一种真正的社会生活的美。在这里不再有强光激响，不再有秽事丑闻，不再有党派团体，不再有纤巧精工，这里所关心的乃是如何细心地从德国哲学中抽出它的一切后果，它将给饥饿者以使他再活下去的面包，给

正象“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们一样，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阶级作靠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只有出版书刊作为他们宣传和行动的工具，因此，他们也不得不象上述两派的作家们那样，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战斗。他们的出版物差不多都是杂志，由于篇幅超过二十印张，就免于遭受书报检查。

他们的主要杂志是：《社会明镜》、《威斯特伐里亚汽船》、《德国公民手册》、《莱茵社会改革年鉴》以及《新秩文集》²⁶。

这些刊物主要是受了弗·恩格斯在1845年5月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启发。在这本书中，恩格斯动人心弦地描写了英国无产阶级的可怕的贫困，他指出，这种贫困是工业革命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它是由于工人之间竞争的加剧、工资的不断下降和工时的越来越延长所引起的。同时他着重指出，贫困的日益加深，必然会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导致共产主义革命。

“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刊物上是把上述这种分析当作范本来对德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加以描写的。由于它的乌托邦主义的倾向，由于害怕法律上的起诉——从一开始就使得它的生存成为偶然——，它不象恩格斯一样地明确表示无产阶级的贫困乃是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并且，特别是它不象恩格斯那样得出结论说，贫困必然产生社会革命。

劳损者以使他得到滋补的美酒。这里所谈论的乃是一种科学，它不仅与生活密切有关，是生活的反映，而且它本身一经接触也就变成了生活，问题在于如何使科学变为生活”。

26 在这里，我们将不研究K.格律恩的《新秩文集》，因为这些在1844年被检查过的文章，对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时代不甚有关。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刊物，由于它们研究社会问题的方式不同而表现出彼此有所区别。

在1845年和1846年赫斯出版的《社会明镜——为保卫非占有者阶级和为解释社会现状的机关报》，是最靠近工人阶级的一个刊物。在一篇由赫斯执笔的《前言》中写着它的纲领：“为了要找到并应用那些根本办法，以便医治我们社会的复杂并时常被掩盖起来的弊病，首先认识这些弊病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明镜》尽量根据事实努力把它们揭示出来的缘故。我们最关心的是工人阶级的状况，工人阶级的遭遇在我们现在社会所有的不幸中是最突出的。我们不但对工人的物质条件，而且对他们的精神的、理智的和道德的情况，同样要很好地加以考察。在非占有阶级的状况之外，我们也要描述占有阶级的状况。我们要表明，根据事实，夺取财富的自由竞争、劳动组织以及社会关系组织的缺少，使得中等阶级在财富逐渐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并因此间接地确立了后者的独占情况下，陷于贫困；我们要表明，土地的分割使小土地所有者破产而有利于大土地所有者的兴起；我们还要表明，由于竞争而产生的这个连我们也被拖进去的斗争，动摇了我们社会的基础，利己主义的泛滥败坏了我们的社会”²⁷。

《社会明镜》中满足纲领要求的《文明世界里的社会状况》一文，陈述了德国、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注解，详细地再现了德国无产阶级不可言状的贫困。如果说，这个对于无产阶级境况的描写还能唤醒德国工人的阶级意识并鼓舞他们的斗志，那么，相反地，它的一些理论考察则远不能与恩格斯的相比。事实上，在那里既没有象恩格斯把

27 《致〈社会明镜〉的读者和合作者》，载《社会明镜》，1845年，第一分册。

无产阶级的贫困作为工业革命发展的后果那样明确而深入的分析，更没有把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景作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结果来说明。从此便得出了赫斯所坚持的唯心主义的结论：工人阶级的贫困，与其说责任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如说在于对占有阶级缺乏了解。于是赫斯号召开明的资产阶级来解决社会问题²⁸。

尽管《社会明镜》有这些弱点，但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功绩：它是第一次在德国明确而详细地陈述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使工人阶级看清了它的生活条件和阶级利益，这说明了《社会明镜》比其他杂志包含的人道主义的无稽之谈要少一些。

从1845年到1848年由奥托·吕宁出版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派的刊物中最接近于《社会明镜》的倾向的。正如《社会明镜》一样，它揭示出工人阶级的贫困以使人注意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必要性；但是同时，它又远比《社会明镜》更努力于争取开明的资产阶级来从事于社会主义事业，这说明它对自由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还是看得很重的。这种双重倾向，成了吕宁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中以《世界大事》为题所写的一些文章的特征。

他比赫斯走得还要远，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应归咎于竞争和利己主义，因此，他也就比赫斯更严重地认为只有消灭竞争和利己主义，才有条件消灭贫穷，才能达到人类友爱。从这里，也就产生了充塞在这个刊物里的大量的人道主义的夸夸其谈。

在《德国公民手册》和《莱茵社会改革年鉴》中，谈论工人阶级

28 参阅《社会明镜》，1845年，第1页，莫·赫斯：《致《社会明镜》的读者和合作者》。

状况要比谈论人道主义少得多。

海·皮特曼在1845年和1846年出版了《德国公民手册》，它的倾向是在一篇由他执笔写的《前言》中这样确定了的：“我们宣告我们参加了一个公共团体，这个团体在我们看来是必要的并且为了它我们愿意进行斗争，在这团体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公益而不是利己主义。在我们传统的国家里情况如何呢？利己主义到处蔓延流行，象毒药一样阻止了自由精神和纯粹人性的发扬。因此，我们要努力寻求利己主义的原因，揭示它的危害，以便启发群众意识”²⁹。

我们了解，有了一个这样的纲领，在这个杂志里是谈不到对社会问题会有严肃的分析的。下面这一点很能标出这份杂志的特色：以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仅仅只有一篇而且是关于罪犯的情况的。而人道主义的废话在这里却大肆泛滥。这种夸夸其谈的最佳样品之一是卡尔·海因岑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非难所有的人民的暴乱，他想，要处理社会问题，只要“精神的宝剑握在道德力量的手中”，“人们以巨响宣告法律和真理”，这样就足够了³⁰。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也是由海·皮特曼在1845年和1846年出版的，而且具有相同的性质。其前言和《德国公民手册》的相类似，在这篇前言里，皮特曼对过去的学说和所有利己主义的表现加以非难，他自我推荐说，在他的杂志里他将帮助所有绝望的人，安慰他们并使他们确信未来将会给他们带来和平与幸福³¹。

29 参阅《德国公民手册》，1845年，《前言》，第V页。

30 参阅卡·海因岑：《关于合法抵抗的一点意见》，载《德国公民手册》，1845年，第1卷，第1—21页。

31 参阅海·皮特曼：《前言》，载《莱茵社会改革年鉴》，1845年，第V页：“希望

除这些刊物以外，由斐迪南·贝伦德(Ferdinand Behrend)于1846到1848年在布累斯劳出版的《人民之镜》，在西里西亚宣传社会主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它在宣传方法上和《社会明镜》有一点是相似的：揭示出工人阶级的贫困，也指出贫困的原因。

在这些刊物出版的同时，也出现了数目越来越多的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倾向的报纸。其中特别应该提一下越来越受读者欢迎的《停战报》。它在K·格律恩的指导下倾向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对在德国传布社会主义有着很大贡献。

尽管“真正的”社会主义有着感伤的、空想的性质，可是那时还不存在强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它通过出版刊物把社会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它在初期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事实上，直到那个时候，社会问题在德国还没有真正被提出来，人民的贫困在这个国家里好象是一件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为上帝所嘉许的事，人们只能通过慈善事业对它予以补救。“真正的”社会主义利用了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在整个德国所引起的反响以及贫穷问题所引起的骚乱不安，虽然是在人道主义的情感的范围里处理这个问题，抛弃一切革命前景而对它给以乌托邦式的解决，但却使得社会主义成了广大人民可以接受，特别是中等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由于出版刊物越来越广泛，社会主义竟被弄得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以致于社会主义思想在政府、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瞠目结舌之下，象瘟疫一样地传播开来。这样，它间接地给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道路，它通过对于工人阶级的贫困、贫困的原因

这本书象美杜斯(Meduse)一样，对那些拒绝去了解的人发生作用罢，他们是配得到他们所不愿意逃避的那种命运的。对于其他一些人，对于通过精神去进行斗争的人，特别是对于所有受压迫的人，它将给他们以鼓励和安慰：未来也要给他们的心带来安静与和平，并为他们的家园祝福。这本书是献给绝望的人们的。

以及补救贫困的方法等等的描写，把工人阶级从漠不关心的状态中摇醒了，因此也就便利了后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如果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起初还表现出有益于工人阶级——因为德国的境况当时是那个样子——的话，那么，由于对社会问题的感伤的、空想的想法而使工人阶级偏离了阶级斗争，因此它很快又变得有害于工人阶级了。另外，由于它不停地批判自由主义，不顾资产阶级当时领导着反对反动派的斗争十分尖锐，对自由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加以非难，因此它也具有一种反动性。

这两点理由，说明了何以从1845年末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批判的对象。

4. 手工业共产主义

在“正义者同盟”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德国手工业共产主义，则以另外一种方式，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地为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道路。当“真正的”社会主义把贫穷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通过它所给与的乌托邦式的、伤感的解决办法引起广大公众的兴趣的时候，德国手工业共产主义，则通过不懈的宣传和创立秘密小集团，在那里开始聚集帮工（Compagnons）和无产者，为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传播作好了准备。

德国手工业共产主义，是在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当时在法国广为流传的丰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鼓舞下，于三十年代在巴黎诞生的。巴黎当时是个主要的中心，许多德国的手工业者、特别是裁缝和制造乌木家具的工人都到那里去，以便改进自己的手艺。他们当中一些最进步的分子先是在“放逐者同

盟”(La Ligue des Bannis), 后来又在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正义者同盟”这样一些秘密协会中聚集。威廉·魏特林这个年轻裁缝, 是“正义者同盟”的成员, 他于1838年就曾在一本名叫《如是和应该如是的人性》的著作中吐露过他们的苦衷和向往。在这本书里, 他曾用所有的人在其中将是自由而幸福的具有手工业者的灵感的共产主义制度, 来反对那个作为工人阶级的贫困的制造者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本书, 以及他后来于1842年在瑞士出版的那本内容更广泛更深入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在德国的革命的帮工们当中得到了极大的反响, 他们在旅行的过程中很快地把他的学说传遍了德国。

这些在技术和智力方面都远比手工业工场和机械工厂的工人高明的革命的帮工们, 在那时是比工人们更有能力去谈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 而且因此也就能更好地直接保卫他们的利益。这就是这些帮工们在1848年大革命以前在法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中扮演极其重要角色的原因。

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加强了阶级意识和战斗热情, 实际上已允许他们上升到了一种革命的水平, 而这个革命的水平, 德国无产阶级只是在1844年织工暴动之后才达到。

德国手工业共产主义的性质在每个国家里是按无产阶级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

在伦敦有一个在R. 沙佩尔、J. 莫尔和H. 鲍威尔领导之下的“正义者同盟”的非常活跃的小组。那里的德国手工业共产主义在英国无产阶级的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之下, 很快失去它特有的性质。

在法国, 手工业工场在生产中还起着巨大作用, 手工业工人的数字依然非常可观, 而无产阶级的影响几乎感觉不到, 这就允

许法国手工业共产主义在很长一段时期保持着自己的特性³²。

在德国更是这种情况，在那里无产阶级运动才开始形成；尤其在瑞士，由于几乎完全没有无产阶级，手工业的优势比德国的还要大——人们统计，在1846年仅苏黎世一地区就有一万二千手工业者。

德国手工业的帮工在瑞士组织了两个团体，一个是在“青年德意志”的民主运动影响下的团体，领导人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信徒：威廉·马尔（Wilhelm Marr）、海尔曼·德勒克（Hermann Döleke）和尤里乌斯·史当多（Julius Standau）。在《当代社会生活报》中，威廉·马尔散布一种民主的人道主义，在德国手工业者那里得到很大反响，但远离了共产主义。“青年德意志”的成员在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后受到法院的追究。威廉·马尔被驱逐出瑞士，后来回到德国，从此不再参与社会运动，而德勒克和史当多则到阿尔及利亚去避难。这样就导致了“青年德意志”和在它影响之下的德国手工业团体宣告解散。

德国共产主义的其他帮工们，在魏特林被驱逐以后，是由他的主要门徒奥古斯特·贝克尔领导的。贝克尔倾向于从路易·布朗克和维克多·孔西得朗抄袭来的改良主义思想；他在他的刊物《快活的信史》第5号中有着这样的说明：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把财产分割成为小份，这是消灭人的剥削和维护自由的唯一办法。另外，在一篇《致富人的信》中，他又请求富人们放弃自己的财富来满足穷人的需要。

32 在这里，我们将不研究在伦敦和在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共产主义运动。对于前者，我们将在叙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4月在英国旅行时同“正义者同盟”接触的机会加以分析；对于后者，将在恩格斯在巴黎“正义者同盟”内部引起骚动时加以分析。

奥·贝克尔的学说的不可靠性，当人们看到格奥尔格·库尔曼(Georges Kuhlmann)出来支持他的时候，便昭然若揭了。库尔曼，一个被雇佣的经纪人，利用了帮工们的轻信，向他们宣告：任何人在那里都可自由地做他喜爱的事的一个人间天堂就要来临了；这个天堂不仅具有一种平等的性质，而且也按照资格和才能的不同分成级别。

奥·贝克尔也与尤里乌斯·特莱契勒(Julius Treichler)有联系。特莱契勒不同于库尔曼，是一个诚实的社会主义者。在他的《揭示贫困并补救贫困汇报》中，他鼓吹普及教育和训练来改革社会，但同时又认为人们由于无知不能够解放自己，并且他认为应该由国家来保证无产阶级得到他们理应得到的生活。

受到保守派攻击的特莱契勒，也象奥·贝克尔一样，在一项反对共产主义的例外法于1846年3月表决颁布以后，看到自己已不得不暂停活动。同月，特莱契勒的日报停刊了，而贝克尔也逃亡国外，这就使得在瑞士的德国手工业共产主义运动暂告结束。

直到1844年织工暴动为止的无产阶级运动和共产主义的发展

在1844年以前，人们不能肯定地说有了德国工人运动；由一个可怜的、从整体来说是被动的阶级构成的德国无产阶级，只是在被贫困逼得忍无可忍的时候，才零零星星地起来暴动。随着纺织工人大暴动，阶级意识在德国无产阶级心中开始产生了，这使他们知道组织起来并以比若断若续的暴动更好的手段——罢工——来进行战斗。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织工暴动以后，从围绕着贫穷问题而

产生的动荡不安中接受到一次强大的推动。工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资产阶级为减轻他们的贫困而想出来的那些慈善措施——比如创办什么储蓄银行——，只不过是毫无实效的装饰品，而工人们实际上连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从此就产生了他们和革命的帮工们联合起来的倾向。在四十年代以越来越多的罢工的形式所表现的追还所有权的运动，部分是依靠革命的帮工们所建立的互助基金 (caisses de secours) 的帮助。在没有任何权利进行结社的情况下，这些基金使他们有可能进行议论和保证在需要时领取一些救济金，也同样给他们提供了创立秘密小团体的机会。这些秘密小团体以文化小组的面目出现，从而掩盖了它们非法的性质³³。正是在这些团体里帮工们和无产者开始联合起来。这些团体的形成，使手工业共产主义特有的性质逐渐失去，于是就有条件进行日益趋于统一的工人运动。

革命的帮工们最初是这些小组的活跃分子。比如，鞋匠帮工弗里德里希·门德尔(Friedrich Mentel)于1845年离开巴黎以后，在基尔建立了一个手工业者小组；木匠弗里德里希·马尔旦(Friedrich Martens)于同年在汉堡创办了一个工人文化协会；另外，木匠L. G. 施特肖(L. G. Stechau)在汉诺威也参与了

³³ 1845年，在汉诺威成立了排字工人的读书小组；在汉堡成立了手工业者和工人的文化小组；在不利格成立了帮工和工人的合唱团；在不伦瑞克、马格德堡和斯图加特成立了印刷工人的文娱小组。参阅托德与拉当的《德国工会运动起源的历史大纲》，柏林，1950，图表第82页。在这些不同的小组以外还有体操小组。埃尔富特(Erfurt)省主席在1845年9月25日的一封信里说：“在年轻的手工业工人合唱里表示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倾向。”Landesarchiv Gotha, Landratsamt Heiligenstadt, №1011(哥塔地方志，地方邦议局圣城档案，第1011号……)；有关民权党的骚乱的记录。第58页。

一个工人小组的建立³⁴。

由不同职业的帮工们和不同工业部门的工人集合在一起的这些小组创立以后，德国工人运动就逐渐统一，并且由于在他们之间建立了积极的通信联系而使得这种统一范围越来越大³⁵，它们的创立同时也便利了工人阶级的要求追还所有权的运动并加强了它的战斗力，这一点，从罢工次数的不断增加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从1800到1844年，工人和帮工们就有过二十三次停工。从1844到1846年，就有以下的罢工：裁缝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次罢工；船工在格隆的罢工；铁路工人在萨克森的罢工；挖土工人在英戈耳施塔特的罢工；炼糖厂的工人在马格德堡的罢工；印染工人在柏林的罢工；木工在伦斯堡的罢工；裁缝工人在卡尔斯鲁厄的罢工；铁路工人在勃兰登堡和埃尔平的罢工³⁶，等等。尽管这些罢工都由于残酷镇压和缺乏支援不能长期坚持而宣告失败，但是从整个来看，它们已具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因而也加强了工人之间的互助友爱，加强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热情。

马克思、恩格斯和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形成的开始

正是在西欧、在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之密切联系的德国的无产阶级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普遍状况中，马

34 参阅W.施埃德：《初期的德国工人运动》、《在1830年革命之后与外国人协作的最初十天》，斯图加特，1963，第304—306页。

35 参阅W.施埃德，前引书，第305页。

36 参阅E.托德与H.拉当，前引书，表第72—78页。

克思和恩格斯才为一个唯一能坚决而合理地保卫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新的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他们不仅在实践领域里这样做——开始与一些大的中心首先是伦敦和莱茵省取得接触,在这些地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向前发展——,而且还在理论领域里这样做——不断深化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是他们以前不曾草拟过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

他们的理论所依据的,不是还处于落后状态的德国的状况和处于开始阶段的德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他们从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吸取的经验,以及法国和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的条件。

因此,他们并不是从一般穷人——其中包括 Lumpenproletariat (流氓无产阶级)——的贫穷这个角度,而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这一角度,提出社会问题的。

形成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准备工作,是在 1845 年通过以下三部著作进行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部著作只是由一篇简短的文件构成);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由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共同执笔写成的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从《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神圣家族》中得出的基本原理,加以深化和综合,指出如何可以从 praxis(实践)这个概念里得出一个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既具有辩证的性质,也具有历史的性质,它之有别于唯心主义观点正如它之有别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一样,他同时还指出,何以只有这个观点才能给予我们关于社会和历史问题以合理而正确的解答。

当马克思在《提纲》中确定了几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时候,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指出,

近代英国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状况，如何被工业革命的发展所决定。继《英国状况》一文之后恩格斯在该书中着重指出——虽然不怎么系统，但很详细，比他在《德法年鉴》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还要详细——，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制约着经济状况、社会状况的发展以及阶级斗争的发展。关于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释历史，他提供了一个空前的伟大的范例。

正是根据这个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象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写的那样；也象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实际应用了这一观点去分析历史的一段特定时期那样——，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类历史的进程如何被生产力和从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之辩证的发展所决定。

正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的制定和应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积极参与国际范围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并逐渐取得斗争的领导地位。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越来越系统地与不同国家的工人运动取得了接触，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跟阻碍工人战斗的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和空想主义所进行的斗争是毫不留情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定他们的理论的时候，还几乎是很孤立的，但由于各国的工人斗争日益加强，很快他们就在思想上和斗争上同一些帮工们联系在一起。由于他们同德国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因此，首先是一些德国人——威廉·沃尔弗、格奥尔格·维尔特、约瑟夫·魏德迈、卡尔·德斯特尔——逐渐摆脱了民主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接受了他们的思想，并越来越紧密地参加了他们的斗争。

1. 威廉·沃尔弗（1809—1864）

威廉·沃尔弗出生在西里西亚的一个村庄里，从他幼小时

起，对于仍在半封建条件下生活着的农业无产阶级的贫困，以及越来越被剥削的工业无产阶级——特别是那些被手工业工场和大工厂的竞争所压倒的生活在农村的手工织布工人——的贫困，就认识到了。他在布累斯劳大学攻读古典哲学的时期，加入了Burschenschaft（德国大学生协会），这是革命学生的一个非法组织，在1834年他还因此被判了六年监禁。恢复自由以后，他参加了在西里西亚刚刚形成的民主运动，在他活动期间，不但表现出理论方面的巨大能力，而且还表现出宣传和组织方面的一种特殊才能。他越来越坚决地站到受压迫的人民一边，在写作中，他喜欢选择社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1843年11月18日的《布累斯劳日报》上登载了一篇名为《Les Casemates》（《暗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对被圈在破烂不堪的阴暗的平民窟中的老人、病人和失业工人的令人不能置信的生活条件，作了一番动人心弦的描写。这篇由于激起争论而获得巨大回响的文章，有助于促使威廉·沃尔弗走向社会主义。最初，他对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还存有幻想，认为教育和训练是改变社会的最合适的办法。但是不久他就意识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上，改革是不够的，那只不过是一些毫无实效的装饰品；他认为要消灭贫困，也许只有社会革命才有效。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的一些文章帮助了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指出，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情况下产生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使工人阶级得到解放。

威廉·沃尔弗的思想倾向，由于1844年6月西里西亚织工的暴动而加强了。他勇敢地站在被屠杀和被监禁的织工这一边；在自己的文章中特别是刊载于1845年《德国公民手册》里面的《贫困与西里西亚的暴动》一文中，他已经不满足于象《暗窟》那样

仅仅描写无产阶级的贫困并谴责那个产生贫困的制度，而是进一步指出，贫困的消灭只能来自一场社会革命。

他对这次暴动的原因加以研究，指出它乃是机械织工对手工织工的竞争之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竞争在乡村织工那里造成了一种无法形容的贫困。总之，他又说，这种贫困不过是成为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牺牲品的工人阶级总的贫困的一个方面。使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加剧的这种贫困的日益严重必然带来社会革命，而西里西亚的织工暴动，就是在德国的一个预报的信号。沃尔弗庆贺织工们的勇敢，庆贺他们在自己的战歌《血腥的法庭》中所表现的对于本阶级的意识的觉醒，他指出，正如在他之前马克思在反对卢格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次暴动的特别重要性在于它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伟大的革命示威。沃尔弗把这些思考又扩展到德国工人阶级的整体方面，分析了小农和农业工人的贫困及其原因，指出，被吹嘘成是农民阶级的一场伟大解放运动的普鲁士农业改革，实际上只是使小农由于必须交付沉重赔款——为的是免除什一税和年金——而遭到破产。陷于贫困的小农又来加强了农业无产阶级的队伍，而后者的命运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命运是同样悲惨的。

在这篇公开肯定共产主义的文章发表以后，沃尔弗与民主主义者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中断了关系。这些人尽管批判产生贫困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但是他们只想求助于种种无效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并不给私有财产制带来任何损害。

正象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沃尔弗当时认为，最紧迫的任务是给无产阶级指明它贫困的原因和它求得解放的条件。这就是他直到1846年4月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遇之前活动的主要目的。在谴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同时，他于1846年2月和

9月又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发表文章，提请无产阶级保持警惕，反对那些能使它脱离阶级斗争的改革计划。他特别提到民主主义者爱德华·裴尔茨（Eduard Pelz）。这个人，在曾经勇敢地批评了西里西亚的半封建制度并提出一些民主的、社会的改革计划以后，现在，正象在他以前A·卢格所干的那样，竟由于害怕无产阶级革命而攻击起共产主义来了³⁷。

威廉·沃尔弗在通过出版进行活动的同时，在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工人当中展开了积极的宣传，并鼓动在整个西里西亚成立共产主义团体组织，光这一点就使他配得上被称为“贫穷的骚动者”。

为了躲开法庭的追捕不得不逃避，他流亡伦敦，之后又于1846年4月到布鲁塞尔。他在这个城市里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遇标志着他生命中一个新时期的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完全使他折服；由于他刚强的性格、宣传家和组织家的才干、以及敢于接受任何考验的勇气，使他成为德国共产主义最坚强的先驱者之一。

2. 格奥尔格·维尔特（1822—1856）

格奥尔格·维尔特是一个耶稣教教堂大总管的儿子，正如恩格

37 E.裴尔茨出版的著作：《La justice patriomoniale》（《遗产的正当性》）、《Extraits des mémoires d'un paysan silésien》（《一个西里西亚农民的回忆选段》），不伦瑞克，1843。《L'administration des communes rurales》（《农村公社的行政管理》），布累斯劳，1845。用笔名特罗蒙德·威尔普（Treumund Welp）写的《Sur l'influence des fabriques et des manufactures en Silésie (quatre lettres)》（《关于工厂和手工业工场在西里西亚的影响（四封信）》），莱比锡，1843—1846。

斯一样，想必在他幼年时代就对他家里的保守思想进行过反抗。1842年在波恩一个富有的亲戚那里当伙计，1843年作为商业旅行者动身去布拉德弗尔德 (Bradford)，那时他已具有民主主义思想。他在那里对英国的异乎寻常的工业发展感到吃惊，而同时，也象弗·恩格斯有过的感觉那样，对工人区的凄惨景象和英国无产阶级的贫困感到愤恨不平。对工人阶级的同情心使他走向共产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他的这些新思想最初是在1844年12月24日给他兄弟的一封信中流露出来的。在这信中他写道：“人们不久将要把黄金之神扔到垃圾堆里去，而罗特西尔德 (Rothschild) (以色列大银行家，1743—1812——译者) 将要在他的宝库上面饿死。在这里，只要两年连续歉收和一次商业危机，就足以爆发一次革命。这场革命不是指向王权，不是指向国会里的蠢事或是指向宗教，而是指向财产。工人从来没有因宪章派的鼓动、革命者的请愿和集会而实现自己的计划，所以他们将要用破坏金钱的办法，来摧毁现社会的根基。我确信用不了多久，象你在西里西亚曾看见过的同样的起义，在这里将要爆发，所不同的是，在西里西亚，工人被投进了监狱，而在这里，他们将取得政权”³⁸。

维尔特和当时在邻城曼彻斯特暂住的恩格斯的友好关系³⁹，使他坚信了这些思想。怀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满腔仇恨和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坚定信念⁴⁰，他与宪章运动的领导者特别是朱利安·

38 参阅《维尔特全集》，B.凯塞编辑，柏林，1856—1857年，第5卷，第140页。

39 参阅《Der Sozialdemokrat》(《社会民主杂志》)，第24号，1883年6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6页；恩格斯关于G.维尔特的回忆。

40 参阅G.维尔特给弗里德里希·奥斯姆·维尔特的信(布拉德弗尔德，1845年1月22日)，《维尔特全集》，第5卷，第150页；给他的兄弟威廉的信，(布拉德弗尔德，1845年3月12日)，同上书，第156页。

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建立了联系，并且也象恩格斯在曼彻斯特那样，接触了工人的生活。

在他所写的诗歌和故事中，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工人阶级的苦难以及他的革命的热情所作的极其动人的描写，是非常杰出的，这样，他成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伟大的作家⁴¹。

41 例如，这是一首诗。在这首诗里，他指出贫困是怎样把一个贫穷的裁缝逼得走向自杀的。

他是一个穷裁缝
拚命在缝纫，
他这样干了三十年
不知为了什么。

随着星期六的来临
一周又完了，
他开始哭泣
不知为了什么。

于是他拿起美好的针
又拿起剪刀
开始把它们弄断
不知为了什么。

然后他往脖子上
套了一根结结实实的绳子，
吊在一根房梁上
不知为了什么。

而晚祷的钟声
开始响了起来，
裁缝已经死了
谁也不知为了什么。

他的散文也是很成功的。他用了同样动人的笔调，比如在关于“英国的无产者”⁴²的文章中，描写了英国工人可怕的生存条件、爱尔兰人的堕落、老板的苛刻、夜间收容所和车间的非人道，在那里，那些被拘留的人的待遇比在监狱还要坏。

在另一篇关于《斯坦勒布立治的宣传家约瑟夫·莱纳·斯蒂芬与1839年的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中，在提到斯蒂芬的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活动的时候，他分析了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资产阶级方面的态度以及工人阶级为求得解放而展开的战斗，等等。在他为无产阶级辩护并揭露资产阶级非人道的时候，特别谴责了马尔萨斯的学说，这个学说把贫困说成是比生产的增加还要快得多的人口增长所引起的，为了医好这个社会病害，建议大量屠杀穷人。反之，维尔特对斯坦勒布立治的这位美以美会牧师的勇敢精

参阅《维尔特全集》，第1卷，第199页。

在这首诗里缺乏的那种革命的远景，在另外的诗里比如《饥饿之歌》中，就显现出来了：

最尊贵的老爷呵，国王，
你可知道这个悲惨的故事？
星期一我们吃得很少，
星期二完全没有东西可吃。

星期三是个斋日，
星期四又是如此，
而星期五我们
已经饿得半死。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当心，
星期六给我们做好面包，要又大又香，
否则星期日我们将要把你烤焦，
将要把你吞下去，呵，我们的国王！

参阅同上书，第193页。还可参阅《铸大炮的工人》，同上书，第203页。

42 载《莱茵社会改革年鉴》，1845。参阅《维尔特全集》，第2卷，第301—326页。

神大加赞扬,因为这位牧师在1839年2月1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竟说女王、大主教、国会的议员等等,对人民的贫困太不关心。为要消灭贫困,他认为可以根据圣经制定一些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办法,并号召人民起来造反以便将这些办法付诸实施。结果他为此遭到了监禁。

这种革命倾向使格·维尔特越来越靠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7月和8月他在布鲁塞尔逗留的时候,完全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从那时起,他就成了他们最好的战友之一。

3. 约瑟夫·魏德迈 (1818—1866)

约瑟夫·魏德迈在柏林陆军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个炮兵联队。在这时期他已具有进步思想。1844年去巴黎,在那里与马克思结识。同年,他给《停战报》撰稿。他对社会问题的评论生动活泼,因而有助于使这一日报获得新的生命。在社会问题上,他特别是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得到了启发。

他为《停战报》写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仅要碰到新闻检查这一关,而且也受到主编瓦尔特尔的刁难,因为这位主编害怕魏德迈给与日报的激进倾向危及日报的生存。可是,这种倾向却从莱比锡《文学报》那里得到了颂扬,它还把《停战报》和《社会明镜》送给其他日报,为了它们评论社会问题的方式堪作楷模⁴³。

由于这种倾向,魏德迈不久就与越来越陷于无稽之谈的卡

⁴³ 参阅《Blätter für literarische Unterhaltung》(《文学娱乐报》),莱比锡,1846年,2月13日,第44号,转引自K. 奥伯曼《Die soziale Frage》(《社会问题》),前引书,第278页。

尔·格律恩断绝了关系,而且,在一次关于赫斯——他指控了资本主义剥削方法——的通信中,和瓦尔特尔也闹得决裂了。

约·魏德迈于1845年4月10日在给瓦尔特尔的信中写道:

“关于犯罪的过程,每个人,只要稍微关心一下真正的社会关系的人,都知道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工人的工资降到了最低水平;知道劳动力的价值随着劳动力的增加而减少;知道由于劳动时间的延长产生了劳动力的增加,而这增加就使得当时被雇用的劳动力的一部分成为多余;知道如果这个当初只是限于一部分工人的劳动时间的延长,开头还能起到提高工资的效果,但不久由于所有的工人劳动时间都延长了,工资就会重新降到最低水平……正如他在犯罪的过程里面所说的……关于这篇文章的其余的方面,我不认为人们可以因为赫斯指出一些机构的真正性质——它们是在博爱和关怀工人福利这个假面具下只为工厂主的利益服务的——而加以责难”⁴⁴。瓦尔特尔不同意魏德迈这样的评论。

三个月以后,1845年11月15日,越来越感到害怕的瓦尔特尔,为了他的日报,解除了魏德迈的职务,不是毫无理由的⁴⁵。

地方上的新闻检查机关,在向省长报告了魏德迈的去职以后,

44 转引自K.奥伯曼:《Die soziale Frage》(《社会问题》),前引书,第281页。

45 关于撤销了许多文章,特别是魏德迈的评论社会问题的文章,他给新闻检查机关的高级法庭寄去一份抗议书。法庭在1845年12月2日实际上作了这样的答复:“这些完全是关于社会状况和现实社会关系的文章,明显地证实了它们的作者思想上没有认识到为帮助陷于贫困的和减轻贫富之间的差别所做的努力。把占有者与非占有者截然分开的种种含有仇恨情绪的对照的描写,对于为法律所保护的现实的所有制硬说迫切需要彻底改变的再三的呼吁,以及附带许多指向王国的攻击,这些,都是为煽动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因此对国内和平和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参阅梅尔斯堡档案(D. Z. A), Rep. 77, Tit. 991, №3. 新闻检查机关高级法庭关于《停战报》的案件,转引自K.奥伯曼《社会问题》,前引书,第284页。

也正如在他之前科伦的新闻检查机关在马克思离开《莱茵报》之后所做的那样，为日报有了新的转向而庆幸不已⁴⁶。

曾一时辞掉军官职务去为《停战报》写稿的魏德迈，不久就在布鲁塞尔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会合在一起了。1846年春天他在这里逗留期间，完全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并成为他们最好的同志之一。

4. 卡尔·路德维希·德斯特尔 (1813—1859)

德斯特尔是科伦的医生，由于职业的关系，他对穷人生活的种种困境特别有所体会，而不久他就站到了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这一边。起初，他是民主主义者，与G. 荣克建立了友谊关系，并与他一道积极参与《莱茵报》的创办；同样，他也参加了在一个小团体里举行的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聚集在这个小团体里的有K. 马克思、G. 荣克、H. 毕尔格尔斯、M. 赫斯、律师孔帕斯和军官安耐克。对《德法年鉴》、《前进报》的阅读，以及在1844年底在“工人阶级生活改善科伦协会”中进行的讨论，很快使他从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他与赫斯一样认为，这个协会不应满足于一些慈善福利措施，并且认为只有种种深刻的社会改革才能直接给贫穷带来补救办法。

在1845年初，他担任了《科伦手工业者联合会的公益周刊》

⁴⁶ 参阅科布朗斯政府档案，第403节，第3805号，第129页。转引自K. 奥伯曼，前引书，第285页：“我把《停战报》的比较温和的倾向和语气的改变归之于……炮兵中尉、被解职的副主编魏德迈的离去……瓦尔特尔是不能再长久地掩盖魏德迈的坏影响的，魏德迈由于他的共产主义的、或至少是很激进的倾向，是要对工作很难通过新闻检查这种情况负责。不过自从他离开报社以后，事情好办多了……”

的编辑,通过他对于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写的文章,赋与了这一周刊以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这些文章中,他指出自由竞争实际上只是对富人有利,穷人没有力量与它抗衡。这使他产生了普及义务教育以便每人都可发展自己的才能这一思想。他另外也指出手工业者和工人联合起来以抵抗大资本的必要性。

由于这份杂志只给他提供有限的可能性去阐述自己的思想,于是他在1846年初在科伦担任了一个社会主义杂志《人民报·当前主要问题人民月刊》的副主编,这份杂志创刊于1845年1月。他的文章全部都是涉及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他指出西里西亚织工暴动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它乃是1844年最重大的事件。他批判了种种具有博爱性质的改革,比如储蓄银行的建立,是不能真正消灭贫困的。他反对作为占有阶级垄断工具的纳税选举制,认为人民真正的代表只能建立在普遍的选举制上面。另外,他再三强调建立工人协会以粉碎大资本势力的必要性,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是建立在由工人生产的财富的垄断之上的。最后,他对工资和价格作了分析,指出,工人拿到手的工资并不能满足他们生活的基本需要,要是哪一年里有一个时期失业,就更是如此了。

《人民报》由于他给指出了方向,对科伦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很大影响,1846年初由于经费不足而停刊。

德斯特尔越来越相信社会问题不通过社会的彻底变革是不可能解决的。他逐渐接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从1845年底起,与他们会合在一起,参加了他们的斗争。

第二章

弗·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弗·恩格斯在巴门

1844年8月底9月初，恩格斯在巴黎与马克思会见以后又回到了巴门他的家里。他还是在两年前为了去英国才离开了家的。既然成了共产主义者，他预见到同他那思想非常保守、非常正统的父亲之间将要发生纠纷。最初，他尝试着避开一切可以引起争论的话题而过一种平静的、退隐的生活¹，但是，当他开始展开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时，一场冲突在他父亲和他之间爆发了，这场冲突由于他越来越厌恶商人这个职业而更严重起来。

1 参阅恩格斯给寓居巴黎的马克思的信(1844年10月初于巴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5页：“我住在巴门已经三个星期了，跟少数朋友和一大家人在一起，尽可能愉快地度日，幸好家中有几个可亲的女眷。在这里根本就别想工作，尤其是，我的妹妹和伦敦的共产主义者艾米尔·布兰克(艾韦贝克认识他)订婚，因此，现在我们家中忙乱得不可开交。此外，我清楚地知道，我要返回巴黎还会碰到很大的困难，我大概还得在德国晃荡半年或一整年。当然，我要尽一切努力避免这一点，但是你想象不到，家里为了反对我离开，提出了怎样琐碎的理由，怎样迷信的担心。”恩格斯给寓居巴黎的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同上书，第20—21页：“我在这里过的生活是只有最体面的庸人才能要求的生活，即恬静而舒适的、虔敬而庄重的生活，成天坐在房间里工作，几乎不出门一步，就象一个德国人那样规矩；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担心上帝会宽恕我的著作而让我进天堂去。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在这里，在巴门正开始博得好评。”

事实上，他是怀着越来越厌恶的心情从事这个职业的，因为他心里反对作为一个厂主的儿子参与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他给马克思这样写道：“由于我妹夫的劝说和我父母的愁眉苦脸，我曾不得不决定再一次去试试做生意，[两星期]来在办事处做了些事情……可是，还没有开始工作，我已经感到发愁了，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作资产者，而且还要作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这种可怕的情景，我曾大致看到过一些，而在我老头的工厂里呆了几天以后，它重新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当然曾经这样打算过：我做生意，只能以我认为适合的时候为限，然后就写一些违警的东西，以便能冠冕堂皇地被赶出国境；但是，甚至这个时候我也将忍耐不到了。如果我不是每天要把英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事情写进我的书里，我想我也许会有些颓唐起来，而这件事至少是把我的愤怒保持在沸腾状态。身为共产主义者如果不从事写作，或许还可以在外表地位上作一个资产者和一个做生意的牲口，但是，如果既要广泛地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同时又要从事买卖和工业，那就不行了……此外，再加上这个彻头彻尾基督教的、普鲁士的家庭里的沉闷生活，实在使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留在这里，到头来可能使自己变成一个德国庸人，并把庸人习气带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²。

这种内心的紊乱，由于一场不幸的、使他非常痛苦的爱情悲剧而更加深了³。为了摆脱这种情况，他起初打算去巴黎再找马克

² 参阅恩格斯给寓居巴黎的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同上书，第21页。

³ 参阅恩格斯给寓居巴黎的马克思的信(1844年11月19日于巴门)，同上书，第10页。

恩格斯给寓居巴黎的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同上书，第21页。

思，但是，他估计一时不可能做到。于是他又考虑到波恩大学去听课；他父亲，意识到从今以后不得不放弃让他作为自己继承人的打算，因此原则上表示同意，希望这样或许会使他逐渐脱离共产主义⁴。

然而，随着他越来越公开地表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在爱北斐特举行的几次共产主义集会以后，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就更为紧张了。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把这情景描绘得既动人又有趣：“告诉你，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不堪忍受的生活。由于集会的事情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同他们时有交往）的‘行为不检’，又使我的老头爆发了宗教狂热病。我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经，他气得就更厉害了，而我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面讲话就更引起了他那本来就已十分道地的资产阶级狂热。我的处境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两星期左右我就要离开，我也不想挑动争吵了，我闷着头忍受一切。他们对此却不习惯，因而更增长了他们的气焰。我接到的信，他们在给我之前，都从各方面嗅遍了。因为他们知道全都是共产主义者的来信，所以每一次都摆出一付宗教徒的难受面孔，叫人看了简直要发狂。我往外走，是那种面孔。我坐在自己房间里工作——当然是从事共产主义的工作，这他们知道——也是那种面孔。吃也好，喝也好，睡觉也好，放个屁也好，我都不能不在鼻子底下碰见那种令人讨厌的圣徒的面孔。不管我做什么——不管外出或在家，沉默或讲话，读书或写字，笑或不笑，我的老头总是摆出那种难看之极的哭丧相。而且我的老头又这样愚蠢，他把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看成是‘革

4 参阅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子巴门），同上书，第22—27页。

命的’；例如，不管我怎样争辩，硬要我对英国资产阶级在议会里的丑事永久负责！此外，这里现在正是家中的敬神季节。一星期前，我的弟弟和妹妹二人接受坚信礼，今天全体亲族都要吃圣餐，——圣体发生了效力，今天早上那种难受的面孔到处出现了。

“而且祸不单行，昨天晚上我和赫斯在爱北斐特宣传共产主义直到深夜两点。由于我的晚归，今天自然又都板起面孔暗示我大概是上妓院了。最后终于鼓足了气，问我，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在赫斯那里’。——‘在赫斯那里！天呀！’停顿片刻，脸上露出了难以形容的基督教的绝望神情。——‘看你交了些什么朋友！’——接着就是叹息，等等。简直叫人发疯。对我的‘灵魂’进行的这种基督教式的征讨是多么刁恶，你是无法想象的。而我的老头如果还发现有《批判的批判》，他就能把我赶出大门。同时，使人经常生气的是，这些人已无可救药，他们简直是甘愿用他们对地狱的幻想来折磨和虐待自己，在这种情形下哪怕是一点点公正的原则都跟他们讲不通了。

“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人，只是在父亲面前不能自主，我很爱她，要不是为了我的母亲，我对我那个狂热而专横的老头就根本不会作丝毫的让步。但是我母亲一忧虑就要生病，每当她特别为我而生气时，马上就要头痛一个星期。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必须离开这里，但是还得住几个星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忍受过去⁵。”

恩格斯在巴门的理论活动是同他的得到理论支持的政治活动

5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3月17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30—32页。

相并而行的。他的理论活动的内容首先是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在和马克思的通信中谈到这个问题，马克思已成为他在思想上和在斗争上的最好的伙伴⁶。

他对马克思也附带谈到《德法年鉴》在莱茵省的经久不渝的成功，也谈到《前进报》、特别是“自由人”小集体即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使人很少感到兴趣⁷，而恩格斯自己也对这批人作了淋漓尽致的挖苦和讥讽。

“我们在德国各地都听到关于社会主义进展的消息，但是唯独从柏林什么也没有听到。到整个德国废除私有制的时候，这些聪明透顶的柏林人还会在哈森海德创办一个《和平民主日报》，——除此之外，这帮家伙肯定再也搞不出别的什么来。瞧吧，不久就要在乌凯马尔克出现一个新的救世主，他将按照黑格尔的样子去改造傅立叶，从永恒的范畴中去设计法伦斯泰尔，并且宣称：资本、才能和劳动都分享收入的一定部分是返回自身的思想的永恒规律⁸。”

6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10月初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9页：

“我还从来没有一次象在你家里度过的十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自己真正是人。”

7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10月初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6页：

“关于鲍威尔弟兄，这里一无所闻，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相反地，对《年鉴》的需要量至今仍然很大。我的评卡莱尔的文章，在‘群众’中获得很大的成功——真是可笑！——而关于经济学的文章，却只有很少一些人读过。这是很自然的。”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19页：

“昨天我收到了《前进报》，自从我离开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它。贝尔奈斯写的一些幽默话，使我十分开心，这家伙很善于使人哈哈大笑，这是我通常在阅读时很少发生的。不过，这报纸确实很差劲，很无趣，使人得不到什么益处，所以许多德国人都未必长期订阅。”

8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11月19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14页。

关于《神圣家族》，当恩格斯知道原来预想的一本小册子已改成了厚厚的一卷书时，他不仅感到惊讶，但同时也感到高兴，因为知道这样一来，可以给马克思发表更多文章的机会，没有这一改变，恐怕这些文章还会被搁置在抽屉里也说不定。另外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尽管他出的力量很小，马克思还是把他作为合作者在书上标出。他也担心《神圣家族》这本书，光凭这个书名，会不会惹出同他父亲的额外的麻烦⁹。接到这本书以后，他对马克思彻底地清算了鲍威尔弟兄感到极其兴奋，但是，由于《文学报》在公众中并没有激起很大回响，他同时也害怕马克思在这个批判上是不是写得太长了，而且，这本书的抽象性质会不会使它对大多数读者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¹⁰。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20页：

“剩下的一小撮人，梅因、鲁滕堡之流，仍然不顾一切，象六年前那样，每天下午两点钟去施特赫利那里对报纸胡乱评论。现在他们已经走到了‘组织劳动’的地步，并且将这样走下去。”

9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19页。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25页。

10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3月17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29—30页：

“《批判的批判》——我好象写信告诉过你，我已收到这本书——真太好了。你对犹太人问题、唯物主义的历史和《秘密》的论述是精辟的，一定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这本书的篇幅还是太大了。我们两人对《文学报》所持有的严正的鄙视态度，同我们竟然对它写了二十二个印张这一点很不协调。另外，对思辨的空论和抽象的普遍本质所作的批判，其中大部分将仍然为大多数读者所不能理解，不会使所有的人都感兴趣。除此之外，这本书的确写得非常精彩，能使人捧腹大笑。鲍威尔弟兄将无词以对。毕尔格尔斯如果要在皮特曼的刊物的第一册上介绍这部书，可顺便提一提我为什么只写了一点点，并且写的又只是一些无须深刻研究的问题，——我只在巴黎呆了短短的十天。”

麦克斯·施蒂纳 (Max Stirner)

恩格斯的批判主要是指向麦克斯·施蒂纳的，后者在他的名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把哲学的思辨推向了最高峰。由于对施蒂纳的批判构成了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主要内容——事实上它占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因此，对施蒂纳这部唯一重要的著作加以分析是有必要的。

这部著作，代表了在黑格尔左派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黑格尔主观主义化的最终极限。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与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走向共产主义的同时，从唯心主义过渡到唯物主义——不同，也与大多数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向民主主义这方面演变——不同，完全脱离了政治斗争，这突出地表明他们走向了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在《文学总汇报》上，把伟大的个性同群众对立起来的布·鲍威尔曾经指出，个性如何在从国家和社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便达到了一种完全的自治，当人们用自我意识的普遍性来同国家和社会加以对比时，那么，国家和社会的无便出现了。施蒂纳为个性辩护达到了极点，他不仅否认国家和社会具有优先的、强大的力量，而且也否认精神的力量。施蒂纳继克尔凯廓尔之后，反对黑格尔只对作为精神——在每个人之中的个别的、个人的、唯一的東西——之表词的普遍和一般的事物感兴趣，认为人就是真实的人而非普遍的人，是个别的个体人，是我而非费希特的绝对的我，是由于其独特性 (unicité) 而有别于其他自我的我¹¹。

¹¹ 参阅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勒克莱的法译本，巴黎斯托克出版社1900年版，第159—161、214—217、443页。

从此，对于以自己的唯一性为标志的个别的个体人来说，摆脱一切可能威胁或限制其唯一性的东西的必要性就产生了。

在施蒂纳看来，人为了肯定自己是个别的、唯一的我而进行的解放斗争，构成了历史的最重要因素。这种思想引导他把历史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一个是人还没有被承认具有个性的史前期，一个是人肯定了自己是具有完全的自由和唯一性的个体的真正的人类历史的时期。

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经指出精神的发展通过感性意识、自我意识和精神三个阶段这一点得到启发，施蒂纳也列举出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唯实主义——这个时期的标志是自然（感性意识）占最大优势；唯心主义——这个时期的标志是精神（自我意识）占最大优势；以及利己主义（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精神阶段）——这个时期的标志是，个体的人不仅从自然、而且也从精神的统治中得到了解放。

正是借助于唯实主义、唯心主义、利己主义这三种抽象，施蒂纳对它们进行了无穷无尽的变化更易，给人类历史描绘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图景。

首先，他根据人的生理的发展指出，儿童——他没有从感性世界中解放出来——是唯实主义者；青年——他寻求事物的本质，可是在精神中找到了它——是唯心主义者；成人——他既摆脱了物质世界的影响也摆脱了观念世界的影响——是利己主义者¹²。

人类的历史也呈现出一种类似的发展。古代，是人类的幼年时期，其特点是唯实主义。在这时期中，事实上，人不能摆脱自

12 参阅同上书，《人的生活》，第8—14页。

然的统治¹³。中世纪，包括古代到近代当中这一段时期，是人类的青年时期，正如人的青年时期一样，其特点是受制于唯心主义¹⁴。摆脱了自然的影响，人们在精神之中看到了世界的本质，但却因此陷入了精神的统治。这个时期的唯心主义是由贬低物质抬高精神的基督教开始的¹⁵。紧接着，把世界予以精神化了的，先是唯理主义¹⁶，后是把精神造成为一种实体、绝对观念、世界的创造者的德国思辨哲学¹⁷。通过对精神的这种神圣化，唯心主义于是成了幻影的创造者，同时也成了统治人和压迫人的工具¹⁸。

人类历史的第三个时期是利己主义的时期，在这时期中，人从自然和精神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使之受自己意志的支配。这样，人有了一种完美无缺的自治，成为一个只服从于自己的目的的利己主义的个体¹⁹。

这个时期是从那种为反对一切已建立的权威——宗教、国家、社会，它们僭取权利来限制个体人的自治——而进行的暴动开始的。在今天，这个时期的特征，特别可以通过布·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对宗教教条的批判而表现出来。施蒂纳尽管承认他们的功绩，但认为他们只攻击体现在宗教这一方面的精神统治，并且以实际上不过是神的代用品的“自我意识”和“人的本质”这些实体的名义去批判宗教，是犯了错误的。

在反对宗教教条的斗争中，布·鲍威尔相当彻底地摧毁了对于

13 参阅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20页。

14 参阅同上书，第20、21—110页。

15 参阅同上书，第26、29页。

16 参阅同上书，第98—99页。

17 参阅同上书，第80、99—100页。

18 参阅同上书，第34页。

19 参阅同上书，第81页。

绝对观念的信仰，但他仍然忠于黑格尔关于超自然思想的发展这一观念，不过超自然的思想在他那里变成了普遍意识，并且认为普遍意识的发展形成了人类的历史²⁰。

费尔巴哈在摧毁宗教教条方面表现得更要彻底，但是，由于他把人的种属当作了人的本质，因而他同样地把人的本质造成一个神的代用品，用对于人类的信仰代替了对于神的信仰²¹。

在布·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对于反对个人的主要对手的批判，即对于把精神变为一种超自然的势力、变为一个与人对立并压迫人的新的神的唯心主义的批判了²²。

事实上，唯心主义赋与世界精神、普遍意识、人的本质、法律、国家、社会、人性等概念以绝对的性质，就是把它们变成为一些固定观念，这样一来，它就把世界造成了一个怪影、幽灵、对这些东西顶礼膜拜的人以及为鬼神所迷惑的人的王国²³。

反对唯心主义，就是说，反对精神的统治，其含意就是不仅要批判宗教和哲学，而且还特别要批判一切政治和社会教条。所谓政治和社会教条，施蒂纳理解的是——这一点很能说明他的新的政治方向的特色——并非一些反动的理论，而是政治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他把这些东西统统包括在自由主义这一种属的名词之下。正如宗教一样，自由主义的最大的效果是把人从属于一些概念；它实际上是用一个新的最高实在来代替神；国家、社会、人性也象神一样，变为压迫人的工具²⁴。

20 参阅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176—177页。

21 参阅同上书，第35—36、53、209页。

22 参阅同上书，第30—37、80页。

23 参阅同上书，第37—52页。

24 参阅同上书，第115—172、296—297页。

政治的自由主义宣扬国家崇拜，认为国家是一切都要归属的最高权威²⁵。社会的自由主义，即社会主义，把个体人交给社会去专政；它把所有权单单赋与社会，这样就把每一个个体人变成了乞丐²⁶。至于人的自由主义，即人道主义，则把人作为牺牲品来祭奠一个抽象的东西：人性²⁷。

摧毁一切固定观念的这种解放战争是不可能通过一场革命来完成的，因为革命是在一般原则的名义之下所引导的集体的事业，而一般原则与个体人的特性是水火不相容的。它只能采取个人背叛的形式，通过这种背叛，个体人否认并抛弃一切与他的自治相对立的观念和教条²⁸。

落在人们肩上的重压不是来自经济和社会关系，而是来自精神方面的原因，因此他得出结论：人的解放必须在意识领域里面进行，它只限于思想方面，在于否定那些已成为个体人的唯一真正敌人的种种概念、种种固定观念。

作为一个有人格的人，为了解放自己和肯定自己，个体的人只要否定掉加于某些观念上面的神圣性质（人用这些观念创造了超自然的权威²⁹）、并按照任凭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快乐引导的纯粹的利己主义者的样子去行事，就够了³⁰。

被费尔巴哈指责为非人道的标记的利己主义，因此反而成了个体人的最本质的品德。人们迄今所做的是，为了一些和自己毫

25 参阅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113、115—137页；《政治自由主义》，第210—212、268、272—282、286—287页。

26 参阅同上书，第137—147页；《社会自由主义》。

27 参阅同上书，第147—172页；《人道自由主义》。

28 参阅同上书，第219、387—388页。

29 参阅同上书，第82—84页。

30 参阅同上书，第88页。

不相干的东西比如上帝、真理、法律、自由、人道而进行了斗争，与此相反，个体的人应该只对自己私人的利益进行保卫³¹。

这样一来，人就应当既排除感性世界即自然的统治，也拒绝精神的统治。从自然的统治中把自己解放出来的办法是：按物质世界对我的关系而赋与它以意义和价值，这就使得这个世界依我的判断以及我所追求的目的而有所变化³²。这样，自然就在失去其纯客观的性质的同时，也失去其对于人的影响。不过，利己主义者的主要斗争的矛头，与其说是指向自然，倒不如说更是指向精神。从精神统治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办法就是把一些概念、固定观念的神圣性质剥去³³。这首先是与人的思想有关，是人们错误地把一种绝对的性质赋与思想，因为思想不过是人的理解能力的产物³⁴。

由于否认了思想的一切绝对价值，所以，利己主义者既不承认永恒真理——一切真理有没有意义和价值完全看它对我的关系如何³⁵——，也不承认绝对的道德。善和恶对于利己主义者毫无意义，他不是根据道德原则而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乐趣来支配自己的行动的³⁶。无论在思想上，甚至在感情上，他都不许有谁对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当他的思想不再适合于他时，他就把它抛掉，而当他喜欢的时候，又重新采纳它。在感情上也是如此，甚至爱情在他也不过是他的快乐的工具³⁷。利己主义者既不

31 参阅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1—4、69、400页。

32 参阅同上书，第411—414页。

33 参阅同上书，第82及以下诸页。

34 参阅同上书，第419—420页。

35 参阅同上书，第426—427、433—434页。

36 参阅同上书，第361页。

37 参阅同上书，第361页。

承认教条和道德，也不承认责任和义务，既反对具有专制性质的任何形式的国家权力³⁸，也反对使个体人屈从于社会法令的社会权力³⁹，因此，他拒绝参加政党和社会组织⁴⁰。

从一切责任和一切联系中解脱出来的利己主义者，可以倾其全力从事于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就其唯一性来观察的我的发展了。结果，与其说是得到了本身具有消极性质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并没有适应于对象的趋势——，倒不如说是使个体人得到任意占有一切可供他尽情享受的事物的能力⁴¹。

从拒绝一切规定性和只服从自己的意志这种能力中，产生了（其实完全是理论上的）自我或唯一者⁴²的威权，而从这威权之中又产生了对于自己喜爱之物的占有之权⁴³，所有这些使他成了世界的主人⁴⁴。

虽然利己主义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乐趣，但是事实上他不是独自一个人生活着，而是生活在集体中，因此必须以某种方式适应社会生活⁴⁵。他采取这样的方式：拒绝压迫个体人的现实社会，而只在个体人自由联盟的形式下参与社会生活，个体人在自己的行动中掌握绝对的主动⁴⁶。

这样，排除了一切可能妨碍自己的自治的东西，唯一者可以

38 参阅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 232—238 页。

39 参阅同上书，第 139 页。

40 参阅同上书，第 282—285 页。

41 参阅同上书，第 186—204 页。

42 参阅同上书，第 221—222 页。

43 参阅同上书，第 222—232、245—246 页。

44 参阅同上书，第 250—251、328 页。

45 参阅同上书，第 174—175 页。

46 参阅同上书，第 375—384 页。

完全随心所欲地过日子⁴⁷。

施蒂纳远远离开了自由主义，对政治活动一概漠不关心，在这部著作中，把他曾和布·鲍威尔一同致力过的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带到了极限。通过对一切实在的否定——这一点在布·鲍威尔的《批判的批判》一书中已经很突出了——，施蒂纳把我造成为一个纯粹的概念，造成为纯粹精神的一位，把世界造成为一个幻影的舞台。把人归结为一个绝对的我，把人的活动归结为对虚假思想和固定观念的排除，这样，他就把思辨哲学推到了最高峰。

事实上，他的哲学不过是他的社会立场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他对于具有唯一性的个人的辩护，实际上是反映了意识到自己在国家和社会面前丝毫无能为力、用肯定自己具有绝对自主这样一种纯粹口头上的反抗来表示反对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另外，施蒂纳的哲学也是被他在安排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不过是一连串的失败——方面的无能所决定，他极力宣扬我的至高无上的全能，不过是为他的生活上的无能寻求某种补偿。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青年黑格尔”派中激起了巨大的回响，恩格斯对施蒂纳所作的批判是掺杂在这本书引起的各种评论文章之中的。施里加为布·鲍威尔辩护，认为施蒂纳尽管受到布·鲍威尔的学说的启发，但并没有能够超过他⁴⁸。

从布·鲍威尔这方面，他本人是这样写的：如果施蒂纳成功地揭露了政治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是空洞无用的东西，那么他对于《批判的批判》的攻击就是失败了，并且指出，从他

47 参阅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393—395页。

48 参阅施里加：《麦克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载《Norddeutsche Blätter für Kritik, Literatur und Unterhaltung》，（《北德意志文学、评论、娱乐报》），柏林，1845年3月，第9册，第1—34页。

对唯一者的辩护来看，他并没有能够摆脱教条主义⁴⁹。

相反地，卢格由于憎恨共产主义，在他的信中则对施蒂纳大加赞扬，他说，施蒂纳对于共产主义的驳斥构成了解放斗争的一种真正的行动。在他的《在巴黎的两年》一书中更是把施蒂纳捧上了天，指出施蒂纳在1842年到1845年的德国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⁵⁰。

费尔巴哈本人在最初还认为施蒂纳这本书，尽管攻击了人道主义，不过由于对自由进行了辩护，还不失为一部天才之作⁵¹。费尔巴哈对施蒂纳提的意见经过思考以后，在回答中否认了人道主义的抽象性，他说，人道主义不过是人类共同体的一个表词而已⁵²。

49 [布·鲍威尔]《路易·费尔巴哈的特点》，载《维干德季刊》，第3卷，第86—146页。这篇包含着对《神圣家族》的攻击的文章，构成了《批判的批判》一书的最后一篇宣言。

50 参阅阿·卢格，*Briefwechsel und Tagebücher aus den Jahren, 1825—1880*, T.I: 1825—1847, Berlin, 1886(《1825—1880年间的通讯和日记簿》，卷一：1825—1847年，柏林，1886。)

阿·卢格给尤·弗吕贝尔的信(1844年11月于巴黎)，参阅同上书，第379页。

阿·卢格给尤·弗吕贝尔的信(1844年12月6日于巴黎)，参阅同上书，第382页。

阿·卢格给他母亲的信(1844年12月17日于巴黎)，参阅同上书，第386页。

阿·卢格：《在巴黎的两年。研究与回忆》，第1、2部分。特别要参阅第2卷：《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批判》、《利己主义与实践活动：自我与世界》。

51 参阅鲍林：《L. Feurbach, sein Wirken und seine Zeitgenossen》[《路·费尔巴哈，他的活动和他的同时代人》]斯图加特，1891年版，第106页。路·费尔巴哈于1844年12月13日给他兄弟的信。

52 参阅路·费尔巴哈：*Über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in Beziehung auf den «Einigen und sein Eigentum»*, 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 1845年, TII. pp. 193—205.(《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载《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2卷，第193—205页。)

对于这些批判文章(其中也有赫斯的文章),施蒂纳回答说,当人们以作为真实的人、个人、自我之否定的一般概念——如绝对观念、自我意识、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时候,是不可能对只能就其唯一性来理解的自我下定义的⁵³。至于赫斯,他则责难施蒂纳只在表面上把社会主义同利己主义对立起来,而不知道以孤立比合作更对人有益这一原则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与相反地认为合作对人是更为可取的社会主义,二者都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⁵⁴。

由于施蒂纳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就是说对所有的进步运动加以批判,正如布·鲍威尔一样,帮了反动势力的忙,这就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很有必要对施蒂纳加以清算,就象他们在《神圣家族》中对布·鲍威尔所作的那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绝大部分就是为这一清算而写的。

对施蒂纳的批判,以前曾是恩格斯、马克思和赫斯一次通信的话题,这篇通信本来是要作为序言之类的东西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

这篇通信使人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程度的发展。

马克思在那时候就把 praxis [实践] 即人在社会和历史发展中的生产活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放在他思想的中心,而在原则上否认了施蒂纳的学说。施蒂纳把被他看成是社会关系之外的个人归结为一个抽象的我,这就引出来关于所谓唯一者的自由、威权和权利等一连串不着边际的胡言。

53 参阅麦·施[蒂纳]:《对施蒂纳的批判》, Wigands Vierteljahrschrift 《维干德季刊》, 莱比锡, 1843年, 第III卷, 第147—194页, 特别是第147—170页。

54 关于赫斯, 参阅同上书, 第173、186—194页。

恩格斯那时候还没有达到象马克思那样坚实地建立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对施蒂纳作同样深入彻底的批判，因此在他对施蒂纳所下的判断中还有点犹豫不决。

至于赫斯，则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还不能对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作精密细致的分析，因此不可能从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中摆脱出来，在他的文章中一如在他批判施蒂纳时那样，还在继续摆弄人的本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等等费尔巴哈的一些概念。

施蒂纳的这本书一出版——出版商维干德已给他寄去一大笔钱——，恩格斯就在1844年11月19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对这本书提出了意见⁵⁵。

由于通过在绝对的我、在孤立于其他人的个人这个形式下去对人加以考察，这本书就成了被竞争和利己主义所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反映，不管施蒂纳愿意不愿意，他实际上是很很好地揭露了这个社会的非人道，以致使人看出摧毁它以使用共产主义社会来代替它的明显的必要性⁵⁶。

尽管恩格斯形式上摒弃了这本书的原则，但是承认施蒂纳还是有功绩的，其功绩为：通过对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道主义的批判，以及通过对于个人的辩护——不管这个辩护是如何夸张——，

55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12—14页。

56 参阅同上书，第12页：“这种利己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达到了自我意识的本质，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论据，是现存的愚蠢事物范围内的一切理论的顶峰。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东西是重要的，例如，比赫斯所认为的还重要。我们不当把它丢在一旁，而是要把它当作现存的荒谬事物的最充分的表现而加以利用，在我们把它翻转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这种利己主义已经如此登峰造极，如此荒谬，同时又达到如此程度的自我意识，以致由于本身的片面性而不能维持片刻，不得不马上转向共产主义。”

施蒂纳指出，为要对人得出一个正确的观念，那么不应该以抽象的、就其一般性去理解的人为出发点，而是应以个人所代表的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为出发点⁵⁷。所以，我们对于人、对于个体的人的历史的研究，不应该建立在施蒂纳的孤立的我上面，而应该建立在同社会发生关系的个人上面，而且应该看到，人类活动的主要动力，不是象施蒂纳所认为的是爱，而是利己主义。另外，我们也不应该象施蒂纳那样抽象地去理解利己主义，并把它当成一种绝对的性质，而是应该看到，人由于追求幸福，利己主义最终会把他引向爱，爱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它最后也会把人改变成为一个无私的、利他主义的个人⁵⁸。

这种企图把施蒂纳的利己主义适用于社会生活而为共产主义服务的尝试，是不合马克思的口胃的。从来不把个人与社会关系割裂开来的马克思，只能把施蒂纳的全部观点当作纯粹的胡说而

57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12页及以下诸页：“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就是对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象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末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象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伸”。

58 参阅同上书，第12—13页：“其次必须告诉他：人的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而不管怎样，这里正确的地方是，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事，利己的事。……如果说肉体的个人是我们的‘人’的真正的基础，真正的出发点，那末不言而喻，利己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施蒂纳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而且也包括心灵的利己主义——也就是我们的对人的爱的出发点，否则这种爱就要飘浮在空中了。”

摒弃。无疑正是出于这个观点他打算自己写一篇批判施蒂纳的文章登在《前进报》上，但由于这份报的停刊而没有实现⁵⁹。

他在给恩格斯的回信中无疑是带有几分严厉的。恩格斯在接到信后又给马克思写了信，说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现在已完全同意马克思关于施蒂纳的看法，他参加了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而同时，赫斯也正在着手写一篇批判施蒂纳的文章⁶⁰。

对施蒂纳的批判连同对鲍威尔的批判，构成了一本名为《挽近哲学家》的小册子的主题。这本书是赫斯在1845年初写的，同年七月出版⁶¹。

这本小册子出版之前在卢格和赫斯之间曾发生一场争论。卢格在1845年1月22日从瑞士回来之后发现赫斯的一封信，信里责备卢格不忠于自由的事业并说他自己正在写一篇批判施蒂纳的文章。卢格在一封措词尖刻的回信中说，看到赫斯攻击施蒂纳感到吃惊，因为赫斯也和施蒂纳一样向往自由的实现，所不同的只是：赫斯从社会的观点研究自由的问题，而施蒂纳则是从个人的观点去思考。说到这，他赞扬施蒂纳权威地驳斥了共产主义，并责难

59 参阅马克思给亨·伯恩斯坦的信（1844年12月于巴黎），同上书，第455页。

60 参阅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16页：“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多多地思考以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赫斯（他还在这里，两星期前我在波恩同他交谈过一次）动摇一阵之后，也同你的结论一致了。他给我念了一篇他写的评论该书的文章，这篇文章他很快就要发表，他在这篇文章里说了同样的意见，那时他还没有读到你的信。我把你的信放在他那儿了，因此我不得不根据记忆来给你写回信”。

61 莫·赫斯：《Die letzten Philosophen》[《挽近哲学家》]，达姆斯塔德版，1845。参阅莫·赫斯：《哲学和社会主义文集》，上引书，第379—393页。

赫斯信奉了这个学说⁶²。

在同布·鲍威尔和施蒂纳的争论中，赫斯是从这一思想出发的；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只有在消灭了人的孤立状态这个条件之下才能得到解决。正因为没有认识这一点，所以，布·鲍威尔也好，施蒂纳也好，都没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两人都没有从人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这一思想出发，而是从与社会对立的、孤立的和利己主义的个人这一思想出发，所不同的只是：布·鲍威尔是从理论方面，施蒂纳是从实践方面，对利己主义大唱赞歌⁶³。

施蒂纳对唯一者的辩护实际上不是别的，而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颂扬⁶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以主人翁姿态统治一切的利己主义伴随着到处横流的情欲，在人与人之间制造战争⁶⁵。

费尔巴哈看到了个人与类之间，即个人与作为宗教之基础的社会之间的对立。在宗教中，这种对立则采取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对立形式。费尔巴哈曾用一种通过消灭人的孤立和利己主义而在人的共同体中的个体人的联盟这一基础上建立的人道主义，去与实际上只是把人的本质异化给上帝的宗教对立起来。但是，他在陈述个人如何有效地溶于类或是说溶于共同体之中的尝试并没有成功⁶⁶，个人溶于共同体中去，这是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62 赫斯给卢格的信只是从卢格的回信中才知道的。参阅阿·卢格《在巴黎的两年》，上引书，第1卷，第400—404页。阿·卢格给赫斯的信（1845年1月末）。

63 莫·赫斯：《挽近哲学家》，上引书，第389—391页。

64 参阅同上书，第392页。

65 参阅同上书，第387及以下诸页。

66 参阅同上书，第384页。在这一篇评论费尔巴哈的文章中，赫斯与施蒂纳在看法上是一致的。施蒂纳在他的《对施蒂纳的批判》文章中，责备费尔巴哈对人的奇怪想法，谈他对人的考察一方面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人作为类去考

的⁶⁷。费尔巴哈此外还考虑了其他问题，因为他转向了社会主义，而鲍威尔和施蒂纳则依然孤独地在他们的抽象概念当中转来转去，活该留在那里成了挽近哲学家⁶⁸。

通过赫斯的这本书和他的一些别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从那时以来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日益努力把自己的思想建立在对于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上，而赫斯则仍然拿着费尔巴哈关于人道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一些概念摆弄来摆弄去，这就使得他不能从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中脱身。

在几乎紧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批判布·鲍威尔的文章之后，由赫斯所写的对于施蒂纳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说，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思辨哲学和唯心主义的总清算的序曲。

恩格斯在莱茵省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

象马克思一样，恩格斯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构成了他的理论活动的条件和基础。

从英国回来以后，恩格斯在莱茵省展开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共产主义的宣传，一开始就碰到比他预见的还要大得多的障碍。他发现巴门的情况的确与英国全然不同。在这里没有象他在曼彻斯特曾看到的富于战斗性的、意识到自己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而只

察，而另一方面又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他把人作为个别的、具体的个人去考察。从这里就产生了他的哲学的矛盾性，他的哲学乃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混合物。参阅施蒂纳，前引书，第185页。

67 参阅同上书，第382页及以下诸页。

68 参阅同上书，第392页。

是一大群被动的、在贫困中艰难度日的工人。屈从于国家、教堂和资产阶级三重压迫，他们听天由命，认为命运是无法抗拒的，要不，就是走向另一极端，去干打劫抢掠的土匪勾当⁶⁹。在差不多象他在1839年在《乌培河谷来信》中所描绘的那种寻找工人阶级而感到幻灭的心情下，他写信给马克思：“近几年来，工人们已达到了旧文明的最后阶段，它们通过迅速增多的犯罪、抢劫和杀人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晚间，街上很不安全，资产阶级被殴打、刺杀和抢劫；如果这里的无产者按照英国无产者那样的规律发展下去，那他们不久就会明白，用这种方式，即作为个人和以暴力来反对旧社会制度是没有用的，要作为具有普遍品质的人通过共产主义来反对它。”⁷⁰

由于看到他同赫斯——当时已成为他的不可分离的战友——在直接向无产阶级作宣传并争取它走向共产主义方面的尝试碰到工人们的不理解和漠不关心而大感失望之后⁷¹，他同赫斯只好向资产阶级中的民主分子作宣传，希望能使这些人接受他们的思想。

当时恩格斯之所以接近赫斯，并使他能够很好地跟他共同作战，那是因为当时他还和赫斯一样，受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

69 1846年1月，政府曾向莱茵省长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想知道如果出了乱子，是否军队还靠得住。这位省长回答说，在莱茵省一点共产主义骚乱迹象都没有，而且他认为这种骚乱在莱茵省是找不到合宜的土壤的。最底层的人民深深受了天主教教士的影响，它的教阶原则是与共产主义的理论根本对立的，以致人们可以把天主教当作对付这一毒药的解毒良药。参阅古·迈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传》，柏林，1933，第1卷，第203页。

70 参阅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10月初于巴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7页。

71 参阅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10月初于巴门），同上书，第8页：“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去影响人民，我们很快就会取得优势。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影响，虽然程度要浅一些⁷²，并且，赫斯对德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进步所抱的幻想，在他也不是没有的。

自从他动身去英国以后，工业的迅速发展给莱茵省的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情景使他看了感到万分高兴⁷³，在他努力争取先进的资产阶级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作中，年轻人的热情和兴奋推动着他，使他对于哪怕是简简单单的一些进步倾向也看成是带有共产主义的性质的。在德国资产阶级当中发生的变化使他看了感到惊喜，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在科伦逗留了三天，我们在那里所开展的巨大的宣传工作使我惊奇……后来，我到了杜塞尔多夫，在那里我们的人当中也有一些能干的小伙子。不过我最喜欢的是我的那些爱北斐特人，人道观念的确已经深入他们的心灵。他们认真地着手搞自己家庭秩序的革命化，只要他们的父母敢用贵族的态度对待仆役和工人，他们就要教训自己的父母，而这样的事在我们宗法的爱北斐特已经很多了。除了这一批人之外，在爱北斐特还有一批人也很好，不过有点糊涂。在巴门，警察局长是个共产主义者。前天有一个老同学、中学教员来访，尽

72 参阅恩格斯在1844年10月初给马克思的信，参阅同上书，第7页，在信中他把德国无产阶级的个人行动和土匪行为与英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战斗作了对比，依他看来，标志着后者的特点是：他们领导的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人”来参与这个战斗的。

73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10月初于巴门），同上书，第7页：“自从我离开以后，乌培河谷在各方面的进步比最近五十年都要大。社会风气文明些了，参预政治和进行反对派活动也成了普遍的现象，工业取得了巨大进步，新的街区兴建起来了，大片大片的森林都被伐光，现在这里的一切可说是高于而不是低于德国文明的中等水平，而在四年前还大大低于这个水平；一句话，这里正在为我们的原则造成良好的土壤，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粗犷而热情的染色工和漂白工吸引到运动中来，那末，我们的乌培河谷还要叫你吃惊呢。”

管他从来没有跟共产主义者接触过，但他也受到强烈的感染。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去影响人民，我们很快就会取得优势。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我们这些著作家，必须沉静，以免被捕……我写完上面几段以后，去了一下爱北斐特，又遇到几个素不相识的共产主义者。不管走到哪里，转到哪里，到处都可以碰到共产主义者”⁷⁴。

他在1844年10月和12月在《新道德世界》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也反映了这种类似的思想⁷⁵。在第一篇《大陆上的社会主义》中，也正象他给马克思的信中那样，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在德国的巨大进步，同时把一部分资产阶级的进步倾向作为社会主义而加以说明⁷⁶。在第二篇《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中，他指出，一个得到读者日益增多的出版物支持的强大的共产党在德国异常迅速的形成。这个党老实说主要是依靠中等阶层的，但是用不了多久，就象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所指明的那样，将会在工人阶级中找到支持。如果共产主义继续以这同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它成功的机会说不定比在英国还要大些⁷⁷。

74 参阅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10月初于巴门），同上书，第5—8页。

75 参阅[弗·恩格斯]《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载《新道德世界》，1844年10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本）第2卷，第507—508页；[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载《新道德世界》，1844年12月13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588—601页。

76 参阅同上书，第508页：“在科伦，共产主义取得了巨大进展。在一个啤酒厂有一次集会，在一个相当大的屋子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律师、医生、艺术家等等；还有三四个炮兵少尉，其中一个是聪明的小伙子。在杜塞尔多夫，我们几个同情者，其中有一个很有天分的诗人。在爱北斐特，有我的六个朋友和另外几个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事实上，差不多在德国北部的每个城镇里我们没有碰不到几个坚决反对私有财产而同时也是无神论者的人”。

77 参阅同上书，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588—589页：“社会主义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还遇到重重的障碍：政府实行书报检查，集会和结社没

尽管激动着恩格斯的热情使他对共产主义的前景存有幻想，但是，他并没有象赫斯那样，让自己成了感伤的人道主义的俘虏。他之所以能够如此，那是因为他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他从对于英国无产阶级状况和活动的分析中理解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他和马克思的积极的通信。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从那时起已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过时

有自由，政府颁布专制法令，设置秘密法庭，雇佣法官惩办一切胆敢用任何方式促使群众思考问题的人。尽管障碍这样多，但是德国现在的情况怎样呢？过去只有两个人为那些完全不了解社会主义或者对这个问题毫无兴趣的群众写文章介绍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已经几十个有才干的作家向成千个渴望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一切的人宣传新的学说。我们有几家激进（在书报检查制度所容许的范围内是最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报纸，其中首推‘特利尔日报’和威塞尔的‘发言人报’；在巴黎，我们在出版自由的情况下发行了一张报纸。除了直接受政府影响的期刊外，没有一个刊物不是每天都在颂扬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甚至政府也不得不客客气气地对待一切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运动，只要这些运动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就行。到处都出现了改善劳动者的处境以及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的协会，并且还有些普鲁士政府的高级官员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些协会的活动。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在德国已经是一个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了。一年来已经有一大批社会主义者成长起来：各个政党都对他们表示尊敬，我国的自由主义者尤其在他们面前讨好卖乖。……奇怪的是（至少在德国北部是如此）无论在轮船上、火车车厢里或是邮车中都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社会的思想，同意必须采取某种措施来改造社会。我刚从附近几个城市旅行回来，没有一个地方我没有碰到五个以至十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在各种人当中，在商人、厂主、律师、官吏、军官、医生、编辑、土地承租人等等当中都有我们的支持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力量仍然靠中等阶级，——这一事实或许会使英国读者大为吃惊，假使他们不明了德国的中等阶级远没有英国中等阶级那么自私、偏颇和愚蠢（这只是因为他们的不那么富有）的话，但是我们希望很快就在工人阶级中找到支柱；显然不论何时何地工人阶级都应当是社会主义政党所依靠的堡垒和力量，而且工人阶级已经被穷困、压迫、失业以及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工业区的起义所惊醒，他们不再那样昏睡不醒了。……事实上社会主义今天在德国所占的地位已经比它在英国所占的地位优越十倍。”

的陈货。

在他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讨论到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指出让人们明确共产主义的真正性质是迫切需要的⁷⁸。事实上，他吃惊地看到，对于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否可靠的想法，不仅在民主主义者中而且也在莱茵省的共产主义者中广为流行；因此，他在宣传和写作中努力消除人们的迷误和空想，同时指出共产主义乃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催促马克思赶快写完他的著作并且出版，因为他的著作是最好的澄清剂，可以使一切难题得到明确的解决⁷⁹。

而他自己也发表了一篇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行办法的文章；他回答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们提出的最根本的意见，这些人尽管很愿意承认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可以接受，但否认它在实践上

⁷⁸ 参阅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11月19日于巴门），同上书，第10页：

“我们当中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人在这里，因为我们的人都还需要引导，使他们继续从事必要的工作，而不致去胡言乱语和走入邪道。例如，很难使荣克和其他许多人相信，他们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他们还总是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私人纠纷。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卢格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总是不相信的，而且会认为，轻率地抛开象卢格这样一个‘著作界权威’，终究是很可惜的！对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呢？应该等待一下，等卢格再干出一件天大蠢事来，让这些人亲眼看看他是怎么回事。”

⁷⁹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10月初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5页：“那里人们非常活跃，但也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支柱。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做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参阅同上书，第8页：“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发表出来。早就是这样做的时候了。”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18页：

“不过，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你自己还感到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没有有什么关系，人们的情绪已经成熟了，就要趁热打铁。”

是可以实现的⁸⁰。

他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一文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移民区在莱茵省建立的可能性^{80a}，并估计这种移民区的存在可以证明有效地实行共产主义是可能的，于是，在《关于最近创立而目前仍然存在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描述》一文中，他同时陈述了这些移民区的建立原则及其组织细节⁸¹。他写道，这些移民区既包括工厂、作坊，也包括农村、草原、葡萄园、养马厂和养牛厂。每个组织都可免费地从一般商店中得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在这些移民区中既没有穷人，也没有犯罪和诉讼，万一有争讼之事，可由管理委员会去解决⁸²。

第一批美国移民区是由基督教的震教(Shakers)组织建立起来的；之后，由沃登堡的传教士拉普(Rapp)的门徒们所创立的移民区也具有同样性质⁸³。欧文在英国汉普斯斐尔的谐和村建立了

80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10月初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8页：“我也要把工作加紧干起来，今天就要重新开始写作。关于共产主义实际上能否实行的问题，所有德国人还都不清楚。为了消除这种陈腐之见，我将写一本小册子，说明在这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什么，并通俗地叙述共产主义在英国和美国的当前实践。这将占用我三天左右的时间，但是这对于向我们的人说明问题有很大帮助。这一点我在和本地人谈话时已觉察到了。”

80a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591页：“如果我们能在最近四五年内取得象这一年当中所取得的那样的成就，那末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建立共产主义的移民区。你知道，我们这些德国理论家都正在成为实践的事业家。事实上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个人受托参照欧文、傅立叶等人的计划并利用美洲各移民区及你们的“和谐”移民区(我希望它繁荣壮大)的经验来拟定一个组织及管理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具体计划。”

81 《Deutsches Bürgerbuch》[《德国公民手册》]，1845年，第326—340页；参阅同上书(德文版)，第521—535页。这一段见于《新道德世界》日报1845年5月10日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即该文作者；参阅同上书，第518页。

82 参阅同上书，第522—525页。

83 参阅同上书，第525—531页。

一个类似的移民区。由于这个移民区是在借款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在它的成员之间，亲密友爱的程度远不象其他移民区那样，然而这也没有妨碍它很好地发展下去⁸⁴。

这些移民区的成功，说明财产共有制不仅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也是可行的。人们在移民区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好、劳动少，而且有更多的闲暇从事自我教育。这种移民区的创立特别有利于工人，因为它给他们以安心工作和独立生活的保障⁸⁵。

正如在对施蒂纳所作的批判中那样，恩格斯在他对于共产主义移民区的价值和作用的想法中，并没有表现出象马克思那样的果断。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共同体的移民区的建立到头来只能是一种失败，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必然要使移民区归于毁灭，事情实际上就是这样的。诚然，在恩格斯预言这些移民区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时候，实际上它们已露出消亡之前的衰败景象。

恩格斯对于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政策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最有利这个当时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深感兴趣；对于这个问题，他曾打算以德国保护政策的发起人李斯特为题写一本小册子；在爱北斐特的讲演中，他把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作了很长的说明。

另外，他的革命家的气质使他并不满足于理论的探讨，不久，他就以最直接、最活跃的姿态参与了无产阶级的斗争⁸⁶。

84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卷，第531—534页。

85 参阅同上书，第534页及以下诸页。

86 参阅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11月19日于巴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13—14页：“所有这些理论上的废话一天比一天更使我感到厌倦；谈到‘人’的问题而不得不说的每一句话，为反对神学和抽象概念以及反对粗陋的唯物主义而不得不写的或读的每一行字，都使我非常恼火。如果人们不去研究所有这一切幻影——要知道，甚至还

在紧接着西里西亚织工罢工之后，掀起了对于贫穷问题的讨论，这一现实给直接参与斗争造成了方便。当时，贫穷问题引起最热烈的争论，尤其在一些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中更是如此。政府为了预防新的暴乱，对这类协会的建立是抱欢迎态度的。在这些协会中，大资产阶级主张对工人阶级的援助应限制在筹办一些慈善事业方面，而民主主义者主张贫穷问题只有通过深刻的社会改革才能铲除，两者之间已开始出现对立的局面，恩格斯和赫斯利用这种对立，把协会的领导权从大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并赋予这些协会以一种更为激进的性质⁸⁷。

在这方面，竟至在自由主义的刊物上也出现了的某种社会主义倾向，帮了他们的忙。从1844年6月起荣克给马克思写的信中说，在《科伦日报》上人们大谈共产主义的情况是从前《莱茵报》所

有现实化的人在现实化以前也仍然是一个幻影——而去研究真实的、活生生的事物，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结局，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这样做至少是上策，因为现在我们还只是靠使用我们的笔杆子，而不能直接用手，或者如果有必要，用拳头去实现我们的思想。”

- 87 参阅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11月19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10页：“现在，我们这里到处都在举行公开的集会，以便建立工人生活改善协会；这使德国人大大活跃起来，并促使庸人们去注意社会问题。这些会说开就开，并不征求警察局的意见。在科伦，章程起草委员会的半数委员是我们的人，在爱北斐特，委员会里至少有一个是我们的人；由于得到了唯理论者的帮助，我们已经在两次会上使虔诚的宗教信徒们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在绝大多数人赞同下，章程中排斥了一切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东西。我感到有趣的是：这帮唯理论者，在理论上是基督徒，在实践上是无神论，因而把自己弄得非常可笑。在原则上，他们认为基督教反对派完全正确，而在实践上，他们却不许章程中有一个字提到基督教，尽管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基督教是上述协会的基础；章程里写进什么都行，唯独不要协会的生命攸关的原则！可是，这些家伙是那样顽强地坚持这种可笑的立场，以至我完全用不着出来说什么话了，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目前情况下所能希望得到的章程。”

从来没有过的⁸⁸。这种倾向越来越突出了,于是,在1845年1月,被共产主义刊物的发展弄得极为兴奋的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共产主义书刊传入德国,在目前已经成事实。一年前,这种书刊是在德国以外,在巴黎开始流行的,实际上,那时它刚刚产生,而现在它已成为德国佬的一种负担了。报纸、周刊、月刊、季刊,以及正在向前推进的重炮预备队,统统都安排停当了。事情发展之快简直难以形容!”⁸⁹

恩格斯所暗示的这个重炮预备队的后备力量,就是一些社会

88 参阅格·荣克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6月26日于科伦)(照像版: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缩写I. M. L. M.],第一卷,第一分册,第54号):

“每天都在谈论贫穷问题、社会主义,这个谈这个题目,那个谈那个题目,以致德国庸人终于相信了人们每天向他嘟嘟囔囔谈的那些,也不感到害怕了,人们如果暗示他在几年之内这是必然的,那么,说不定他甚至也会把他的所有分给别人。”参阅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载《新道德世界》,1844年11月13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590页:“就是今天早晨,我在一张自由派的报纸《科伦日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该文作者由于某种原因遭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攻击,作者就在这篇文章中为自己辩护。但是他怎样辩护呢?他说他是社会主义者,就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希望从政治改革入手,而我们却希望立刻取得一切。但是要知道,《科伦日报》就其影响和发行面来说是德国第二大报。”

89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18页。

参阅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载《新道德世界》,1845年5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599页:“至于共产主义的书刊,在这方面已经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群众确实渴望得到消息;他们正在吞食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切新书。……另外还创办了一些月刊,这就是《威斯特伐里亚汽船》(在比雷菲尔德出版,吕宁发行,载有论社会主义的通俗论文和报道劳动者的状况的文章)、《人民报》(在科伦出版,具有较明确的社会主义倾向)和《社会明镜》(在爱北斐特出版,赫斯博士发行,专门揭发有关现代社会状况的事实和保卫劳动阶级的权利)。此外,皮特曼博士还创办了一个季刊,叫做《莱茵年鉴》,该刊的创刊号正在印刷中,很快就要出版。”

主义杂志：由皮特曼主编的《德国公民手册》和《莱茵社会改革年鉴》、奥·吕宁主编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和恩格斯与赫斯打算在爱北斐特的出版商贝德克那里出版的《社会明镜》。他们想在这个刊物上，也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描写英国无产阶级的贫困那样的类似办法，去描绘德国工人阶级的苦难⁹⁰。

因为贝德克是个胆量很小的人，他们给他介绍这个杂志的时候，就说这是一个非政治性的刊物，最多只是对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的活动表示支持，同时描写一下工人阶级的贫困，如此而已。恩格斯和赫斯由于找到了出版这一刊物的出版商表示非常满意，事实上，这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一个这样的刊物常常是它刚一出版就遭到了没收。

赫斯负责这个刊物的发行工作，因此来到爱北斐特并在这里定居下来。恩格斯为了不使他同家里的关系完全断绝，坚持要在名义上作为副主编，而实际上这个刊物的性质和倾向是由他定了的。事实上，正是由于他，这个杂志通过对于无产阶级的贫困及其原因的详细描写，才使这个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境况和本阶级的利益，并唤醒了它从事战斗的热情，这个杂志同样也使资产阶级注意到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性。

为了慎重对付书报检查并避免杂志很快遭到停刊的命运，在杂志中很少谈到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方面的问题，相反的，关于无产阶级在其中生活的那种非人道的境况，不管是在德国的还是在英国的，也不管是在法国的还是在比国的，却得到广泛而

⁹⁰ 参阅《德意志电讯》，1845年3月，第45号，第180页：“恩格斯（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与赫斯——《莱茵报》的前任主编——目前在巴门。他们打算出版一份月刊，揭露当代的丑恶，和宣传社会主义。”

详尽的分析⁹¹。

赫斯在主编《社会明镜》的工作中一直坚持由恩格斯所制定的方针，正是恩格斯使得这个杂志成为德国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机关刊物。毫无疑问，赫斯是在恩格斯的倡议之下才在《前言》中着重指出这个刊物的激进性质的。《前言》在批判资产阶级的博爱主义时说：资产阶级，只有当无产阶级的贫困使它觉得大失体面而成为社会舆论的对象时，才去关心一下无产阶级的苦难，随后只要社会问题对它不再具有威胁时，便让工人们去饿死。赫斯不同于恩格斯，由于他对人道主义的迷恋，他在文章中情不自禁地走向了感伤的空想主义。

《社会明镜》只限于去描写工人阶级的贫困，所以就大大有别于恩格斯当时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所写的那本书。恩格斯在该书中，并不限于只去描绘工人阶级的贫困，而且还分析它的原因并得出这样的推断：由资产阶级所引起的存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其尖锐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共产主义革命。

尽管这份刊物的倾向是比较温和的，但是，还是首先受到政府的监视。政府命令书报检查官要对这份刊物特别严格⁹²。正如

91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17页：“从我们这儿的实际情况来看，那帮恶棍不论什么时候都可能来麻烦我们的人的。我们将从皮特曼的《公民手册》方面看到，可以活动到什么程度而不至被捕和被驱逐出境。……最新的消息是，赫斯和我从4月1日起……出版《社会明镜》月刊，在这个刊物上描述社会苦难和资产阶级制度，广告等等最近就要登出来了。……给我们提供一些那里的苦难的材料就好了，特别是具体的事例，因为这适用于那些需要使之理解共产主义的庸人。编辑这刊物并不太费劲，因为要供给每月出版四个印张的材料，写稿人是足够的。这样一来，我们做的工作不要很多，而所能起的作用却很大。”

92 参阅内政部长冯·阿尔尼姆于1845年3月18日给杜塞多尔夫省长冯·施华盖尔的信。引自卡·奥伯尔曼的《社会问题》，前引书，第268页。

进步的报刊所指出的,《社会明镜》从一出版就在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工人当中得到了广大的读者,因此对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贡献⁹³。

在恩格斯与赫斯积极忙于这个刊物的出版工作的同时,他们也尽力为《莱茵年鉴》物色撰稿人,并把这情况告诉马克思。

同时,他们也参与了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中举行的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这些集会是在得到警察局批准的情况下在很多城市中召开的,在集会的过程中他们进行了共产主义宣传。

集会中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数目之多出人意外,这些集会的成功让他们产生了在爱北斐特由自己来组织一些类似的集会的想法⁹⁴。关于这些集会,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这样写道:“爱北斐特这里正在出现奇迹。昨天,在我们这个城市一个上等饭店的最大的客厅里召开了共产主义者第三次大会。第一次大会有四十人参加,第二次大会有一百三十人参加,第三次大会至少有二百人参加。整个爱北斐特和巴门,从金融贵族到小商人都有人参加,所缺少的只是无产阶级。赫斯做了报告。会上朗诵了弥勒和

⁹³ 参阅《停战报》,第173号,1845年6月22日,引自卡·奥伯尔曼的《社会问题》,前引书,第277页及以下诸页:“看到《社会明镜》仅在爱北斐特就已有二百份在工人当中流传,而且他们还不不停地要求订阅,就可知道一份旨在保卫穷人阶级的利益和描述现实社会关系的机关报纸是多么符合人们的需要。直到今天,人们一直把工人看成是一个愚蠢的、粗野的、不可能接受思想的阶级,在这里人们却得到了相反的证明。”

⁹⁴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18页:“科伦的集会已经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共产主义小组一个个地逐渐出现,这些小组是未经我们直接协助就悄悄地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24页:“另外我还要去一趟比雷菲尔德,看看那里的共产主义者。”

皮特曼写的诗以及雪莱的诗的一些片断，也宣读了登在《公民手册》上的关于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文章。然后一直讨论到一点钟。收效极大。共产主义成了人们的主要话题，我们每天都得到新的支持者。乌培河谷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为现实，也几乎成为一种力量了。这里有多么有利的土壤啊，这点你是无法想象的。最迟钝、最无所用心、最庸俗的人士，对世界上任何事情从不感到兴趣，现在也简直欢迎起共产主义来了”⁹⁵。

在第一次集会中，有竖琴家们演奏前奏曲和诗歌朗诵，从而使这次集会带上了一种艺术色彩。赫斯在会上对共产主义的一般原理作了阐明，这就因此产生了一场颇为活跃的讨论⁹⁶。

在另外两次集会中，赫斯和恩格斯——恩格斯还是以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这个假名来发言的——一直强调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不可避免地要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在最后一次集会中，恩格斯确信这些集会遭到禁止已为期不远，索性非常公开地阐明了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

他对于能有机会让他当众讲演并以此来直接影响听众感到特别高兴。他给马克思写道：“当然，站在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具体地、公开地进行宣传，比起胡乱写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文章、用自己‘精神的眼睛’看着同样抽象的公众，是完全

95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23—24页。

96 关于这几次集会，可参阅曾参加集会的诗人阿尔弗莱德·叔尔茨的报道，转载于H.魏格纳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爱北斐特》，载《Monatsschrift des Bergischen Geschichtsvereins》[《伯尔格历史学会月刊》] 1913年。也可参阅《在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省的共产主义》，载于《Janus》[《守门神》]，柏林，1847年，第722页及以下诸页。

1845年2月25日爱北斐特市长给县长的报告，载于H.赫尔施的《思想家与战士》、《工人运动史大纲》，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55年，第102—106页。

不同的两回事”⁹⁷。

性格易于激动的赫斯表现得特别兴奋，看到这几次集会的成功，以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已近在目前了⁹⁸。

恩格斯和赫斯在《莱茵社会改革年鉴》上发表了他们的讲演稿，并且无疑地还补充了一些论据，准备在下一次集会上加以阐明，但是这次集会没有开成⁹⁹。

要正确地评价这几次的讲演，就应该考虑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和面对怎样的一些群众。正是出于对这样一些群众的考虑，出于保留再开另外几次集会的可能性的考虑而不是顾虑到自己的安全，他们才避免着重指出，共产主义只有通过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相反地，他们却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无疑地是要采取和平方式。

这是完全符合赫斯的感伤的本性和他那浸染了人道主义的精神的。他在讲演中说¹⁰⁰，社会所患的最大的病，就是竞争。竞争使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发财致富，同时使穷人的苦难日益深重，并且引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¹⁰¹。

由于意识到在非人的条件下生活，人们便努力通过消灭宗教和国家来消除这些条件。但是，这是不够的，因为只要产生竞争

97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于巴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24页。

98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25页：“赫斯又大大乐观起来，因为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的进展也确实巨大；这个老好人总是富于幻想。”

99 参阅《莱茵社会改革年鉴》，1845年，第36—62、83—93页。讲演稿收集在莫·赫斯的《哲学与社会主义文集》，前引书，第348—359页。

100 赫斯的讲演稿收集在莫·赫斯的《哲学与社会主义文集》，前引书，第348—359页。

101 参阅同上书，第355—358页。

和利己主义的环境存在一天,这些非人的条件就会存在一天¹⁰²。只有共产主义,通过消除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它产生日益严重的危机、把成百万的生命投在苦难之中、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弄得越来越宽——,才能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不错,人们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理论、一种抽象观念而满意地接受了,但是,人们却认为它是不可实现的。事实上,共产主义绝不是一种抽象、一种空想,它乃是近代工业发展和竞争的必然产物。这种发展和竞争将导致一场社会革命;不消灭贫穷,这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¹⁰³。

恩格斯的几次讲演,由于它们具有更为巨大的客观性,由于他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显然比赫斯的讲演要高明得多¹⁰⁴。因为他对形成听众的大多数的厂主和商人的心理状态比赫斯更了解,所以他的发言与其说触及了他们对于事务的实践方面的考虑,不如说触及了他们的心。他以远比赫斯明确的方式指出,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还指出,危机的加剧、中等阶级的贫穷化、无产阶级的扩大及其苦难的日益深重、占有者与非占有者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等等,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不仅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具备,就是在德国,它们也正在逐渐出现。

首先,他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自由竞争,使得生产和社会的合理组织安排成为不可能。生产与消费二者之间日益不平衡,在市场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就使得工厂主不能考虑真正的实

102 参阅同上书,第349—352页。

103 参阅同上书,第352—358页。

104 参阅《莱茵社会改革年鉴》,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536—557页。

际需要,因此,就发生了生产过剩、不景气、降低产品和经济危机。

在生产和危机之中日益严重的这种无政府状态,在使得中等阶级破产和无产阶级苦难日深的同时,使资本集中到人数越来越少的占有者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更加严重了,而这场斗争必然要导致社会革命并走向共产主义¹⁰⁵。

为了杜绝这种情况,他说,就应该合理地组织生产,这将消除危机。良好的统计可以精确地估计需求,并根据需求去调整生产。那时,将不会有成批成批的商品在不景气之后以廉价处理,我们也再看不到有中间人、投机倒把者和批发商(这些人自己不生产而是以商品的寄生虫的方式生存)。同时,失业、讨饭和卖淫的现象也将消失。这样,司法机关、警察和军队也就成了多余的东西,因为已不再有偷盗、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战争¹⁰⁶。

有人说,共产主义对某些国家、比如说象英国这样被危机弄得焦头烂额的国家,也许是一种必要,可是对于受到保护制度的维护而不致产生危机的德国,则不是必要的。对这种意见,恩格斯回答说,事实证明,把共产主义引进德国,同样是必要的。诚然,德国的经济学家们否定这一点,那是仅仅因为他们只关心财富的创造而没有关心财富的分配,并且,他们对这件事、对社会问题从来是漠不关心的。实际上,他们只是幻想着有那么一些正当的办法来保证德国工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并避免危机罢了。使这些经济学家彼此有所区别的是,有一些人比如李斯特,认为只要凭着使德国在英国竞争面前受到保护的关税保护政策,就可以避免危机,至于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主张自由贸易¹⁰⁷。

105 参阅同上书,第536—538页。

106 参阅同上书,第541—546页。

107 参阅同上书,第549页及以下诸页。

恩格斯当时认为，德国需要提高关税来发展自己的工业，这样，既壮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可使它对反动势力的斗争更加积极；但是他没有把问题再推进一步，研究一下怎样的关税保护制度或自由贸易对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才是最直接有利的。两种制度的拥护者们都只看到资产阶级可从中提取的利润，都想方设法来蒙骗无产阶级，说他们所宣扬的制度将给无产阶级带来多么大的好处。相反地，恩格斯不厌其烦地指出，这两种制度不论哪一种实行起来必将给无产阶级带来种种悲惨的后果，并且也指出它们必然地有助于共产主义的建立。

他说，为了德国的经济发展，面前摆着三种可能性：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提高关税、或者维持目前的制度，这个制度，是在外国竞争的情况下不能使德国工业得到足够保护的制度。

如果我们放弃关税保护制度而实行自由贸易，那么德国工业是经不起竞争的，因此就要产生危机、失业并且有爆发社会革命的危险。如果我们提高保护性关税，那么，德国工业由于可以保证得到国内市场，便会迅速地发展起来，直到国内市场达到饱和状态为止。那时如果要增加生产就必须降低保护性关税，这就会使德国工业同外国工业展开竞争，因此同样也要产生不景气、危机、失业和社会秩序的紊乱。最后，如果我们维持 *statu quo* [现状]，那么，在国内市场达到饱和状态之后就会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然后就是倒退，这同样也要引起普遍的危机和它的一切后果。

如果德国工业由于实行关税保护制度而最终与英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起来，同样的事情也是会发生的。那时，两国之间出现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由于英国在经济领域里的先进而德国工业在斗争中失败了，那么，这就会在德国引起深刻的社会动乱；

相反地，如果德国在这场搏斗中取得胜利，那么，英国就会垮台，而不久即将爆发的社会革命将会在整个欧洲产生巨大的回响¹⁰⁸。

恩格斯得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自由贸易制度下也好，在关税保护制度下也好，由于竞争、危机、中等阶级的破产、资本集中在少数占有者手中、无产阶级的贫困日益深重、以及它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主义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英国和法国。

正如在英国那样，实际上在德国工业领域里已经形成了人数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贫困促使他们起来造反，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就是如此。在农村也有同样情形，由于小农不断地贫穷化，一支农村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形成了，城市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因而得到了加强¹⁰⁹。

暗地里酝酿着的革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公开的战争，已露出了要变得比以往任何革命都要更激烈、更残酷的凶兆。如果无产阶级不铲掉祸根、不从根本上消灭财产私有制，那么，这个革命就不能算是达到了它的目的。如果让财产私有制继续存在而只满足于重新分配，那么，导致革命的条件就仍然是被保留着。不过，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例子证明，一场革命在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前是绝不半途而废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情况也是如此，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以消灭贫穷的原因、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而告终¹¹⁰。

这个革命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将以不同方式进行。事实上，有各种不同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在英国，人们无疑将从建立彼此自由联系的共产主义移民区开始，反之，法国人将努力通过国

108 参阅同上书，第550—554页。

109 参阅同上书，第549页及以下诸页。

110 参阅同上书，第555—556页。

家途径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至于德国，因为无产阶级运动还刚刚开始，眼下还不能看出用什么方式去实现共产主义¹¹¹。

为了避免通过暴力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也避免让绝望和复仇心在暗地里起作用，就应该采取种种必要措施以便共产主义能够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首先，应该保证所有儿童由国家免费给以教育和训练。这样，就可避免使穷人加倍地成为现实社会状况的牺牲者，而且也避免使无知成为他们贫困的必然的补足物。同时，这对于形成开明的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的。开明的无产阶级既决心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那么做起来就会采取合于理性的、和平的方式。另外，也要把给予穷人的帮助转变为组织失业工人在移民区中从事工业和农业劳动。这样，穷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将会变成有利于社会的人，而不再是游手好闲和伤风败俗的流浪者。在这方面，筹划必要的资金时要采取对资本课以累进税的办法，而不用当前的不公平的课税制度¹¹²。

由此可见，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梦，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由于危机和居民之日益无产阶级化而造成了自身毁灭的原因。共产主义则将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社会中，每个人都能自由发挥自己的爱好和才能，并和谐地与别人一起生活。在结束自己的演说时，恩格斯请他的听众认真地关心共产主义并促其实现，因为它是从历史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是符合人的心灵和理性的需要的¹¹³。

尽管这些演说语调温和，对公众和环境作了让步，但是地方当局对这些共产主义集会是不会容忍很久的，更不要说容许发言

111 参阅同上书，第547页。

112 参阅同上书，第547—548页。

113 参阅同上书，第556—557页。

人越来越公开地突出表示自己的真实情感了。起初，这些集会受到怀疑，虽然有一些行政官吏也参加了，并且还参与了讨论，但是，县长不在场，他们便不知如何是好，更不要说最先的一些发言并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干预的借口¹¹⁴。

但是，县长回来了，他得知听众的数目不断增加、这些集会在出版界得到越来越大的反响¹¹⁵、并且有可能成为闹事的根源¹¹⁶，于是他请爱北斐特市长命令饭店主人此后不再把大厅租给集会的组织者，这就使得集会从此宣告结束。

县长所采取的措施得到省长的支持，并且受到政府——它看见工人也去开会，就感到害怕——的赞许。省长在2月28日曾命令爱北斐特市长严禁此后再开这类的会，必要时可通知警察局¹¹⁷。

114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于巴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24页：“这种状况能被容许多久，我不知道，但是警察当局确实已陷入困境，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那个头号大混蛋县长现在恰好又正在柏林。如果要禁止我们开会，我们就迂回一下；要是迂回不过去，那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大大地搅动了一阵，使符合我们利益而出版的所有书刊都在这里惊人地流传了。”

115 参阅《Rheinischer Beobachter》[《莱茵观察家》]，1845年，第12号，第2页；K. 赫因岑的《Die Opposition》[《反对派》]，曼海姆，1846年，第118页；《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德意志电讯》]，1845年，第87、99号，第348、368页；《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有教养的读者晨报》]，斯图加特—杜宾根，第78号，1845年3月1日，第311页及以下诸页。以上各条是白尔特·昂德莱阿斯先生(魏尔斯瓦，日内瓦)热情提供的。

116 参阅爱北斐特市长冯·卡尔纳普于1845年2月25日给县长的报告：“我仍然相信这里的资产阶级先生们的心是太崇高、太通情达理了，以致于象这样的集会还能在直到现在为止曾开了几次会的地方得到某种回响。对于在爱北斐特这样的工业城市中其他集会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我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引自H·赫尔施《思想家与战士》，前引书，第106页。

117 省长曾在1845年3月1日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描述了莱茵省的共产主义的骚动、爱北斐特的几次集会，以及他为避免在工业城市中宣传共产主义思

在这几次集会以后，恩格斯同他父亲的关系已经紧张到在家里呆不下去的地步。老早他就想去与马克思聚会，先是想到巴黎去（因为当时马克思在巴黎——译者），后来想去布鲁塞尔（因为那时马克思已迁居布鲁塞尔——译者），但都给耽误了。他所以推迟了动身，是因为他在莱茵省找到了一块非常有利于他的政治活动的地方。现在，既然他受到被逮捕的威胁，于是决定立即动身，他父亲由于害怕事情惹起自己儿子的被捕也表示了同意。他于4月初到达布鲁塞尔，在这里与马克思会合在一起¹¹⁸。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¹¹⁹

恩格斯在巴门逗留期间的最大收获，是他对英国无产阶级状

想的危险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其他城市如毕勒斐特和莱达所举行的一些类似的集会也从此遭到了禁止。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于巴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25页：“昨天晚上有消息说，宪兵将驱散我们下次的大会，演讲者将被逮捕。2月26日。昨天早上，市长禁止奥伯迈耶尔太太让我们在她的住所开这样的会。我也得到通知说，大会如果照样举行，违反禁令，就要实行逮捕和提出控告。”

- 118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17页：
“如果警察要给我制造什么麻烦，我甚至去得更早一些；而从我们这儿的实际情况来看，那帮恶棍不论什么时候都可能来麻烦我们的人的。”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3月17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32页：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必须离开这里，但是还得住几个星期，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忍受过去。”

- 119 弗·恩格斯：《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莱比锡，奥托·维干德，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269—587页。
《La situation de la classe laborieuse en Angleterre》[《英国劳动阶级状况》]，巴黎，社会出版社，1960年版。

况的研究。这项研究不仅使他保持了他在英国逗留期间在意识形态方面所达到的水平，而且还超过了它。

这本书可以说是他从1842年以来关于英国状况所发表的文章中的最高成就。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的越来越详细的分析，使他接近了关于历史的越益深刻的唯物主义的理理解，从而使他完全彻底地摆脱了在青年黑格尔派形成时期他所信仰的唯心主义的残余，同时，也摆脱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直到那时还在他身上起着作用的影响¹²⁰。

这本书，是他从英国回来以后，从1844年10月到1845年3月中旬在一段紧张的劳动之后完成的。通过这本书，他实现了马克思和他在《神圣家族》序言中共同宣布的那个计划，要在反对《批判的批判》所写的这部论战著作之后，分别地、独立地拟定他们对于世界的新的唯物主义的看法¹²¹。

为了把这件工作做好，对恩格斯来说，无论如何都必须对英国的状况加以分析，正是这一点，决定性地确定了他的思想走向历史唯物主义。起初，他打算写一部英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通史¹²²，

120 参阅《莱茵报》，科伦，1842年：《英国对内部危机的看法》，12月8日；《内部危机》，12月9、10日；《政治党派的立场》，12月24日；《英国劳动阶级状况》，12月26日；《关于谷物法》，12月27日。《瑞士共和党人》，苏黎士，1843年：《伦敦书札》，5月16、23日；6月9、27日。《德法年鉴》，巴黎，1844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第86—114页；《英国状况。过去与现在》，托马斯·卡莱尔著，第152—181页。

《前进报》，巴黎，1844年：《英国状况》，8月31日，9月4、7、11、18、21、25、28日，10月5、16、19日。

12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8页：“因此，我们先写下这篇论战性的序言，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著作里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

122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前言》；参阅同上书，第278页：“本书

但是,最后还是决定只限于对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加以描述,这样对他有着更直接的利益,因为这些描述可以使他当时开展的有利于共产主义的积极的宣传活动顺利进行¹²³。

英国无产阶级的悲惨的生活状况,激起了英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恩格斯实际上正是打算以描写这些生活状况的办法,来唤醒德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激励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憎恨,并反对那些以为凭着自己的万灵药方就可以使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得以终止的博爱主义者和空想主义者¹²⁴。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或多或少地受

中所考察的问题,最初我是打算仅仅作为一本内容比较广泛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中的一章来论述的,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很快就使我不得不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恩格斯没有实现他最初的计划,但他对这计划还是念念不忘的,这一点,可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中发表的文献看出。

- 123**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11月19日于巴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11页:“我将给英国人编制一张绝妙的罪状表,我要向全世界控诉英国资产阶级所犯下的大量杀人、抢劫以及其他种种罪行,我要写一篇英文序言,打算单独印行,并分别寄给英国各政党的领袖、著作家和议员们,让这些家伙记住我吧,可是,不言而喻,我打的是麻袋,但指的是驴子,即德国的资产阶级。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坏,只是在榨取方面不那么勇气十足、不那么彻底、不那么巧妙罢了。”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18页:“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当然也不会不起作用,那些事实是太明显了;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想腾出手来写一些对目前更有用,更能打击德国资产阶级的东西。”

- 124** 参阅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278页:“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而傅立叶主义和英国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则是它的间接产物,所以,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 pro et contra [赞成和反对] 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

了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影响，事实上，他们比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更证明自己具有一种空想的倾向；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的博爱主义者还远远超过他们。这些博爱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真实境况一无所知，以为通过一些慈善措施或象创办储蓄基金这样一些权宜之计，就可消灭贫困。这些情况出现过，那是在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之后，而德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日益严重化并没有中止¹²⁵。

从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是以一种真正的热情开始这项工作的¹²⁶。为了起草这部著作，他研究了从各种刊物和书籍中搜集到的大量材料¹²⁷。

造，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大不列颠，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境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稍微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

125 参阅同上书，第279页：“描述不列颠王国无产阶级的境况的典型形式，特别在目前对德国来说是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

126 参阅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11月19日于巴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11页：“目前，我正埋头钻研英国的报纸和书籍，给我的那本关于英国无产者状况的书搜集材料。我想，到1月中或1月底就可脱稿，因为我已在最近一两个星期完成了最困难的工作，即整理材料的工作。”

127 关于恩格斯所引证的著作、刊物和官方出版物，参阅恩格斯《英国劳动阶级状况》，巴黎，上引书，第401—403页。

在这些著作中应该提到以下几种：

ALISON (Sir Archibald),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 [艾利生(阿尔希巴尔德男爵)，《人口原理》]，两卷本，爱丁堡，1840年。

ALISON (William Pulteney), *Observ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poor in Scotland and its Effects on the Health of great*

恩格斯出版他这部著作正赶上一个特别有利的时机：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织工起义的影响下，公众的舆论已越来越对工人阶级的境况和贫穷问题感到关切。

无产阶级的贫困的日益严重和这种情况给社会带来的危险，

Towns [艾利生(维廉·伯尔特尼),《苏格兰对穷人的管理及其在大城市的保健效果的考察》], 爱丁堡, 1840年。

BAINES(Edward, jun.), 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Great Britain [贝恩斯(爱德华, 小),《大不列颠棉纺厂史》], 伦敦, 1835年。

CARLYLE(Thomas), Chartism (London, 1839); Past and Present [卡莱尔(托玛斯),《宪章运动》(伦敦, 1839年);《过去与现在》], 伦敦, 1835年。

CROCKER(J. W.), A sketch of the State of Ireland, Past and Present [克洛克尔(J. W.),《爱尔兰州素描,过去与现在》], 伦敦, 1835年。

FAUCHER (Léon), Etudes sur l'Angleterre [福适(莱昂),《英国研究》], 两卷本, 巴黎, 1845年。

GASKELL (Peter), 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of England [加斯凯尔(彼得),《英国工厂人口》], 伦敦, 1833年。

KAY(J. P.), The Mor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employed in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Manchester [凯(J. P.),《曼彻斯特棉纺厂雇工的精神和物质条件》], 第2版, 1832年。

LEACH (James), Stubborn Facts from the Factories by a Manchester Operative [李奇(詹姆斯),《一个曼彻斯特工人从工厂所看到的不容歪曲的事实》], 伦敦, 1844年。

MCCULLOCH, A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Empire [麦克库洛赫《一张大英帝国的统计表》], 伦敦, 1837年。

MALTHUS (J. 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 [马尔萨斯(J. R.)《人口原理论》], 伦敦, 1803年。

OASTLER (Richard), The Fleet Papers [奥斯特勒(理查德),《转瞬即逝的纸张》], 四卷本, 伦敦, 1841—1844年。

PARKISSON (R.), 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or in Manchester [帕奇生(R.),《曼彻斯特穷苦劳工的现状》], 伦敦, 曼彻斯特, 第3版, 1841年。

PORTER (G. R.),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波特(G. R.),《国家的进步》], 三卷本, 伦敦, 1836—1843年。

这问题以前在英国和法国就早已被提出来了。在英国和法国,不仅是社会主义者,而且就连资产阶级的著作家,也都在绞尽脑汁地寻求种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和平方法,以避免一场社会革命。

早在三十年代初,曼彻斯特的一位医生P·加斯凯尔(P·Gaskell)在《英国工厂的工人人口;它的道德的、社会的和物质的状况;由于蒸汽机的使用而带来的变化,以及关于童工的考察》(伦敦,1833年)一书中,就论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并引起人们注意到,减轻贫困的后果,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由于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他没有建议要彻底改革,尽管如此,他的书客观地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还是有功绩的。他的这种客观的描述使恩格斯部分地受到了启发¹²⁸。

SENIOR (Nassau William), Letters of the Factory Act [色尼尔(纳索·维廉),《工厂活动书札》], 伦敦, 1837年。

SMITH(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the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斯密(亚当),《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四卷本, 1828年。

SYMONS (J. C.), Arts and Artisans at Home and Abroad [西蒙斯(J. C.),《国内和海外的手工业与手工业者》], 爱丁堡、伦敦, 1839年。

URE(Andrew), The Cotton Manufacture of Great Britain [乌尔(安德列夫),《大不列颠的棉纺厂》], 两卷本, 伦敦, 1835年;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工厂的哲学》], 第2版, 伦敦, 1837年。

VAUGHAN (Robert), The Adge of Great Cities [沃汉(罗伯特),《大城市的边界》], 伦敦, 1842年。

WADE (John), 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瓦德(约翰),《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史》], 伦敦, 第3版, 1835年。

WAKEFIELD (Edward Gibbon), Swing unmasked, or the Causes of Rural Incendiarism [瓦克斐德(爱德华·吉本),《剥去伪装的放纵,或乡村中纵火的原因》], 伦敦, 1831年。

128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第2卷, 第297、332、354、358、602页及以下诸页。参阅弗·恩格斯《英国劳动阶级的状况》, (法文版), 巴黎, 前引书, 第107、148、174、179、336页。

在法国，L·维莱美(L. Villerme)于1840年上交给道德与政治科学院一份名为《在棉花、羊毛与丝绸工厂中雇工们的物质和精神状态图表》的报告中，同样也非常客观地陈述了法国纺织工业中工人阶级的状况。

维莱美只满足于描绘工人阶级的生活境况，老实说，只是达到了使人看出对这种境况有加以改善的必要这一地步；至于自称改革家的毕莱(Buret)，在他的《英国和法国的劳动阶级的贫困》(巴黎，1840年)这部书中，批判资本主义是造成贫穷的原因，不过并不号召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相反地，而是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明智来解决社会问题。

继毕莱之后，杜佩修(Ducpétiaux)在他的《论青年工人的物质与精神状况及其改善方法》(1843年)一书中，详细描述资本主义国家中青年工人的境况，而莱昂·福适(Léon Faucher)则在他的发表于《两大陆评论》(1843—1844)的《英国研究》以及他的《英国，它的社会与商业制度》(巴黎，1845年)一书中，明确无误地描述了英国无产阶级的贫困，但是并没有分析贫困的经济和社会的原因¹²⁹。

在德国，劳伦斯·施太因(Lorenz Stein)在他的《目前法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莱比锡，1842年)一书中，指出了社会主义——表现受压迫的中等阶级的愿望——与共产主义——反映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愿望——二者之间的不同；另外他也指出，无产

129 恩格斯承认这些研究是有功绩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417页。弗·恩格斯《英国劳动阶级状况》，巴黎，前引书，第251页：“莱昂·福适(《两大陆评论》上关于英国工人状况的一系列论文的作者，这些论文表明作者至少研究过这一问题，而且无论如何要比英国人和德国人一向在这方面所写的东西都更有价值)……”

阶级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强调改革的迫切的必要性以避免社会革命的爆发。

在这本激起巨大回响的著作出版以后，在德国紧接着织工起义，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一大批研究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著作¹³⁰。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霍夫根(Höffken)，在他的《英国的境况、它的政治、它的势力的发展》(两卷本，莱比锡，1846年)一书中，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作了一番唯心主义的描绘，赞扬英国是最先进、最自由的国家，认为它的成功应归之于它的自由的制度，但是对工人阶级的贫困则闭口不谈。

J·维纳底(J. Venedey)在他的《英国》(3卷本，莱比锡，1845年)和载于《新欧洲》、《文明世界年鉴》(卡尔斯卢赫，1845年，第1卷)的《英国社会生活》等著作中，从一种感伤的观点来批判社会关系，他对富人们，责备他们由于竞争而产生的利己主义——因为竞争必然产生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对穷人们，则责备他们

130 参阅 H. BODEMER: *De la situation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H. 鲍德迈:《论劳动阶级的境况》], 格里玛, 1845年。

H. BETTZIEH, *L'argent et l'esprit* [H. 贝特济,《金钱与精神》], 柏林, 1845年。

A. SCHNEER: *De la situation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à Breslau* [A. 施尼尔:《论布累斯劳的劳动阶级的境况》], 柏林, 1845年。

B. WERNER: *L'assistance aux pauvres, son origine, les moyens de leur venir en aide* [B. 维尔纳:《济贫所, 其起源, 援助穷人的办法》], 达姆斯塔德-莱比锡, 1845年。

O. V. WENCKSTERN: *L'industrie allemande et l'union pour le relèvement de la condition de la classe ouvrière* [O. V. 文克施太因:《德国工业与工人阶级生活改善联盟》], 柏林, 1845年。关于这一时期的德国社会文学可参阅 W. 芒克(W. MÖNKE)的《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德国文学上的回响》, 柏林, 1965年。

放任自己受恨的情绪的支配，并且教训人们，只有对邻人的爱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办法。

差不多和恩格斯同时，生活在离曼彻斯特不远的布莱德弗尔德地方的商业代表并与恩格斯常有来往的格奥尔格·维尔特(Georg Weerth)¹³¹，在《英国的无产者》这篇长文中，从共产主义的观点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进行了一次分析¹³²。他的描述在两点上与恩格斯的有所不同：他很少论述英国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也很少论述它的革命后果，因此缺少系统性和完整性。事实上，格·维尔特可以说是以摇动万花筒那样的方式，通过轻描淡写和画写生画那样的办法来进行这篇文章的写作的。他描写了一个宁愿乞食不愿劳动、坚信自己无法逃脱贫困的爱尔兰人¹³³；他描写了一个到了晚上就变成夜店、供一些无处安身的人乱七八糟地挤在那里过夜的小酒馆¹³⁴，以及一些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失业者宁愿乞讨或行窃也不愿关闭在那里的习艺所¹³⁴。贫困的日益严重说明了犯罪、自杀、以及为英国工人阶级所证明了的战斗性何以不断在增加¹³⁵。在文章的末尾，维尔特宣告恩格斯的著作即将出版，他认为在当代德国作家中，恩格斯是最能够对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作出正确的分析的¹³⁶。

131 关于格·维尔特，请参阅本卷第1章，第 页。

132 参阅《莱茵社会改革年鉴》，1845年，第309—326页。

133 参阅同上，第309—313页。

134 参阅同上，第313—315页。

135 参阅同上，第317页及以下诸页。

136 参阅同上，第326页：“我就此结束我对英国无产阶级境况的不完整的描述，而此刻，我高兴地知道一位德国最优秀的作家正在对英国工人生活的全貌进行写作，这将是一部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作品。事实上，这位作家远比我懂得如何揭露一些个别事实，从他在曼彻斯特长时期的居留期间，比我有更多的机会去观察工人……”

恩格斯献给英国工人阶级的这本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¹³⁷，是对英国工人生活状况所作的一次细致深入的研究的成果¹³⁸。它是不久前发表在《前进报》上的那篇重要文章《英国状况》的续篇¹³⁹。

在那篇文章中，恩格斯着重说明何以工业革命决定了近代英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现在则与那篇文章不同，恩格斯打算说明何以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活境况日趋恶化、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必然导致一次社会革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这次工业革命的必然后果。

在这本书中，他非常明确地指出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使经济和社会状况起决定性变化的工业革命的发展，与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一部仍处于手稿状态的、名为《英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素描》的书中，维尔特对英国境况作了一番比较完整的描绘。参阅《格奥尔格·维尔特全集》，前引书，第3卷，第8—475页。

137 参阅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273页及以下诸页。

138 参阅同上书，第273页：“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

参阅同上书，第278页及以下诸页，《序言》：“我有机会在二十一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

139 关于这篇文章，参阅本书第3卷，第179—195页。（法文版）

这场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是：手工业生产越来越被那种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生产所代替。这种代替之所以势所必然，是因为手工业作坊和手工业工场的产品越来越不能满足急速增长的需要。这场革命是从纺织工业中、特别是棉纺工业中机器的发明和引用，以及1769年詹姆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的使用而开始了的。在纺织工业中引起真正天翻地覆的变化的第一个发明，是1764年哈格里沃斯制造的珍妮纺纱机。手摇纺车只有一个锭子，而它却有十六个到十八个锭子，只要一个人摇就行，因而能够生产比过去多得多的纱。在他以后随之而来的一些发明，比如1769年阿克莱的梳棉机、1785年克伦普顿的骡机、1804年卡特赖特的动力织机等等，从根本上改变了纺织工业的面貌，并使手摇纺工和织工越来越迅速地遭到了淘汰¹⁴⁰。

在纺织工业中引起了前所未闻的跃进的机器的使用¹⁴¹，很快就扩展到所有的工业部门中去。汽船、铁路以及其他机械的制造，有利于促进冶金工业的迅速发展，而这种发展由于在冶炼中用焦炭代替了木炭因而更加快了步伐。同样，采掘工业也是如此¹⁴²。

工业革命对于农业的影响就是机器的普遍使用。这种使用，加

140 参阅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284—287页。

141 参阅同上书，第287页及以下诸页：“在1771—1775年输入英国的子棉平均每年不到五百万磅；而1844年输入就不下六亿磅。这种工业的中心是郎卡郡，在八十年内人口增加了九倍。……这种工业好象用魔杖一挥，创造了居民共七十万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城市……。”

142 参阅同上书，第291—293页。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的煤矿，从1753年的十四个增加到1843年的一百三十个，每年出口原煤五百万吨。铁矿的采掘1740年为一万七千吨，1834年上升为七十万吨。制铁业的主要中心是北明翰、设菲尔德和斯泰福郡，铁的生产在1740到1834年这期间的增长是与铁矿的采掘成正比的。同样，生铁的出口从1805年的四千六百吨上升到1834年的十万零七千吨。在煤矿、铁矿、铜矿和锡矿中雇佣的工人总数，在四十年代初期已上升到将近二十万人。

上越来越大量地使用肥料和土地的逐渐集中，增加了从土地中的进益，其结果，造成了农产品价格的降低¹⁴³。

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由于产品价格降低引起了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迅速扩张，这样，也就给占领国际市场造成了有利条件。

工商业的不断跃进也给交通运输手段带来深刻变化。譬如陆路运输，尽管公路网延长了，还是不能直接满足需要，于是从1830年起开始修建铁路，以便把大城市、工厂、煤矿和铁矿，同一些海滨城市彼此连接起来。同时，挖了一些新的运河、疏浚河道使之能够通航，修整改建码头，由于帆船不敷使用，又加速建造汽船，到1836年，汽船的数目已达到五百艘¹⁴⁴。

“近六十年来”，恩格斯这样作结论说，“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简短地说来就是如此。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二百五十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智慧的工人，这些人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象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象ancien régime〔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¹⁴⁵

工业革命在经济上引起一场深刻变化的同时，也在社会方面

143 参阅同上书，第293—294页。

144 参阅同上书，第293—295页。

145 参阅同上书，第295—296页。

引起一种巨大的变动。这个变动表现在：中等阶级衰落了，新的阶级在上升，以及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

事实上，土地的集中造成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发财致富和小农的破产；由于机器的广泛使用而促成的工业发展，在另一方面又使得大资产阶级由于资本集中和产品的垄断而壮大起来，同时，受到大工业和批发商的竞争的打击的中等阶级、手工业者、小厂商和小商人则日趋衰败，工人阶级也日益陷于贫穷。所有这些产生了这样一种后果：英国人民划分为资本家和无产者这样两个对立的阶级，以及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的不断加剧。

一个越来越富有、越强大、并企图作为领导阶级把政权从贵族手中夺过来的大资产阶级开始形成了。而在这同时，由于中等阶级的日益贫穷和机器的广泛应用，也形成了一个人数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英国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研究英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研究它的贫困的原因和影响以及对于它的革命的行动的后果等等，其重要意义正在于此¹⁴⁶。

他对英国无产阶级的研究，是既包括城市无产阶级也包括农

146 参阅同上书，第296页：“新生的工业能够这样成长起来，只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而在狭义的工业以外，在手工业方面，甚至于在商业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

参阅同上书，第281页：“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英国是发生这样一种变革（这种变革愈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愈是强有力）的典型国家，因此，英国也是这种变革的主要结果（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只有在英国，才能就无产阶级的一切相互关系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阶级。”

业无产阶级的。这两个阶级都是在工业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直到那时为止，农村人口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大土地所有者、占大多数的以自己的土地来养活自己的小农和佃农、农庄的雇农、以及在自己的工作之外耕种小片土地以维持生活的手摇纺工和织工¹⁴⁷。

由于人口增加和大陆封锁而引起的农产品的需求增多和价格提高，促使大土地所有者和大农场主开始大量收买土地，尽量使用农业机器和肥料来增加他们的收益¹⁴⁸。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由于大陆封锁，英国农业的丰收得到了保证，可是战争一结束，一场农业危机爆发了，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逐渐破产。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土地，让大土地所有者和大农场主收买了去，自己去作农场的雇工或当短工，或者流入城市去到手工业工场或大工厂寻找工作¹⁴⁹。

农场的雇工也遭受到类似的命运。只要在农村还保留着宗法风俗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勉强地生存下去。他们住在主人家里，干活吃饭，差不多可以稳稳当地留在那里直到他们死去。但是，农业危机爆发了，尽管有保护法，大土地所有者和大农场主还是被迫不得以最低的价格把谷物卖掉，并且，降低农场雇工的工资并把不绝对需要的雇工遣散。这些人只有去当短工，这在以前是绝无仅有的事，而且由于不是每天都被雇用，生活条件越来越坏，这同样也促使他们涌入城市去寻求报酬比较好的工作¹⁵⁰。

147 参阅同上书，第285页及以下诸页。

148 参阅同上书，第293页。

149 参阅同上书，第285、549页及以下诸页。

150 参阅同上书，第550—563页。

在农村生活的手摇纺工和织工的贫穷化，是同小农的贫穷化相伴而行的。由于大土地所有者们的竞争，小土地所有者被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驱除出去，一向在乡间躲开了需求和危机而生活的手摇纺工和织工，则成了工厂的竞争的牺牲品，因而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工作，到城市里去当产业工人¹⁵¹。

这就是二十年代末在乡间普遍存在的情况。从这时期以来，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成了贫穷的策源地。好多家庭每周只有六到八先令来维持生活，而有不少的家庭，由于失业，一点收入也没有。

在农村一如在城市，农业工人之间与工厂工人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结果使工资降到为生活所必需的最低水平，使失业成为普遍现象。在农村，失业工人还能找到一些零星工作，不致于饿死，但是，也不能企望象一些工业区那样，失业的现象可以由于生产的增加而减轻；相反地，城市的失业工人则处于完全被遗弃的境地，不能企望能够得到任何救援。

工人阶级的贫穷化首先是在纺织工业中发展起来的。由于人口迅速增加而产生的对于纺织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破产的农民、手摇纺工和织工的不断拥挤到城市中来（他们同无产阶级化了的手工业者一起提供必要的劳动力）¹⁵²，以及机器和作为动力的蒸汽的使用，所有这些都利于促成这一工业部门的飞速进展，不仅在城市而且也在农村。

如果城市对厂主们提供了许多巨大的好处，诸如便利的运输工具、购买原料和商品运出的极其方便等等，那么乡村则使他们可以逃避工商组合对生产加以限制和阻碍的种种规定，而且另外还

151 参阅同上书，第281—286页。

152 参阅同上书，第296—297页。

给他们提供了低工资的好处。所以，工厂建立在哪儿都好，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工厂建立在农村，农村很快就变成小乡镇，由于劳动力的不断涌入而逐渐扩大，而且，在各式各样需求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一些必要的行业也具备了。“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须有其他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儿来了。这种村镇里的居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习惯于工厂工作，逐渐熟悉这种工作；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来。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器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起不仅建筑材料和机器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的确，农村比起城市来也有它的优点，在那里通常可以更廉价地雇到工人。因之，农村和工厂城市就不停地竞争，今天优势是在城市方面，明天农村里的工资降低了又利于在农村中开办新的工厂”¹⁵³。

先是在纺织工业中，继之又在冶金工业和采掘工业中，由于

¹⁵³ 参阅同上书，第300—301页。

通过广泛使用机器而造成的产品的迅速增加，一支数量越来越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开始形成了。起初，因为劳动力的需求在增加，他们的命运相对地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境况不久就由于代替了手工的机器的普遍使用而趋于恶化，而且，很快又变得比差不多能保证总有个栖身之处和一日之粮的农业工人的境况还要坏。生产的机械化，使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了，其结果就是使得工人之间的竞争激化，使他们陷于贫困和失业。珍妮纺纱机的使用便引起了这种情况：这部机器可纺出比手工劳动多六倍的纱，所以一经使用，三分之二的手工纺工被解雇了。在织造和棉布印染方面使用机器，也得到同样的后果¹⁵⁴。

对工人来说，把机器引用于工厂的不祥的后果，由于允许使用妇女和儿童这一措施而更加严重了。女工和童工的报酬比男工的报酬低得多，使用女工和童工就使得已经普遍降低了的工资还要降低。在生产上不需要多大力气的纺织工业中特别是这种情况。事实上，纺纱的工作已经简化到只要把断了的纱头接起来就行了，而这个工作，妇女和儿童由于手指的灵巧就比男人适宜去做¹⁵⁵。在冶金工业和采掘工业中，同样也表现出妇女和儿童的竞争。这说明为什么女工和童工从八岁起就被雇佣，在那又窄又低的坑道里去运煤和矿石¹⁵⁶。

数目可观的爱尔兰的移民加剧了英国无产阶级贫困的恶化。这些爱尔兰人，由于受土地被分割得过于细碎的影响而且要向小

154 关于机器被引用后对纺工和织工的境况产生的影响，可参阅同上书第427—428页；对棉布印染工的影响，可参阅第481—482页：“在这里，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做助手的小孩用机器做的工作抵得上过去二百个工人用手做的工作。”

155、156 参阅同上书，第533—534页。

农场主缴付过高的赎金，若在当地肯定是要饿死的。他们不适宜做正规的、复杂的工作，缺乏组织能力，他们被迫不得不勉强去做那些比英国工人所做的还要低下、还要更受剥削的工作。他们需求不高，习惯于各种匮乏，住在简陋的小屋中，衣衫褴褛，以土豆充饥；他们满足于最低的工资，事实上他们也很难得到中等水平的工资，除非做那些要求更多的灵巧和智慧而不要求力气的专门技术的活儿，而这在他们是很难办得到的¹⁵⁷。

由工人自己造成的这种激烈的竞争，他们为获得工作而展开的这种无情的斗争，成了握在资本家手中的最好的武器，可以使资本家去剥削压榨工人直到他们最后一滴血¹⁵⁸。

由于工业的机械化，生产的费用降低了，并且正因为这样，商品价格也降低；可是由于需求的增加，生产费用和商品价格降低，完全可以导致雇佣大量工人并相对地提高工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事实上，为了满足需求，建立新的工厂是必要的，但是要费好多年的时间。因此，失业好象成了地方病，以致寻找工作的工人的数目总是高于劳动力的需求¹⁵⁹。

不管碰到怎样的机会，工人的境况总是悲惨的、无常的，特别是在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产生的危机时期，更是如此。由于生产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在机会顺利时人们制造出大批大批的商品，投入市场。当市场已呈饱和状态时，商品再流入就极其困难了，这样就爆发了危机：减价、停止生产和失业。

在工业革命初期，危机还只限于在某一些工业部门或某一些市场发生，但是，很快就普遍发生了并具有周期性，大约每五年

¹⁵⁷ 参阅同上书，第562—563页。

¹⁵⁸ 参阅同上书，第359—360页。

¹⁵⁹ 参阅同上书，第366、423页。

重新发生一次。

由于定货停止了，于是危机引起小工厂的倒闭，而大工厂则满足于放慢生产的步伐……它们拖，对于工人来说，就是减少劳动时间、工人之间彼此竞争的激化、以及失业和贫困的普遍发生，到头来只有挨饿受冻。

过了一段时间，情况由于需求增加而好转了；在价格上升的同时，渐渐地，仓库里的存货又往外流了。形势一经好转，投机倒把的商人便插手进来，他们使物价直线上升。于是，又出现了新的生产热潮，直到专凭信贷为生的投机家们为了偿还债务而不得不把囤积的货物卖出时为止。这样一来，市场上引起了混乱，信贷动摇了，而由于不景气，仓库里积压了大量的存货，付款付不了，工厂只有倒闭。这样，一场新的、按照习惯的程序发生的危机就出现了¹⁶⁰。

由于失业，英国工业除去在特别繁荣的时期，总保有一支工人后备大军，其规模大小要看当时市场的情况而定。这支失业者大军有助于稳定工资水平不致过高，而且在情况好的时候还可以作为必要的劳动力去满足生产的需要。这支后备军，包括乞丐、靠偶然的工作为生的人诸如清道夫和沿街叫卖的小贩等等在内，据官方的报告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可以这么说，这支后备军构成了一批多余的人口，经常程度不同地受着贫困的折磨¹⁶¹。

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老板的奴隶。老板不仅有权安置他的工作，而且甚至有权支配他的生命。在古代奴隶和构成无产阶级的新型奴隶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工人似乎是自由的。这意思是说，他不象古代奴隶那样地被卖掉，而是自己出卖自己，而且

160 参阅同上书，第365—368页。

161 参阅同上书，第369—371页。

看来还是满心情愿。如果说这给了他古代奴隶所享受不到的某种自由，那么，这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坏处，即没有人保障他的生计；如果资本家对他的工作不感到兴趣了，那他就只有去挨饿。从这里可以看出，资本家处于一种古代的奴隶主所没有的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他可以不去关心工人的命运，他可以随便把他辞退而自己不受任何损失¹⁶²。

无产者的境况也并不比农奴的境况好些。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事实上自己的生计倒是有了保障；而无产者的情况却不是如此，他随时都有失业和挨饿的可能。如果说农奴要把结婚的初夜权让给主人，那么工人事实上则是把每夜的权利让给老板去受用¹⁶³。

无产者处于奴隶地位这一点，从他没有资本家的同意就连一天也不能活下去这一事实即可看出；这就使他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不就接受雇主所强加的任何条件，要不就去饿死¹⁶⁴。即使在工厂中，工人所受的压迫也是完全公开的。工人在工厂中没有任何权利，而老板则享有一切。工人不仅要在工厂里劳动，而且还要在那里吃，并且经常也要在那里睡，但睡眠时间极少。从他还是孩子时起，他就屈服于老板的绝对统治，没有权利请假或罢工，上工稍稍迟到一会儿，就要受到很重的罚金¹⁶⁵。

由于他的工资时常是以购买券的形式发给他的，他的境况就更糟糕了。他不得不以高价从老板那里购买他所需要的东西；他不能不租用由老板盖的住房。如果被解雇，他就立刻被驱逐出来，丢

162 参阅同上书，第363—364页。

163 参阅同上书，第471、479、480页。

164 参阅同上书，第360页

165 参阅同上书，第464—470页。

掉了工作，同时也丢掉了自己的家¹⁶⁶。

作为商品的生产者，无产者也是服从于调节生产和贸易的各种条件的。工人本身变成了商品，并且他必须按照供求的价格作为商品出卖自己的劳动。如果生产增加了，而劳动的需求也同时增加了，那么便出现了高工资；如果相反地生产减少，那么工资便降低，工人的贫困便会加深¹⁶⁷。

工资的上升同样有赖于工人之间竞争的程度，而且它也以工人的能力和工厂对这种工人的需求量大小而有所不同——比手工工人有着更大的能力并且为工厂所更需要的具有专长的工人，比手工工人挣的钱要多些¹⁶⁸；因此，工资的高低要看劳动需求的增减而定。工资的上升实际上是根据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最低价格来定的，这说明一个用陈旧的机器生产的工人要比一个用新型机器生产的工人报酬要少¹⁶⁹。

只有在为满足需求而使所有的工人都得到工作的时候，工人之间的竞争才会停止，他们的工资才会增加¹⁷⁰。

不过这种情况究竟是个例外，因为关于工资这个问题，占优势的一种倾向就是，尽可能把工资降低到为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

166 参阅同上书，第 470—471 页。

167 参阅同上书，第 363 页：“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奴隶。他们竟可以象商品一样地被卖掉，象商品一样地涨价、跌价。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他们的价格也就上涨；如果需求减少，价格也就下跌；如果对工人的需求下降，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找不到买主而‘成了存货’，那末他们就只好闲着不做事，而不做事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所以他们只好饿死。”

168 参阅同上书，第 363 页。

169 参阅同上书，第 426 页。

170 参阅同上书，第 362—363 页。

度¹⁷¹。工资的降低经常伴随着工人劳动日的延长，劳动日一延长，加上工人由于忍受饥寒，结果弄得筋疲力尽。劳动日事实上对童工来说是十二到十四小时，而对男织工和女织工以及在家里劳动的工人来说，竟达十八小时¹⁷²。

这种非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不仅在城市里到处存在，而且在农村里也是如此。事实上，农业短工如果一周挣到六到八个先令为一家人生活，就应该满足了，因为有时一连几个星期没有工作可做¹⁷³。在产业工人当中，工资最高的是冶金工人和矿业工人，他们的劳动极其艰苦，因此他们是受妇女和儿童的竞争最少的。不过冶金工人的境况由于逐渐地普遍使用机器而不断恶化。比如在斯泰福郡铁业区，一个工人制出一千二百个钉子才挣六个辨士；每一个钉子要打十二锤，因为锤重三磅，所以工人要举重一万二千磅才能挣到这点可怜的工资¹⁷⁴。

必须与妇女和儿童展开最大竞争的纺织工人挣的工资最低。除去数目很少的一些具有高度技能的纺工和织工不提——他们每周可挣到三十先令——，大部分纺织工人只挣到他们工资的一半，有时甚至是三分之一；工资挣得最少的是那些在旧式机器上工作的工人，他们还必须和最新式的改良了的机器竞争¹⁷⁵。工

171 参阅同上书，第361—362页：“工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只有一个限度：没有一个工人会为了少于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工资而工作。……在最坏的情况下每个工人都情愿放弃他已经习惯了的那一点舒适和文明，只要能勉强地生活下去就行。他住猪圈也可以，只要不住在露天底下；穿得破破烂烂也可以，只要不赤身露体；吃土豆也可以，只要不挨饿。”

172 关于在不同工业部门里的工人的一般境况，可参阅同上书，第420—474页；第475—499页。

173 关于农业无产者的境况，可参阅同上书，第549—563页。

174 参阅同上书，第489页。

175 参阅同上书，第426—428页。

资最少的，是那些制帽女工和女裁缝，一天工作十八小时，每周不过挣到二到四个先令。她们挤在顶楼里，冬天唯有靠着自己的体温取暖，每天从早晨四、五点钟直到半夜一直在弯着腰工作，就在这里消磨掉她们的健康和青春；而这时在街道上却飞驰着富人的豪华的马车，一位花花公子在玩牌中一夜之间输掉的钱，她们劳动一整年才能挣到¹⁷⁶。

扣去房租、取暖费和照明费，挣钱最少的工人大约每天只有十五个辨士的饭钱，没有钱去买衣服¹⁷⁷。

加之，大部分工人都不是正规地被雇佣的，他们常常在一年中有三个月要失业，这样，他们贫困的情况就更可怕了。

为了不致于完完全全地被饿死，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带着自己的家小逃到习艺所去避难，而这里的生活条件是恶劣到了极点的。吃的东西，就是面包和荞麦粥，比分给监狱里的犯人吃的还要坏。这里的制度也类似监狱：外出一定要事先得到批准；为了不生孩子，丈夫和妻子分开来住；孩子是四个或六个人睡一张床，男人和女人是十二个到十四个人一个房间。人死了就象牲畜一样地被埋掉，人们把死人往一个大坑里塞，直到塞不下为止。失业的工人知道这种情况，宁愿饿死也不愿让人把自己关进这样的监狱中去的¹⁷⁸。

正是在挤满了工人的那些大工业城市里，通过他们住房、穿衣、和营养的情况，我们才充分地看到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和这种贫困的悲惨情景。

每个大城市都有它的工人区，这工人区和其他一些漂亮的市

176 参阅同上书，第498页。

177 参阅同上书，第426页。

178 参阅同上书，第576—582页。

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工人阶级所居住的房子陈旧、肮脏和不舒适超过了一切想象。人们很难相信好些人竟会挤在从地窖到顶楼的一些房间里，差不多没有家具，而且常常连铺盖也没有。没有铺石块也没有下水道的街道上堆满了垃圾。最可怕的是对于居住着爱尔兰人的住房和街道所描写的那种景象¹⁷⁹：“这些街道常常窄得可以从一幢房子的窗子一步就跨进对面房子的窗子，而且房子是这样高，这样一层叠一层，以致光线很难照到院子里和街道上。城市的这一部分没有下水道，房子附近没有渗水井，也没有厕所，因此，每天夜里至少有五万人的全部脏东西，即全部垃圾和粪便要倒到沟里面去。因此，街道无论怎么打扫，总是有大量晒干的脏东西发出可怕的臭气，既难看，又难闻，而且严重地损害居民的健康。……贫穷阶级的住宅一般都很脏，而且显然是从来没有打扫过。这些住宅大半都只有一个房间……屋子是潮湿的，往往位于地平线以下，家具总是少得可怜或者干脆就没有，一捆麦秸常常成为全家的床铺”¹⁸⁰。只是在霍乱出现以后，由于害怕传染，人们才想到把工人区打扫清理一下¹⁸¹。为了这些发臭的住房，穷人们付出了极高的租金，还以能在这里找到栖身之处为莫大幸福¹⁸²。

和工人阶级的住房状况相称的是他们衣服和食物的质量。他们穿的棉制衣服既不挡雨，又不御寒，而经常是破烂得不成样子¹⁸³。食物也是同样的质量，工人阶级对于他们的购买力允

179 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的居住情况，参阅同上书，第306—315页。

180 参阅同上书，第316页。

181 参阅同上书，第346—347页。

182 参阅同上书，第307—348页。

183 关于工人的衣著，参阅同上书，第349—350页。

许买到的那些毫无营养价值的食物，已觉得很知足了¹⁸⁴。“工人买的土豆多半都是质量很差的，蔬菜也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¹⁸⁵。

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条件的分析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大城市里住的主要是工人，资产者和工人的比例至多是一比二，常常是一比三，有些地方是一比四。这些工人根本没有什么财产，全靠工资过活，工资几乎总是只够勉强糊口。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根本不关心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养家活口，但是又不给他们能够长期维持正常生活的手段。因此，每一个工人，即使是最好的工人，也总有可能失业，因而就有可能饿死，确实也有许多人饿死了。工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害。住户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间房子至少住一整家人。至于房子里有多少家具，那就随贫穷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最穷的连最必需的家具都没有。工人的衣服一般也是很糟糕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破衣褴衫。食物一般都很坏，往往是几乎不能入口的，在许多场合下，至少是有时候，在量方面也不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会饿死人。——这样，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最好的情况是生活暂时还过得去，靠紧张的工作而挣得的工资也比较多，住的房子也不错，饮食一般还不算坏——说这一切是好的，过得去的，自然是从工人的眼光来看；最坏的情况是极端的贫困，直到无家可归和饿死的地步；但是一般说

¹⁸⁴ 关于工人阶级的食物，参阅同上书，第351—357页。

¹⁸⁵ 参阅同上书，第351页。

来，是更多地接近于最坏的情况，而不是接近于最好的情况。同时，并不是某一类工人就固定在这个阶梯的某一级上，不能说这一类工人生活得好，那一类生活得坏，更不能说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不，就算有些地方是这样，就算某些工作部门大体上优越于其他工作部门，但是每一个部门里工人的状况仍然是极不稳定的，每一个工人都有可能通过这一整个阶梯，从相对的舒适转到极端的贫困，甚而至于饿死；几乎每一个英国无产者都能滔滔不绝地叙述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¹⁸⁶。

工人的健康情况之糟和死亡率之高，由于酗酒和纵欲的发展而造成的风俗日趋败坏，以及他们的教养水平之低，都是同他们这种生存条件相称的。

无产者从早到晚不得不从事的繁重的劳作，工厂里普遍的卫生条件之坏，以及睡眠和营养的缺乏，都大大有损于工人的健康。一般来说，工人的健康是很差的¹⁸⁷，在过早地被摧残了的工人当中，结核病和伤寒病为害最大¹⁸⁸。

过度的劳动对体质较为娇弱的妇女和儿童还产生了更为不幸的后果。通常它给妇女们带来脊椎骨和骨盆的变形。

而且，怀孕的妇女因为怕失掉工作，一直继续劳动差不多到生产期，并且生产后没有几天又重新开始劳动，这样对她的健康便不能没有影响¹⁸⁹。

除此以外，还有使用机器的劳动带来的意外事故：断指、肢体的轧伤，等等。在矿井中，由于坍塌和矿内瓦斯的爆炸，这类

¹⁸⁶ 参阅同上书，第 357—358 页。

¹⁸⁷ 关于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参阅同上书，第 379—394 页。

¹⁸⁸ 参阅同上书，第 379—387 页。

¹⁸⁹ 参阅同上书，第 447—449 页。

事故特别是经常发生的。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老板付诊疗费，在治疗过程中照发工资，过后，对事故的受害者的命运就置之不理了¹⁹⁰。工人们没有能力去找高明的医生就诊，而常常是求救于沿街行医的江湖医生，这也是使得他们的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¹⁹¹。

在工厂里劳动，对孩子来说其后果是特别不幸的。由于母亲在生产后三天或四天就重新开始工作，婴儿实际上是没有人去照顾的。母亲在很短的休息时间里来了，急急忙忙地给他喂一顿奶，同时也灌他一些麻醉剂，为了使他保持安静。如果孩子在这种情况下里长大了，那么，他便会任性而为，常常是还没有达到成熟年龄便嗜酒如命。在工厂，孩子从九岁起就不得不开始劳动，他在噪杂声中和对健康极其有害的气氛中生活，并且要拚命地劳作；这说明何以青少年中患佝偻病的人数特别多¹⁹²。

工人在其中生活的条件说明何以在工人阶级中死亡率特别高。在总人口中死亡率只有2.5%，而在工人区中则上升到4%；在有产阶级中五岁以下的儿童的死亡率是20%，在工人中则是57%；至于平均年龄，有产阶级是35岁，而工人阶级则降为20岁¹⁹³。

根据以上所有这些事实，恩格斯在结论中控告资产阶级犯有社会谋杀罪¹⁹⁴。

工人的可怜的生活条件也说明了何以他们有着酗酒的嗜好和

190 参阅同上书，第449—451页。

191 参阅同上书，第388—389页。

192 参阅同上书，第386页。

193 参阅同上书，第390—393页。

194 参阅同上书，第394页。

败坏的道德。喝烈性的烧酒在他们是一种需要，因为他们可以从那里得到必要的安慰和一点点生活的乐趣。工人下了工已是筋疲力尽，困倦不堪，毫无心情再回到他那低矮肮脏的小屋里去，而宁愿去酒馆，在那里，他把挣到手的大部分钱花掉，这对工人阶级的健康同时也对工人阶级的道德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喜欢责备工人们爱好酗酒的资产阶级，事实上正是造成这类事情的真正的罪人，因为正是它使工人遭受的贫困推动他们走向酗酒的¹⁹⁵。

在工人当中，道德的堕落是伴随着酗酒而出现的。由于工人是在那种条件里生活，所以即使宗教和道德的规劝都不能改变工人在烈酒和性生活的错乱中去寻求快乐¹⁹⁶。

道德的败坏不仅由于工人的生活方式、贫困和酗酒，而且也由于强加给他们的那个工作的性质。事实上，劳动并没有成为一种发挥他们才能的手段，而只是成了使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衰退的根源，因为劳动分工越来越细，使他不得不从事一种单调的操作。“使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根源就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创造吗？是由于本能吗？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東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连工作多少个钟头，单调得令人厌烦；如果他还保有些微

195 参阅同上书，第386—389、412—416页。

196 参阅同上书，第398—399页。

人的感情的话，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内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分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门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制针头或锉齿轮，再加上象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末，当他活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¹⁹⁷。

在工厂中越来越普遍地使用妇女和儿童，也大大地助长了道德的堕落，首先它破坏了家庭生活。在工厂中劳动的少女，既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操持家务的主妇，也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母亲。由于孩子不在身边，母亲也不可能照顾他，于是孩子随心所欲，整天在家门外闲荡，没有任何约束¹⁹⁸。

好象作为一种惩罚似的，工人们不得不在其中居住的那些破烂肮脏的房子，也助长了家庭生活的瓦解。事实上，女人和男人一样，宁可到酒馆去，他们在那里倒可以找到比在自己家里还要令人舒服的气氛，他们去时带着孩子，因此孩子也逐渐地沾染上喝酒的习惯¹⁹⁹。

工业城市中工人人口的集中，由于在工作上男人和女人的经常接触，同样也带来了道德上的堕落²⁰⁰。另外，老板随意地玩弄女工，而女工怕被解雇不敢拒绝，这就在造成贫困的同时鼓励了纵欲。纵欲的情况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仅仅伦敦城中就有四

197 参阅同上书，第404页。

198 参阅同上书，第430—433页。

199 参阅同上书，第412—413页。

200 参阅同上书，第405—406、434页。

万个妓女²⁰¹。

尽管英国工人道德败坏，但是他们比资产阶级表现出更富有人性，对那些急需援助的人比资产阶级表现得更要乐善好施²⁰²。

随着贫困、酗酒和纵欲的发展，犯罪事件也逐日剧增。在英格兰和高尔地区，1842年里发生了三万一千起犯罪案件，其中绝大部分是偷窃案。因为在陷于贫困的无产者看来，被关进监狱没有什么可怕，他们宁愿去偷窃而不愿被迫饿死或自杀²⁰³。

工人阶级的智力水平同它的物质和道德状况也是相称的。正如资产阶级只给与英国工人阶级以生活必需的最少的工资那样，资产阶级也给与它以最少的教育，因为害怕教育会使它起来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在五千五百万英镑的预算中，英国政府只拨出四万英镑用于国民教育。事实上，正规的教育是保留给资产阶级的子女们的；对于工人的孩子们，则只有少数质量很坏的学校，特别是一些由宗教教派创办的旨在劝人进教的学校。由于这些孩子们从九岁起便不得不去劳动，所以，他们一般地只能上夜校，而且他们不可能从夜校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他们劳动之后已经筋疲力尽、睏倦不堪了²⁰⁴。

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绝不是从学校教育中得到的，而是从日常生活中取得的，所以，尽管工人们一般地不会念不会写，可是却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这个文化按劳动的工种的不同而不同；产业工人的文化特别高，矿工的次之，农业工人的更次之。这个文化使工人们避开了宗教——他们在宗教中看到的不

201 参阅同上书，第414、434—435页。

202 参阅同上书，第410—412页。

203 参阅同上书，第417—419页。

204 参阅同上书，第395—400页。

过是一种欺骗——，因此他们产生偏见的可能比资产阶级小得多²⁰⁵。

面对着工人阶级的，是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唯利是图。工人对它来说不过是一种商品，它要从中取得最大可能的利润：“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象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腐朽，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在这里我指的首先是狭义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清白的。当然，这些英国资产者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他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私德，在日常的交往中，和其他一切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些可敬的和体面的人物；在商业关系上，他们甚至比德国人好些，他们不象我们的小商人那样讨价还价，斤斤较量，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发财的渴望。……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所以政治经济学这门专讲赚钱方法的科学就成为这些人所喜爱的科学。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政治经济学家。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并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而当工人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作这样

205 参阅同上书，第399—400页。

一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肯定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确，这个人除具有其他特点外，也还具有劳动的能力)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决不能被当作‘劳动’、当作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通了……”²⁰⁶。

这阻止不住资产阶级大声宣扬它对人民的人道主义的感情，给它这种感情作证的是，它用从工人阶级那里取得的利润的一部分创办种种慈善事业，其实创办这些慈善事业的目的，不过是在于缓和工人的愤懑情绪罢了。

在它对待所有问题的态度上都标志着这同样的伪善。比如，关于废除谷物法的问题便是如此。资产阶级口口声声地说废除谷物法是为了工人的利益，其实，它是想通过这一措施所必然产生的面包价格的下降来进一步缩减工人的工资，这样可以使它更好地对付国外的竞争²⁰⁷。

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全部怨恨，都在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论这篇辩护书中和由此而产生的济贫法中爆发出来了。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地球上的人口同它能养活的居民的数目比较起来是人口过剩的。人口由两类不同范畴的人组成：一类是富人，他们是有教养的并具有崇高道德的人；另一类是穷人，他们既无文化也无道德，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把穷人人口中的多余的人铲除掉。这样，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来看，所有以增加多余人口为其效果的济贫措施的不祥性质，便很清楚了。马尔萨斯的理论受到资产阶级的热烈拥护，他们在这个理论里为他们迫使无产阶级一步步饿死的行为找到了合法根据²⁰⁸。

²⁰⁶ 参阅同上书，第564—565页。

²⁰⁷ 参阅同上书，第568—569页。

²⁰⁸ 参阅同上书，第569—572页。

这个理论，在代替了1601年的旧法（该法规定穷人由教区负责救济）的新济贫法中，得到了实施。由于执行旧法，财政上的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了，因为失业急剧增加，于是旧法被新法所代替。新法认为贫穷就是犯罪，强迫失业者一律进入真正的监牢——习艺所中去²⁰⁹。

资产阶级不满足于通过经济和社会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它同样还利用只不过是保护它的阶级利益的全部国家机器——一切法律的设计局——、司法、军队和警察，来达到它压迫无产阶级的目的。事实上，穷人身上承受了法律的全部重量，在对待失业流浪和损害私有财产的惩罚上，法律表现得特别严厉。这种惩罚由于裁判官所采用的那种方式就显得更严厉了。在法庭上，对富人总是宽大处理，而对穷人则给以最严酷的惩罚²¹⁰。

无产者既是在那种条件中生活，为了不致于陷入绝境，他们只有在两者之中选择其一：或者沉溺于酗酒和纵欲，或者起来造他们压迫者的反²¹¹。

尽管英国的工人阶级在道德上或多或少是堕落的，但是由于受到贫困的重压，从整体来看它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它在自己身

209 参阅同上书，第576—581页。

210 参阅同上书，第569—571页。

211 参阅同上书，第399—400页：“所以，这些被当作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渐变得象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参阅同上书，第405页：“这样，工人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上可以找到必要的力量来反对它的压迫者。

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变成了保守的阶级，这样，在它反对专制的君主政体和封建制度时所曾起过的那种进步作用，也就终止了。一直属于资产阶级的指引历史前进的任务，今后就落到了日益表明自己是革命阶级的英国无产阶级的肩上²¹²。

强加在无产阶级头上的贫困越恶化，它的人数越来越众多和有力量，它就越适合于担负起这个革命任务。

工人阶级的斗争，在农村是反对那些剥削农业工人和矿工的大土地所有者，在城市是反对压迫工厂工人的工业资产阶级。这个斗争，随着无产阶级对自己的阶级利益获得更明确的意识和更严密地组织起来而不断扩大²¹³。

起初，工人阶级的斗争是采取了零零星星造反的形式，在斗争过程中，工人们破坏了他们认为是导致自己陷于贫困的机器，并迫害老板²¹⁴。在斗争中一个特别起作用的因素，就是性格热烈泼辣的爱尔兰工人的参与，他们激发了英国工人的战斗精神²¹⁵。尽管英国工人在斗争中使用了暴力，但是从整体来看，他们表现得远比对他们没有使用暴力的资产阶级更要富有人性²¹⁶。

英国工人认识到这些造反并不能带来任何持久的胜利，随着

²¹² 参阅同上书，第412页。

²¹³ 参阅同上书，第407页：“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

²¹⁴ 参阅同上书，第502—509页。

²¹⁵ 参阅同上书，第409—410页。

²¹⁶ 参阅同上书，第501页。

更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他们贫困的真正原因，他们设法在工会和政治领域里组织起来^{217a}。

首先在工会领域里成功地组织起来的，是纺织工人。他们在当时形成了工人阶级的核心；紧接着是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按照这些部门受工业革命冲击的程度的不同，先后组织起来，最后，才是农业工人，他们处于零星的造反阶段最长^{217b}。从此可以看出，在工人斗争的发展中大工业城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²¹⁸。

工人阶级这样逐渐地组织起来，必然推动了反对有产阶级的斗争的迅速扩展²¹⁹。1824年规定工人有结社之权的法令给在工会领域内建立组织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可以在工会中、在工联(Trade-Unions)中集会。这些工联，最初是按照产品的不同种类分开成立的，但很快就统一起来成立了一个总部，它可以积极地、特别是通过组织罢工来捍卫工人的利益²²⁰。虽然罢工遭到了极其野蛮的镇压，但是它却更加激起了工人阶级的战斗热情和对资产阶级的仇恨²²¹。

罢工以及常常伴随着罢工的武装起义的频繁发生，表明在英国社会斗争是多么地严重。这些罢工和起义比政治斗争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它们是工人阶级的前哨战；可以说它们构成了无产阶级的军事学校——它准备通过罢工和起义向资产

^{217a} 参阅同上书，第408页：“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

^{217b} 参阅同上书，第296、554—555页。

²¹⁸ 参阅同上书，第408页。

²¹⁹ 参阅同上书，第571—572页。

²²⁰ 参阅同上书，第503、504页。

²²¹ 参阅同上书，第507页。

阶级发动决定性的斗争²²²。

工人阶级在工会领域里开展的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1842年纺织工人发起的大罢工。但这次大罢工遭到了有政府的一切力量为其后盾的资产阶级的激烈抵抗。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为反对它而开展的艰苦的斗争中，从整个来说是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工人一般地在罢工中都遭到失败；他们没有办法，为了不致饿死不得不向资产阶级投降²²³。尽管如此，工人们还是坚决地留在工会中，因为工会给他们提供了少受老板剥削并取得某些成功的唯一的可能。正是这样，童工的劳动多少得到减轻，不满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可以不上夜班，不满十八岁的工人白天工作十二小时，成年则平均工作十三小时²²⁴。尽管厂主们千方百计地破坏这些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对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能说没有带来一些明显的改善。当然，从整体来看，工人的情况仍然是极其悲惨的，他们对剥削者的仇恨丝毫没有减轻，相反地，是在不断增长²²⁵。

工人阶级的活动在政治领域里是通过日益采取坚决捍卫工人阶级立场的宪章运动来进行的。宪章运动开始于18世纪末叶诞生的民主运动之前。民主运动由于支持辉格党人为选举改革而发生的骚乱，曾允许工人阶级派遣一些代表去国会参加1832年的选举。1838年，以威廉·洛维特为首的伦敦领导委员会（le Comité directeur de Londres）草拟了人民宪章，提出普选、年选、和选区平等要求²²⁶。起初，工人的激进主义和资产阶级

²²² 参阅同上书，第512页。

²²³ 参阅同上书，第505—508页。

²²⁴ 参阅同上书，第458—461页。

²²⁵ 参阅同上书，第462页。

²²⁶ 参阅同上书，第525页。

的民主原则混合在一起。由于工人的激进主义表现得越来越坚决，上呈了成百份请愿书要求改善工人劳动条件，资产阶级首先企图使工人不再坚持自己的请求，它发动了一场拥护废除谷物法的骚乱，废除谷物法实际上是想通过降低物价以达到缩减工资的目的²²⁷。工人们很快懂得，如果废除谷物法可以增进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对工人自己是不会有利的；于是他们对这场骚乱表示不关心，而继续自己的争取恢复权利的斗争。

掀起了纺织工人大罢工的1842年的危机，给宪章运动以巨大的推动；在拥护宪章的请愿书上有三百五十万人的签名。在1842年的波澜壮阔的罢工面前，资产阶级有一个时期对工人阶级还比较宽大，因为它原来期望在废除谷物法的行动上可以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后来它改变立场反对工人阶级，并呼吁政府出力粉碎罢工。这样，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加深了，并且在宪章运动中引起分裂。1843年在伯明翰举行的国会中，资产阶级拒绝一切革命行动，退出了宪章运动。宪章运动自此控制在工人分子手中，更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的要求：每天工作八小时、增加工资、和工作要有保证²²⁸。宪章运动的进展可惜由于1842年罢工的失败受到挫折，紧接着是迫害，并且遭受了牺牲。

宪章运动尽管在行动方面很活跃并卓有成效，可是与同时发展的社会主义相反，它在理论方面则贫乏无力。在英国，社会主义的发起者是R·欧文。欧文仇视革命行动，认为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半农半工的移民区，在这移民区中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同样的福利和权利²²⁹。

227 参阅同上书，第569页。

228 参阅同上书，第519—521页。

229 参阅同上书，第525—526页。

英国社会主义的信徒们在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最开明的分子中召集志同道合者；他们相信通过训练和教育的发展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他们还创办了很多阅览室和学校。学校中教授的基础科目包括博物学、政治经济学、一些思想家如爱尔维修、霍尔巴赫、D·F·斯特劳斯和蒲鲁东等人的学说的研究²³⁰。不同于法国的社会主义，英国社会主义具有无神论的性质，这一点是同英国无产阶级反宗教的态度相一致的²³¹。如果说，英国社会主义由于它的无神论的性质而比法国社会主义高明，那么，反之，从革命行动这观点来看它却大有逊色。由于相信理性的决定性作用而拒绝行动，英国社会主义者谴责无产阶级争取权利的斗争；尽管他们懂得这是由于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那方面的剥削而引起的。他们还责备无产阶级道德堕落，不知道道德堕落应归咎于贫困，不知道资产阶级的道德实际上比无产阶级要堕落得多²³²。

没有同无产阶级取得联系的英国社会主义在实践上是软弱无力的。如果它与宪章运动联合起来，它就会直接发挥有效的作用。只有社会主义与宪章运动、就是说理论与革命行动联合起来，才能使无产阶级取得胜利²³³。而且，这种联盟也不会不形成，因为这是大势所趋。

由于另外一些工业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日益严重的竞争而引起的危机的发展，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这次危机，大约将在1846—1847年时达到高潮，势将引起一场革命，同这场革命比较起来，法国的大革命看来不过是种儿戏²³⁴。人民的怒火

230 参阅同上书，第528页。

231 参阅同上书，第526页。

232 参阅同上书，第525页。

233 参阅同上书，第527页。

234 参阅同上书，第585、298页。

将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势头迸发出来。减轻人民的愤怒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工人当中宣传共产主义。如果说，共产主义承认了工人阶级反对压迫者的起义的合法性，那是因为它认识到，资产阶级作为个人是不能对现存事物的状况负责的，人们对资产阶级分子不能进行个人报复。应该希望，直到这次革命爆发以前，共产主义将在工人阶级当中深入人心，以便革命能够爆发而无需流血。无论如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将进行到底，目前的现实就是这样，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足以使革命爆发²³⁵。

对于英国的境况、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它的贫困的原因、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激化——对所有这些情况的深刻的分析，说明这本书自从出版以来何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兴趣²³⁶。所有的评论家都一致承认这本书是以一种对于事实的深刻认识为根据的，但是，对于恩格斯所认为的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以及由此而产生革命后果的论断，他们之间的意见却各不相同。

反动的评论家一般都承认恩格斯的分析正确，但是认为这部书就它的倾向性而论是危险的。另外，他们还这样想：恩格斯所作的批评只在英国有效，而在德国，贫穷现象逐渐出现则只能由资产阶级负责；不过德国政府，特别是普鲁士政府，出于它的性质既然能够有效地防止工业化的过头，因此，同样也可以防止贫穷²³⁷。

²³⁵ 参阅同上书，第585—587页。

²³⁶ 对这部著作表示欢迎的评论，参阅W. 芒：《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德国文学上的反响》，柏林，1965年；K. 奥伯尔曼：《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评价》，载《历史评论》（*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59年，第7卷，第5号。

²³⁷ 特别要参阅V. A. 胡伯（V. A. H[UBER]）：《最近的文学》，载《Janus》[《守门神》]，1845年，第2卷，第18号，第387—389页。

同工人阶级有直接接触并担心织工暴动的广泛影响的大资产阶级，比各级政府还要更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加强和阶级斗争的激化意味着怎样的危险。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由主义派的出版界不惜浪费笔墨地攻击恩格斯的这本书。比如政治经济学教授B·希尔德布朗德就是如此；他把这本书形容为“共产主义的圣经”，认为在里面可以找到一切革命的根据，他非难这本书中所阐明的理论，认为它们既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²³⁸。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则确信，社会问题通过国家的民主化而不需要社会的深刻变革就可以得到解决，因此拒绝恩格斯书中的共产主义结论，尽管承认这本书是有价值的。同时，他们也强调有必要采取措施消灭贫穷²³⁹。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热烈欢迎这部著作，并且在自己的刊物上大段大段地选载原文，这对传播这部著作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们对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原因所作的分析和这本书的革命性质，并不强调；对于社会问题只能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来解决这个论断更是闭口不谈。他们用只有一切人都信仰人道主义才能解决全部社会问题这一论点来和恩格斯的相对立²⁴⁰。尽管如此，就他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还是比较易于接受这一点来说，他们还是会或多或少地接受这部书的一些结论的²⁴¹。

238 参阅B·希尔德布朗德：《现在和未来的政治经济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文学社1848年，第162页。

239 参阅卡尔·毕德尔曼：《德国的社会主义倾向》，载《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未来》，莱比锡，1846年，第1、2、4卷。

240 特别要参阅O·吕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德国公民手册》，1846年，第222—245页。

241 参阅H·塞米(H·Semmig)：《恩格斯与卡莱尔笔下的英国，它的现状和未来》，载《Constitutionnelle Staatsbürger-Zeitung》[《宪章公民报》]，格里玛，1845年，第128、130号。

所有这些评论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都把它看作是论述社会主义的唯一的书。在《共产主义宣言》问世以前，正是这部著作读者最多，它对在德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作出了最大的贡献。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这本书，认为在当时社会主义文献中，它是几乎完全符合他的思想的唯一的一部书，并且在某些基本点上还发展了他的观点。“此外，”后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你的书中的主要论点，连细节都已经被1844年以后的发展所证实了。我恰好又把这本书和我关于后来这段时期的笔记对照了一下”²⁴²。他认为这部书作出了对当时英国无产阶级状况的唯一正确的分析，在《资本论》中他还把恩格斯的这部书作为参考，特别是在第1卷第8和第13章中。

列宁把这部书看作是一部无产阶级文学的杰作，并且认为它具有绝对的重要性：恩格斯是第一个在这部书中甚至从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中得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结论，并强调指出在近代历史发展中这个斗争的决定性的作用。“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指出了帮助无产阶级的必要。但是，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

郎贝尔(R [EMPE]):《工业状况》,载《Offentliche Anzeigen der Grafschaft Ravensberg》[《拉文山伯爵领地公报》],毕尔斐特,1845年,第27—32、35号。

J. 魏德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这书属于人民》,毕尔斐特,1845年,第86—94页。

242 参阅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1863年4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0卷,第338页。

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他们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这就是恩格斯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书的基本思想。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体能思考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领会，但在当时却完全是新的。这些思想是在一部写得很动人、充满了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情景的著作中叙述出来的。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从此，到处都有人援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它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的描述。的确，不论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出现过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这么鲜明、逼真”²⁴³。

就在今天，这本书仍不失为一部社会主义文学的杰作，读起来使人获益匪浅并令人叹赏。当恩格斯在差不多五十年后重新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尽管书中有些地方仍然使人感觉到主要是受了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影响，他自己仍然认为这部著作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的一份非常重要的贡献：“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

²⁴³ 参阅《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1卷，第89—90页。

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²⁴⁴。

这本书对恩格斯的思想发展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被恩格斯用来当作某种解毒剂，消除了德国的落后状况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可能在他思想上产生的影响的毒素。由于他继续不断地专注于英国状况的研究，这就能使他的思想水平一直保持他在英国时所达到的那种高度。另一方面——这是最重要的——，他从工业革命这一观点对英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状况的分析，引导他完全独立于马克思并以与马克思不同的方式，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起草这部著作的时候，对他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站到了无产阶级这一边；这就使他跟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博爱主义者不同，把无产阶级不但看成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特别看成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这个阶级只有通过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恩格斯在指出无产阶级的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它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的时候，他就同时打破了博爱主义者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幻梦。前者认为一些慈善措施可以减轻工人阶级的贫困并阻止社会革命的爆发；后者则相信开明的资产阶级能够信仰社会主义，这样社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²⁴⁴ 参阅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276页。

恩格斯所采取的对于无产阶级的立场，说明了何以他的著作与许多探讨同一课题的同时代人的著作有着深刻的不同。这些著作一般只满足于对无产阶级悲惨的生活条件加以描述。相反，恩格斯则同时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对工人阶级状况所产生的后果，指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激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这样，他就帮助了工人阶级认清自己贫困的原因，并鼓舞了他们的革命斗志。

这也使他在两个重要点上远远超过了他那篇作为这部著作的出发点的文章《英国状况》。事实上，他是以更为深刻、详尽、精确的方式，指出英国当代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状况是如何被工业革命所决定，并且，他也更明确地指出了由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激化所必然要产生的一些革命后果。

这本书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事实上，这是第一次，一段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被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以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和一种惊人的果敢从它的经济发展中系统地推断出来。恩格斯实际上说明了工业革命怎样在引起经济的深刻变化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的大动荡并因此而确定了近代英国的基本特点。机器的迅速普遍的使用和发展，通过竞争的剧化，带来了中等阶级、特别是手工业者的破产；使资本集中于变为领导阶级的大资产阶级的手中；并形成了一支人数越来越多的、不得不象商品一样出卖自己并服从商品买进卖出的规律的无产阶级队伍。一切权利被剥夺的、在肉体、智力和道德方面注定要日益败坏的无产阶级，为了从非人的生活条件中解放自己，除了造资产阶级社会的反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样，就引起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激化。

为了防止无产阶级起来造反，资产阶级不仅加强了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力量，而且还加强了国家、经济、政治、道德、以及为资产阶级调节和加强其阶级统治服务的宗教的权力。

尽管这样，资产阶级还是不能阻止无产阶级向它展开的日益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起初是以个人造反和零星的武装起义的形式进行的。但是，当无产阶级对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己的贫困的真正原因有了认识的时候，这些造反便逐渐被由工联和宪章运动所推动的工会和政治斗争取而代。

取得自身解放的唯一可能既然是一场社会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在战斗中，就越来越由那种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彻底对立的思想引导自己，而且这样一来也就越来越远离了空想主义和改良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甚至从资本主义产品的发展和危机中受到鼓舞，因为产品的发展使工业部门中雇佣工人的人数不断增加，而危机则使贫困普遍化，使中等阶级破产，而这些人进来又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如果恩格斯不再象他刚到英国那样，相信共产主义革命在这个国家里已近在目前，至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激化使他坚信，这场革命是无可避免的。

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阶级自行发展的同时，它与资产阶级不同之处也就越来越表现得泾渭分明，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它的行为上，而且也表现在它的通过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形成的自己的意识形态上。甚至正是由于这种发展，无产阶级势将作为进步的阶级而取代资产阶级，决定历史的进程。

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还带有从费尔巴哈人道主义那里得到的某些唯心主义的痕迹²⁴⁵；但是，从整个来看，这些唯心主义的痕

245 关于人道主义，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

迹无损于对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这个唯物主义历史观正在形成，并且使他在摈弃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摈弃了费尔巴哈的半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他的人道主义。

通过对英国状况的分析，恩格斯完全独立于马克思并在与马克思不同的领域里，给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带来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并且，象他通过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和他的《英国状况》这篇文章所曾经做过的那样，在具体解释和实际应用这个范围里，对马克思的一般观点做了精确的阐明和补充。

由此可见，在历史研究中，人们不应采取教条式的方法，只有对于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深刻分析，才能使人对历史获得正确的认识。这些状况本质上是受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而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新的劳动分工和新的所有制的出现，带来了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的改变。

正如社会状况一样，作为这种状况之反映的意识形态也是有阶级性的。可以说，不存在超越历史和超越阶级斗争的绝对观念。事实上，哲学、宗教、道德、法律，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都只能从它们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去理解。由此可见，只能导向观念的发展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以及一般地说一切脱离社会生活的理论，都是空虚的。

第 277 页：“我确信，你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英国人，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民族的成员；你们是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中的成员。正是由于我把你们当作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当作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所以我和大陆上其他许多人一样，祝贺你们在各方面的进步，希望你们很快地获得成功。”关于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原则的利己主义，参阅同上书，第 304 页：“虽然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象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

在对英国状况的分析中用来作为基础的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并不象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做的那样，是被系统地表述出来的，这说明从理论的观点来看，恩格斯还没有达到马克思已经达到的那种水平。如果说，恩格斯还没有做到使他的工作成果具有和马克思同样的概括性，那么，相反地，他对经济状况和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分析，却比马克思的要精确得多。马克思那时已经达到了世界是物质的这样的普遍观念，认识到历史本质上是由人的生产活动的发展构成的，人的生产活动在自行改变的同时，人也为了使之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在改变自然，但是，他却不象恩格斯那样清楚地看到，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决定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状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既然能够在他们分别达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卓有成效地进行合作，那么，在他们的思想互相补充而达到了更高水平的现在，就能够做得更好：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建立了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在关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分析一段历史时期这个方面，提供了一个空前的、光辉的范例。

他们在布鲁塞尔会合以后，这次新的合作的成果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本著作中，他们把彼此的观点结合起来，在对于一些重大的历史时期的分析的基础上，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建立。

第三章

卡·马克思与 弗·恩格斯在布鲁塞尔¹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生活

马克思被逐出巴黎以后，在1845年2月5日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一起到达布鲁塞尔。几天以后，他的妻子也带着他们的小女儿来到了这里²。

2月7日，到达后仅仅两天，马克思就向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一世递了一份申请书，请求批准他留居比利时。这个批准，好不容易才得到³。事实上，由于他的革命活动，他受到比利时政

1 关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寓居生活，参阅路克·佐莫豪森：《卡尔·马克思的动人的人道主义》，巴黎，1946年。《卡尔·马克思生平大事年表》，第27页及以下诸页。

2 燕妮·马克思在《动荡的生活简记》的一篇手稿中描写了他们离开巴黎时的情景：“1845年初警官突然到我们这里，拿出普鲁士政府忒恩基佐发出的驱逐令。命令写道：‘卡尔·马克思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给我的时间比较长，我利用这个时间卖掉家具和部分衣物。因为搬家需要钱，所以不得不廉价出售。海尔维格家人让我在他们家寄住了两天。2月初，天气严寒，我带病在卡尔之后到达布鲁塞尔。”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0页。

3 陛下，呈请人查理·马克思，哲学博士，年26岁，普鲁士王国特利尔人，今愿携妻子定居贵国，谨此奉呈，祈予允准，无任感荷。申请人查理·马克思签字。参阅路克·佐莫豪森：《卡尔·马克思的动人的人道主义》，第75页。

府的怀疑，而且，司法部在刚一得到他到达的消息时就向保安人员下达了命令，要把他作为危险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严密地加以监视⁴。

比利时政府对马克思的怀疑，从警察局的一个密告员2月14日的报告中可以得到证实。这份报告指出，马克思有意在比利时伙同卡尔·海因岑出版一种德国报纸并使它非法地到德国传播，这就不可能不引起同这个国家的麻烦⁵。关于这件事，公安局长在2月19日曾请求布鲁塞尔市长打听一下，弄清楚是否马克思有意在比利时继续出版《前进报》⁶。

爱克斯·拉·夏百乐的警察局长3月3日的一封来信，更增加了比利时当局的恐惧。这封信里问，是否海尔维格、卢格、马克思和伯恩施坦现在布鲁塞尔，是否他们打算回普鲁士⁷。

为了答复公安局长的要求，布鲁塞尔市长于3月15日通知他，说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外没有其他意图，并且还说，为了言之有据，马克思拿出了由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列斯凯签字的关于出版一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书的合同给人看⁸。不管怎样，马克思还是在3月22日写了一张字据声明决不发表有关政治问题的文章以后，才领到了定居布鲁塞尔的批准⁹。

4 比利时公安档案，伯恩施坦德案卷，第8篇。参阅路·佐莫豪森，前引书，第75页。

5 比利时公安档案，卡尔·马克思案卷，第2篇。参阅路·佐莫豪森，前引书，第75—76页。

6 比利时公安档案，卡尔·马克思案卷，第7篇。参阅路·佐莫豪森，前引书，第76页。

7 参阅比利时公安档案，卡尔·马克思案卷，第8篇。参阅路·佐莫豪森，前引书，第76页。

8 参阅路克·佐莫豪森，前引书，第77页。

9 “为了得到在比利时居住的批准，我同意以我的荣誉保证，不在比利时出版

既然被禁止在法国和德国居留，那么能在布鲁塞尔把家安置下来，马克思也觉得很幸福了，他在这里一直住到1848年的革命爆发为止。

他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满足家庭的种种需要。这件事所以能够圆满成功，则多亏得到恩格斯和荣克金钱上的帮助，以及出版商列斯凯同意为马克思打算出版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预支稿费¹⁰。恩格斯为这本书组织募款卖了不少力气，第一次表现出是马克思的忠诚而热心的友人。事实上，恩格斯整个一生对马克思都是忠诚而热心的，特别是当马克思和他的家庭陷入极度贫困的时候，由于恩格斯的经常不断的帮助，马克思才能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事业¹¹。

无论对于思想的发展，还是对于在那个已经签定的声明不谈政治的字据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革命活动，布鲁塞尔这个地方对马克思来说是同巴黎一样有利的。从经济和社会的观点看，比利

任何有关当前政治的著作。”

查理·马克思博士，比利时公安档案，卡尔·马克思案卷，第10篇。

参阅路克·佐莫豪森，前引书，第61、77页。

- 10 恩格斯第一次公开的募款得到五十塔勒，于1845年3月初寄给马克思。参阅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2月22—26、3月7日于巴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22页；几天之后恩格斯又寄来一百二十二法郎。见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3月17日于巴门)，参阅同上书，第28页；马克思从荣克那里收到七百二十法郎，见荣克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4月7日)，原件，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1卷，第5分册，第65号。……马克思从列斯凯那里收到预支稿费一千五百法郎。以上几笔款子加起来约有二千五百法郎，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数目，大约相当于一个教员的年俸的三倍。
- 11 参阅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2月22—26、3月7日于巴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23页：“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

时事实上处于和法国差不多同样的发展水平。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的机械化，正以和法国同样的速度在进行，因此产生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即在中等阶级特别是手工业者衰败的同时，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了，无产阶级扩大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起来¹²。

另外，构成了法国、英国和莱茵省的接合点的布鲁塞尔，由于它的位置同巴黎、伦敦和科伦的距离差不多相等，因此给宣传和活动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而且，正是在由这三个城市构成的三角形地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展开了他们的革命活动。

由于布鲁塞尔的地理位置，同时也由于比利时政府相对的自由主义，布鲁塞尔变成了主要由波兰和意大利流亡者组成的革命力量聚集的巨大中心，这些波兰和意大利的流亡者可以说形成了国际革命活动的酵母¹³。

在1830年的武装起义遭到镇压以后，成千的波兰爱国者流亡国外，主要是流亡法国和比利时，他们在那里为了祖国的解放继续进行斗争。布鲁塞尔大学地理教师约哈希姆·列列韦尔(1786—1861)在比利时扮演了特别活跃的角色。意大利的民族反对派聚集在玛志尼(Mazzini)的周围，后者曾由于创立了“青年欧罗巴”同盟而赋予革命的民主运动以国际的性质。这个同盟，在法国、德

12 关于当时比利时的状况，参阅本卷第1章。

13 参阅奥地利国家档案，维也纳，梅依昂斯情报局记录，一个情报人员给梅特涅的报告，1842年10月18日：“布鲁塞尔是革命活动的主要中心，因为在这里人们享受到完全的自由。”

这些国外移民的革命作用的重要性，特别是从情报人员写给梅特涅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参阅奥地利国家档案，梅依昂斯情报局的记录)。报告几乎完全以从当时被奥地利占领的波兰和意大利本土逃出的波兰和意大利移民的革命活动为主要内容，至于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革命骚动则几乎没有提到。

国、瑞士和比利时，都有一些支部，以消灭一切民族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压迫为宗旨。在这个同盟里，正如在当时所有反对派的同盟里一样，起初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是混在一起的，但是，随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国际范围里的日益激化，在资产阶级盟员与无产阶级分子之间便产生了分裂。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尽力同在英国、法国与莱茵省的德国革命运动领导人取得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英国，这个运动的中心是“正义者同盟”的伦敦支部，由当时逃亡伦敦的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亨利希·鲍威尔和威廉·魏特林领导，在名为“德国工人普及科学公共联盟”的人民教育小组的掩蔽下，努力争取德国手工业工人信仰共产主义¹⁴。马克思那时是通过魏特林的媒介同“正义者同盟”的伦敦支部取得联系的¹⁵。

14 参阅E. P. KANDEL, *Marx et Engels, Organiseurs de la Ligue des Communistes* [E. P. 康代尔, 《马克思与恩格斯, 共产主义同盟的组织者》]莫斯科, 1953。——E. SCHRAEPLER, *La ligue des Justes. Son activité à Londres (1840—1847)* [E. 施拉普勒: 《正义者同盟。它在伦敦的活动(1840—1847)》],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社会史文库》]汉诺威, 1962, 第2卷, 第5—29页。——A. MÜLLER-LEHNING,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1855—1859). A contribution to the preliminary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 莫勒-勒宁, 《国际联盟。第一国际前期史大纲》], 载《社会史国际评论》, 1956年, 第185页及以下诸页。——A. W. FEHLING, *Karl Schapper et les débuts du mouvement ouvrier jusqu'à la Révolution de 1848* [A. W. 费林, 《卡尔·沙佩尔与1848年革命前工人运动的开始》], 罗斯托克, 1922年(论文)。——Karl GRÜNBERG, *Bruno Hildebrandt sur le cercle communiste d'éducation populaire à Londres* [卡尔·格林伯尔格《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关于伦敦人民教育的共产主义小组》],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 1925年, 第11卷, 第445—459页。

15 魏特林给马克思和其他人的信, 见E. BARNIKOL, *Weitling le Captif*

另外，马克思同巴黎的“正义者同盟”保持联系，是通过贝尔奈斯和巴黎“正义者同盟”主席艾韦贝克。好象那时候他并没有跟他在巴黎居留时曾与之来往的巴枯宁继续有着联系。

当然，他通过在莱茵省领导共产主义宣传的恩格斯与赫斯，也同莱茵省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如果说，他感觉同恩格斯——由于他对英国状况的分析而不断丰富了他自己的思想——越来越近，那么，他对赫斯并不是如此，赫斯在发表了那篇《金钱的本质》以后，在思想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虽然他努力使自己去接近当时同自己关系十分紧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想法¹⁶，但是，事实证明，他没有能力象他们所做的那样，通过对于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深刻分析，指出使资本主义发展与无产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的那些因果链环。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转来转去，就是反反复复地说什么实质的问题就是要把人从私有制与竞争产生的利己主义中解放出来，以便人能变为真正的人而能过符合于他的真正本性的生活。

马克思也同在科伦的一些人如那个极为推崇他的格奥尔格·荣克¹⁷、他在巴黎争取信仰了共产主义的医生罗兰特·丹尼尔

et sa «Justice» [E. 巴尔尼高尔：《俘虏魏特林及其“正义”》，基尔，1929年，第271—274页。

魏特林给马克思、恩格斯及赫斯的信(1845年9月22、27日于伦敦)(原版把日期错印为1844年)，参阅W. MÖNKE, Neue Quellen zur Hessforschung [W. 芒克：《关于赫斯研究的新资料》，柏林，1964年，第108页及以下诸页。

16 参阅赫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17日于科伦)，参阅莫·赫斯Correspondance Gravenhage [《格拉文哈格通讯》]，1959年，第105—108页。

17 格·荣克给马克思的信(大约在1845年3月18日于科伦)：“现在，对整个德国来说，你应该算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了，就象你在你朋友们眼中已经是那样的人一样。由于你文笔的华美，你的文章的高度的明确性和正当性，在这

斯¹⁸、以及可能自发地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卡·德斯特尔保持着联系。相反地,他和卡尔·格律恩却越来越疏远了。格律恩的感伤的浮夸之谈在马克思看来对无产阶级斗争是非常有害的。

由于魏特林的活动,瑞士在当时已成了一个共产主义骚动的巨大中心,但马克思和瑞士方面却没有联系。在魏特林被驱逐以后,瑞士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在A·贝克尔的影响之下全都倒向乌托邦主义去了,而魏特林一走,他们的组织实际上也就归于瓦解。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最初同几个比利时人、特别是同菲力浦·日果——民主主义组织的最活跃的领导者之一——有着交往,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同一些德国的政治流亡者们保持接触。这些流亡者也象马克思一样,利用在比利时可以享受比别处更大的自由,同一些德国的手工业工人开辟了一个象巴黎那样向进步思想开放的重要的殖民区¹⁹。

他最初与之常来往的是卡尔·梅因茨、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和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马克思刚到布鲁塞尔的时候,律师卡尔·梅因茨(1812—1882)

方面你应该并且你将会勉励自己去成为第一流的明星。”原件,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第1卷,第5分册,第63号。

18 罗兰特·丹尼尔斯(1819—1855)是科伦的医生。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莱茵省的可靠的同盟者,后来成为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1850年进入科伦共产主义中央委员会。关于罗·丹尼尔斯,参阅G. BAGATURIA, *Marx et Engels et les premiers révolutionnaires prolétariens* [G. 巴加图里阿:《马克思、恩格斯与初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俄文),莫斯科,1961年,第196—244页。

19 参阅茹利安·库柏尔斯:《卡尔·马克思在比利时的朋友们(1845—1848):注解选自比利时档案》,载《社会史国际评论》,1962年,第446—458页。参阅燕妮·马克思:《动荡的生活简记》,前引书,第206页及以下诸页。

曾多次被聘请去争取在比利时的居留批准。毫无疑问，马克思正是通过他才同“比利时民主联盟”的领导成员们特别是律师吕西安·若特兰和菲利浦·日果建立联系的²⁰。

马克思认识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是在《莱茵报》的时期，并且在巴黎时经常与他来往。毕尔格尔斯是在1844年9月和卡尔·格律恩一起来到巴黎的。正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之下毕尔格尔斯变成了共产主义者²¹。

一到布鲁塞尔，马克思几乎立刻就去看望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²²。弗莱里格拉特由于发表了《异国情调的歌》，在将近1840年时连同海尔维格已成为德国最著名的诗人，但是和海尔维格相反，他逃避他所反对的政治斗争。因为接受了弗里德里希·吉约姆第四的三百塔勒的年俸，曾被《莱茵报》指名为自由的敌人。可是最近，在他1844年以《信仰的行为》为书名（他在序言中声明放弃年俸）的这部诗集中所发表的《爱国者的幻想》遭到禁止以后，他转到反对派这方面来了。为了躲避警方的追究，他流亡到布鲁塞

20 关于“比利时民主联盟”，参阅本书第1章。

21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1820—1878)。在波恩大学学完语言学(1838—1841)之后，亨·毕尔格尔斯在1842年与《莱茵报》合作，1844年由于政治活动被逐出巴黎，与马克思一同来到布鲁塞尔，在这里参加共产主义活动。后来他参加“共产主义同盟”，成为《新莱茵报》的编委成员，在科伦共产主义诉讼案中是主要的被告之一。

22 参阅亨·毕尔格尔斯：《关于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回忆》，载《Gazette de Voss》[《福斯报》]，柏林，星期增刊，1876年11月3日：“在布鲁塞尔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马克思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看看，他在这里，我应该去弥合一下《莱茵报》所曾加与他的不公道，那时候他并不是‘在党的围墙后面’；他的《信仰的表白》把一切误会都消除了。”参阅《卡·马克思生平大事年表》，前引书，第27页。参阅弗·梅林：《书信来往中的马克思与弗莱里格拉特》，载《新时代》杂志第12号增刊，1912年4月12日，第7页。

尔，在这里他同马克思建立联系，在他看来，马克思是个有趣、和藹而单纯的人。正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他从民主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²³。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还同来自瑞士的塞巴斯提安·载勒有来往，载勒在瑞士曾积极参加过共产主义活动。他在布鲁塞尔领导一个“通信社”，给德国报纸提供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新闻，他尽可能赋与这些新闻以社会主义的色彩²⁴。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还遇到了卡尔·海因岑和海尔曼·克利盖。他们这两人与毕尔格尔斯、弗莱里格拉特以及载勒相反，显得不是很好的斗争伙伴。海因岑在同《莱比锡汇报》与《莱茵报》合作过一时期以后，于1844年在一本名叫《普鲁士的官僚主义》的书中，对普鲁士的制度大加抨击，这本书一出版就遭到被没收的命运。1844年9月流亡到布鲁塞尔，他在这里出版了一本名叫《密封的信件》的小册子，重新对普鲁士的行政制度加以攻击。毫无疑问，他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之下转向社会主义而给一些社会主义杂志写稿子的；但是，他虽然对普鲁士制度的攻击曾是那样严厉而击中要害，可是对社会所发表的废话连篇的评论却表现得毫无定

23 弗莱里格拉特可能在布鲁塞尔逗留的时间不长，他在1845年3月10日动身去瑞士（参阅《卡·马克思生平大事年表》，前引书，第28页）。他在这个国家里也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曾同一些朋友其中包括卢格和海因岑来往过。1846年，他作为商业代表去伦敦。1848年大革命期间，他参与《新莱茵报》的编辑工作，与马克思一直保持联系，并且马克思在生活困难的时候，好多次都得到他的帮助。

24 塞巴斯提安·载勒（大约1810—1890），最初在莱比锡当统计师。载勒来到瑞士时已是共产主义者。瑞士的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以后，他来到布鲁塞尔，在这里继续积极参与共产主义活动。在1846年时，他在马克思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支持马克思，积极参与了1848年的革命。移居伦敦以后，在马克思领导的反对维利希—沙佩尔小集团的斗争中，站在马克思一边，最后去了美国。

见²⁵。1845年来到瑞士以后，他完全叛离了，他的攻击从此不再指向反动派，而是指向社会主义，特别是指向共产主义²⁶。

二月底，马克思结识了当时在布鲁塞尔流亡的海尔曼·克利盖。克利盖是卡尔·格律恩一类的费尔巴哈派的社会主义者，是弗·恩格斯推荐给马克思的²⁷。他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象卡·格律恩一样，满足于一种感伤的浮夸之谈²⁸。秋天，克利盖从布鲁塞尔动身去纽约，在那里，通过他

25 参阅卡·海因岑：《关于被允许的抵抗说一句话》，载《德国公民手册》，1845年，第1—21页。

第4页：“人们并不是总愿意站在高处去理解或考虑人民的利益同时也应该是政府的利益，并且，政府是为人民而设而不是人民为政府而生。正是由于对法律和自然法则的不幸的误解，才产生了所有历史的不幸。”

第6页：“不过，我们坚决相信，革命，特别是那些事先组织好的、或得到赞许的……对自由和自由的敌人同样都是不幸的。”

第9页：“怎样才能使革命成为没有用的东西呢？在我们看来有一个办法，这办法在德国还很少用过，这就是让精神的宝剑为道德力量服务。”

26 参阅卡·海因岑：《反对共产主义者》，载于《反对派》一书，1846年由他自己在曼海姆出版（第42页及以下诸页）。

关于卡·海因岑，参阅卡尔·海因岑：《经历过的事情》（《Erlebtes》），波士顿，1856年。H. 胡伯：《卡尔·海因岑：他的政治发展与他在文学和出版界的活动》，伯尔尼-莱比锡，1932年。

C. F. 维特格：《反潮流。卡尔·海因岑的一生》，芝加哥，1945年。

27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23页：“这封信寄到时，克利盖恐怕已经到你那里了。这家伙是一个出色的鼓动家，他将告诉你许多关于费尔巴哈的事。”

28 参阅海·克利盖：《关于我们的时代说一句话》，载《威斯特伐里亚汽船》，1845年，第225—228页。

第228页：“这个人类分化的可悲的时代将要永远这样下去吗？富人与穷人将要永远彼此对立，而人们在他们之间将永远不会感到同情吗？难道我们这个美好的大地将永远成为泪之谷，除去逃向彼岸的幻梦中去就不能从这泪之谷中逃出来吗？难道穷人总是盖了房子给富人住，织好了毛衣给富人穿，耕种土地只让富人去受益吗？难道富人就应该永远占有整个大地，享受一切快

的日报《人民论坛》，他给工人阶级做的坏事比做的好事要多得多。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还同以下一些人建立联系：路易·海尔拜尔格（《民主工场》工人日报的撰稿人）、理查·李德尔、C·G·弗格勒（书店老板）、卡尔·威勒（排字工人），以及医生弗里德里希·布莱尔。此外，又来了燕妮的兄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格奥尔格·维尔特和威廉·沃尔弗，因此，在马克思和不久前来到布鲁塞尔与马克思相聚的恩格斯的周围，一个越来越扩大的战友的小组很快就形成了。

马克思和他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小女儿，在布鲁塞尔过着幸福和平静的生活。史蒂芬·伯尔恩那时去看过他们，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的情景：“我从伯尔尼来到布鲁塞尔，这个地方，简直可以说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联盟的精神中心。马克思正是在这里生活着。我很快就跟他认识了。我在一个很简陋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家具的狭小住所里找到了他。他友好地接待我，问了问我宣传方面如何成功的一些问题，并为我写的一本反对海因岑的小册子向我祝贺。他的妻子也参加进来向我祝贺并对我的来访表示欢迎。她的一生都是这样，凡是使她丈夫关心和忧虑的事情她都一一记在心上。她对我也感到兴趣，认为我是她丈夫可以信赖的一位弟子。依照后来人们对我所讲，马克思是在一个舞会上认识他现在的妻子的，那时他是波恩的一个大学生。冯·威斯特华伦小姐出身于一个曾几次遭到厄运的普鲁士贵族家庭。马克思

乐和幸福，而穷人只有他的苍天，他的汗水和他的祈祷吗？不，绝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不会永远这样下去：不久我们将要看到富人与穷人和睦相处，而在人类共有的自由之中，对一切人和每一个人的幸福，将只有一种唯一的爱和唯一的利益。”

狂热地爱着她，而她也以自己的爱情回报了他……这个爱情经受住了一切战斗的考验，而他们的一生就是永不间断的战斗。我很少见过一对夫妻这样幸福，同甘共苦，而苦却比甘要多得多，他们是在对于一种完全的、相互的爱的确信中克服了种种苦难的。我同样也很少见过象马克思夫人这样在仪表、心灵、精神方面如此和谐的女人，甚至只要你第一次遇见她就会吸引你的同情。她的头发是金色的，而她的孩子们，头发和眼睛都随父亲，是黑色的。生活在特利尔的马克思的母亲给他们寄一些东西以备家用，但寄来的却是供书写用的笔。马克思在布鲁塞尔还真结识了几个有着民主精神的政治家，不过他们大都是外国人，跟马克思的关系并不很密切，至少，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看来对此也并不感到遗憾。马克思夫人完全理解她丈夫的思想，也一心照顾着全家，可是她同那些只限于织毛线袜和从事烹饪的德国家庭妇女没有丝毫共同之处”²⁹。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著作：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寓居布鲁塞尔的初期，由于和比利时政府签了协定，很少从事革命活动，而是大部分时间从事理论研究。他所有的研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崭新的世界观。

他的研究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在巴黎时，由于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了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机会，这方面的

29 参阅史蒂芬·伯尔恩：《一个四十八岁人的回忆》，莱比锡，1898年，第67页及以下诸页。

研究已经开始了。推动他向这方面去研究的是这样一种确信，即只有通过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分析，我们才能对在社会变革中无产阶级的状况及其革命任务获得正确的观念。另外，促使他从事于研究工作——关于政治学方面的研究——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1845年2月1日动身到布鲁塞尔来的前夕，跟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了一个合同，约定马克思要写一部两卷本的名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将在1845年夏天出版³⁰。

30 1845年2月到6月，就是说到他将要跟恩格斯一起去英国的时候，在马克思所做的一些有关文选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他读了以下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书：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部分，第6卷，第597页及以下诸页。——NASSAU William Senior,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tirés de leçons éditées et inédites par le Comte Jean Arrivabene [纳骚，老威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从约翰·阿利瓦伯尼伯爵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稿中得出的》，巴黎，1836年。——Henri STORICH,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expositio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 [亨利·施托利希：《政治经济学教程，或对于决定国家昌盛的一些原理的阐述》，附J.-B. 塞伊的解释和评注，巴黎，1823年，第1—3卷。——Joseph PECCHIO (comte), 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n Italie, ou abrégé critique des économistes italiens [约瑟夫·白克希欧（伯爵）：《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史，或对意大利经济学家的简评》] 附序言，雷奥纳德·伽洛阿译自意文，巴黎，1830年。——J. R. MAC CULLOCH, Discours sur l'origine, les progrès, les objets particuliers et l'importanc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J. R. 麦克·柯洛赫：《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进步、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的演讲》，G. 布莱弗译自英文，日内瓦—巴黎，1825年。——Charles GANILH, Des systèmes d'économie politique: de leurs inconvénients, de leurs avantages et de la doctrine la plus favorable aux progrè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查理·伽尼勒：《政治经济学体系：其缺点、优点、以及最有利于各国财富进步的学说》，巴黎，1842年，两卷本。——Adolphe-Jérôme BLAQUI, 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阿托夫-日罗姆·布朗基：《政治经济学史》，《政治经济学教程》，布鲁塞尔，1843年。——Emile GIRARDIN, Les machines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要写这本书他才草拟了一个对于代议制的批判的十一点提纲。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特点是：资产阶级国家是面对着资产阶级社会而建立起来的。与社会脱离的国家的种种制度和教育都具有一种绝对的性质。因此，必然就会把统一于国家的公共生活分为两种：一种社会生活和一种政治生活。由于资产阶级在公共事业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当前作为国家的标志的这种制度就是代议制度。作为这个制度的基础的基

[爱弥尔·吉拉尔丹, «机器»]。——Charles BABBAGE, *Traité sur l'é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 [查理·巴巴热, «关于机器和工场的经济学的研究»], 埃·毕奥译, 伦敦, 1833年。——Andrew URE,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 de la fabrication du coton, de la laine, du lin et de la soie avec la description des diverses machines employées dans les ateliers anglais* [安德列夫·乌尔«工场哲学, 或棉花、羊毛、麻、丝制造工业的经济学, 附英国工场中使用的不同机器的描写»], 译本, 增印关于工业的未发表的一章, 布鲁塞尔, 1836年, 2卷本。——Jacob PEREIRE, *Leçons sur l'industrie et les finances, prononcées à la salle de l'Athénée, suivies d'un projet de banque* [雅科比·白莱尔, «在雅典大厅作的关于工业和财政的讲演, 附一个银行的计划»], 巴黎, 1832年。——Pellegrino Rossi,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白勒格里诺·罗西, «政治经济学教程»], 布鲁塞尔, 1843年。——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 *E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让·查理·雷奥纳德·西蒙德·德·西斯蒙第, «政治经济学研究»], 布鲁塞尔, 1837年, 2卷本。——Ramon de LA SAGRA, *De l'industrie cotonnière et des ouvriers en Catalogne* [拉蒙·德·拉·撒格拉, «论卡达罗涅的棉纺工业及工人»], 载«经济学者日报», 巴黎, 1842年, 第2卷。——A. MOREAU DE JONNÈS, *Aperçus statistiques sur la vie civile et l'économie domestique des Romains au commencement du IV^e siècle de notre ère* [阿·莫罗·德·若耐, «从四世纪初到本世纪罗马的城邦生活与国内经济的统计一览»], 载«经济学者日报», 巴黎, 1842年, 第3卷。——Louis-François-Bernard TRIOEN, *Essais sur les abus de l'agiotage, les moyens d'y obvier et les principes de bonne foi commerciale* [路易·弗朗索

本权利是自由与平等。这些在表面上看来具有绝对性质的权利，在代议制中实际上归结为赋与人人发财致富的自由权，和人人有行使这个权利的平等的权利。

标志着代议制的其他特点是，通过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以及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三权分立。事实上，这三种权力既然由使之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国家来行使，那么，这种分立纯粹是理论上的和虚幻的。马克思就是用民主制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而

瓦一白尔纳·特里奥恩《论投机之风，预防的方法，与诚实的贸易原则》，布鲁塞尔，1844年。——François-Louis-Auguste FERRIER, *Du gouvernement considéré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 commerce* [弗朗索瓦-路易-奥古斯特·费立叶，《从与商业的关系这方面论政府》]，巴黎，1806年。——Alexandre de LABORDE, *De l'esprit d'association dans tous les intérêts de la communauté ou essai sur le complément du bien-être et de la richesse en France par le complément des institutions* [亚历山大·德·拉波尔德，《论集体利益中的协作精神，或论在法国由于普及教育在福利和财富方面的增进》]，巴黎，1818年。——Théodore Flix, *De l'esprit progressif et de l'esprit de conservation en économie politique* [泰奥多尔·菲克斯，《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进步精神和保守精神》]，载《经济学者日报》，巴黎，1842年，第2卷。——F. VILLEGARDELLE, *Histoire des idées sociales av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ou les socialistes modernes devancés et dépassés par les anciens penseurs et philosophes avec textes à l'appui* [F. 维勒卡尔代尔，《法国革命前的社会思想史，或先进的和被古代思想家和哲学超越的近代社会学家，附作为凭据的原文》]，巴黎，1846年。——Alban de VILLENEUVE-BARGEMONT, *Economie politique chrétienne, ou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u paupérisme, en France et en Europe, et sur les moyens de le soulager et de le prévenir* [阿尔邦·德·维勒纳夫-巴尔格蒙，《基督教的政治经济学，或对法国和欧洲的贫穷的性质和原因的考察，以及缓和与预防贫穷的方法》]，布鲁塞尔，1837年。——C.-G. de CHAMBORANT, *Du paupérisme, ce qu'il était dans l'Antiquité, ce qu'il est de nos jours* [C.-G. 德·尚包朗，《论贫穷，古代的状况与今日的状况》]，巴黎，1842年。——Eugène BURET, *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这种民主制只有通过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建立³¹。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计划写的这部《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宣传上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在信中催促他赶快写完³²。但是，由于马克思有这样的性格：自己不完全满意的东西决不发表，这样，这部著作就迟迟未能结束，以致于最后一一直停留在手稿状态。

正是在这些全都有助于使马克思在深度和广度上更好地制定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研究的基础上，他写下了与制定这一世界观有着本质联系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些提纲是在1845年将近3月的时候，就是说差不多在恩格斯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的时候起草的；1888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笔记本中发现了这些提纲，于是趁《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重新出版的机会，恩格斯以《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为题，把这些提纲作为这本书的附录发表出来³³。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欧仁·毕莱, 《论英国和法国劳动阶级的贫困, 政治经济学教程》], 布鲁塞尔, 1843年。——Louis SAY (de Nantes), Principa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ou de la misère des peuples et des particuliers [路易·塞伊(德·南特), 《人民和个人的财富或贫困的主要原因》], 巴黎, 1818年。

- 3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27年德文版, 第1部分, 第6卷, 第537页: 《资产阶级社会与共产主义革命》。
- 32 参阅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7卷, 第18页: “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 即使你自己还感到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 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人们的情绪已经成熟了, 就要趁热打铁。……因此, 你一定要在4月以前写完你的书, ……并设法马上付印。”
- 33 原文曾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 第1部分, 第5卷, 第533—535页。最初的原文和恩格斯曾稍稍作过修改的原文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 第3卷, 第5—7页。原文的法文译文发表在: 马克思、恩

恩格斯高度评价这些提纲，认为这是第一次用文字表达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写道：“这是一份匆匆写成的笔记，原是为了作进一步研究用的，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³⁴。”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只不过是关系到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分析中引出的一些问题，它们是以格言的形式写出来的，因此并不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完全连贯的完整的阐述。这个提纲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与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已经获致的重大成果的发展和深化的表现。马克思在这两部著作中已开始拟定了他的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些原理，因此，这个提纲可以说形成了这两部著作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一条连接线。

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布·鲍威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以后，现在在《提纲》中又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半形而上学的性质进行了抨击。正如在《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开始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点作为思辨哲学的对立部分一样，他在《提纲》中则通过反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

马克思之所以摒弃费尔巴哈的哲学、他的半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以及他的人道主义，最重要的理由是，作为迷恋于保留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费尔巴哈不可能接受一种主张无产阶级阶

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巴黎，社会版，1968年，第31—34页。

34 参阅弗·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页。

级斗争的革命的理論。尽管费尔巴哈的理論代表了资产阶级思想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但是由于他的阶级立场的缘故，他只能在一种既非辩证的、也非历史的、而且必然要使他用乌托邦式的和唯心主义的解决办法去处理社会问题的唯物主义面前，止步不前³⁵。连费尔巴哈自己也承认他的哲学的局限性和缺点，认识到不能用它去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但是要克服这些缺点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³⁶。

随着自己的思想起初朝向革命的民主主义理論演进，之后又转向共产主义，马克思不得不越来越摆脱不可能作为革命行动之基础的费尔巴哈的哲学。

从1843年他开始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时——尽管那时他以之作为依据的还是费尔巴哈的关于异化的理論——起，他在1843年3月13日写给卢格的信中，就责备了费尔巴哈只研究自然而忽略了政治，就是说，忽略了政治和社会的全部问题³⁷。

这种对费尔巴哈的疏远，在他开始制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这两部书中，就采取了一种越来越彻底的反对的形式。在写《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马克思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反对所将触及的广度和各个方面——在1844年8月他写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

35 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一般的特征，参阅本书第2卷，第224—232页。

36 在他的著作的普通版的序言中（《全集》，莱比锡，1846年，第1卷，第XV页），他写道：“你所研究的题目只是关系到头和心。可是人类忍受的真正的病痛并不在头和心中，而是在人的胃里……胃想要的东西有一些人全都有了，而另一些人则没有丝毫东西可吃；从此，人类的一切病痛，甚至连头和心所忍受的病痛，就产生出来了。这样，凡是不涉及对这个重大的病痛的认识和消除方法的东西，不过是个杂货堆，而所有你的著作毫无例外都是从这个杂货堆里出来的。”

37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7卷，第417页。

还祝贺他是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奠基者³⁸——，可是在写《神圣家族》的时候，在这本书里他已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某些哲学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他就已经十分自觉地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从此以后，他几乎不再用异化这个概念去指导他的分析和想法，而是逐渐用 *praxis* [实践] 这个概念去代替。

把马克思的思想同费尔巴哈的思想割裂的这种彻底的对立，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充分地表现出来。随着马克思日益倾向于共产主义，他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也就越来越激烈；在批判过程中，把他与费尔巴哈分割开来的这种差异，就逐渐变为一种日益鲜明的对立。在一些零星分散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在《提纲》中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一般原理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批判。

虽然如此，他的批判并不象对布·鲍威尔的批判那样尖刻，因为在他看来，鲍威尔是反动派的支持者，而费尔巴哈则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

他把对费尔巴哈的全部批判归结为这一点：费尔巴哈没有认识到实践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巨大重要性。

正是因为脱离实践，不懂得它的重要作用，所以费尔巴哈对自然、对个人、对社会、从而也就是对一些社会问题和意识形态，不能得到一种正确认识。他的唯物主义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正是从这里产生的。

和唯心主义者相反，费尔巴哈认为感性的现实、具体的存在是与精神不同的，在他的思考中，是从感性的自然和具体的人出发的，正是在感性的自然和具体的人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

38 参阅费尔巴哈：《通信集》，由叔芬华尔出版，莱比锡，1963年，普及版。

世界观。但是，由于他对感性的现实只从客体的形式而不是从主体的形式、不作为人的生产的、物质性的活动去理解³⁹，因此，这就使他对自然和自然与人的关系产生错误的观念。

费尔巴哈因为不认识实践的作用，因此他只能从其原始的形态去理解自然，把它作为直观的对象而不是作为行动的对象。事实上，自然，对人来说，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那样，本质上乃是人的生产活动的对象，它许可人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而对它加以改变。所以，对人来说，自然已越来越不是动物眼中的那个原封不动的原始的自然了，不是它最初显现给他的那个样子，不是一个为他的生存提供原料的独立的世界了。相反地，自然对于人来说，已日益成为他的活动的产物，成为他的可以通过劳动越来越深刻地加以改变的一个领地。他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正是这种对于自然和人的双重的并行的改造构成了人类的历史。

对于实践的作用的不理解和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一种直观的态度，这就使得费尔巴哈认为，人的理论活动是一种符合人的真正本性的活动方式；跟这种活动比较起来，人的实践活动生产活动不过是属于下品的东西⁴⁰。

39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3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世界，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

40 参阅同上书，第3页，第1条：“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

和这种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强调人类活动具有先于一切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它把人类活动只归结为精神的活动，因而把人类活动给灵性化了，这同样也使它走向形而上学的世界观⁴¹。

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对唯心主义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批判，而在《提纲》的其他条文中就专门来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在费尔巴哈那里，由于不理解实践的作用，因而不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错误的观念，而且对个人、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错误的观念。

费尔巴哈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要性，而这关系在他看来不过是对自然的一种直观，因此，这就使得他在考察个人的时候，不是从其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其真实存在——，而是从个人与其他人的自然关系中去进行考察。这样，个人这个观念在费尔巴哈看来并不是社会的而是人类学的，个人成了一个在社会性上毫无差别的存在，只能从其一般性去理解，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抽象。

费尔巴哈对社会也是如此，他不从经济的和社会的观点，而是从人类学的观点进行考察，认为社会是把人与人联系起来的种种自然关系的总和，他把社会归结为一个自然的共同体，归结为人的种类⁴²。

关于费尔巴哈对实践活动的看法，参阅《基督教的本质》，莱比锡，1841年，第264页：“以实践为对象的直观，乃是被利己主义所玷污的直观之一种卑下而庸俗的形式。”

41 参阅同上书，第3页，第1条：“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

42 参阅同上书，第5页，第6条。

正是由于对自然、个人、社会、个人与自然以及与其他人的关系持这种既非历史的也非辩证的观点，费尔巴哈尽管同唯心主义进行斗争并肯定具体的人和感性的自然的第一性，但还是走到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机械唯物主义中去，这使得他不可能获得一种对社会问题和意识形态的正确观念，也不可能对社会问题给以正确的解决。

事实上，费尔巴哈所探讨的唯一的社會问题是宗教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的自由有赖于这问题的解决。由于他看不到宗教的社会原因，所以，他探讨宗教问题也象他探讨个人和社会的问题那样，是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的。

他认为宗教的本质原因，实际上是存在于个体与类之间的对立，这个对立妨碍个体过一种符合于人的本质的种属的生活，并且使人把人类所固有的一些特性加之于神，就是说加之于一个超自然的和虚幻的存在身上，为的是活在神之中，并在它的王国中即天上过一种符合于人的真正本性的生活。把人的种属的特性异化给神，这样，就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把世界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现实的、地上的、由于人在这里被剥夺了固有于人类的一些特性之故而带有非人性质的世界，一个是天上的、人在那里可以重新找到——尽管是虚幻地——他的种属的特性的世界⁴³。

“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

“(2)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⁴³ 参阅同上书，第4页，第4条：“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

费尔巴哈提出的解决办法，倒是符合于他在宗教问题上所抱的这种半形而上学的想法的。他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归结为一个意识问题。为了消灭宗教，消灭伴随宗教而来的、由于把人类的特性异化给神所产生的人的非人化，费尔巴哈以为，只要使人对宗教和神的虚幻性有了意识就够了，这是属于教育和训练的事情。

马克思摒弃这个宗教问题的理解及其解决办法，指出，宗教在社会关系的性质中有它现实的原因，而宗教只有通过这些关系的彻底变化才能被消灭⁴⁴。

宗教的灵魂，连同它所固有的神秘主义和幻影，是由于在某些确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二重化和分裂所产生的。因此，为了消灭宗教，揭露它的虚幻性还是不够的，而是应该摧毁产生宗教的社会关系，这只有通过革命活动才能办到⁴⁵。

另外，马克思也使人注意到，费尔巴哈所宣扬的通过教育的途径来消灭宗教的说法，实际上包含着这样一个前提：社会被分

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哩。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

44 参阅同上书，第5页，第6条：“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参阅同上书，第5页，第7条：“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45 参阅同上书，第5页，第8条：“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参阅同上书，第4页，第4条：“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

成为两类不同的个人，一方面是作为教育者的贵族——这些人自己其实也应当被教育——，另一方面，则是需要受教育的群众。这就间接地证实了社会分成了对立的阶级⁴⁶。

同样，费尔巴哈因为不理解实践的作用，所以对宗教问题只能提出一种空想的解决办法。他不能解决理论问题，特别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这证明他是不可能把唯心主义彻底驳倒的。

尽管他对唯心主义的攻击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他责备唯心主义把世界归结为精神因素，并且，他用建立在感性现实的知觉上的思维来反对抽象思维。他认为，只有这种感性现实的知觉，才能带给我们外在世界的真实性的证据，证明外在世界的每一个表象都符合于一个客观现实。但是，由于他完全不懂得实践，因此把外在世界、感性现实归结为一种直觉客体、直观对象；这样，他就不可能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真正性质⁴⁷。

并不象费尔巴哈所想的那样，是对于感性现实的直觉供给给我们它的客观存在的确实性；这种确实性是只能由与实践活动相连接的思维供给我们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就是说，要知道认识是否与客观现实相符合的问题，事实上，只有从实践的观点去说明才能弄清楚，因为人凭着直觉和直观是认识不了世界的，而必须把世界作为人的活动的客体，人才能认识世界。

46 参阅同上书，第4页，第3条：“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47 参阅同上书，第4页，第5条：“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

意识、思维，事实上是人的真实存在、他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反映；由此得到这样的结论：意识形态，就是说人类思想的总和，不过是构成其基础的实践的理论形式⁴⁸。因此，思维确实存在于它同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之中，至于是否能存在着一种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的思维方式的问题，这就又扯到纯粹思辨上去了⁴⁹。

费尔巴哈的由于不理解实践而产生的半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正与资产阶级世界观一致。由于排斥一切革命行动，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不能比建立在直观基础上的唯物主义的观点高明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从实践活动的形式去理解感性世界，必然要与对于单个人的抽象观念联系在一起，而作为社会的生活观来说，它也没有能够超过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单个人的生活观⁵⁰。

为了跟这种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符合的唯物主义相对立，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这个新的唯物主义，是从那个被社会主义人道化了的新社会的观念中得到启发而产生的，是反映了

48 参阅《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121—122页：“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因此，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本身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

参阅同上书，第121页：“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49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3页，第2条：“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50 参阅同上书，第5页，第9条：“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内心的呼声的⁵¹。至于机械唯物主义,也象在马克思以前一个一个地出现的哲学体系一样,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而这个新的唯物主义,正如革命的无产阶级所要求的那样——这一点是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于改变世界⁵²。

在这个以社会生活和历史的发展中的实践这个起着革命作用的概念为基础的《提纲》中,马克思表现出已决定性地摆脱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在《政治经济学与哲学手稿》中,费尔巴哈的哲学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在《神圣家族》中虽也有,但是很少了。在《手稿》中,指导思想还是异化这个概念,即使在《神圣家族》中,这个概念仍然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可是在《提纲》中,异化这个概念则完全被实践这个概念所淘汰。

不管是在对于费尔巴哈的批判中,也不管是在《提纲》——可以说是费尔巴哈思想的对立部分——里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基本原理的制定中,正是实践这个概念引导着马克思。事实上,他把费尔巴哈学说的不足之处和缺点诸如对自然的错误观念、对在社会性上毫无区别的个人的抽象概念、对同样以抽象的方式把社会理解为人类的这种错误观念、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宗教问题及其提出的解决办法、以及对思维与存在的真实关系无能理解等等,都归之于不懂得实践的革命作用。与费尔巴哈相反,马克思正是在实践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才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去考察的个人、对在同经济发展和发展的关系中去探讨的社会问题、以及思维与存在的关

51 参阅同上书,第5页,第10条:“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52 参阅同上书,第6页,第11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系等等，有了一种崭新的观念；他还以存在为根据创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

从这些不同的概念中，一个具有辩证的和历史的特点的、与机械唯物主义完全相反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轮廓出现了，这个世界观使马克思从教条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中完全摆脱出来，它将被用来当作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布鲁塞尔会合以前的合作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是从写《神圣家族》时开始的。他们分别以后，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保持着联系，这些书信鼓舞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

最初，他们的通信是以当时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为主要内容的。1845年1月，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他打算同赫斯一起出版一个刊物《社会明镜》。同时，他还请马克思为另外一个杂志《莱茵年鉴》写稿，这份杂志，恩格斯是积极参与了的，并且还为其物色撰稿人。一个月以后，他又极其恳切地向马克思提出他的请求⁵³。在1845年1月，赫斯联合恩格斯给马克思去了一信，

53. 参阅恩格斯给在巴黎的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16页：“另外皮特曼将通过列斯凯出版一种因篇幅大而不用经过检查的季刊《莱茵年鉴》，只刊登宣传共产主义的作品，你也可以给这个刊物写些文章。如果把我们的一部分文章发表两次，首先是在刊物上，然后编成集子单独出版，那也不坏；因为，被禁止的书现在比较难于传播，而我们这样做就能有双倍的机会去起作用。”

参阅恩格斯给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的信（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于巴门），同上书，第24—25页：“我再次以赫斯的名义——也以我的名义请求你，给皮特曼的季刊寄点稿子去。我们都应该在第一期中发表文章，使这个刊物具有明确的性质。不用说，没有我们，刊物是无法问世的。”

信中说明了《莱茵年鉴》将具有纯粹社会主义的性质，并指出在这刊物上刊登的稿子将得到很高的酬金，这对主要靠着笔杆维持生活的马克思并不是没有利的⁵⁴。

但是，马克思没有给这刊物写稿子，无疑是因为他太忙于写他的那部《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了，不过他却尝试着争取海涅去写稿子⁵⁵。

另外，在1845年2月，恩格斯与马克思同时都有意出版一些英国和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要作家著作的译本，附一些说明性的注解⁵⁶。

54 参阅赫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1月17日于科伦)，莫·赫斯，《通信集》，前引书第105页及以下诸页：“我告诉你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一个季刊就要出版了，第一期只要我们凑够二十印张的稿子（这是书籍和刊物可以免去书报检查的最低需要）就可以付印了。皮特曼……跟列斯凯签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合同，这说明社会主义文学现在在德国是多么地风行一时。不用说，这个刊物将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为了皮特曼也为了捍卫我们的事业，应该帮助这个刊物能够出版才是。我已经答应他请你给写点稿子，并且请你也让海尔维格（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好话）和海涅也写点稿子来……按照皮特曼跟列斯凯签的合同，文章每页将付至少三个金路易的稿酬，在皮特曼的再三要求下，说不定要给四个金路易或者还要多些。”

55 参阅马克思给海涅的信(1845年1月12日于巴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456—457页：“出版商列斯凯刚才到我这里来了。他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一种不受书报检查的季刊。我、恩格斯、赫斯、海尔维格、荣克等人都为它写稿。他要我和您商量，请您写稿——写些诗歌或散文。我相信您是不会推辞的，因为我们需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在德国本国站稳脚跟。”也可参阅马克思给海涅的信(1845年3月24日于布鲁塞尔)，同上书，第457页。

56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同上书，第26—27页：“顺便再说一件事。我们在这里打算翻译傅立叶的著作，如有可能，干脆出版一套《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最好是从傅立叶的著作开始。翻译的人也找到了。……你认为对这一套丛书来说，哪些法国人的著作值得翻译，也请你推荐一些来；不过要快，这件事很紧迫，因为我们已经同一个出版商谈判了。”

他们的用意是对这些学说作一番正确的介绍，这个工作，以前劳伦茨·施泰因也做过，不过在阐述中把这些学说弄得面目全非了。另外，通过这番介绍，不仅可以帮助工人而且也可以帮助资产阶级进步分子了解社会问题的性质和重要性⁵⁷。他们想先出版傅立叶、欧文、摩莱里和圣西门派的作品。恩格斯给马克思建议，这套丛书先从出版傅立叶的作品开始，在他看来，傅立叶是最能够把读者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去的作家了。他认为应该有意识地限于象傅立叶这样的一些作家，因为他们的著作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⁵⁸。

恩格斯想把傅立叶著作的翻译工作委托给他在波恩的一些朋友去做，因为那时他自己计划写一本关于英国社会史的书，实在太忙。这本书是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而写的，不过这

57 参阅恩格斯 1888 年 10 月 25 日给倍倍尔的信，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柏林，1958 年，第 157 页。

关于筹办一套丛书的计划，参阅 W. 莫恩凯：《关于一部迄今尚未问世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的两次印刷》，载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 bewegung* [《德国工人运动史论文集》] 1964 年，第 4 号，第 670—674 页。

58 参阅恩格斯给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的信（1845 年 3 月 17 日于巴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7 卷，第 28—29 页：“现在再来谈谈《文丛》。我不知道，这一套书按历史顺序编排是否最理想。由于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著作要交错起来，所以发展的连贯性就要经常被打断。此外，我又想，或许最好是着眼于实际效用而牺牲理论的兴趣，从那些能给德国人提供最多的材料和最接近我们的原则的著作开始；就是说，从傅立叶、欧文、圣西门主义者等人的优秀著作开始。摩莱里的著作也可以放在前面。历史的发展情况可以在全套丛书的导言中作简单的介绍；……导言可以由我们共同执笔。……如果我们要想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那我们恐怕在短期内完不成这项工作，并且还会使读者感到厌烦。因此，我主张我们只出版那些其积极内容到今天仍很有意义的著作。”

计划后来未能实现。赫斯担任德奥多·德萨米的《公共财产法典》和P·M·毕奥纳洛蒂的《巴倍夫所谓的为了平等的密谋》的翻译。埃弥尔·维勒，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翻译摩莱里的《自然法典》⁵⁹。

由于找不到出版商，这件事搁浅了。不管是出版《社会明镜》的贝德克尔，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之商谈过的列斯凯，都不愿冒险去出版这样的著作⁶⁰；这次出版的唯一的一个译本，是恩格斯译的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关税保护政策对德国的发展最有利这个在当时争论得很厉害的问题也非常感兴趣。主张关税保护政策的人强调这一点：英国的竞争被淘汰了，那么这个政策对迅速发展德国工业是有利的，而持反对意见的人则指出，工业的过于迅速的发展会带来手工业作坊和工场的破产。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为了使手工业者和工人免于破产和工业发展所带来的贫困，国家应当控制工业生产的发展。跟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意见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正如中等阶级的衰败和无产阶级化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工业的发展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跟那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相反，这些经济学家在考虑自由贸易和保护政策给德国工业发展带来的效用的时候，只着眼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主张，在探讨这一问题的时候只能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唯一观点出发。他们认为，不管是自由贸易政策得胜了还是关税保护政策得胜了，在损害无产阶级的情况下渔利的，只是资产阶

59 参阅 W. 芒克，前引书，第 671 页。

60 参阅恩格斯给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的信（1845 年 3 月 17 日于巴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7 卷，第 27—28 页。

级。实行保护政策的后果即使工资得到增加，但同时也会带来工人贫困的加剧，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后果，则是竞争的激化、危机和工资下降，所以，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倒霉的都是无产阶级。

正是根据这个观点，他们打算批判关税保护学说的制定者李斯特⁶¹。恩格斯打算指出这个学说所势必带来的实际后果，而马克思则主要想对这个学说的一些原则加以批判⁶²。

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都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计划。恩格斯对李斯特学说想讲的话，其中要点他在爱北斐特的一次讲演中已经阐述过了⁶³。马克思打算写的那篇关于李斯特的文章也没有写成。不过，两个人都仍然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在1845年还跟出版商康培谈过要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文章⁶⁴。

61 参阅恩格斯给在巴黎的马克思的信（1844年11月19日于巴门），同上书，第11页：“在这期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写几本小册子，特别是反对李斯特的小册子。”

62 参阅恩格斯给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的信（1845年3月17日于巴门），同上书，第30页：“有意思的是，除了丛书以外，我们两人又不约而同地有了另一个计划。我也给皮特曼写文章批判李斯特，——很幸运，我从皮特曼那里及时地知道了你也有这种想法。这里可以提一下，我是想从实际方面对付李斯特，阐明他的体系的实际结论，因此我将把我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的一篇加以扩充。另外，根据毕尔格尔斯给赫斯的信，同时我也知道你个人的爱好，我估计，你批判他的理论前提会比批判他的结论更着重一些。”

63 参阅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17页及以下诸页。

64 参阅恩格斯给在汉堡的康培的信（1845年10月14日于布鲁塞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461页。

马克思与恩格斯 在布鲁塞尔的会合。英国之行

1845年4月，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这就为他同马克思的合作造成了便利条件。恩格斯离开巴门的原因是怕警方的追究，因为自从在爱北斐特发表演说以后，他就受到警方追究的威胁；但是，他离开巴门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想同马克思更紧密地在一起合作。这种愿望，马克思也是有的。那时，他搬了家，住在圣·若瑟·堂·诺德郊区的一条阿里昂斯街上，恩格斯就住在与他邻近的一所房子里。

正如在巴黎他们第一次会见时那样，他们彼此交换了自己的新观点。马克思把他刚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草拟的、并且无疑在写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加以补充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点，向恩格斯作了阐明。恩格斯对这次阐明给予他的深刻印象作了如下的描述：“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领域中都

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⁶⁵。

如果恩格斯还没有象马克思那样系统地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以同样明晰的方式表述出来，那是因为他对经济和社会状况有更为直接和深刻的研究，能够比马克思更好地指出生产力的改变怎样和为什么同时决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在他的《英国状况》这篇文章中，特别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中，事实上，他指出工业革命如何决定了近代英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就是提供了一个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说明一段历史时期的光辉的范例，这样，就是对这一观点的制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不用说，恩格斯本人对于在制定这一观点的过程中自己这方面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是充分意识到的。后来在1888年伦敦出版的《共产主义宣言》英文版的序言中，他就这样写道：“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象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至于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进展，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可以明白看出。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象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⁶⁶。

马克思自己也完全承认恩格斯这方面的重要性。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他就这样写道：“自从弗里德里希·

65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192页。

66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238页。

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⁶⁷。

由于他们观点的完全一致，因此，在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和行动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可以立刻着手去完成他们的唯物史观的制定工作，并根据这一思想开始去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恩格斯在他写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使人回想起来的正是这种情况：“但是，这个在历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了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象是一种也可能不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作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作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作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

67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⁶⁸。

正是抱着这种双重目的，他们在7月中旬去英国作了一次旅行，差不多直到8月24日才回来。除了愿意对更坚实地奠定了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政治经济学继续作一些研究，并且同“正义者同盟”伦敦小组与宪章运动的领导人进行接触而外，在马克思，还愿意认识认识这个欧洲最工业化的、拥有在工会方面和在政治方面最强大和最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国家。

他们先到恩格斯曾经住过的曼彻斯特，可以说，在恩格斯是愿意再看看他的女友玛丽·白恩士。正是在这里他们停留的日子比较长，这个城市给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去认识英国的工业发展和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他们在这里投入了对政治经济学以及一些政治社会问题的紧张的研究工作⁶⁹。马克思读了一些关于经济学、政治学、商业、金钱等等方面的一般原则的著作⁷⁰。

68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193页。

69 参阅I. A. 巴哈，《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8月在伦敦停留期间的新资料》，载《关于政治与社会思想史》，莫斯科，1955年，第479—482页。

70 参阅马克思的笔记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部分，第6卷，第598页及以下诸页。在那里可以找到下列各书的一些引文：

Thomas COOPER, Lectures on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托玛斯·库佩，《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要素的讲稿》]，伦敦，1831年。

Thomas TOOKE,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托玛斯·杜克，《从1793年到1837年的价格与货币流通状况史》]，伦敦，1838年，两卷本。

James Will. GILBART, The history and principles of banking [詹姆斯·威·吉巴尔特，《银行史与银行原理》]，伦敦，1839年。

William PET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multiplication of mankind; together with another essay in political arithmetic, concerning the growth of the city of London [维廉·培特，《关于人类增殖的研究；附关于伦敦城的成长的政治算术研究》]，等等，伦敦，1698年，第3版。

恩格斯读的，一部分是探讨类似问题的著作，一部分是与他在自己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经探讨的问题有关的著

Edw. MISSELDEN, *Free trade or the means to make trade flourish* [埃·密塞尔登,《自由贸易,或使贸易繁荣的方法》], 伦敦, 1622年。

D'AVENANT, *Discourses on the public revenues under the trade of England* [达维南,《关于在英国贸易政策下的公共进益问题的讲演》], 等等, 伦敦, 1692年, 两卷本。

James ANDERSON, *Calm investig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that have led to the present scarcity of grain in Britain* [詹姆士·安德逊,《对造成目前英国谷物欠缺的环境的冷静考察》], 伦敦, 1801年。

G. BROWNING, *The domestic and financial condition of Great Britain* [G. 勃朗宁,《英国的国内和财政状况》], 伦敦, 1834年。

William COBBETT, *Paper against Gold, or the history and myste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维廉·寇白特,《面对着黄金的纸币,或英国银行的历史和秘密》], 等等, 伦敦, 1828年。

《Encyclopedia Metropolitana or 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Knowledge》[《伦敦百科全书,或世界通用知识辞典》], 第4、1卷, 1836年。

Michal Thomas SADLER, *The law of population* [米沙·托玛斯·赛德勒,《人口律》], 伦敦, 1830年, 两卷本。

D'AVENANT, *Essay on peace at home and war abroad* [达维南,《论国内和平与国外战争》], 伦敦, 1704年, 两卷本。

D'AVENANT, *An essay upon the probable methods of making a people gainers in the ballance of trade* [达维南,《论在贸易平衡中使一国人民获利的可能的方法》], 伦敦, 1699年。

(KARL. I), *His Majesties propriety and dominion on the British Seas asserted together with a true account of the Netherlanders insupportable insolences* [卡尔·I,《根据荷兰人的真实记载,英国王室在英国海上的特权和统治确实是无可忍受的霸道行为,等等》], 伦敦, 1655年。

D'AVENANT, *An essay upon ways and means of supplying the war* [达维南,《为战争提供给养的途径与方法》], 伦敦, 1695年。

William THOMPSON,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维廉·汤姆逊,《最有助于增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的原则的研究》], 伦敦, 1824年。

作⁷¹。他同样也研究象虔诚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及作为解决

71 恩格斯的笔记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一部分,第4卷,第501—515页。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下列各书的引文:

G. R. PORTER,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in its various social and economical relation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ime* [G. R. 波特,《从19世纪初到目前国家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方面的进步》], 伦敦, 1843年, 三卷本。

William GODWIN, *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 From its commencement, to the Restoration of Charles the second* [威廉·戈德文,《英联邦史。从开始到查理第二复位》], 伦敦, 1824年, 第1卷。

Thomas TOOKE,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preceded by a brief sketch of the state of the corn trade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 [托玛斯·杜克,《从1793年到1837年的价格与货币流通状况史:附最近两世纪谷物贸易状况简记》], 伦敦, 1838年, 两卷本。

On combinations of trades [《论商业联合》], 伦敦, 1834年。

Sir Frederic Morton EDEN, *The state of the poor: or an history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in England, from the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period; together with parochial reports relative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work-houses, and houses of industry; the state of friendly societies and other public institutions* [弗里德里克·摩尔顿·艾登,《穷人的状况: 或从1066年到目前英国劳动阶级的历史: 附关于习艺所与工业救贫所的管理的教区报告: 互助会与其他公共机构的状况》], 伦敦, 1797年, 三卷本。

[J. AIKIN],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from thirty to forty miles round Manchester. The materials arranged, and the work composed by J. Aikin* [J. 艾金,《曼彻斯特方圆30到40里地区的描写》, J. 艾金整理材料并写作], 伦敦, 1795年。

James BUTTERWORTH, *The antiquities of the Town, and a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trade of Manchester with a description of Manchester and Salford; to which is added an account of the late improvements in the town* [詹姆斯·佩特沃尔特,《曼彻斯特城的古代风习以及该城的完整的商业史, 附曼彻斯特与撒福尔德的描写: 并附该城最近改进情况的说明》], 等等, 曼彻斯特, 1822年。

社会问题的方法去理解的教育等等这样一些意识形态的问题⁷²。

他们旅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同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取得更为紧密的联系。为此，他们去了伦敦，在那里他们开始同“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亨·鲍威尔、卡·沙佩尔以及恩格斯已经认识的约·莫尔建立联系。

“正义者同盟”从1840年起已获得了越来越明显的国际的性质；不同的小组之间保持着积极的通信关系，而分别到各地去的盟员，彼此之间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⁷³。

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到伦敦的时候，“正义者同盟”伦敦小组的思想在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下已经有了深刻的改变^{74a}。它的成员

James William GILBERT, *The history and principles of banking* [詹姆士·维廉·吉巴尔特,《银行业的历史与原理》], 伦敦, 1834年。参阅: 原文中的注解, 关于投机倒把和危机, 参阅第505页及以下诸页, 第515页; 关于工资与利润, 第507页; 关于对工人的剥削, 第503页; 关于工人运动和罢工, 第506—507页。

72 关于虔诚主义与资产阶级, 参阅同上书, 第508页; 关于教育的社会作用, 参阅第504页。关于教育问题,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象一切空想主义者一样, 认为教育对解决社会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而恩格斯的看法与他们完全不同。“波特现在给我们写了一篇谈论关于一种良好教育的种种好处的干燥无味的长文章, 说一种良好的教育如何可以给工人阶级以上升到资产阶级那样崇高地位的种种手段, 同时使它知道, 那些倒霉的时期乃是不可避免的不幸, 这些不幸是由于必然的、无法控制的一些原因产生的, 而不是由于有利于富有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制度产生的。教育使工人阶级不再去闹事, 保证它不受蛊惑性宣传的诱惑, 并且给工人阶级指出, 如果它要是找不到工作的话, 那么它最好是什么也不要做, 要不就听天由命, 听之任之, 要不就不声不响地去饿死。”

73 参阅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 第21卷, 第209—211页。

74a “正义者同盟”伦敦小组当时与宪章运动的成员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比如, 1844年卡尔·沙佩尔与波兰人奥鲍尔斯基建立了一个民主主义团体, 它的第一个宣言《各国的民主主义的朋友们》就是由宪章运动的领导人维

们实际上已逐渐摒弃他们对共产主义所抱的那些手工业者的、乌托邦式的观点，不过还没有达到工人阶级能够解放自己这样一个明确概念。

在四十年代初，鲍威尔、沙佩尔和莫尔赞同卡贝的思想，认为共产主义能够和平地得到实现。1844年9月21日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时，他们发表了一篇宣言，表示对织工的同情，但是，同时又宣称这样的起义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只有通过劳动组织以及教育和训练的普及才能得到解决^{74b}。

不过，他们当时还是不赞成卡贝的空想主义。比如，沙佩尔反对伦敦的“法国民主会”的成员们这件事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个会支持卡贝的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计划，而这计划注定是要失败的。

“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们在英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与宪章运动左翼的影响下，确信只有革命才能解放工人阶级，这样，他们对卡贝的疏远也就更加突出了。

向革命观点的这种转变在小组内部激起了热烈的争论⁷⁵。被瑞士和德国驱逐出境而于1844年夏天来到伦敦的威·魏特林，特别坚持这种革命观点。在1844年9月22日为他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他被当作一位共产主义的英雄受到人们的祝贺。不过，伦敦这个地方和瑞士大不相同，魏特林的思想在这里找不到它曾在瑞

廉·劳维特起草的。这个团体的目的，是在各国的移民之间建立一种亲如兄弟般的友爱关系，并对生活匮乏的人给以支援。

74b 参阅《德国电讯》，第165号，1844年10月，第659页及以下诸页：“在伦敦的德国工人为西里西亚织工组织了一次募捐。”

75 参阅 M. 耐特劳：《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根据 C. A. B. V. 的议事记录，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汇编》，莱比锡，1922年，第10卷，第363—391页。

士找到的那些追随者。在瑞士，可以说并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在那里的德国手工业共产主义还保留着一种空想主义的性质；而伦敦与瑞士不同，在这里的德国共产主义手工业者则与英国的无产阶级非常接近，他们始终很难接受魏特林的那些空想主义的观点。魏特林只是凭着他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必然的这个与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相对立的观点，才在他们当中得到一些反响。在他的影响和象朱·哈尼这样的革命的宪章运动的一些领导人的影响下，伦敦“正义者同盟”小组才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唯一途径是共产主义革命，而这一点，就大大密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这个小组的关系。

在伦敦，马克思与恩格斯同样也和宪章运动的领导人特别是和朱利安·哈尼取得联系，这就使他们对在1842年的罢工暴动之后紧接着在宪章运动中产生分裂的前因与后果有了了解。事实是，那时候主要以朱利安·哈尼为代表的一种激进倾向反对威·劳维特的民主倾向，前者在他出版的《北极星报》（宪章派的机关报）上公开肯定使用暴力作为解放的手段。同样，在“正义者同盟”中，卡贝主义的观点被革命思想所淘汰，在宪章运动的核心中，激进派战胜了缓进派。

正如在“正义者同盟”中一样，在宪章运动中的这种思想的激进化只能有利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影响的扩展。在8月21日前后，他们参加了一次有宪章运动者、“正义者同盟”盟员和民主运动领导人在场的集会，会上采纳了恩格斯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在伦敦开一个民主主义者的国际会议，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国际民主进步联盟”⁷⁶。

⁷⁶ 参阅《北极星报》，第406号，1845年8月23日出版，第8页：“在这次集会中——这次集会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布鲁塞尔以后，于1845年9月22日

从英国回来以后到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从事的工作

标志着马克思1845年下半年生活的特别是以下两件大事：其一是第二个女儿劳拉诞生了⁷⁷，其二是为了摆脱普鲁士政府的无休止的追踪而于12月放弃了他的普鲁士国籍。既然他申请不到另外一个国籍，他就作为一个无国籍者住在那里⁷⁸。

回到布鲁塞尔以后，马克思起初想先完成他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书是他和出版商列斯凯约定最迟要在1846年11月交稿的。尽管列斯凯多次催着要稿，可是马克思并没有写完这本书，毫无疑问，这本书的论题是太广泛了，以致在法定的延期期满之前是不可能作深入的研究的，而且，特别还因为他那时极其热衷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书的撰述⁷⁹。

举行的——，决定创立一个叫作，‘民主派兄弟协会’(Fraternal Democrats) 这样一个组织，这组织实际上于1846年3月建立。这个组织从它的激进的倾向来看，是反对由威·劳维特所领导的名叫The democratic Friends of all nations (所有国家的民主友人) 这个协会的。威·劳维特宣扬教育才是人类求得解放的途径。”

77 参阅燕妮·马克思的《动荡的生活简记》，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1页。

78 参阅 Entlassungsurkunde für den Literaten D. Marx aus Trier ausgestellt von der Regierung Trier(《特利尔政府颁发文学家马克思博士免籍令》)，1845年12月1日，原件：社会史国际研究院，阿姆斯特坦。

马克思给特利尔市长的信(1845年10月17日；1845年12月6日)(特利尔城市档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623页及以下诸页。

79 参阅马克思复列斯凯1846年3月31日信的草稿(1846年8月1日于布鲁塞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473页：“由

由于马克思拖延交稿，列斯凯在1846年5月以废除稿约相威胁，终于稿约在1847年2月废除⁸⁰。顺便说一句，马克思在这本书上花费的劳动并没有白费，因为无疑他把他的研究成果中最本质的东西写进《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去了。

1845年11月和12月，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自杀”的文章，发表在1846年的《社会明镜》上⁸¹。由于日益增长的贫困，自杀的人数经常不断的增加起来，这件事成了很多专书和文章的论题⁸²。

马克思的文章基本上是由《伯舍的回忆录》一书中的一些选段组成的⁸³。长期担任巴黎警察总监公署档案保管员的伯舍，有机会清楚地认识到那种使工人犯罪和自杀的贫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老实说，伯舍所特别感到兴趣的，只是那些由于家庭纠纷、

于同德国资本家商定要出版那部著作，我就把《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工作搁下来了。因为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这是必要的。顺便说一句，这就是我在一封信中告诉过您的在《政治经济学》出版以前必须完成的那部论战性著作。”

- 80 参阅列斯凯于1846年3月31日和1847年2月2日给马克思的信，原件，社会史国际研究院，阿姆斯特坦，档案号 Dm 3007 和 3010。
后来，列斯凯还给马克思写过好几封信，催他把为写这部书预先支付的1500法朗退还出来。列斯凯给马克思的信（1847年9月28日；1871年10月30日；1871年11月16日），原件，同上，档案号 Dm 3011, 3012, 3013。
- 81 参阅卡·马克思：《伯舍：关于自杀》，载《社会明镜》，1846年第7号，第14—2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德文版第1部分，第3卷，第391—407页。
- 82 参阅《自杀在巴黎和在法国》，载《社会明镜》，1846年，第106—108页。——《乌培河谷里的一个自杀者》，载《德国公民手册》，1845年，第272—286页。——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344页及以下诸页。
- 83 J. 伯舍，警察局档案保管员：《回忆录——为用于道德史和警政史的研究选自从路易十四到今天的巴黎警察局档案》，巴黎，1838年版，6卷本。

爱情方面的烦恼以及野心不能得逞等等而引起的自杀案件。

不过，他很少从感情的观点而是从社会的观点去考察自杀这个问题，因此，他认为自杀的发生主要是由于非人道的社会状况，而唯一能够医治这种社会弊病的就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去掉自杀的主要原因⁸⁴。

在序言中，马克思赞扬了伯舍对社会状况所作的细致而深入的分析，而把它同那些资产阶级慈善家在谈论这些问题时所自鸣得意的那种夸夸其谈，严格区别开来⁸⁵。

84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德文版第1部分，第3卷，第392页：“在我国，每年都要发生的那些可以说是正常的和周期性的众多自杀事件，应该看作是我们社会的一种机构不健全的标记；事实上，在工业停滞、危机和生活必需品腾贵的时期，在严酷的冬天，这个标记就变得越发明显，自杀事件不断地发生，简直象一场瘟疫。卖淫和偷盗也以同样的比例增多起来。”

参阅同上书，第403、395、406页：“自杀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同我们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弊端相对应的……关于这个问题（自杀），我曾下过一番功夫去研究，我得到的结论是：除非现社会作一次彻底的改革，所有一切杜绝自杀的办法都是徒劳的……事实上，应该把在利益和感情之间必然存在的真实关系建立起来，把个人与个人之间必然存在的真实关系建立起来，因为自杀只是社会斗争的不可胜数的标记之一……在羊皮纸上写下一部保障每个公民有权享受教育、劳动、特别是最低的生活必需品的宪法，那是容易的。但是，在纸上写下的这些美梦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通过有效而合理的办法来实现这些自由思想，——这样一个真正的任务仍然有待完成。”

85 参阅同上书，第391页：“法国人对社会的批判，至少部分地作出了这样的贡献：揭示了现代生活的种种矛盾和非人道。他们不是通过个别阶级的生活状况的分析，而是通过对一切地方、一切形式的现存社会的分析，来揭示现代生活的矛盾和非人道的。他们的描写，无论在感情的热烈程度上、在视野的宽广上、在分析的细腻上、在思想的大胆和具有独创性上，都超过了人们在任何一个别的国家中可能找到的一切。比如，人们可以把欧文和傅立叶的类乎社会报道的批判的分析作个比较，人们将会得到一个印象：法国人占上风。另外，我们不仅在法国的社会主义作家那里，而且也在文学的一切部门特别在小说家和撰写回忆录的作家那里，找到对社会事实的这种批判的分析。我将从雅克·伯舍的《引自公安局档案的回忆录》中引用几段关于谈论自杀的

恩格斯在关于傅立叶的一段文字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很可能在去英国之前就已写成，并发表于1846年的《德国公民手册》——，就曾根据傅立叶的深刻而准确的分析，把马克思在谈到资产阶级博爱主义时对空想主义所作的批判，作了引申，转而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⁸⁶。

傅立叶这段文字发表在《法朗吉》评论上。在这段文字里，傅立叶对于破产——就其与商业的关系来观察——之种种不同的形式，作了非常仔细的描写⁸⁷。傅立叶写道，商业，特别是就它在近代所采取的形式来看，不是别的东西，而只不过是贩卖自己既不生产也不消费的财富的中间人，对消费者所犯下的一种合法的盗窃罢了⁸⁸。“破产”这个最明显的盗窃形式，就是它的最完全的表现。

恩格斯给这段文字的译文写了前言和结束语，把法国社会主义者对社会状况所作的准确而详细的分析，同德国社会主义者所自鸣得意的那些胡言乱语，作了一个对照。其实，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中，早就责备过德国社会主义者们不知疲倦地

原文，提供一个法国人的批判的例子，来指明资产阶级关于博爱的思想纯属空谈，按照这些思想，社会问题不过是给无产者一点点面包和教育的问题，似乎只是劳动者由于事物现状而忍受痛苦，除此而外，世界上的一切都无限美好，各得其所。”

86 参阅弗·恩格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载《德国公民手册》，1846年，第1—5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部，第4卷，第409—453页，前言和结束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54—661页。

87 《法朗吉》，《社会科学杂志》，第16年，第1辑，1845年，1—2月，第1—12页。

88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1部分，第4卷，第411—424页。

把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一些主题搬来搬去⁸⁹。

在这里，他们对他们又重新加以批判，而且是更加深刻了；他指出他们的那些胡言乱语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明晰而精确的分析，二者间有着天壤之别。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们不同于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满足于摆弄抽象名词，关于社会问题只是进行空洞的思辨，这样做至少可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因为他们认为凭着这些思辨，他们要比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们高明得多。“德国人逐渐把共产主义运动也弄得庸俗起来了。在这里，那些后生之辈和庸庸碌碌的人总认为自己能够用轻视前辈和空谈哲理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落后。共产主义刚在德国出现，它就被一批投机分子用来作为资本。这些人把在英法两国已经陈腐了的论点翻译成黑格尔逻辑的语言，就以为自己创造了奇迹；而现在他们就把这种新的智慧当作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当做‘真正的德国的理论’献之于世，以便将来可以尽情地诬蔑目光短浅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拙劣的实践’和‘可笑的’社会体系。这种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论极其幸运地稍许嗅到了一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气息，被柏林的某一个干瘪的教授列入了永恒的范畴，后来也许还参考过费尔巴哈的著作和几篇关于德国共产主义的文章以及施泰因先生的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大作。这种劣等的德国理论，按照施泰因先生的观点，毫无困难地给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了适当的解释，使它处于从属的地位，‘制服了’它，把它‘提高’到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论’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当然，这种理论不会想到去稍许熟悉一下要提高到更高阶段的对象，去看一下傅立叶、圣西门、欧文以及法国共产主义者的著

⁸⁹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293页。

作；对这种理论来说，要宣告德国的理论光辉地战胜了外国人的可怜的挣扎，有了施泰因先生的贫乏的摘录就足够了”⁹⁰。

这说明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与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不同。德国社会主义者从英国和法国理论家那里甚至从罗·施泰因那里，拾到他们所知道的关于经济和社会的一点点东西，就完全心满意足了，而我们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特别是在傅立叶那里，却找到一大群崭新的观点⁹¹。“为了反对不朽的德国理论所表现的那种滑稽可笑的高傲态度，完全有必要向德国人指出他们在研究社会问题这方面应该感谢外国人的地方。现在，在德国人的著作中有些夸张的词句被吹嘘为真正的、纯粹的、德国的、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所有这些夸张的词句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种思想是从德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法国人或英国人在十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前就说过的话——他们说得很好、很清楚、很动听——德国人仅仅在最近一年来才偶尔知道一些，并把这些话黑格尔化了，或者至多也只是落在人家后面做了再一次的发明，并把它当做崭新的发明，用坏得多、

90 参阅弗·恩格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654—655页。

91 参阅同上书，第658页：“最后，现在已经是德国人停止这样夸耀自己做事切实认真的时候了。他们非但可以从最无谓的材料中给你作出随便什么样的结论，而且还可以把这种结论和世界史联系起来。……因此，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真是可怜得怕人。稍微谈谈现在大家都乐于挂在嘴上的‘人性’，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宁可说是兽性的‘实现’，按照蒲鲁东那样（而这还是经过了第三手或第四手呢！）稍微谈一下财产，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一下劳动组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团体，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却茫然无知，这种‘社会主义’整个就归结为这几点。而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

抽象得多的形式公诸于世。我自己的作品也不例外。要是说，德国人也有些自己的东西，那末这只能是他们用来表达这种思想的那种讨厌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拙劣的形式。他们俨然是真正的理论家，认为法国人（对英国人他们还几乎一无所知）那里值得注意的东西，除最一般的原则外，只是最坏、最抽象的东西，也就是未来社会的规划，即社会制度。而最好的一面，即对现存社会的批评——对社会问题作任何研究的现实基础与主要任务，他们却泰然自若地抛弃了。不用说，关于唯一真正做了些事情的德国人魏特林，这些聪明的理论家通常也用轻蔑的口吻评论一番，或者干脆连提都不提一下”⁹²。

通过傅立叶的例子，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出法国的理论家们是如何与德国的理论家们根本不同的。

傅立叶并不是一个哲学家；而且他也不愿意作一个哲学家，相反，他对哲学从不隐藏他的厌恶。但是，在对于经济和社会事实的分析以及从这些事实中推出理论性的观点这方面，他却是一位大师⁹³。

⁹² 参阅同上书，第655页。

⁹³ 参阅同上书，第657页：“让那些热中于在无底的理论的‘茫茫大海’中乘风破浪并竭力钓取‘社会主义’的‘原则’的德国学者先生们学学 Commis marchand [店伙计]傅立叶的榜样吧！傅立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对哲学是深恶痛绝的。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它百般嘲笑，而且说出了许多理由，这些理由是值得我们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家们’注意的。不错，他们会反驳我，说傅立叶也一样地‘抽象’，他靠自己的分类法想出了神和世界，而且并不逊于黑格尔，但是这救不了他们。……”

“要是我们德国的那些半边的和十足的共产主义教授们花些力量去看一下傅立叶的主要著作，……他们将会在这里找到多么丰富的材料来进行推断和达到其他目的！他们将会在这里找到多少新的（对德国来说目前还是新的）思想！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好好先生除了对无产阶级的处境外，还未能对现代社会提出任何责难，而且即使在无产阶级的处境这方面，他们能够说的

诚然，傅立叶的思想体系和他对于未来的看法，并不是没有一些奇怪荒谬的东西⁹⁴，但是，他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是以对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深刻分析为根据的，这就使得他在如何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到目前为止，能够进行这种批评的只有傅立叶一人。傅立叶毫不留情地揭穿有身分的人士的虚伪，揭穿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以及他们整个生活方式的空虚；他嘲笑他们的哲学，嘲笑他们想使 *perfection de la perfectibilité perfectibilisante* [日趋完善的完善能力臻于完善]，嘲笑他们想追求 *auguste vérité* [最高真理]。傅立叶嘲笑这些人的‘纯洁的道德’，嘲笑他们的划一的社会制度；他把他们的实践，把受到他的精辟批评的 *doux commerce* [和气的商业]，把不能提供享乐的放纵的享乐，把婚姻制度所容许的通奸以及普遍的混乱和这种社会制度作了对比。这就是在德国还完全没有谈论过的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确，曾经有人谈论过恋爱自由、妇女地位、妇女解放，但是有什么结果呢？谈几句杂乱无章的话，捧出几个女学者，表现出一些歇斯底里，对德国人的乱伦抱怨几句——全是虎头蛇尾！”⁹⁵

也不太多。当然，无产阶级的处境是一个主要问题，但是对现代社会的批评难道就限于此吗？傅立叶（除了他后期的著作外，他几乎没有接触到这一问题）就证明了，一个人即使不接触这个问题，也可以承认当前的社会完全不中用，而且仅仅根据对资产阶级的批评，也就是对资产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的批评而不涉及它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出必须改造社会的结论。”

94 参阅同上书，第 655 页及以下诸页。

95 参阅同上书，第 659 页及以下诸页。

参阅同上书，第 658 页：“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按照自己的看法想象未来的，德国的理论却是首先随意地清算一下过去的历史，然后又随意地给未来加上一个方向。譬如请把傅立叶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几个时期（蒙昧时期、宗法时期、野蛮时期、文明时期）及其特征同黑格尔的

作为结论，恩格斯号召德国的理论家们去向傅立叶、向法国和英国的其他研究政权的理论家们学习，学习他们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方式，而不要光去嘲笑傅立叶体系中某些奇怪荒谬的地方⁹⁶。

恩格斯不仅和马克思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而且还在他写的一篇发表于1846年《德国社会改革年鉴》里的名为《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的文章中，对德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家特别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继续进行了批判⁹⁷。

我们看到，恩格斯也象马克思一样，不过是在另一方面而且以不同的方式，如何不仅同费尔巴哈划清了界限——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在谈到施蒂纳时就曾批判过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正是它使费尔巴哈对于人因而也对于社会问题有一个抽象的错误的理解⁹⁸——，而且也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他责

绝对理念比较一下吧！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历尽千辛万苦才为自己开辟了一条穿过历史迷宫的道路，并终于不顾实际上有四大世界帝国这一事实而勉强建立起一个三分法的外貌。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些结构，就更不必谈了：因为黑格尔的结构毕竟还有某种内容，虽然是歪曲了的内容，而黑格尔之后的一些体系的发明家的结构却已经没有任何内容了。”

96 参阅同上书，第660页及以下诸页。

97 参阅同上书，第662—676页。

98 参阅恩格斯给在巴黎的马克思的信（1844年11月19日于巴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12—13页：“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就是对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末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

尽管如此，恩格斯直到1845年初还在争取费尔巴哈信仰共产主义，参阅恩格斯给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的信（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于巴门），

难他们的观点是思辨的——划清了界限。他对于一切思辨的日益增长的厌恶使他越来越远离了他们，而这也正是这些社会主义者们对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辩护吹捧逐渐转变为浮夸之谈的时候。事实上，在这篇文章中他不过更强调了一下他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对他们的批判，在这本书中，他就曾说明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于社会问题的神秘化的倾向，是由于他们几乎都是通过自己无法摆脱的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媒介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其结果就是，在他们的思想中不能对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进行分析，而只能提出一些纯属理论性的考察⁹⁹。恩格斯在批判中并没有饶过赫斯，尽管在巴门他们曾有过紧密的联系，因为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赫斯摆脱不开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势必也要象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样，不得不以抽象的、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对待社会问题。

恩格斯从英国回来以后，给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写了一组关于近代德国的发展的通讯，目的在于让英国工人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毫无疑问，他是应该报主笔朱·哈尼的请求而写的，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旅居伦敦的时候认识了他。

第一篇通讯是《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¹⁰⁰，恩格斯在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书，第23页：“又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他来说，问题只不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已。今年夏天他可能到莱茵去，那时他就会去布鲁塞尔，我们也要设法劝他去。”

99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279页：“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

100 参阅《北极星报》，1845年9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书，第627—

篇文章里对萨克森政府、特别是对1845年8月12日在莱比锡下令向那些为声援新天主教民主运动及其领导人约翰奈斯·隆格而举行示威的群众开枪的萨克森亲王约翰，进行了谴责。这场在西里西亚织工暴动以来最大的屠杀在德国激起了极大的反响，并且，由于新天主教派的宣传在群众当中得到越来越大的反应，因而给予了民主运动以强大的推动力来与政府对抗¹⁰¹。

有鉴于这次的大屠杀，恩格斯研究了在德国发起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的种种条件。他在刚到英国以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欧文主编的《新道德世界》报上，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德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将要由有知识的资产阶级来发起。现在他的想法正相反，正如他刚刚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阐明的那样，具有民主倾向或共产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分子，由于其阶级立场，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共产主义革命主要应该是德国工人阶级的事情，而自从织工起义以来，它也正在积极地做准备。事实上，陷于贫困的德国无产阶级，已经越来越不怎么参

630页，《德国工人运动》。

- 101 参阅同上书，第628—629页：“萨克森人现在一定会知道，他们也象其他一切德国人一样处在军阀统治之下；他们一定会知道，尽管他们有宪法、自由主义的法律、自由主义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国王的自由主义言论，但是在他们这个小国家中实际存在的不过是军法而已。另外也还有一个因素有助于莱比锡事件在萨克森传播这种反抗情绪。不管萨克森的自由派怎样吹嘘，但是大多数的萨克森人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说话。萨克森是一个工业国，那里的麻纺织工人、针织工人、棉纺工人、花边工人、煤矿工人和采矿工人自古以来一直就是极端穷困的。从西里西亚起义（即通常所谓1844年6月的织工斗争）开始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蔓延到整个德国，当然也触及到了萨克森。不久以前，在许多地方的铁路建筑工人中和印花工人中都发生了骚动；这里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共产主义很可能正在工人中传播开来，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材料可以拿来作证明。如果萨克森工人登上斗争的舞台，他们肯定地不会象他们的雇主自由资产者那样空谈一下就完事。”

加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要求言论自由和立宪自由的骚动了，因为它知道这些改革的实现并不能消除它的贫困，要消除贫困，只有加强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才有可能¹⁰²。事实上，无产阶级也正在通过从织工暴动以来所不断发生的罢工和暴动来为这场斗争做着准备。

在另外的一些通讯中，恩格斯对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德国现状作了广泛的陈述¹⁰³。

由于德国的皇帝对曾经拯救了他们的那些独立的大臣们表现得软弱无力，德帝国与曾经建立起强大的王国的英国和法国不

102 参阅同上书，第629—630页：“德国的革命行动将从我们的工人当中开始。的确，在我们的资产阶级当中也有不少的共和主义者以至共产主义者，而且也有不少这样的青年，如果现在爆发革命，他们在运动中就会非常有用；但是这些人是资产者，是追求利润和经营企业的人。谁能向我们担保，这些人不会因他们的职业，不会因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堕落腐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才靠他人的繁重的劳动来生活，靠吮吸工人阶级的血、榨取工人阶级的脂膏来养肥自己。即使他们仅仅在职业上是资产者而在思想感情上是无产者，但是和那些因本身利益而死抓住现存秩序不放并一心只想塞满自己钱袋的资产者相比，他们在人数上实在太少了。所幸的是我们根本没有指望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了，一两年后，我们就可以检阅光荣的工人队伍，即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队伍，因为在我国对工人阶级来说，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个东西。1844年西里西亚的织工发出了信号，波希米亚和萨克森的印花工人和铁路建筑工人、柏林的印花工人以及几乎整个德国的产业工人都纷纷举行罢工和局部的起义来响应；这些起义几乎都是由于法律禁止结社而引起的。现在运动差不多扩展到了全国，并且还在继续平稳地发展，可是资产阶级却只是在鼓吹‘宪法’、‘出版自由’、‘保护关税’、‘德国天主教’和‘新教改革’。虽然所有这些资产阶级运动都有它们的作用，但是根本不能影响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有自己的运动，即饭碗问题的运动。”

103 参阅弗·恩格斯：《德国状况》，《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一封信》，载《北极星报》，1845年10月25日；《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二封信》，同上书，1845年11月8日；《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三封信》，同上书，1846年4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631—653页。

同，开始日益趋于衰微，尽管如此，而身受皇帝和亲王们双重剥削的属民们所承担的压迫并没有因之减轻。由于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缓慢而落后了的德国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象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所做的那样去改变现存事物的状态的¹⁰⁴。

在十八世纪末叶德国所处的悲惨的境况中，唯一进步的因素就是在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不逊于任何最先进民族的巨大发展。伟大的作家和哲学家们（歌德、席勒、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对腐朽制度的叛逆精神。但是，随着岁月的消逝，这些处于孤立状态的伟大人物也渐渐放弃了看到德国再生的希望，而听天由命了¹⁰⁵。

正是在德国处于这种解体状态的时候，霹雳一声，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这次大革命，与其说在习惯于被动地忍受自己命运的受压迫的人民中，不如说在开明的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以喜悦的心情迎接这次革命的贵族当中，得到了更加巨大的反响。但是，这种热情还只限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学说，而没有扩展到革命所必然要涉及的实际方面。当吉伦特派一垮台，人民夺取了政权，恐怖笼罩了法国的时候，那原来就不是建立在阶级的真实利益上的，因此

104 参阅《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一封信》，1845年10月25日，同上书，第633—638页：“这就是前一世纪末叶的德国状况。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105 参阅同上书 第634页。

也就是具有唯心主义性质的德国人的热情，就一下子变为对革命、对法国人民的憎恨了¹⁰⁶。

不过，古老的德帝国的寿命已经不长。已经挺进到莱茵地区的法国革命军，推翻了以自由平等的原则的名义建立起来的秩序¹⁰⁷。拿破仑致命地摧毁了这个古老的帝国，强化了大的邦，并引进了具有平等精神的民法¹⁰⁸。

拿破仑并不是我们从字面上所习惯于理解的那样一位“暴君”。毫无疑问，他是以残暴的方式从事统治的，至少也象国民议会所做的那样，或者象当时德国王公们继续在做着的那样，之所以如此，那仅仅是因为环境迫使他不得不这样做¹⁰⁹。当他后来娶了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一心想着要成为欧洲的第一位君主，并因此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的时候，他就成了正统派的牺牲品，而在正统派看来，他不过是一个篡权的人罢了¹¹⁰。

拿破仑的垮台，主要是由于英国和俄罗斯造成的。英国组织并支持一切起来反对拿破仑的联盟，而俄罗斯则击溃了他的大军。他的大军的消灭给德国王公们提供了从越来越重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机会。德国资产阶级不饶恕拿破仑，因为征兵夺去了他们的儿子，大陆封锁使他们吃不到糖和咖啡，因此他们同德国的王公们联合在一起。资产阶级和全体人民都忘记了大陆封锁正好把德国从英国的竞争中解脱出来，给德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他们却把英国当作朋友和解放者来向之致敬，其实，

106 参阅同上书，第 635 页及以下诸页。

107 参阅同上书，第 636 页。

108 参阅同上书，第 636—637 页。

109 参阅同上书，第 636 页。

110 参阅同上书，第 637 页及以下诸页。

英国人是只想利用这次的胜利来对他们进行剥削的¹¹¹。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813—1815年的解放战争爆发了，人们把这次战争当作德国历史上最光荣的时期来纪念，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起了保证反革命在德国必然成功的作用。领导这次战争的，是挣脱不开压在自己肩上的奴役而实际上正是维护了贵族利益的农民；是头脑里充满了民族性、正统性的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学生；是借胜利之机牟取暴利的投机商人，和少数梦想着德国的统一和自由的知识分子¹¹²。

拿破仑的垮台，给整个欧洲所有反动国家在以沙皇和梅特涅领导下的神圣同盟中联合起来的反革命势力，开辟了道路¹¹³。

111 参阅同上书，第637页。

112 参阅同上书，第637页：“被称为‘德国历史上最光荣的时期’等等的1813—1814年和1815年的‘光荣的解放战争’，是一种疯狂的表现，每一个正直的和有理智的德国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为它感到惭愧。的确，当时表现了激昂的情绪，但是，是谁表现的呢？首先是农民，世界上最愚昧无知的一部分人，他们死抱住封建成见，蜂涌而起，宁死也不背叛他们和他们的先辈称之为老爷的人，不背叛管辖他们、蹂躏他们和鞭打他们的人。其次是大學生和一般的年轻人，他们认为这次战争是捍卫原则的战争，甚至是宗教战争，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不仅是为了捍卫他们称之为民族特征的正统主义原则，而且也是为了捍卫神圣的三位一体和上帝的存在。当时的一切诗歌、论著和讲演都把法国人描写成无神论的代表，没有信仰、没有道德的典型，而把德国人则说成维护宗教、虔敬神明、主持正义的代表人物。再其次是一些比较有知识的人，他们把关于‘自由’、‘宪法’和‘出版自由’的某些概念和这些思想混在一起，但是这种人为数极少。最后是企业主、商人、投机家等等的子弟，他们要争取在最便宜的市场上购买货物的权利，要争取喝不掺菊苣的咖啡。当然他们都是拿‘自由’、‘伟大的德国人民’、‘民族独立’这类当时流行的热烈的字眼来掩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那些在俄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帮助下打败了拿破仑的人。”

113 参阅同上书，第640页：“所有一切战胜国都把拿破仑的垮台看做法国革命的覆灭和正统主义原则的胜利。结果它们当然都在自己的国家里恢复了这种原则，它们恢复这种原则，起初还用‘神圣同盟’、‘永久和平’、‘公共福利’、

在那以恢复革命前状态为宗旨的维也纳会议上，各民族都按照反革命势力的利益给肢解了¹¹⁴。而英国和俄国却在拿破仑的失败中捞到了好处：英国得到一些新的殖民地，同时确立了它的海上帝国的地位并垄断了世界市场¹¹⁵，而俄国则从此成了大陆上最大的强国。法国比较幸运地摆脱了战败的困境，领土没有遭到割裂，只是接受了一部自由主义色彩相当浓厚的宪法，而德国、意大利和波兰则处于被分割的状态¹¹⁶。人们把德国搞成为一个联邦，奥地利的梅特涅和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吉约姆三世则是这个联邦的太上皇，扮演着决定一切的角色¹¹⁷。

由于德国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阻碍着自己的经济发展，这就使得它成了英国商品和反动阴谋大量倾注的理想之地¹¹⁸。

不同于早已接受了种种假自由主义的宪法的德国中部和南部各邦¹¹⁹，普鲁士事实上仍然保留着一种极权的君主政体。在经过一段由施坦因和哈尔登伯格的改革所标志的短暂的自由主义时期以后，它也象奥地利那样，变成了一个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弗里德里希·吉约姆三世，这个冷酷无情、平庸无能、生来只配当

‘君民互相信任’等等动人心弦的词句加以掩饰，后来就抛弃了任何遮盖，而借助于刺刀和牢狱了。……在法国南部屠杀共和主义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宗教裁判所把人活活烧死，本国的专制制度又恢复起来，在英国颁布了禁口法令，发生了‘彼得卢事件’，这就是对法国革命被镇压下去的庆祝”。

“彼得卢事件”是指1819年8月16日在曼彻斯特附近发生的一次大屠杀。当时有六万人参加示威，大部分是工人，他们要求普选权利、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参阅同上书，第645页。

114 参阅同上书，第641页。

115 参阅同上书，第639页。

116 参阅同上书，第641页。

117 参阅同上书，第646页。

118 参阅同上书，第642页。

119 参阅同上书，第643页。

检查士兵军服上的钮扣是否整齐的人，背弃了要给他的人民颁布一部宪法所作的庄严的诺言¹²⁰。

然而，不管压制的手段多么厉害，资产阶级对贵族和极权的君主政体的反抗还是越来越大了。资产阶级凭着金钱的力量，同贵族特权和极权政治展开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斗争，特别是要求制订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和出版自由¹²¹。

因为资产阶级以平等原则的名义要求这些改革，所以这个自由主义运动最初看起来很象是一场色彩很浓的民主主义运动。不过，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事实上只是在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这场自由主义运动并不具有丝毫民主主义的性质。资产阶级所要求的选举权，实际上只是限于具有一定财产的人的普选，而这就把一般人民排斥在政权之外；由于印刷价格高昂，出版自由便成为资产阶级的一种特权；同样，在参与陪审工作方面也是如此，因为只有生活富裕的公民才有成为陪审员的可能¹²²。

120 参阅同上书，第 641、644、650 页。

121 参阅同上书，第 647—648 页：“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不把选举原则当做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他们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书报检查对报刊的束缚；他们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王国的特殊法官阶层的束缚，不得不实行陪审制。就这一切而言，资产者真象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122 参阅同上书，第 648 页：“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销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

德国资产阶级以法国资产阶级为榜样，用自由和平等的原则来证实自己要求的合法性，而在大革命前后，法国资产阶级就正是以这些原则为号召来保卫自己的利益的。德国资产阶级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必需的勇气来使这些原则取得胜利，因此，直到1830年的革命时为止，德国的自由主义仍然保留着一种理论的性质。中产阶级和农民，总的来说，对公共的事情并不关心，而无产阶级那时还正在形成当中，所以，直到1830年反对派还只限于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法国资产阶级为之奋斗的那些原则乃是绝对的、永恒的真理¹²³。

起初，解放战争时期诞生的德国大学生协会(Burschenschaft)中的学生所组织的一些秘密团体，在反对派中起了很大作用。德国大学生协会集合了一些具有民族的和基督教的思想倾向以及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学生，协会的思想状况是十分混乱的。不过，一个与古老的日尔曼帝国所理想化了的幻想相符合的“基督

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有^点钱。陪审制也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他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只选‘有身分的人’做陪审员。”

- 123 参阅同上书，第649页：“德国人是一个从事理论的民族，但是缺少实践，因此他们把英法两国资产阶级的谬论当做神圣的真理。德国的资产阶级都满足于能够安安静静地经营自己的规模不大的私人事业。在他们争得了宪法的地方，他们就吹嘘自己的自由，但是却很少过问国家大事；在没有宪法的地方，他们则觉得轻松愉快，因为他们可以摆脱选举代表和阅读代表们的长篇大论的麻烦。工人阶级缺少使英法两国工人从酣睡中苏醒过来的那种强大的杠杆，就是说，缺少发达的工业和以发达的工业为前提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工人还没有什么动静。在德国，在那些从前的封建制度又重新代替了现代的法国制度的地方，农民感到了压迫，但是这种不满情绪还需要新的刺激才会爆发为公开的反抗。所以，从1815年到1830年，德国的革命派只是由一些理论家组成。它的成员都是从大学里招收来的，他们都是一些大学生。”

教日尔曼人”这种理想，却是他们所共有的因素¹²⁴。不管他们的思想是多么混乱，德国大学生协会毕竟在德国传播革命思想方面起了重大作用，那时候，全欧洲被发生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的人民起义弄得动荡不安，所有这些起义，除去希腊人为反对土耳其人而进行的暴动以外，一概被神圣同盟所粉碎¹²⁵。

被神圣同盟的统治弄得奄奄一息的革命反对派，从1830年的革命中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这次革命，首先在法国然后在比利时，导致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两年以后，英国资产阶级通过选举法修正法案（Reformbill）这一途径也同样取得了政权。相反，那时在意大利和波兰爆发的起义却重新被镇压下去了。在德国，1830年的革命诞生了一个半自由主义半民主主义的运动，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软弱，它也很轻易地被镇压下去了。由于这次失败，自由主义在德国只是保留了一种理论的性格，而宪法呀，出版自由呀，法国的资产阶级曾为之进行斗争的这类字眼，则继续被认为是一些永恒的原则，在自由主义者当中引起了永无休止的字面上的争论¹²⁶。

124 参阅同上书，第650页：“从这两个派别（因为它们不能够称为党派）的联合中产生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自由主义者的派别：这些人在自己的秘密团体里梦想德国有这样一个皇帝，他头戴皇冠，身着紫袍，手执权杖和其他类似的东西，颌下是花白的或棕黄色的长髯，周围是各等级——僧侣、贵族、市民和农民分别议事的等级会议。这是封建的暴虐和现代资产阶级的骗局所合成的最荒谬的混合物，我们想象它多荒谬，它就有多荒谬。但是对那些不管目的、不惜代价而只求热烈的大学生来说，这是最适当不过的事情。”

125 参阅同上书，第650—651页。

126 参阅同上书，第651页及以下诸页：“德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要争取政治自由，并不是为了要使公共事业适应于他们的利益，而是因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面前为自己的奴隶地位感到羞耻，他们的运动缺少自由主义据以在法国和英国取得胜利的现实基础，他们对理论问题的兴趣要比对实际问题的兴趣大得多。德国的资产阶级一般说来是所谓不大关心自己私利的人。但是1830年

严厉的书报检查和1834年的镇压，使这场运动宣告结束。它的领导人不是被投进监狱就是逃往国外，这样，到1840年，这个运动就几乎完全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只是在巴德大公爵采地的议会厅里，人们还能听到反对派的声音，但不很成功¹²⁷。不管是人民屈服于极权主义的奥地利，还是资产阶级继续对公共事业毫不关心的普鲁士，都不能为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土壤。尽管如此，但也只有从普鲁士，从这个在当时成为德国历史之中心的地方，能够在德国推动一场伟大的自由主义运动¹²⁸。

在这场自由主义运动进行的同时，法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也正在开展，这个运动在1830年以前就已经形成了。由于工人阶级不够强大以及资产阶级还具有进步性，结果，工人的民主主义运动起初只能从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工人们并没有认识到作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之政治用语的自由主义，和民主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这就说明，工人阶级为什么起初只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这也说明为什么在1830年的革命期间，法国工人为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了战斗；英国工人宣布取消谷物进口法也是同样情形。工人阶级的利益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有在资产阶级仍然是一个进步阶级时才是可能的。在英国和法国，当资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并从而变为一个

的法国资产者却不是这样。在革命后的第一天拉菲特就说：‘现在该我们这些银行家来执政了。’而且到今天他们还在统治着。英国的资产阶级也很了解他们把财产资格规定为10英镑的目的；但是德国的资产者，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他们只是‘出版自由’、‘陪审制’、‘宪法对人民的保障’、‘人民的权利’、‘人民代议制’等等的热烈崇拜者，而且他们不是把这一切当做手段，而是当做目的。他们把影子当本质，因而一无所得。”

127 参阅同上书，第652页。

128 参阅同上书，第646—653页。

保守阶级的时候，它就只想到保卫自己的私利而不再想到别的，这就要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引起极其尖锐的对立，同样，也要在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引起对立¹²⁹。可是直到四十年代，工人阶级还只是以一些毫无成效的孤立的暴动而不是以有组织的运动，来表示它的反抗¹³⁰。

恩格斯在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即研究英国谷物法的文章中，对谷物进口法的建立和废除的种种理由进行了分析¹³¹。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的谷物一直是出口的。谷物价格的下降和肉类价格的上涨引起把土地改为牧场的急速变化，这就使得英国不得不进口谷物。大陆的封锁停止了进口，因此又引起小麦价格的上

129 参阅同上书，第 648—649 页：“我认为，为了说明以下两个事实，这样稍微谈一下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必要的。第一，从 1815 年到 1830 年，各国工人阶级的、实质上是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都或多或少地从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虽然工人比资产阶级先进，但是他们还看不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即资产阶级的解放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之间的根本区别；当金钱还没有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当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唯一的统治阶级的时候，工人们是不能识别金钱的自由和人的自由之间的区别的。因此，在彼得卢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民主主义者打算呈递请愿书，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普选权，而是同时要求废除谷物法；因此，1830 年巴黎无产者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进行了战斗，1831 年英国无产者准备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而投入战斗。从 1815 年到 1830 年，在一切国家里，资产阶级都是革命派中间的最有力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革命派的领袖。只要资产阶级本身还在革命，还在进步，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充当资产阶级手里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单独的运动始终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取得了全部政权、金钱的势力消灭了一切封建的和贵族的特权、资产阶级不再进步和不再革命并且本身已经裹足不前的那一天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开始领先，并且成了全民的运动。”

130 参阅同上书，第 652 页。

131 参阅弗·恩格斯：《英国谷物法史》，载《德意志电讯》，1845 年 12 月号，第 193、194 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563—568 页。

涨和牧场又重新改为耕地。1814年的和平再一次有利于谷物的进口；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当时执政的保守党人便建立了谷物进口法，以便使小麦在英国保持一种有利的出售价格¹³²。

这个办法不仅使工人不满意，因为他们看到面包涨价了，而且也同样使农民和资产阶级感到不满。农民们觉得由于有了进口法，他们自己的利益便得不到足够的保护；资产阶级则认为，由于面包价格上涨，他们因此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工资。利用了工人阶级的这种愤懑情绪，资产阶级在1838年建立了一个反对谷物法的同盟，要求予以废除。他们口头上声称，这样做是着眼于人民的福利的，而实际上他们却只在想着如何保卫自己的利益，因为谷物进口法的废除使他们能够由于生活水平的降低而减少工资的支付，并从而也可以更好地来对付外国的竞争¹³³。

当1842年工商业的停滞引起一次危机，这次危机把工人投入深深的苦难之中时，要求废除谷物进口法的骚动具有了一种革命的色调。规模越来越大的集会举行了——曼彻斯特的那次集会就聚集了五十万人。为引起一场迫使政府不得不让步的暴乱，厂主们宣称要关闭他们的工厂，可是工人们却走在了他们前面，在兰加什爆发了一场纺织工人的总罢工。使资产阶级大为惊讶的是，工人们不是首先要求废除谷物法，而是要求增加工资和颁布宪法¹³⁴。

得到宪章运动者支持的工人起义，使资产阶级感到危险，他们就协助政府进行了镇压，其结果就是使全体无产阶级识破了它的真面目。工人们决定今后只为本阶级的利益进行斗争，毫不关

132 参阅同上书，第563页及以下诸页。

133 参阅同上书，第564页。

134 参阅同上书，第566页及以下诸页。

心谷物法是否废除；当1843年资产阶级又组织一次规模巨大的要求废除谷物法的骚动的时候，它的演说家被工人嘘下台来并遭到痛打，以致这场骚动不得不由工业区转移到农村去¹³⁵。

恩格斯在结论中强调指出，谷物法的废除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事实上，这一废除将使英国的农业和外国展开竞争，从而动摇了大土地所有者的权势，加剧了他们与农民的斗争，在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激化的同时，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而最后使得宪法的颁布提上了议事日程¹³⁶。

通过这几篇文章——它们在分析经济和社会状况方面所表现的深度和准确性并不亚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显示出他的判断历史事件的杰出的才能，这才能使他成为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理想的合作者。

135 参阅同上书，第567页。

136 参阅同上书，第568页。

第四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¹

著述与出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执笔撰写的继《神圣家族》之后的第二部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他们更系统地、更概括地建立了直到那时为止他们还不曾制订过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他们把这些原理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并把它们在对于思辨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中予以有效地应用。

我们知道，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相遇以后以及在旅英过程中，他们的思想观点已趋于一致了，因此在这部著作中，要明确指出哪一部分思想出于马克思，哪一部分思想出于恩格斯，那是很困难的。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基本论点无疑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至于恩格斯，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因此在对于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史的当代历史的批判性的分析方面，他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

引起他们从事于这部书的写作的，首先是他们觉得有必要澄清、扩大和深化他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此同时，愿意借助于

¹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11—640页。

这个唯物主义世界观，来完成对于曾作为《神圣家族》的对象的德国思辨哲学的批判²。

写这部批判著作的直接动机，是在《维干德季刊》第三卷上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发表的几篇文章引起的。这两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英国回来以后认识的³。

在这几篇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指责为教条主义，因此他们决定用对思辨哲学的总批判来作为回答。在他们心目中，这个总批判就是在《神圣家族》中对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尔·鲍威尔的批判的继续，也是他们在1845年初与赫斯的通信中对施蒂纳的批判的继续。这部批判著作在他们看来如此重要，以致马克思写信给他的出版商列斯凯说，为了使德国公众易于了解并采纳他们的观点，出版这部书是不可少的⁴。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写这部著作，从1845年9月一直工作到1846年8月。他们把全付精力投入这本书的写作；马克思早已着手写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恩格斯已着手写的《英国通史》

2 参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9—10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从另一条道路（请参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

3 [布·鲍威尔]，《路易·费尔巴哈的特点》，载《维干德季刊》，第3卷，第86—146页。

麦·施[蒂纳]，《施蒂纳的批判》，参阅《维干德季刊》，第147—194页。关于他的几篇文章，参阅该卷第2章，第58页。

4 参阅卡·马克思致卡·威·列斯凯的信，1846年8月1日发自布鲁塞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473页。

参阅本书（指《马克思恩格斯传》第4卷法文版），第3章，第151页。

都暂时搁置一旁⁵。

当1846年将近5月的时候，这部著作的主要部分刚一写完，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开始物色出版商。1846年3月底重新回到威斯特伐里亚的魏德迈，给他们联系到两个有钱的同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民主主义者：毕勒菲尔德的商人鲁道夫·雷姆佩尔和柏肯洛德的冶炼师尤里乌斯·迈耶尔⁶。

同这两位出版商的商谈失败以后⁷，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伯尔尼、赫黎兹奥和不来梅同另外一些出版商联系，但都未能成功⁸。

直到1847年5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为出版他们的书继续不断地努力。最后他们考虑到，要是把手稿分开印成数卷，也许容易卖掉。不过即使如此，他们的努力也还是落空了，他们的著作只好一直停留在手稿状态⁹。关于他们所做的一切尝试，马克思写信给巴·瓦·安年柯夫这样说道：“我本想有可能随信把

5 参阅《卡尔·马克思生平年表》，前引书，第29页。

6 参阅B·安德莱阿斯与W·芒克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故事》，载《社会史文库》，汉诺弗尔，1967年，第7卷。

7 参阅W·芒克的《莫泽斯·赫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合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载《年鉴》，米兰，1967年，第6卷，第491—496页。

8 参阅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46年10月18日自巴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3页；1846年12月自巴黎，同上书，第78页；1847年1月15日自巴黎，同上书，第85页；1847年3月9日自巴黎，同上书，第89页。

9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请参阅约·魏德迈致卡·马克思的信，1846年5月13、14日，6月11、28日。（莫斯科马列学院）。

莫·赫斯致卡·马克思的信，1846年5月6日自菲尔弗埃；1846年7月28日自科伦，参阅莫·赫斯的《通信集》，格拉芬哈戈，1959，第152页及以下诸页，第163页及以下诸页。

威·魏特林致莫·赫斯的信，1846年3月31日自布鲁塞尔，参阅同上书，第150页及以下诸页。

弗·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1868年10月25日，参阅弗·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柏林，1958年，第157页。

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代表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的利益的出版商。至于我们的党，那末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部分党员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¹⁰

关于这部手稿的命运，马克思后来这样写道：“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¹¹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活着的时候，只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其中一部分与世人见了面，那是马克思以论文的形式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发表的¹²。

1883年，原稿经过修订以后，恩格斯建议伯恩施坦把它出

《卡·马克思生平年表》，前引书，第33—34页。

E·巴尔尼科勒的《俘虏魏特林及其“正义”》，基埃尔，1929年，第269—271页。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47年3月9日自巴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92页：“此外，如果我们手稿的出版会妨碍你那本书的出版，那末就把手稿扔掉算了，因为出版你的书重要得多”。

10 参阅同上书，第488页。

11 参阅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页。

由于马克思的书法几乎无法辨认，因此，手稿的绝大部分是由书法写得好的恩格斯抄写的，关于施蒂纳的那一章，有一部分则是由魏德迈抄写的。

手稿部分地呈残缺不全状态，缺少24页：政治自由主义（缺少4页）；利己主义者的现象学或关于辩解的学说（缺少4页）；社会（缺少12页）；社会Ⅱ（缺少4页）。

12 卡·马克思，卡尔·格律恩：《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达姆斯塔德1847）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眼目中的历史》，载《威斯特伐里亚汽船》，1847年，第439—463，505—525页。

版，但由于种种偶然的原因也未能实现¹³。那时，恩格斯正在撰写《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在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以后，觉得它写得比较零散，付印是不太合适的¹⁴。

恩格斯逝世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让这部手稿在文库中搁置起来。这部手稿的一些片断最初在不同的出版社印行。只是在1932年，才出现了这部手稿的完整的评注本，收在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5卷中。

《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在当时立即出版，是很遗憾的，因为，正如马克思写信给列斯凯所说的那样，如果出版了，那么要了解他们的新观点，在当时就会便利得多。

《德意志意识形态》起初是想作为一部对黑格尔以后的思辨哲学的批判来写的。这就说明，意识形态这个词在这里所包含的特殊意义：它不是指专门适用于一个阶级或一个时代的世界观的意思，而是指通过思辨把实在弄得神秘化了的意思……

他们最初想把他们的论战写得富有幽默色彩，就象在《神圣家族》中那样。在《神圣家族》这部书中，他们把爱德华和布鲁诺·鲍威尔这两位《批判的批判》的杰出作者当作圣神的化身来加以嘲笑，在这里，他们则转而使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以在一个宗教会

13 参阅爱德华·伯恩斯坦的《马克思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载《新时代》，1896年，第2卷，第216—220页：“1883年夏天，恩格斯在一封信中问我，是否我认为时机已经来临……出版马克思和他在1847年写的一部异乎寻常的手稿，在这部手稿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受到了十分巧妙的批判。但是，不久他又撤回了这个请求，因为这部手稿若是出版便不会不伤害党内一部分同志，原因是这个批判是针对他们的，在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还在统治着的情况下，没有绝对必要是不能这样做的……1884年春天，我在他家住了几天，晚上他把这部手稿念给我听……那几小时使我终生难忘。”

14 参阅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议上善作预言的教堂神父的面貌出现，而进行讽刺。这部书最初的书名《莱比锡的宗教会议》就是从这里来的，而且它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正是在莱比锡出版的《维干德季刊》上发表的。

这个宗教会议开得乱哄哄的，并且回响着好战的声音。所讨论的并不是一些尘世间的事物，不是一些现实问题，诸如铁路的修建、海关的税率、宪法等，而是清一色地抽象的东西：自我意识、实体等，关于这些东西人们争论得特别热烈。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充当了仇恨异教徒的大裁判长的角色。布鲁诺·鲍威尔，完全扮成圣布鲁诺的样子，对以为在自我意识的形式下可以与圣神相比的实体公开加以辱骂，不管这个实体在什么形式下表现自己。面对着他的，则是以圣麦克斯或乡下佬雅各的名字出现的施蒂纳，此人把反对异端邪说的论战引向到顶点，他仇恨一切偶像，包括自我意识在内。

作为被告出庭的有费尔巴哈，他把实体予以神化，因而有罪；还有莫·赫斯，因为他竟敢把布·鲍威尔和施蒂纳当作晚近的哲学家而加以研究；另外，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因为他们是《神圣家族》的作者。所有这些被告一概被驱除出精神的王国。办完这事，两位教堂神父竟动手撕打起来，而莱比锡的宗教会议也就到此结束了¹⁵。

正如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那样，诙谐幽默的作风让位给一种细致深入的分析——不仅是对于《批判的批判》而且也是对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的分析——；很可能对思辨哲学的越来越严谨的批判，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抛弃他们原来打

¹⁵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8—90页。

算赋给这部著作的那种幽默色彩。

在他们对思辨哲学进行批判的同时，由于与它相对抗，事实上他们就这样逐步地发展了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给本书的主题和计划带来了极大的修正，而且导致他们为这本书取了一个与书的内容更为符合的书名：<德意志意识形态>¹⁶。

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越来越深入的钻研，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不仅能够清算思辨哲学，而且也清算了一切教条主义和空想主义。这就说明，他们如何在批判了思辨哲学以后，又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个在当时德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所采取的一种形式也进行了批判。

由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可分为以下四个主要部分：

- 1) 唯心主义历史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
- 2)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人类的几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分析；
- 3) 对黑格尔以后的思辨哲学的批判；
- 4)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由于不论是对思辨哲学的批判还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都以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根据，他们在对这部著作进行分析的时候，不按照年代的顺序，即是不按照本书各部分写作的年月，而按照贯串各部分的内在联系，看来还是有益的。

16 <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最近的德国哲学和以其不同的先知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这个标题最初是马克思在反对卡尔·格律恩的一篇声明中使用的，这篇声明发表在1847年4月8日出版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日报>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卷，第38页。

历史唯物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是象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那样以系统的方式予以阐述，而是借助于对历史的几个主要时期的批判性的分析来说明的。

这个说明，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题为《费尔巴哈》的这一章中写出的。这个题目说明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认为费尔巴哈是当代哲学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半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从而也仍然是思辨的唯物主义——，正象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的那些完全故意玩弄思辨的学说一样，是应该加以驳斥的。

最初，他们也许想通过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原理相对抗的方式，来阐发他们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就象马克思在《提纲》中所曾经做的那样。但是，在《提纲》中用的那个方法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不打算以片断零散的方式来阐明这些原理，象在《神圣家族》中所做的那样，也不打算以梗概的形式来阐明这些原理，象在《提纲》中所做的那样，而是想以完整的形式把它们写出来，因此，这就只能通过对于历史发展的分析来完成。

尽管这一章的题目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但是对于历史发展的分析实际上乃是这一章研讨的主要对象，在这里几乎没有谈到费尔巴哈的问题¹⁷。

¹⁷ 他们对于费尔巴哈的批判将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那一章中加以分析。

正如在《神圣家族》中那样，这一章是从对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驳斥开始的，在这里，这个驳斥既针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同时也针对着思辨哲学家。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对于人类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是有意地不予考虑的，这就导致他们忽略了由于这种生产活动而产生的种种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与德国的历史学家们不同，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学家们对社会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而为他们的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们具有资产阶级所特有的种种幻觉，以为历史主要是被一些宗教的和政治的原因所决定的，因此，他们就把历史归结为一系列的宗教斗争和政治斗争，其实，这些宗教斗争和政治斗争只不过是阶级斗争中派生出来的一些次要方面，而只有阶级斗争才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

“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将对自然界的联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假使某一时代设想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那末它的历史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他们的实践的唯一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原始形态在这些民族的国家 and 宗教中产生了等级制度，

所以历史家便认为似乎等级制度是产生这种原始社会形态的力量。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¹⁸。

在近代德国哲学家那里，历史取得了一种全然唯心主义的性质，因为历史归结为精神的发展，就是说归结为一种观念的连续，这个连续是不依赖于创造出这些观念的人以及他们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自己实现的¹⁹。

与这些多多少少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一点作为原则：真正的历史是从思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另外，在他们的历史观中，他们并不以抽象作用、概念为出发点，而以具体的人为出发点，按人的生产活动，就是说按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来观察人²⁰。

¹⁸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页。

¹⁹ 参阅同上书，第44页：“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在德国历史编纂学看来，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第55页：“把统治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做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而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一切关系都可能从人的观念、想象的人、人的本质、‘人’中引申出来，那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

²⁰ 参阅同上书，第30—31页：“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

在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活着的现实的个体人的生存，乃是历史的第一个条件和前提。这些个体的人通过经济的和社会的活动而产生自己的物质生活，它使人们得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首先是他们的最基本的需要：吃饭、穿衣、住房²¹。

这些需要的满足以及必需的生产资料的创造，结果又推动了新的需要的产生、新的生产工具的创造发明，从而使得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生产的发展，从它这方面说，又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

“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象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象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

- 21 参阅同上书，第23页：“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第31页：“……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

关系的建立。由于生产和生殖而产生的那些最初的社会关系，就是在家庭中建立的夫与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些社会关系随着需要的增长和生产资料的不断发展而扩大，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物质生活的生产、为满足需要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创造、以及被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种种社会关系，并不构成人类生活的一些阶段或不同的方面，而从来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²²。

人由于具有生产活动而有别于动物；动物不象人那样能够变革自然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它只能依靠自然以直接的方式提供给它的东西生活。人与动物不同，他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不断地、越来越进步地创造自己生活的物质条件，这就使他能够通过变革自然而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他是以间接的方式来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的²³。

22 参阅同上书，第32页：“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此外，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

“这样，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

23 参阅同上书，第24页：“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

由于人对自然的改造，结果，对人来说，自然环境就不象对动物那样是原始状态的自然，象它最初直接呈现给人的那个样子，而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逐步地予以改造了的那样的自然了，所以，人不同于动物，他是越来越不受自然环境的支配，环境影响他，他也同样影响环境²⁴。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活动在人类生活的组织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一思想出发，用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统一这个唯物主义观点，代替了黑格尔的主体与客体在理念中的统一这个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这个观点是从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而在个体人、自然与社会中建立的种种关系归结出来的。

人在通过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这种自然与人相并进行的改造过程，构成了历史的主要内容。

人的生活是被他所生产的东西和他所从事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因此，研究历史必须从生产的发展这一点出发。生产首先取决于需要的增长，而需要的增长本身则又是被人口的增加、以及人所采用的原料的数量和性质所决定的²⁵。由于相宜的生产资料的创造和利用，人的需要满足了，而这满足又引起了种种新的需要，后者反过来又刺激了生产。

人既然不能孤立地、不依赖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只能在劳动中互相协作，因此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便具有一种社会性，它是被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的这些术语指的就是后来他们称之为生产关系的那个东西

24 参阅同上书，第43页：“……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25 参阅同上书，第24页：“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事实上紧紧地取决于生产力，而且是随着新的和更复杂的生产力被创造出来以满足新的需要的情况而自行发展。社会关系的一定形式符合于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个形式之被采用是为使这生产力发挥作用的，因此，就产生这样的情况：交往形式随着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²⁶。

生产力的发展在决定交往形式的改变的同时，也决定意识和思想的改变。意识和思想，事实上并不象唯心主义者和唯灵主义者所想的那样，是历史发展中首要的因素，而是次要的因素，虽则它们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正是根据这一点，人类历史才从根本上同动物历史有所区分²⁷。

从人的生活和生产力的发展这二者间所建立的紧密联系中，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如果我们不从经济发展的观点，即不从财富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观点来观察的话，那么对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是不能理解的。财富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不仅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决定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发展。

被这些东西所决定了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一代一代地相传下去。每一新的世代从前一代接受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它把它们加以改变，适用它们来满足新的需要，并把这样经过改变了的生

26 参阅同上书，第 33—34 页：“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27 参阅同上书，第 35 页：“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这是纯粹畜群的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的、或部落的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产力和交往形式，传给下一代²⁸。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辩证发展，推动历史的前进。由于需要的增长而促进生产力的不断改变，结果使得适应于生产力的一定形式的社会交往成为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此，它必须被适应于新的生产力的那些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²⁹。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二者间产生的这个矛盾，乃是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根源，是历史前进的动力³⁰。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向更高级的发展并不是自动地完成的。它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而且很容易、很快地会碰到统治阶级的反抗，因为这个变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在建立殖民地和形成一些新的文明国家比如美国的时候，就发生过这种事情³¹。

28 参阅同上书，第51页：“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

29 参阅同上书，第81页：“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 *à son tour* [又] 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

30 参阅同上书，第83页：“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31 参阅同上书，第82页：“相反地，在那些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才开始自己发展的国家里，例如北美，这种发展是异常迅速的。在这些国家里，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地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迁移到那里去，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古老国家里现存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因此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古老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古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确立起来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这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情况，只要它们不仅仅是一些军用场所或交易场所。”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向更高一级的发展，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在近代反而变为容易了，这是由于以下的情况：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大了，而且由于一些在经济上更为先进的国家的竞争，又给予商品交换以刺激。事实上，这个竞争使得一些落后的国家不得不加快他们生产力的改变，以便能够继续自己的生存³²。

这个过渡不应理解为过时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一下子和彻底地被取消而由一些新的生产力和新的交往形式取而代之。事实上，在一定的时期，在新的生产力的一旁仍有旧的生产力存在——蒸气磨坊的一旁仍有水磨坊——，同样，在社会上，我们看到反动分子——他们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适应于已过时的生产力——、保守分子——他们的阶级利益适应于现阶段的生产力的发展——、和革命分子——他们的阶级意识超过了他们的时代——，三者并存³³。

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是由占有者与非占有者之间的阶级斗争构成的，这些斗争随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改变而改变，并孕育

32 参阅同上书，第83页：“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

33 参阅同上书，第81页：“这种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得到完全的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并在许多世纪中和后者一起继续存在下去。由此可见，甚至在一个民族内各个个人都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发展，即使撇开他们的财产关系不谈，而且较早时期的利益，在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已经为适应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所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表现为与个人隔离的虚幻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这种权力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打倒。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某些带有较大的概括性的问题上，意识有时似乎超过了当代的经验关系，因此人们在后来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指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

着社会革命。由于阶级斗争常常以宗教斗争或政治斗争的面貌出现，这些斗争掩盖了它们的社会性质，因此，这就导致人们认为宗教的或政治的动机才是历史上种种变化的真实原因，而且，宗教斗争或政治斗争的发起人自己也会在这些斗争的真正理由方面容易产生错觉³⁴。

作为生产力发展之必然结果的交往形式的改变，是来自这样的事实：新的生产力——就它不是纯粹的量的增长而言——产生了新的分工和新的所有制形式，正是它们改变了交往形式³⁵。

起初，分工是由个体人的自然能力的不同以及需要和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引起的³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分工，则首先是城乡、工农之间的分离以及它们的利益的对立的产物；后来，它就带来了工业和商业的分离、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日益增长的专业化、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化³⁷。

34 参阅同上书，第 83—84 页：“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以往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这种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根据狭隘的观点，可以从其中抽出一种附带形式，把它看作是这些革命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更其容易的是，这些革命所由出发的各个个人本身，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历史发展的阶段而对自己的活动作出了种种幻想。”

35 参阅同上书，第 24、25 页：“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例如开垦新的土地），……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36 参阅同上书，第 35 页：“分工起初只是性交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

37 参阅同上书，第 24—25 页：“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在某一劳动部门共同劳动的个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致了。这些种种

不同形式和不同方式的所有制符合于不同等级的分工。分工和所有制是紧密相连的，分工实际上关系到人的活动，所有制则关系到人的活动的成果³⁸。

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所有制方式的改变决定着交往形式，就是说决定着建立在与生产、劳动工具的所有制以及劳动产品的分配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³⁹。

这些与日益增长的、使人在划分得越来越细的活动中被迫从事专业化劳动的分工相连的交往形式，决定着人的生活条件⁴⁰。

在财产私有制下，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财富逐渐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结果，就是占有者对非占有者的垄断和压迫，从而把社会分成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加剧了它们之间的斗争。

社会分成阶级，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按他们所属的阶级而有所不同，并把他们彼此区分开来⁴¹。

细致的分工的相互关系是由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决定的。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同样的关系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

参阅同上书，第 35 页：“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

38 参阅同上书，第 25 页及第 37 页：“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39 参阅同上书，第 25 页。

40 参阅同上书，第 37 页：“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

41 参阅同上书，第 84—85 页。

不仅属于对立阶级的个人之间有斗争，而且，就是在属于同一阶级的个人之间，在他们不参与共同斗争来反对敌对阶级的时候，由于彼此竞争而进行着斗争⁴²。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发展，在决定阶级的形成和个人生活条件的同时，还决定国家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它的特性。

国家形成的先决条件是私有制的建立和社会分成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把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使之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上升的阶级必需占有国家而成为统治阶级，并使政权即军队、警察、司法、立法等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

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由于受到国家的保护，因此就伪称是普遍的利益，是不依赖社会关系而存在的。国家就这样取得了为一切人所公有的普遍利益的代表者的骗人的外观，而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为占有者阶级服务的便于统治的工具罢了⁴³。

国家，原则上作为面向社会的种种普遍利益的代表者，在个人看来就象是一种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势力，它由于自身的力量向前发展⁴⁴。

事实上，国家的存在是从属于社会的存在的；它是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发展的一定阶段、当私人的利益改变为阶级的利益、

42 同上。

43 参阅同上书，第37—38页：“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

44 参阅同上书，第38—39页：“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

当司法关系开始产生的时候诞生的⁴⁵。近代国家是在私有财产采取了资本的形式的时候建立的；那时它就完全脱离了社会，好象是一种特殊的、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存在⁴⁶。

一些还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国家只有在这样一些地方才会出现：在那里，人口中的不同阶层在政治上由一些不同的国家所代表，就象在古老的制度下的法国那样，而且，在那里，国家作为中央的权力，因此不可能单单为某一个阶层服务⁴⁷。在一些经济上和社会上最先进的民族中，资产阶级控制了它同意给予国家的那些公债，并且能使国家债券行市随它的意愿涨落，因此对资产阶级来说，国家就是它进行统治的一种最驯服的工具⁴⁸。

统治阶级在普遍利益的形式下借助于国家来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因此在国家内部，阶级斗争就采取了政治斗争的形式，而这些政治斗争是以普遍原则之名发动起来的，比如贵族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的斗争、专制政体与共和政体之间的斗争等等，这些

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关于这种权力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的，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45 参阅同上书，第 377—378 页：“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內容总是决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这是由例如私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

46 参阅同上书，第 70 页：“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

47 参阅同上书，第 70—71 页。

48 参阅同上书，第 70 页。

斗争都掩盖了它们的阶级性质⁴⁹。

正如国家并不具有一种绝对的性质、并不是按自己的意愿来确定自己而只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表现那样，国家借以肯定自己的权威的权利和法律，同样也是由社会关系来确定并随同它们一起演进的⁵⁰。权利[法]是和私有制同时诞生的，是从原始集体所有制的解体中诞生的。由于权利的诞生，存在于个体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失去了它们的个人的性质而不得不屈从于一些确定的规则，这些规则采取了法律的形式，是国家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制定的⁵¹。

近代法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影响下，从封建的司法关系的解体中诞生的。这就说明为什么在中世纪进行了广泛的海上贸易的第一个城市阿马尔非制定了航海法⁵²。

随着权利[法]的诞生，法庭也建立起来了，它以一些更文明的形式代替了原始而野蛮的裁判方式，每个个体人就是通过这些文明的形式行使自己的权利。近代法庭则是在社会关系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取得一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时期出现的⁵³。

49 参阅同上书，第38页：“由此可见，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

50 参阅同上书，第70—71页：“因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象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现实基础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同样，法随后也被归结为法律。”

参阅同上书，第378页：“……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

51 参阅同上书，第71页。

52 参阅同上书，第70—71页。

53 参阅同上书，第395、396页。

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象各个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一样，是由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各民族彼此之间建立的关系取决于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发展程度⁵⁴。

为保护自己的生产以对抗发达国家的竞争，一些民族开始禁止出口贵重金属，进口外国商品时则征收限制性的关税⁵⁵。

从17世纪开始，一些最先进的民族为了开拓殖民地和世界市场，展开一场无情的斗争。结果，它们开创了一些富有垄断性质的殖民地公司以便于殖民地的开拓⁵⁶。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扩展的结果，各民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异已逐渐地变得微乎其微，它们从自己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它们的交往则具有了全世界的性质⁵⁷。

正是从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人类的历史描绘了一幅宏伟的图景，这使得他们能够越来越正确而深刻地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

人类历史的发展可分为两个伟大时期，这两个时期由于人的活动方式、分工、所有制的形式和社会关系而彼此有所区分。在第一个时期内，生产、分工、所有制等方式以及社会关系还只具有一种自然的品格，可是在第二个时期内，它们就越来越为文明

54 参阅同上书，第24页：“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55 参阅同上书，第65页。

56 参阅同上书，第66页。

57 参阅同上书，第51页：“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来越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来越彻底，历史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的发展所决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空想主义者的方式把历史分成一个由于异化的劳动而产生的非人道主义化时期和一个由于这种劳动方式的废除而产生的再生的人道主义化时期，而在这里却不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何以人类历史的这两个伟大时期由于人们生产自己物质生活的方式不同而在根本上互相区别。

在第一个时期内，人们依靠着在自然中直接找到的东西生活，比如各种植物及其产物（五谷和水果的收获）、狩猎和捕鱼等等，因此，他们物质生活的生产的成分带有一种自然的品格；这些成分实际上不是由使他们改变了自然的生产活动的成果所构成而是由自然呈献给他们的东西所构成的。他们的生活是被如实地呈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个自然所决定，而所有制则只限于对于处在自然状态的土地的占有。由于人们在最初不能够孤立地生存，他们的劳动诸如收获、打猎、捕鱼等等就要求他们彼此合作，所以他们起初是聚集在家庭中，之后就聚集在部落中生活。家庭构成了社会关系的最初的形式。它不仅用来延续人种，而且也可满足它的成员的基本需要。社会关系，由于分工，起初只是限于建立在男人和女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那些关系，这时则由于需要和生产的增加而自行发展起来，这就导致由一定数目的家庭聚集起来形成了部落。

在标志着社会生活开始的部落中，社会关系也正象在家庭中那样，只是限于在收获、打猎和捕鱼方面的共同操作，现在，则在这些劳动之外，又加上种种自然产物的饲养和交换，或者还处于十分原始状态的工业产品（陶器）的交换。那时候，人们使用的生产资料是一些用石头或木头做成的原始的工具；没有分工，也更谈不上什么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

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时期之后，紧接着是由需要和生产力的增长所决定的另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物质生活的产品越来越表现出是人的生产活动的结果。

由于人口增加，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原始的工具逐渐被一些更好的和更复杂的工具取而代之。在生产力自行发展的同时，一种更大的分工出现了，一些新的所有制形式和新的社会关系产生了。人的生活越来越不象原始时期那样密切直接地联系于自然，而是越来越被新的生产力和新的交往形式的发展所决定。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流通的诞生，那些逐渐失去其个体品格的社会关系，由于它们被归结为是一种商品交换，从而就越来越被物化(chosifiés)。这样被物化了的社会关系对于个体人来说，就不再是什么人的关系，而象是一些统治着他们的外来的势力⁵⁸。

在对人类历史的两个伟大时期的特点作了一番简要的说明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地分析了这第二个时期的几个主要阶段。他们处理这个问题时采取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用的办法，在这部书中，恩格斯曾指出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各种关系是如何被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

人类历史的第二个时期包括四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标志是部落的集体所有制，这是与还处于原始状态的生活方式相符合的。人们的生活这时还是依靠着谷物的收获、牲畜的饲养、狩猎和捕鱼，这就需要占有广大的土地和部落的成员在所有他们活动的领域里的密切合作。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分工并没有超出家庭

58 参阅同上书，第50、51页。

中的分工，它是简单地普遍于整个部落的。这种生产和分工的方式是与族长制相符合的。在这种制度下，我们看到奴隶制在发展。其实奴隶制在家庭里已经产生，在家庭里，由于生产活动的不平等的分配，女人和孩子事实上已成为安排他们去劳动的父亲的奴隶。正如生产力一样，奴隶制在部落中的扩展越来越大，特别是由于部落之间的战争把俘虏变为奴隶⁵⁹。

这个时期的第二个大的阶段，是由公社和国家的集体所有的古老的制度构成的⁶⁰。这个制度的诞生是出于部落的聚集（它们形成一个国家）和由于商品的日益增长的交换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扩展。集体所有制一般是扩展到一个城市和它的近郊。因此，在这种制度下也就出现了城乡的分离、农业与带有手工业性质的工业的分离，而在城市内，则出现了工业与商业的差异⁶¹。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而越益显示其重要性的城市的扩张，需要形成一个行政机构和国家，这样，它就带来了其他的分工，特别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⁶²。

在这种制度中，生产依靠奴隶劳动的普遍化，因为奴隶劳动在这时已充分发展成生产力。同时，我们看到，存在于占有者与非

59 参阅同上书，第 25、37 页。

60 参阅同上书，第 25 页。

61 参阅同上书，第 52 页。

62 参阅同上书，第 56—57 页：“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

占有者之间的、存在于主人——只有他们才是国家的成员——与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奴隶之间的关系已更加清楚。我们也同样看到所有制的方式在逐渐地变化。在仍处于统治地位的集体所有制的一旁，终于出现了私有制，起初，它只是作为集体所有制的从属形式自行发展起来的。事实上，自由人或主人只能凭着国家成员的身分雇佣和垄断奴隶，因此私有制在根源上是与集体所有制相联系的，正是它构成了自由人的权力的基础⁶³。

这个制度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尤其是大片领地的建立而自行瓦解了，特别是在意大利。结果是：小农被淘汰了，乡村人口稀少，为了饲养牲畜而农业减产，田地改变成牧场，破产的农民流向城市，他们在那里也找不到工作，因为工作都让奴隶们去做了，他们成了寄生虫，成了富人们的食客，从而壮大了贱民的行列。这就为野蛮民族的入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它们正是把战争和抢掠作为手段来满足它们的需要的⁶⁴。

生产力、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封建制。在野蛮民族灭亡了罗马帝国以后，封建制取代了古时的所有制。这个制度是在野蛮民族破坏了巨大的生产力之后建立起来的；破坏带来了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凋敝。野蛮民族不再能够借抢掠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于是它们不得不利用在被征服的地方还残留下来的生产力，使之适应于一些新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它们占领地区上的人口稀少、工商业和城市的衰落、以农业作为生产的主要形式的绝对重要性以及野蛮民族的军事组织，这些便决定了适于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质⁶⁵。

63 参阅同上书，第52页。

64 参阅同上书，第26页。

65 同上。

由于农业在生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这个制度并不象古时的集体所有制那样从城市开始，而是从乡村开始的。这个制度也象古时的制度那样具有等级性；事实上，它同样是建立在由地主对大批农业工人的垄断之上，所不同的是，由于生产条件有了改变，统治阶级的性质以及它同被压迫阶级的关系的性质是另一种情况罢了。

新的统治阶级是在野蛮民族的军事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军队首领们成了大地主，是高等贵族；在陪臣们的帮助下，他们压迫广大农业工人，后者已不再是奴隶，而是农奴。这些农奴形成了一个新的被剥削阶级，它最初是由以前的奴隶和破产的小农组成，由于农奴依附于土地，自己不能解放自己，于是这个阶级便延续下来⁶⁶。

在封建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分工和与这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固定下来的同时，在城市中也自行发展着一种手工业生产，这就加强了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这种手工业生产是在一种合作组织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种合作组织中，操同样手艺或同样商业的人联合起来，以便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⁶⁷。

这些同业行会与农业组织具有同样的等级性。在最上层是一些占有作坊和劳动工具的手工业师傅，他们支配帮工和学徒。生产的独占允许这些师傅们随心所欲地规定他们同帮工和学徒的关系，因为是个人的关系把他们联合起来的，所以师傅同帮工和学徒的关系便带有族长制的色彩。帮工们不管受到怎样的剥削，总还是留恋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给他们提供了有朝一日他们

66 参阅同上书，第26—27页。

67 参阅同上书，第27页。

自己也成为师傅的可能性⁶⁸。

这个制度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性质事实上是排除了任何竞争的，结果便在工农业的发展中产生了一定的停滞状态。资本在那时基本上还只是具有不动资本的形式，是由土地或作坊以及工具和贱民这样的所有物构成的。由于没有流通资本——这在当时积累起来是很慢的——，生产力和分工的进步也就非常缓慢。再者，帮工必须能够操作属于他这一行业的所有的劳动，这个事实也拖缓了生产力和分工的进步⁶⁹。

与农业和手工业不同，商业发展的步伐是很快的。商业起初是和生产紧密相连并从属于生产的（师傅不仅是商品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商品的贩卖者），自从和生产逐渐脱离以后，它便获得独立，因此也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商人阶级。商业超越了城市及其近郊的狭隘的界限，相当迅速地扩展到临近的城市，从而具有了城际贸易的性质。由于它具有比农业和手工业更为迅速发展的可能性，它就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商业便利了新的需要的交换和创造，它通过需求的增加、新的产品的发明和制作方法的迅速普及、运输工具的改善和扩展、以及在城市里最有利可图的部门中逐渐的专业化等等，都刺激了工业的发展⁷⁰。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适应于封建制度的社会政治结构和阶级斗争。后者是与产生在乡村和城市的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相符合的。在乡村，贵族不得不与农奴和小农进行斗争，而在城市中却遭到资产阶级的日益增长的反对。基本上是

68 参阅同上书，第27页。

69 同上。

70 参阅同上书，第59—60页。

由手工业师傅和商人组成的资产阶级，随着它通过工商业的发展而不断壮大，便越来越有力地进行斗争，以便摆脱王公、主教和贵族的统治。自由城市的商人们联合起来，为防止掠夺成性的敌人的攻击而进行自卫⁷¹。在这些壮大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的斗争当中，资产阶级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阶级性质。它的特殊的生活条件，由于不断普及，事实上已成为适应于整个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这就是说，成为支配它的每一个成员的生存方式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条件；其结果就是资产阶级越来越变成一个特殊的阶级⁷²。

在资产阶级对王公贵族进行斗争的同时，它又不得不对受它剥削的帮工以及底层越来越大得可观的平民们进行斗争。这个平民层主要是由那些从农村逃出来希望在城市里可以找到更好的生存条件的农奴们形成的。他们不属于任何行会，不能找到正规的工作，因此，他们同师傅和帮工们发生冲突。这些平民与近代的无产阶级不同，他们不反对已建立了的秩序，而是反对阻止他们找到工作的那些特权。由于他们没有组织起来，所以他们尽管闹事，但不能构成一种危险的革命因素，因为在当时构成这一因素的只是一些农奴和小农，他们的暴乱直到中世纪时还在不断发

71 参阅同上书，第60页。

72 参阅同上书，第60页：“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性居民团体中，逐渐地、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各个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他们和现存关系以及为这种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方式相对立，便成了他们共同的、不以每一个人为转移的条件。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脱离了封建联系；同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主义的对立所制约的。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就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

生⁷³。

以分割土地成立好多小的公国为标志的封建政治体制，在贵族归属于最有权势的王公，和资产阶级渴望看到自己建立强大的国家胜于去保护他们并推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自己在变化着。由于这一事实，封建的老爷们便逐渐地从属于王权，他们把领地联合起来以便形成强大的王国⁷⁴。

在非洲、亚洲和美洲新的土地(这些地方不久便沦为殖民地)的发现，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殖民地的开辟实际上给了商业、主要是海上贸易以一种巨大的动力；商业越来越具有了国际性质，在当时它的发展的步伐要比工业快得多，它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在社会上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殖民地成了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结果，殖民地在缴出了金子、银子和香料以后，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了工业原料的提供者和工业产品的倾销地⁷⁵。

大量金银的进口和从海上贸易中提取的巨大利润，使得流动资本越来越迅速地积累起来，从重要性上说，流动资本已差不多超过了不变资本。

流动资本的积累使得生产力通过手工业生产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生产而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工场手工业生产由于商业的扩展而得到巨大的推动⁷⁶。

手工业工场起初是在城外乡村里创建的，在那里，它们可以不受行会规章的限制。在那里找到比较好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农

73 参阅同上书，第57—58页。

74 参阅同上书，第27页。

75 参阅同上书，第64页。

76 参阅同上书，第58页。

奴给它们提供了劳动力。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对纺织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手工业工场首先在纺织工业部门创建起来，特别是在意大利和弗朗德尔⁷⁷。

海上贸易和工场手工业的迅速跃进，引起了一些最先进的国家之间竞争的激化，这也就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每个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海上贸易、工业生产和流动资本的积累，无不采取下列办法，如建立享有特权的殖民地公司、保护关税、严禁出口金银以及纺织品原料如羊毛、亚麻、丝、苧麻等等，以便就地采用⁷⁸。

有助于商业跃进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加速了流动资本的积累，而后者则又有利于银行、纸币、公债和金融市场的建立⁷⁹。

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展，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同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相比之下已逐渐失去其重要性，贵族们眼看到自己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日益衰落，情况朝着有利于大资产阶级方面转化，至于手工业则更是日暮途穷了。最初主要是在沿海城市兴起的大资产阶级，逐渐地从小资产阶级分化出来，越来越激烈地同贵族争夺领导阶级的地位，这事首先发生在经济最先进的英国⁸⁰。但是，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只要流动资本积累的进度还比较慢，只要行会的特权还在阻碍着工商业的发展，只要手工业生产和小商业从总的方面说仍然占统治地位，那么，资产阶级一般说来就仍然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风俗习尚和心理状态，这一点就是使它同下一时期的资产阶级（这个时期中的大资产阶级开创了新的局

77 参阅同上书，第62页。

78 参阅同上书，第65页。

79 同上。

80 参阅同上书，第58页。

面)有所区别的地方⁸¹。

在这个经济的和社会的变革当中,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斗争改变了性质。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贵族不仅要同农奴、小农、资产阶级展开斗争,同时也要和逐渐走向极权主义的君主政体展开斗争;至于资产阶级,则在尽力地企图推翻封建制度,以便使自己的要求得到完全的满足。同样,它也要投入公开的斗争,反对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兴起的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在中世纪末一次逃亡农奴人数猛增之后出现的。这次逃亡农奴人数的猛增,是一些国王动用军队镇压一些大的陪臣和把一大部分土地改为牧场的结果。没有工作的人在那时数目非常庞大,他们到处流浪逃亡,已构成成为一种公共的危险,因此被无情地大量处死;在英国,仅仅国王亨利第八一人就绞死了七万二千人之多。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一些没有工作的人开始找到了工作,但是条件非常苛刻。在手工业工场里,早先在行会中存在于师傅与帮工之间的那种宗法关系实际上已被废除,而现在存在于老板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则变为金钱的关系,这就提供了毫无止境地剥削工人的自由的机会⁸²。

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流动资本的越来越迅速的积累,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标志就是手工业工场向工厂的过渡。由于手工业工场再也不能满足对于工业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手工业工场就逐渐地被工厂所代替。在工厂里,机器的使用取代了手工,而蒸气则越来越被用作动力。工厂代替了手工业工场,这首先发生在不得不满足世界市场需要的英国;在所有其他资本

⁸¹ 参阅同上书,第59页。

⁸² 参阅同上书,第57页。

主义国家中，在强迫它们不得不使自己的生产力现代化的竞争的压力下，后来也用工厂代替了手工业工场⁸³。

多亏工厂的发展，现在大工业的重要性才超过了直到18世纪末还在起着突出作用的商业。大工业的飞跃带来了运输工具的改进：帆船和马车再也不能满足工商业的需要了，它们越来越多地被汽船和铁路所代替。它加快了流动资本的积累，流动资本在重要性上已超过不变资本而且摆脱了一切阻碍。最后，它便利了大城市的扩展，在大城市中，和仍然存在于小城市中的那些情况相反，连花园、果园、草原、牲畜棚这类农业和牧业的最后的遗迹也看不见了；这样，最后就导致乡村和城市的分离，并保证了城市的优越性⁸⁴。

大工业的进步，在给生产力和经济关系带来变化的同时，也给社会关系和个人生活带来一个比工场手工业生产和海上贸易的扩展所曾经引起的更为深刻的改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带来的在人的生产活动及其劳动产品之间的越来越深刻的分离，加快了个人交往被商品交换所代替的过程；商品交换是通过金钱来进行的，从而也就出现了社会关系的物化。

大工业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国家内部的每一个人都依靠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它的飞速发展消灭了每个国家的特殊性，并在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方面引起深刻变化⁸⁵。

83 参阅同上书，第68页。

84 同上。

85 参阅同上书，第68页：“它（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

由于农业生产比工业生产要缓慢，贵族和农民越来越失去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要性，至于手工业，也越来越难以和大工业竞争，因此，我们看到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增长，大资产阶级通过占有新的生产力和流动资本，在所有国家中已逐渐成为领导阶级。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资产阶级社会，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是一致的，因此它也象资本主义制度那样，越来越具有一种国际性质。事实上，资产阶级使一切非资本主义国家服从它的特殊利益的需要，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则又使一切其他阶级服从它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样，资产阶级就象昔日的贵族那样，在国际方面就创造出符合于它的阶级利益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推翻了现存的风俗习尚和思想观点，由此而成为决定近代历史的社会因素⁸⁶。

资产阶级虽然已超出国家和民族的范围，但是，它对内还不得不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以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对外则依靠一个强大的民族以便能同外国的竞争进行斗争⁸⁷。

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只要这一点在劳动范围内可能做到的话）；它把这些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

86 参阅同上书，第 60 页：“资产阶级本身只是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又由于分工关系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产阶级……”

参阅同上书，第 68 页：“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变成赤裸裸的谎言。”

87 参阅同上书，第 41 页：“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

现在，资产阶级已乾脆同那日益失去其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重要性的中等阶级分离，而投入对无产阶级的无情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时诞生，也可以说是以作为它的对立面的方式同时诞生的。这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相互对立的社会产物而各自发展，资产阶级想方设法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无产阶级则竭尽全力去消灭这个制度⁸⁸。

继古代的奴隶主与奴隶的斗争、中世纪的贵族与农奴的斗争⁸⁹之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随着无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它所受剥削的日趋严重以及它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是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对立的这种情况，而日益尖锐起来⁹⁰。

即使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本身也在产生着所有制与生产、

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

- 88 参阅同上书，第68页：“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其对立的阶级。”

参阅同上书，第77—78页：“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必然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是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

- 89 参阅同上书，第507页。

- 90 参阅同上书，第75页：“因此，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总和，这种生产力好象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说来它们已经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成为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它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

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日益严重的对立，从而社会也就越来越明显地分成两个大的阶级：占有一切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被剥夺了一切财富的无产阶级⁹¹。

为了生活，只拥有自己的劳动的无产者不得不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这就使他自己降格为商品并屈从于商品的生产 and 出售所规定的法则。这样，他就只能忍受资本家的无情剥削和残酷压迫。他的境况由于以下情形就更加恶劣了：劳动对他来说已不是自由的、有成果的、作为人来进行的那种活动，而是一种强加于他的劳动、一种奴隶的劳动，这种劳动使得他越是生产便越是受到摧残，而且，越来越细的分工使他无可避免地去从事一种消耗体力和不道德的苦工⁹²。

无产者所忍受的压迫好象跟这样的事实相矛盾，即他不同于奴隶或农奴，从表面上看是能够自由地处理自己的工作。其实不然，他紧密地屈从于资本的势力，以致于他的境况实际上跟奴隶或农奴的境况很少有所区别。特别沉重地压在无产者肩上的这

91 参阅同上书，第74—75页：“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

92 参阅同上书，第75页：“他们同生产力和自身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它只是用摧残生命的东西来维持他们的生命。”

参阅同上书，第87页：“相反地，对于无产者说来，他们自身的生存条件、劳动，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是一种偶然的東西，它是单个的无产者无法加以控制的。……单个无产者的个性和强加于他的生存条件即劳动之间的矛盾，现在无产者自己已经意识到了，特别是因为他从早年起就成了牺牲品，因为他在本阶级的范围内没有机会获得使他转为另一个阶级的各种条件。”

种劳役，由于社会关系的物化，到头来也扩展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切个体人的头上⁹³。

无产者所忍受的贫困越来越促使他们走向暴乱，这样，就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不断激化。资产阶级为了防范无产阶级，更一般地说，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它就借助于国家权力；而国家由于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公债，就用自己的军队、法庭和警察为资产阶级效劳⁹⁴。

资产阶级通过对于国家的控制，能够在受到国家保护的普遍利益的形式下大大扩展自己的阶级利益。由此也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任何一个阶级想要成为统治阶级，必需夺取政权，就是说，必需夺取国家政权⁹⁵。

资产阶级在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之外，还从政治经济学给它带来的支持方面得到好处。这些支持者尽力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当性，把它说成是一种既合理又必需的制度。为说明这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从这一原则出发的，即作为这个制度的基础的利润和竞争乃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不可缺少的动力。

在功利论中我们可以找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主要论证。这个

93 参阅同上书，第86页：“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个人似乎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

94 参阅同上书，第418页：“随着资产阶级财产的发展与积累，即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个人越来越富，而国家则弄得到处负债……因此我们才看到，一旦资产阶级积累了钱，国家就不得不向他们乞求，最后则干脆被他们收买去了。”
参阅同上书，第70页：“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由于捐税逐渐被私有者所操纵，并由于借国债而完全为他们所控制；这种国家的命运既受到交易所中国家债券行市涨落的调节，所以它完全取决于私有者即资产阶级提供给它的商业信贷。”

95 参阅同上书，第38页。

学说最初是在英国被霍布斯和洛克发展起来的，那时，在这个国家里爆发了好几次革命，使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霍布斯的、特别是洛克的学说，反映了工场手工业、海上贸易、殖民化、以及有利于创立银行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流动资本的发展的高度水平⁹⁶。

功利论在法国则是被一些重农主义者发展起来的。在法国，经济的发展不如英国先进，农业在很大程度上还占统治地位，封建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因此重农主义者在思想上仍然是事物现状的俘虏。他们认为农业才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才是在决定社会关系上起着首要作用的因素⁹⁷。

功利论在法国也同样被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所发展，不过是在另一方面。霍布斯和洛克的学说是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着的，而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则与之分开，从而赋予他们的学说以一种哲学性质。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本来是对于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特点的理论性概括的东西，而在作为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言人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那里，却变成了与普遍利益混为一谈的纯粹个人利益的体系⁹⁸。

96 参阅同上书，第482页。

97 参阅同上书，第483页。

98 参阅同上书，第482页：“在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面前，不仅已经出现了英国的理论以及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已有的发展，而且还出现了正为自己自由发展而斗争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18世纪的特征的商业精神特别是在法国以投机的形式笼罩了一切阶级。当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以及因此发生的关于课税的辩论遍及整个法国。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巴黎是18世纪唯一的世界城市，是各国人物在此进行个人交往的唯一城市。所有这些前提，再加上法国人一般所具有的比较通达的特征，使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理论带有独特的无所不包的色彩，但同时使它失去了我们还可以在英国人那里找到的实证的经济内容。在英国人那里，理论是单纯地肯定事实，可是在法国人那里，却变成了哲学体系。”

功利论作为替资本主义制度辩解的学说，在英国的葛德文、边沁和斯图尔特·弥尔那里找到了最完美的形式。那时候，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已完全稳定下来了。他们主张竞争和利润是普遍利益的必要基础、认为就是这些东西创造了尽可能美好的社会关系，这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是使功利论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纯粹的辩护⁹⁹。

但是，资本主义由于种种危机和它引起的阶级斗争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变得越难为资本主义辩解并保卫自己的阶级特权¹⁰⁰。

实际上，资产阶级对于自己阶级特权的保卫已遇到无产阶级的抵抗。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集中于大城市，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不断地尖锐化。由于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在大工业中特别明显，因此在工业工人中，无产阶级的战斗的革命精神就特别得到发展，矿工差些，农业工人更要差些，由此，工业发展不仅起着经济作用，而且也起着社会和政治作用。

无产阶级只有从资产阶级设法使它扭转斗争方向的幻想和欺罔中完全解脱出来，并且在斗争中只受自己本阶级的利益引导的情况下，它的革命行动才能有成功的机会。

⁹⁹ 参阅同上书，第483页。

¹⁰⁰ 参阅同上书，第331页：“当前社会的交往形式以及统治阶级的条件同走在前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大，由此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愈大，那末当初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当然也就愈不真实，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了；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在这些观念中，现实的个人利益往往被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但是，这些东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们对意识本身的作用愈小，那末它们对自身的捍卫也就愈坚决，而这个标准社会的语言也就愈加虚伪，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

这个斗争的目的，只能是通过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只有把这个制度以及它所产生的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统统消灭，无产阶级才能从剥削和奴役中解放出来¹⁰¹。

无产阶级有责任完成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革命任务，不仅因为它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不得不同这个制度进行斗争，而且因为，由于资本主义的种种缺陷，资产阶级应该放弃迄今它在世界各地所扮演的统治者的角色。

共产主义革命同迄今发生的种种社会革命有着根本的区别。事实上，这些社会革命并不主张废除私有制，而是主张改变现存社会关系并使另一阶级来取代当前的领导阶级。这些社会革命是处在生产还很有限、从而还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条件下的产物，因此，这些社会革命的倡导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尽量满足特权阶级的需要，而完全不顾及其它阶级，特别是一直受到残酷剥削的工人阶级¹⁰²。

共产主义革命由于以下的事实而变得比较容易了，即一些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由于受到一些最先进的国家如英国的竞争而不得不发展自己的生产力，其结果就

101 参阅同上书，第87页：“而无产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迄今都表现为某种整体）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

102 参阅同上书，第78页：“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的锋芒都是指向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

是在这些国家中形成了革命的无产阶级¹⁰³。

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首要条件，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发展允许无产者占有已达到发展的最高水平的全部生产力，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而遍及各个地方，从而给予共产主义以一种与资本主义曾取得的相应的普遍的性质。

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还没有发展到竞争已成为多余的那种程度，那么，要想用共产主义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就是承担了一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如果共产主义革命居然在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完全发展之前爆发，那么，它也不过只能具有一种地方的、有限的性质，并且无可避免地注定要失败的。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仍然在发展，既然资本主义国家在竞争中战胜了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后者就可能仍沉浸在贫困之中，其结果可能就是共产主义的消灭，事物仍然回到原来的老样子¹⁰⁴。

103 参阅同上书，第59页。

104 参阅同上书，第39—40页：“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

由此可见，人们是不能依照自己的意愿来调整历史的进程的。事实上，历史的进程既不以资产阶级要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以无产阶级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共产主义制度要取代资本主义制度，那就必须要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在必要的条件还没有具备以前，凭着一种革命意志就能创造出新的社会秩序的想法，纯属空想。共产主义者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要认为共产主义是历史注定要达到的目标，而他们自己则是注定要使之实现的人物；他们应当认识到，共产主义既不是一种理想也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象在它之前的那个资本主义一样，乃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¹⁰⁵。

共产主义革命既然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因此，它不仅要完全改变经济和社会关系，而且也要改变政治关系，因为它必需夺取国家政权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不同于以往的任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将完全消除建立在私有制上面的生产方式和把社会分成对立阶级的社会划分，并

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能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105 参阅同上书，第40页：“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参阅同上书，第79页：“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把过去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作无机的条件，然而他们并不以为，给他们提供资料是过去世世代代的意向和使命，也不认为这些条件对于创造它们的个人说来是无机的。”

因此彻底地改变每个个人的生活条件。

在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之后，共产主义社会将形成一种个人活动及其历史自行发展的局面。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将不再有阶级统治，从而也就不再有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对立；这就使得一种新型的社会可以实现，在这社会中，人将不再受物的世界的统治而是将统治它¹⁰⁶。

在私有制统治下，个人的活动由于生产力的不足、分工和领导阶级的统治而受到限制，而共产主义革命则与直到如今在私有制下所发生的事情相反，它容许每个个人通过对于达到最高发展水平的生产力总和的利用而能够得到完全的和谐的发展。这样，每个个人的生存就溶合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体中；直到如今一直受到限制的社会关系将取得一种普遍的性质，而个人本身也将成为普遍的人¹⁰⁷。因此，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为了

106 参阅同上书，第84页：“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107 参阅同上书，第76—77页：“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局限性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只是这种有限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所有的生产工具。在过去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现

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解放无产阶级，而且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由于人的活动取得了一种普遍性质，这个新的社会秩序就能够允许所有的人得到充分的发展¹⁰⁸。

跟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状况一样，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说在一定时代中的它的观念的总和，也是由生产力、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决定的。人的精神生活也正如他的物质生活那样，乃是他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活动的产物。作为抽象的存在，人实际上并不能产生他的意识和思维，而是作为被生产活动所决定了的个人，他才能产生意识和思维¹⁰⁹。

因此，我们不能把意识和思维同社会生活分割开来，意识和

代的普遍交往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途径受一个个人支配，只有通过受全部个人支配的途径。……

“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得到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所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

“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

¹⁰⁸ 参阅同上书，第78页：“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

¹⁰⁹ 参阅同上书，第29—30页：“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同人们的物质活动，同人们的物质交往，同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

思维乃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法、道德、哲学、宗教并不是意识之绝对的、自己构成的形式,而是经济状况、社会状况之精神产物,并随同它们一起变化¹¹⁰。思维同社会的密切联系已经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思维以语言为必要的条件,而语言则产生于人与人进行交往的需要¹¹¹。人由于有意识和思维而不同于动物,后者既没有清醒的意识,也没有象人一样的思维,因为它们既没有社会生活也没有社会关系¹¹²。

意识最初表示人同自然以及同其他人的直接而原始的关系。只要自然还没有根本上被人的生产活动所改变,它就是以它的原始而直接的形式显示给人,犹如一种异己的因素和一种强大的势力一样。自然宗教就是从人与自然的原始关系以及他在面临自然

他们的关系就象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来自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110 参阅同上书,第30页:“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111 参阅同上书,第34页:“‘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112 参阅同上书,第34页:“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

时所采取的态度中产生的¹¹³。

在人类发展的初期，那时人们刚刚开始意识到有彼此互助合作的需要，而他们之间以及同自然的关系还只是具有有一种原始性质的时候，意识也还是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这是一种畜群的、原始的意识，由于它不象本能那样毫无意识性，因此它有别于动物的本能¹¹⁴。

随着生产的增加，以及随之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带来区分的分工，我们看到意识和思维也在不断发展，它们总是同社会关系紧密相连并随之变化的¹¹⁵。因此，在一切形式下的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法等等，也就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这说明何以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总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¹¹⁶。

¹¹³ 参阅同上书，第35页：“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特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

¹¹⁴ 参阅同上书，第34—35页：“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

“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这是纯粹畜群的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

¹¹⁵ 参阅同上书，第35页：“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前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的、或部落的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¹¹⁶ 参阅同上书，第52页：“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一切上升的或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都以普遍原则之名竭力论证和实现它们的阶级利益；在把这些原则同决定它们的社会关系分割开来的时候，那就可以很容易地赋予这些原则以一种绝对价值，把它们改变成观念本身，改变成为一些概念，把真实关系予以颠倒从而把这些原则看成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¹¹⁷。

作为意识形态（取这个词的最坏的意义）之标志的这种建立在存在与意识之间的真实关系的颠倒，系起源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的激化：这个分工产生了这样一类人，即思想家，他们只从事于脑力劳动，其任务即是思维。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由不同的个人所分担，这一事实就在物质的社会现实与社会意识之

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117 参阅同上书，第53—54页：“然而，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间产生分歧，在一些思想家那里，这个分歧指的就是他们在存在与精神之间所建立的对立。从这里也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他们竟至认为思维本身代表着某种本质的东西，它可以独立于社会交往而自由发展¹¹⁸。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对现实作了歪曲反映的意识形态向前发展着。由于一些思想家把存在和意识割裂开，使它们对立起来，因此这就导致他们相信并非存在决定意识，而是相反，是意识决定存在。这样，意识对于他们便成了某种抽象的东西，某种与对于真实生活的意识有别的东西，而精神也就成了独立于物质现实的一种因素，一种高于现实的力量。在一些意识形态学家那里，从精神和精神活动如此取得的绝对性质中，就产生了这样的观念：精神是构成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历史不过是观念的一种更替和斗争罢了¹¹⁹。

意识形态学家们，特别是思辨的哲学家们，从对于历史的这种唯心主义的理解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可以仅仅通过精神的作用，通过对于观念和制度的批判的途径来规定历史的进程。对于观念的这种决定性作用，不仅哲学家们坚信不疑，就是所有那些由于自己的社会活动导致他们赋予某些观念或制度以绝对价值的

118 参阅同上书，第35—36页：“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像：它是同对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不想像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像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上述三个因素——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

119 参阅同上书，第199页。

人如法学家和政治家们，也都同样相信。一旦把法和国家同决定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割裂开，法学家和政治家们就会趋向于一种具有正当意志的绝对的法和绝对的国家想法¹²⁰。一切意识形态，就是说一切离开实践的理论，它们的无益的空谈正是从这些东西中推论出来的。从社会关系的一些特殊形式比如国家和法的变化中，就产生了种种类似于由宗教所产生的异化。与社会关系隔绝，这些观念实际上对于人们就象是一些异己的势力，它们统治人们并成了象神一样的崇拜的对象。正如宗教的异化那样，这些异化只有通过消除那些使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消灭掉¹²¹。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于人类历史的总的轮廓的批判分析，完成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制定工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正是根据这些基本原理对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和空想主义进行了论战，在结束对思辨哲学的批判之后，又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形式下，对空想主义展开了斗争。

对德国思辨哲学的批判

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

在深度和广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都有了进一步理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可以最终对德国思辨哲学作一番清算了，从更普

120 参阅同上书，第378页。

121 参阅同上书，第54—55页：“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那种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的必要性消失了，那末，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种假象当然也就会完全自行消失。”

遍的意义上说，对唯心主义作一番清算了。这件工作，在《神圣家族》中，他们通过对作为批判的批判的首倡者布鲁诺和爱德华·鲍威尔的论战，是已经开始做了的，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则通过对布鲁诺·鲍威尔、特别是对麦克斯·施蒂纳的联合的批判，来完成这件工作。

他们的批判占这本书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为了几本作为他们论战对象的早已或多或少失去其现实性的著作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不过，这说明他们对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估计是很高的，这也说明他们对进行这次论战有着个人的兴趣，因为这个论战，使他们可以清算一下自己的过去，特别是因为这个论战给他们提供了证实他们自己思想的正确性的机会，他们对思辨哲学的每一个唯心主义的主题都用一个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据的主题去加以反对。

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对德国唯心主义以及成为唯心主义之顶峰的思辨哲学通过种种历史的原因去说明。德国唯心主义乃是从中世纪末以来德国经济和社会状况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在曾经给德国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工商业日趋衰败的同时，农业则由于封建的社会关系的统治处于停滞状态。诚然，在德国，一如在西欧所有的国家那样，封建组织逐步在瓦解，但是比起在英国和法国的情况来，这种瓦解的步伐要缓慢得多¹²²。

象在所有封建国家中那样，在德国由于高傲的贵族表示顺从，也建立了专制的君主政体。但是，在英国和法国，君主们成功地统治了一切地方并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而德国的皇帝们，

¹²² 参阅同上书，第212页。关于德国状况，参阅恩格斯的文章，载本卷第2章，第150页及以下诸页。

没有能力使大臣们服从于自己的权威，因此眼巴巴地看着在自己面前起来各自为政的，不仅是一些邦的强有力的领袖比如普鲁士王，而且还有很多相对独立的小的亲王。

德国的落后状况说明何以专制君主政体在这个国家里成了一种经久不变的国家形式（不同于英国和法国，在那里由于国王们与之发生冲突的资产阶级日益强烈的反对，专制君主政体只不过是一种过渡的国家形式）¹²³，同时也说明何以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贵族、农民和资产阶级有着不同的境况。

贵族们住在乡村，过着一种即使是英国或法国最不讲究的乡绅也不会满足的平淡生活，要不，就是靠着在宫庭或军队中的一个职位给他们提供的微薄的薪俸度日¹²⁴。由于农业凋敝，在乡村既没有有钱有势的农民，也没有革命的农业无产阶级¹²⁵。由于工商业发展迟缓，德国资产阶级不同于英国资产阶级，后者由于开辟了殖民地和统治了世界市场而变成为统治阶级；而且，也不同于法国资产阶级，后者在18世纪末通过革命夺取了政权。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是很缓慢的，直到19世纪中叶，它还是很软弱，以致还不能有力地参与国家事务¹²⁶。

这种软弱无力使它在面对政治问题时采取唯心主义态度。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在德国还没有达到英国和法国那样的程度；在英国和法国，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已在政治领域中表现为成为资产阶级战斗武器的自由主义；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则由于自己的软弱，只能在意识形态方面参与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

123 参阅同上书，第212页。

124 参阅同上书，第211—212页。

125 参阅同上书，第212页。

126 参阅同上书，第211—212页。

和社会斗争,这样,它就把自由主义当作理论而同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所代表的物质利益割裂开来。把自由主义的物质方面的动因,通过移植到意识形态领域中而转变为道德方面的动因,这样,它就认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由法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斗争,不过是为了使一些普遍原则即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取得胜利的斗争。从这里就产生了它的那种对于政治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的大大不同于英法资产阶级的态度,也正是从这里产生了它对法国大革命的仇视。起初,对于法国革命,它曾抱同情态度,以致认为是一种争取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斗争,可是当革命为了自卫必须采取恐怖手段时,它却责难革命了¹²⁷。

在拿破仑统治下,德国资产阶级想的主要是如何忙于自己的私人琐事。他们抱怨咖啡短缺,咒骂征兵等等,可是没有看到拿破仑由于摧毁了日尔曼神圣罗马帝国和传播了革命的思想 and 出版物,从而为近代德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相反,他们却毫无保留地赞美英国;其实,英国只是一心想着如何对德国进行剥削,勾结德国的王公,而后者不过是被英国用金钱收买的人而已。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懂得在解放战争时期那些意识形态论者即教授和大学生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如何地重要了¹²⁸。即使在1830年的革命以后,当自由主义在欧洲到处都深深扎下了根的时候,由于德国的经济和社会落后,德国的资产阶级还在坚持相信自由主义不过是为取得原则胜利的斗争,这就说明他们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是很少成功的。只是在德国为了抵抗英国的竞争并

127 参阅同上书,第213页。

128 参阅同上书,第213页。

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促进自己工商业的发展而创立了关税联盟以后，德国的资产阶级才开始拿出最大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¹²⁹。也仅仅在1840年以后，由于德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德国资产阶级才证明自己是能够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他们成了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要求保护关税，在所有各邦中建立自由主义的宪法，从而使他们差不多接近了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所曾达到的水平¹³⁰。

1. 布鲁诺·鲍威尔

德国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倾向在一些进步的思想家那里得到了表现。这些进步的思想家把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移植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去，一致认为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学说，是同作为自由主义的基础的物质利益割裂开来的。这种情况在康德那里尤其如此；在实践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就把法国大革命的一些原则改变成为道德观念，并在自由的概念上建立了他的道德学。正如德国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软弱无力只能怀有一些独立的意向那样，对独立有所感悟的康德则把法国资产阶级的行动的物质动机弄成为一整套为自由意志、为意志自身所支配的动力，这样，就把这些动机改变成为纯粹观念¹³¹。

129 参阅同上书，第213—214页。

130 参阅同上书，第214页。

131 参阅同上书，第211—213页：“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经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跃居统治地位，并且夺得了欧洲大陆；当时，政治上已经获得解放的英国资产阶级使工业发生了革命并在政治上控制了印度，在商业上控制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但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有‘善良意志’，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

这种唯心主义思想后来被德国思辨哲学家们特别是被黑格尔所采纳，后者把绝对精神当成了历史的决定性因素¹³²。他同意这种思想，而且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他都把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同在确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接受这些观念的统治阶级分割开来，这就使他能够赋予这些观念以一种绝对性，并用这些观念作为世界精神发展的表现¹³³。观念构成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思想引导他在观念之间建立一种连续不断的联系，使他对于绝对观念的规定性创造出一些特殊的观念，并且还肯定历史事件的发展是同概念的发展融和一致的¹³⁴。

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

“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132 参阅同上书，第16页：“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他不仅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历史也变成了思想的历史。他并不满足于记录思想中的东西，他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的活动。”

133 参阅同上书，第54—55页。

134 参阅同上书，第55页：“这样，根据历史材料来证明精神的最高统治（施蒂纳的教阶制）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

第一，必须把统治的个人——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根据、在经验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和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第二，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承继着另一个的统治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达到这一点的办法是：把这些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思想由于它们都有经验的基础而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

以上这些构成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础¹³⁵，这个观点，他最初概括地在《精神现象学》中后来又详细地在《历史哲学》中作了阐述。在《精神现象学》中，他把作为主体的人归结为自我意识，把世界作为自我意识的对象，并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精神对世界所不断采取的态度。精神演变到最后也就转变为它所构成的意识，在它自身中包容着世界的本质，这样，它就变成了既是主体又是客体¹³⁶。

在《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详尽地阐述了他对世界的总的看法，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一种概念的连续¹³⁷。

黑格尔根据大量事实来阐明他的哲学，因此，他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给予人以这样的假象：他对世界的思辨的看法是同世界的真实发展符合的¹³⁸。

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被他的继承者们——青年黑格尔派发展到了顶点。青年黑格尔运动产生于黑格尔体系的腐朽和解体¹³⁹。青

起的，还因为它们既被仅仅当作思想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区别，变成由思维产生的区别)”。

135 参阅同上书，第55页：“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的结尾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第446页)”。

136 参阅同上书，第163页：“在《现象学》这本黑格尔的圣经中，在‘圣书’中，个人首先转变为‘意识’，而世界转变为‘对象’，因此生活和历史的全部多样性都归结为‘意识’对‘对象’的各种关系。”

137 参阅同上书，第44—45页：“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在德国历史编纂学看来，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

138 参阅同上书，第190页：“如果人们要象黑格尔那样第一次为全部历史和现代世界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那末没有广泛的实证知识，没有对经验历史的探究(哪怕是一些片断的探究)，没有巨大的精力和远见，是不可能的。”

139 参阅同上书，第19—20页：“我们碰到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当它的生命的最后一个火星熄灭时，这个 *caput mortuum* 的

年黑格尔派的每一个哲学家——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都从这个体系中借用其中的一个因素，把它同其他因素分割开来，以便用来作为他自己的哲学的原则。

在黑格尔那里，精神与物质是在作为主体-客体来理解的观念中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而青年黑格尔派则把在自我意识的形式下去理解的精神同作为实体去看待的物质分割开来，用其中的一个因素去反对另一个并对之加以系统的发展。施特劳斯对于实体就是这样做的，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对于自我意识也是这样做的。其结果，黑格尔的哲学或是被改变成一种建立在实体上的体系，象在施特劳斯那里那样，从而辩证法不见了；或是被改变成一种归结为自我意识之辩证发展的体系，象在布·鲍威尔和施蒂纳那里那样，排除了一切真实内容，排除了一切实体。

尽管这些哲学家自吹超越了黑格尔，可是由于他们不能从思辨中解脱出来，因此对黑格尔也好，对他们自己的观点也好，都不能采取批判态度，也许只有这一点使他们超越了黑格尔哲学¹⁴⁰。

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化合，构成新的物质。那些靠哲学过活，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的人们，现在都在贪婪地攫取这种新的化合物。每个人都热心兜售他所得到的那一份。”

参阅同上书，第21页：“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互相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

140 参阅同上书，第21页：“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它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出了黑格尔哲学。”

布·鲍威尔和施蒂纳，这些自我意识的哲学家们，还夸大了黑格尔学说中思辨的那一方面，把在黑格尔哲学中紧密地联系着的意识和实体分割开来，就象费希特那样，经常地用意识去反对实体，用精神去反对世界。这样，他们就把自我意识弄成为一种实在、一种抽象，把历史弄成为是它的创造：他们在把与世界对立的自我意识予以主体化的同时，使它体现在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一些哲学家的身上，并且完全顶替了绝对理念，赋予他们以决定历史进程的使命¹⁴¹。

这样一来，历史，在黑格尔那里还不过是绝对观念之客观的辩证发展的结果，而到了青年黑格尔派那里，却变成了自我意识之自我规定的产物，因此也就比在黑格尔那里更具有一种目的论的性质。历史本来不过是由各个世代之依次交替构成的，每一代都在继续完成前一代的成就，给它赋予一种新的性质，可是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历史却变成了一种预先确定的时代的连续，每一个新的时代都是目的，而以前的时代不过是为实现这个目的做准备¹⁴²。

141 参阅同上书，第56页：“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的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思想家，而这些人又被规定为历史的创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于是就可以放心地解开缰绳，让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

142 参阅同上书，第51页：“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然而，事情被思辨地颠倒成这样：好象后一个时期历史乃是前一个时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象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引起法国革命。因此，历史便具有其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并列的人物’（如象‘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其实，以往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

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孤立于世界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并赋予历史以目的论的性质，说明了这些哲学家是以极其专断的方式研究历史的，这种方式，说明他们既是反对黑格尔，而对历史的事实也是全然无知的¹⁴³。

由于这些哲学家对于人不是从他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方面予以观察，而是几乎完全从他的精神活动这方面去加以观察，因此他们把人归结为一种抽象，归结为自我意识，象布鲁诺·鲍威尔所做的那样，或者，把人归结为我，象施蒂纳所做的那样，这就说明了他们的思辨的形而上学性，他们的思辨不过是引向纯粹浮夸的一种玩弄抽象的把戏¹⁴⁴。

143 参阅同上书，第131—132页：“思辨的观念、抽象的观点变成了历史的动力，因此历史也就变成了单纯的哲学史。然而，就是这种哲学史也不是根据现有材料所载的真实面貌来理解的，至于它如何在现实的历史关系的影响下发展，则更不用说了；它被理解成现代德国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理解和阐述的那样。……这样，历史便成为单纯的先入之见的历史，成为关于精神和怪影的神话，而构成这些神话的基础的真实的经验的历史，却仅仅被利用来赋予这些怪影以形体，从中借用一些必要的名称来把这些怪影装点得仿佛真有实在性似的。”

144 参阅同上书，第77页：“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

参阅同上书，第200页：“在思想家们假定观念和思想支配着迄今的历史，假定这些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就是迄今存在的唯一的历史之后，在他们设想现实的关系要顺应人自身及其观念的关系，亦即顺应逻辑规定之后，在他们根本把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的历史变为人们的现实历史的基础之后，——在这一切之后，把意识、观念、圣物、固定观念的历史称为‘人’的历史并用这种历史来偷换现实的历史，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这些后继者们的唯一贡献，是他们对于某些宗教观点的批判以及部分地关于基督教来源的历史性探讨¹⁴⁵。他们从黑格尔那里窃取了基督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一信念，但与黑格尔相反，认为这个作用并不曾是有利的，而是不幸的，因为它曾构成精神的自由发展的一个障碍¹⁴⁶。

在他们看来，基督教的影响在近代史中是起过决定性作用的，他们认为意识、政治、社会和道德观念的一切现实的表现都具有宗教的性质；他们对于这些事物的批判也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这样，在他们那里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就都只是一些教义和对于教义的批判¹⁴⁷。因为人们的态度和行动在他们看来是清一色地受意识支配的，他们于是要求人们摆脱自己的虚假观念，摆脱自己的宗教幻影，因此他们的批判就只限于对虚假观念和幻影的

145 参阅同上书，第22页。

146 参阅同上书，第22页：“老年黑格尔派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归入某种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就明白易懂了。青年黑格尔派则批判一切，到处用宗教的观念来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加以反对，而另一派则认为合法的而加以赞扬。”

147 参阅同上书，第21—22页：“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至于什么是宗教意识，什么是宗教观念，后来下的定义各有不同。整个的进步在于：想象中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以及其他的观念也被归入宗教观念或神学观念的领域；还在于：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意识被宣布为宗教的或神学的意识，而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人，总而言之‘一般人’，则被宣布为宗教的人。宗教的统治被当成了前提。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都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转化为迷信——对法的迷信，对国家的迷信等等。到处出现的都只是教义和对教义的信仰。世界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被圣化了，直到最后可尊敬的圣麦克斯 en bloc [完全地，彻头彻尾地]把它宣布为圣物，从而一劳永逸地把它葬送为止。”

批判¹⁴⁸。

他们同黑格尔一样，认为精神决定历史的进程，认为通过对虚假观念的批判，人们意识的转变必然要带来社会和国家的转变。从这里就产生了他们这样的信念：为了改变世界，他们的批判比迄今任何革命都要重要得多，他们是现代的真正英雄，他们的战斗将提供一种无与伦比的利益。同时，也就产生了这些醉心于自己学说的价值和空前勇敢的空谈家们对于别的思想家和别的民族的蔑视¹⁴⁹。

他们在狂妄的自负中，自以为一切历史的目的都是在迎接他们思辨的胜利，而事实却是，他们在思想和历史领域中引起的所谓革命，不过局限于一些从黑格尔哲学发霉的垃圾中产生的琐碎可怜的争论而已。

¹⁴⁸ 参阅同上书，第15页：“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一个人说，只要我们教会他们如何用符合人的本质的思想来代替这些幻想，另一个人说，只要我们教会他们如何批判地对待这些幻想，还有个人说，只要我们教会他们如何从头脑里抛掉这些幻想，这样……当前的现实就会崩溃。”

参阅同上书，第22页：“既然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观念、思想、概念，即被他们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是人们的真正枷锁，就象老年黑格尔派把它们看作是人类社会的真正羁绊一样，所以不言而喻，青年黑格尔派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既然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幻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所以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他们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

¹⁴⁹ 参阅同上书，第18—19页。

尽管夸耀自己如何革命，实际上他们却是根深蒂固的保守分子。在他们想用人的王国来取代神的王国的尝试中，他们采取的也还是神学家的那一套；他们只是用一些抽象，比如不过是神的代用品的自我意识或我这类东西，来代替真实的人，或是用这些抽象的、其本身只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拙劣摹拟的活动，来代替人的活动。由于他们的批判只是虚幻地消灭了人所忍受的种种异化，因此这些批判只不过是对现存事物的状况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而对这种状况并没有加以丝毫改变¹⁵⁰。

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通过他们那纯属浮夸之谈的学说反映了德国的落后而悲惨的状况。正如德国人民由于自己可悲的生活条件曾求援于宗教，以便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一样，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也求援于种种宗教的代替物，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能丝毫改变现存事物的状况。黑格尔的后继者们的这一整套理论，只要使它得以产生的那种情况一改变，它就会土崩瓦解¹⁵¹。

150 参阅同上书，第22页：“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说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末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

151 参阅同上书，第45页：“整个这样的历史观及其解体和由此而产生的怀疑与动摇，仅仅是德国人的民族事情，而且对德国说来也只有地方性的意义……通常这些德国人总是只关心把既有的一切无稽之谈变为某种别的胡说八道，就是说，他们以为，所有这些无稽之谈都具有某种需要揭示的特殊意义，其实全部问题在于从现存的实际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正如上面所说的，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中，他们批判的重点是麦克斯·施蒂纳，而不是布鲁诺·鲍威尔；因为，可以这样说，在《神圣家族》中他们对布鲁诺·鲍威尔已做过清算了；现在来对付鲍威尔，不过是在后卫战中对付一个奄奄一息的敌人。事实上，鲍威尔为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所写的那篇题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特点》的文章，就是如此软弱无力的，以致它充分证明了在《神圣家族》中对他所作的那个严厉的判断的正确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对布·鲍威尔的批判是在《神圣家族》之后在关于布·鲍威尔的一次公开论战中写下的，所以他们的批判就不再涉及《批判的批判》，而是指向他们老早就想予以详尽批驳的这篇文章了¹⁵²。由于他们那主要是涉及由布鲁诺·鲍威尔所挑起的反对其对手的论战的一些说明只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在这里没有必要予以介绍，我们将只对有助于补充他们对布·鲍威尔和思辨哲学的总的批判的一些方面，加以阐述。

布鲁诺·鲍威尔由于从黑格尔那里窃取了人与世界都是属于精神本质的这个概念，他就是在唯心主义和思辨的道路上更前进了一步。他赋予自我意识以一种绝对性和主观性，把它同经济和

152 关于这次论战，可参阅(G.尤利乌斯)，《布鲁诺·鲍威尔或神学的人道主义的现实的发展、批判与特点》，载《维干德季刊》，莱比锡，1845年，第3卷，第52—87页。

《上西里西亚的通信》，T. O.，《特利尔日报》，1846年，第87号。

[E.冯·威斯特伐伦]，(E. von Westphalen)，《布鲁诺·鲍威尔及其辩护者》，载《社会明镜》，1846年，第7号。

Th. 欧庇茨 (Th. Opitz)，《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对手》，布莱斯劳版，1846年。

社会关系分割开来。在他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同时，又把世界说成是实体的观念¹⁵³。黑格尔对于精神和世界是从它们的有机发展和它们的统一这方面去理解的，而他却不是这样，他是把它们彼此孤立起来，用自我意识去与实体对立¹⁵⁴。

布鲁诺·鲍威尔正是在自我意识和实体这两个他可以任意玩弄戏法的抽象上面，建立了他的体系¹⁵⁵。他看不到他在自我意识和实体之间建立的对立事实上是由黑格尔哲学的解体所决定的，这个解体的后果则是精神与世界的分离；另外，布鲁诺·鲍威尔还认为这种对立乃是近代的基本事实，是最重要的课题¹⁵⁶。

他是这样想的：人类的历史将要按照是自我意识还是实体占优势而采取一种全然不同的进程。事实上，历史的合理的进程是不能从自我意识的自由发展得到保证的，它的自由发展，就象费希特的我的情况那样，是通过同实体的一种经常的对立来实现的，

153 参阅同上书，第93页：“一方面，现实的人以及他们对于从外表上看是独立在外而和他们对立的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意识都非实有，实有的只是自我意识这种赤裸裸的抽象词句，正如现实的生产都非实有，实有的只是这种自我意识的已经独立化的活动一样；另一方面，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都非实有，实有的只是这些关系的一切哲学范畴或名称归结而成的赤裸裸的哲学词句，即实体；因为布鲁诺同所有哲学家和思想家一起，错误地把思想、观念、现存世界在思想上的独立化了的的表现当作这个现存世界的基础。”

154 参阅同上书，第92页。

155 参阅同上书，第93页：“不言而喻，用这两个已变得毫无意义和毫无内容的抽象，他就能够变各式各样的戏法，而对现实的人及其各种关系则一无所知。”

156 参阅同上书，第92—93页：“圣布鲁诺的特别处是他和《神圣家族》的作者不同，他认为自我意识对实体的关系问题并不是‘黑格尔思辨范围之内’的争论问题，而是世界历史的问题，甚至是绝对的问题。这是圣布鲁诺能够借以道出当代冲突的唯一形式。”

在鲍威尔那里，世界却归结为实体。

对于他，正象对于所有的唯心主义者那样，历史是被它所要实现的目的来决定的，而且，也象在这个时代的思辨哲学家那里一样，历史是从神的王国向人的王国的转变¹⁵⁷。这种转变，只有在自我意识从实体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才能得到实现，因为实体的统治产生了种种虚假的观念和阻碍自我意识自由发展的制度（如宗教、国家）。

这种自我意识异化的学说反映在宗教中，就是那些奴役人们的怪影、固定观念的诞生；这个学说，不过是对于存在于一个确定的社会状况和将超过这种状况的历史发展之间的对立以及对于这个对立所带来的种种后果的一种唯心主义解释¹⁵⁸。

布鲁诺·鲍威尔把历史归结为自我意识与实体之间的斗争，就是说，归结为概念之间的斗争，这样，现实的冲突在他那里也就归结为观念的冲突，这些冲突通过精神的途径是可以得到解决的¹⁵⁹；因此他认为在历史发展中批判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绝对的批判、在批判的批判的形式之下所理解的批判，在他那里就变成

¹⁵⁷ 参阅同上书，第 424 页。

¹⁵⁸ 参阅同上书，第 16 页：“所有的德国哲学批判家们都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统治和决定着人们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今日，但今后不应继续存在。他们彼此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想用不同的方法来拯救他们所谓在自己的固定思想的威力下呻吟的人类；他们彼此不同的地方取决于他们究竟把什么东西宣布为固定思想。他们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相信这种思想的统治；他们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相信他们的批判思想的活动应当使现存的东西遭到毁灭。”

参阅同上书，第 95 页：“我们只是搜集一些句子，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如何迷信哲学家的威力，如何赞同他们的幻想：改变了的意识、对现存诸关系的稍新的解释，能够把整个现存世界翻转过来。”

¹⁵⁹ 参阅同上书，第 106 页。

了自我意识的工具，而历史则不过是一些由批判的批判所领导的战役。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已详细地分析了由《批判的批判》所引起的争论，因此在这里他们只限于着重说明其中的一些重要之点。

《批判的批判》所倡导的斗争是虚幻的，因为它同人的真实的解放毫无共同之处，人的解放只能是社会革命的产物¹⁶⁰；同时，它又具有一种反动性质，因为这个斗争不是指向普鲁士国家，不是指向专制君主政体和封建制度，而是指向被布鲁诺·鲍威尔所轻蔑地称为群众的人民。事实上，正是群众和以群众为依靠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被布鲁诺·鲍威尔认为是精神之死敌。

布鲁诺·鲍威尔看不到在自由主义中有着由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阶级斗争的政治表达，认为自由主义不过是一场意识形态运动，是由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家们倡导的论争（它在1843年初宣告结束）。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那是由于它同群众结成了同盟，并从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要求得解放是不能依靠群众的帮助的，而是相反，要对群众作无情的斗争。

对于象布鲁诺·鲍威尔所设想的关于自由主义的那些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使人注意到如下事实：在1843年初销声匿迹了的只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那个玩弄词句的自由主义，而真正的、以资产阶级作为依靠的那个自由主义，却过去不曾而现在也没有中止

160 参阅同上书，第440页：“这是陈旧的幻想：改变现存的关系仅仅取决于人们的善良意志，现存的关系就是一些观念。哲学家们那样当作职业，也就是当作行业来从事的那种与现存关系脱节了的意识的变化，其本身就是现存条件的产物，是和现存条件不可分离的。这种在观念上的超出世界而奋起的情形就是哲学家们面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在思想上的表现。他们的思想上的吹牛每天都被实践所揭穿。”

发展壮大¹⁶¹。至于群众，布鲁诺·鲍威尔把他们说成是进步的障碍，实际上则远不是这样；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形式下的群众，乃是进步的动力。

由于布鲁诺·鲍威尔创立了这样一种学说，即主张给历史固定某种它必须追求的目标，从而他就与那些设想一切历史存在的理由都不过是为他们思辨观点的出现做准备的思想家们，成为一丘之貉。布鲁诺·鲍威尔宣扬批判的批判的至高无上和全能，证实他自己原来不过是一个大言不惭的吹牛专家，而他那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观念的神话的学说，使人再一次看到思辨哲学的空洞无物¹⁶²。

2. 麦克斯·施蒂纳

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相对来说比较简短，那么相反地，对麦克斯·施蒂纳的批判却又太长

161 参阅同上书，第109页：“1842年可算是德国自由主义最光辉的时期，因为当时哲学参与了政治。在批判家看来，随着自由主义理论和激进主义理论的机关刊物《德国年鉴》和《莱茵报》的停刊，自由主义也就销声匿迹了。此后，剩下的似乎仅仅是‘余音’了。其实，只有现在，当德国资产阶级感到因经济关系而引起的对政权的真正要求并力图实现这一要求的时候，自由主义才在德国获得了实际的存在，从而才有某种成功的机会。”

162 参阅同上书，第46—47页：“上述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所具有的纯粹民族的性质还表现在：这些理论家们郑重其事地认为，形形色色的臆造，如‘神人’、‘人’等等，支配着各个历史时代；圣布鲁诺甚至断言：只有‘批判和批判者创造了历史’。……如果我们的理论家们一旦着手探讨真正的历史主题，例如18世纪的历史，那末他们也只是提供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和构成这些观念的基础的事实和实际过程脱离的，而他们阐述这一历史的目的也仅仅是把所考察的时代描绘成一个真正历史时代即1840—1844年德国哲学斗争时代的不完善的预备阶段、尚有局限性的前奏时期。”

了。对麦克斯·施蒂纳的批判大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与施蒂纳本人的著作长短相等；有时在细节方面扯得太远，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自己比施蒂纳高明得多，无情揭穿施蒂纳的全部弱点对他们本人来说乃是最大的乐趣。正如对布鲁诺·鲍威尔那样，我们在下面只提到他们批判的一些要点。他们对麦克斯·施蒂纳的批判使得他们能够通过反对施蒂纳的学说的办法来更恰切地确定和完成他们自己的学说。

自从1844年12月，即是说自从施蒂纳的书一出版，马克思就想写一篇批判施蒂纳的文章，这篇文章本来要在《前进报》上发表，但由于这个报纸的停刊而未能实现¹⁶³。

A) 哲学的唯心主义

在这个批判¹⁶⁴（这个批判事实上是他们在同赫斯的通信中已经开始着手了的那篇批判的继续）中，正如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所做过的那样，他们是从这样的思想为出发点的，即施蒂纳也象费尔巴哈那样，尽管方式有所不同，他的最根本的缺点是不考虑实践的作用，不考虑人的生产活动的作用¹⁶⁵。

施蒂纳也象布鲁诺·鲍威尔一样，从黑格尔那里窃取了意识和

163 参阅马克思致亨·伯恩施太因的信（1844年12月发自巴黎）：“我不能在下星期以前把对施蒂纳的批判寄给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455页。

164 关于施蒂纳的同时代人对他的批判，可参阅W.弗里登堡的《当代哲学中的风尚史大纲》。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载《Die Grenzboten》（《国外消息》），莱比锡，1845年版，第1卷，第239—241页。
载《威斯特伐里亚汽船》，1845年，第335页及以下诸页；第424—426页。
载《文学座谈杂志》，1846年2月3、6日，第142页及以下诸页；第147页及以下诸页。

165 关于施蒂纳学说的概貌，参阅本书第2章。

思维构成人的本质、决定人的生活、从而也决定历史这个观点。其结果，在他那里也象在黑格尔和布鲁诺·鲍威尔那里一样，颠倒了意识和存在之间的真实关系，由于把黑格尔哲学予以彻底的主观化，因此这个颠倒在他那里达到了极点。继布鲁诺·鲍威尔强调作为普遍意识之体现的人格的高尚价值之后，施蒂纳又竭力强调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主观化这一方面，他把人归结为从绝对一致性中去理解的我，并把整个历史归结为我的活动。

施蒂纳和黑格尔相反。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绝对观念的产生过程，他把精神与存在作为主体—客体(主观—客观)统一在历史之中，这就赋予辩证的发展以客观性；而施蒂纳却认为历史是我的活动的产物，这个我就象费希特的我和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那样，通过对世界的经常的对立而自行发展，这就赋予辩证法以主观性。

把人归结为一个绝对的我，把历史归结为这个我的活动，并且使完全脱离了现实世界的辩证法主观化，这样一来，现实世界就变成了一个抽象概念的王国。

施蒂纳不认为人的生活乃是由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辩证发展决定的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相反地却把它归结为孤立于一切现实的我的发展，这样，他就把人与人彼此有所区分的精神与肉体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性质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给抽象化了。

他没有把人作为与自然和社会都有着真实关系的个人去考虑，而是把人作为与自然和社会经常处于对立状态的个人去考虑，因此，他对自然和社会也就都得出一种虚假的观念。事实上，他没有看到他只从其原始状态观察的、以为是一个对人构成经常威胁的种种原始力量之总体的那个自然，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被人的生产活动所改变，人已经越来越紧密地与自然联系在一起¹⁶⁶。另

一方面，他不考虑社会关系——人由于这种社会关系彼此进行交往并彼此互相限定——，而只去考虑竞争所产生的个人之间的对立，因此，他在社会中也只看到把人归结为我的一种威胁¹⁶⁷。

人同自然和社会没有联系，他自己就必然变成一个绝对的我，这个绝对的我自身就构成一个目的，他非难并摒弃所有同他的完整的自治对立的一切。这样一来，利己主义就构成了我的基本特性，构成了我的本质属性。

施蒂纳还用庸俗的利己主义者和为了别人而自我牺牲的个人去同意识到自我的利己主义者相对立¹⁶⁸。象布鲁诺·鲍威尔一样，

166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卷，第202页：“不过，这一次他却转向自然史，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唯一的’自然科学的重要知识；这是因为：在他那里，每逢‘世界’需要起重要作用时，世界立刻就变为自然。‘唯一的’自然科学一开始就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它不是考察由工业和自然科学所决定的人对自然的现实关系，而是宣布人对自然的幻想关系。‘人能够征服的东西多么少啊！他不得不让太阳按照自己的道路运转，让大海掀起自己的波涛，让山峰耸入云霄。’”

167 参阅同上书，第460页：“他们竭力宣扬‘实体’对‘主体’的依赖，并且把支配‘主体’的‘实体’贬低为只不过是这种主体的‘偶性’，这一切实际上是‘空洞的废话’。因此，他们的行动非常慎重，不愿多讲分工，不愿多讲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而个人对一定关系和一定活动方式的依赖恰恰是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决定的。”

参阅同上书，第514—515页：“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但由于他们相互间不是作为纯粹的我，而是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

168 参阅同上书，第269—270页：“正如我们在‘旧约的经济’及其后已经看到的那样，圣桑乔所论述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同庸俗的利己主义者，即‘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混淆起来。相反，无论这后者（事物世界的俘

施蒂纳把一些为数不多的诸如一致性、利己主义、自我牺牲等这些他认为是天生的、他不屑去加以分析的抽象，摆弄一番，就能够象布鲁诺·鲍威尔那样先天地确定人的行为的性质以及历史的发展¹⁶⁹。

在他看来，真实的人就是以利己主义作为原则的人，他把本性不符合这个原则的人同真实的人相对立。这样，人就成了正确或错误原则的体现者，变成了肯定真理者或否定真理者¹⁷⁰。正如人的一些特性在他那里变为一些抽象一样，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也就变成这些抽象的活动的表现。

事实上，与施蒂纳所想的相反，人的特性是社会决定的。一种特性或一种欲望的产生和发展的方式实际上取决于社会关系。如果一个个人在这些关系的影响之下想要不顾其他特性或欲望而

虏、儿童、黑人、古代人等），或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思想世界的俘虏、青年、蒙古人、近代人等）都是他的前提，……因为圣麦克斯想把‘真正的利己主义者’说成是某种全新的东西，说成是过去全部历史的目的，因而他不得不一方面证明自我牺牲者，*dévouement* [自我牺牲的]说教者是被迫的利己主义者；而证明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是自我牺牲的，证明他们不是真正的、神圣的利己主义者。”

¹⁶⁹ 参阅同上书，第295页：“他的一切特性早就是他所特有的，至于它们是从哪里产生的，却与他无关，就是说，无须他来形成这些特性，例如学习跳舞，以便成为自己双足的主人，或者就非任何人都有、非任何人都能求得的材料来锻炼自己的思想，以便成为自己思维的所有者；也无须他操心社会关系问题，这些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

¹⁷⁰ 参阅同上书，第262页：“从费尔巴哈那里来的上帝的宾词，成了统治着人们的现实力量，成了主教，这样的宾词就是‘施蒂纳’所发现的用来代替经验世界的怪物，他的‘独自性’竟如此地建立在‘启发’给他的东西之上。如果‘施蒂纳’责备费尔巴哈，说他所得到的结果是无，因为他把宾词变为主词或主词变为宾词，那末施蒂纳就更不能得到什么结果了，因为他把费尔巴哈的这些变为主词的宾词神圣地奉为统治着世界的现实的个人，他把这些有关各种关系的词句恭顺地看作是现实的关系。”

单独发展一种特性或欲望，那么，这个特性或欲望在这个活动有限的人那里也将要受到限制；相反地，如果是在一个活动是多方面的人那里，则它将会得到发展¹⁷¹。

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并不是在先天性的形式下自己存在着；它们是在产生于私有制中的个别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对立的影
响下自行发展的。这种存在于个别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并从而也
就是存在于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的对立，毕竟只是在表面上
是绝对的，因为个别利益与普遍利益是互相制约着的。普遍利益
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独立于私人利益而存在的东西，它是在这些私
人利益取得了阶级利益的形式时产生的，阶级利益由国家所代表
并受到国家的保护，只是在这时候它们才表现出最高利益、普遍
利益的外貌。私人利益的代表者之所以看起来是利己主义者，那
是因为他最终必然会与否定他自己利益的普遍利益相对立；对普
遍利益的保卫者来说也是如此，普遍利益的保卫者看起来似乎是
自我牺牲的体现，那只是因为他的任务强迫他，使他不得不以最
高原则的名义同个别利益以及他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¹⁷²。

171 参阅同上书，第 295—296 页：“象圣麦克斯那样，设想可以脱离一切其他欲望来满足一个欲望，可以不同时满足自己这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个人而满足这一个欲望，[这种设想完全是荒谬的。]如果这一个欲望取得抽象的、独立的性质，如果它成为一种外在的力量同我对立起来，如果因此个人的满足就表现为片面地满足一个唯一的欲望，那末，决不象圣麦克斯所想的那样决定于意识或‘善良意志’，更不是决定于对特性这一概念反思得不够。……这不决定于意识，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活；这决定于个人生活的经验发展和表现，这两者又决定于社会关系。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末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并且这个受到特别培植的特性发展的方式如何，又是一方面决定于为他的发展所提供的材料，另一方面决定于其他特性被压抑的程度和性质。”

172 参阅同上书，第 272—276 页：“他非常不愉快地发现，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两

由于把人归结为一个绝对的我，把人的活动归结为观念的实现，因此在施蒂纳那里人就变成了一个虚幻的存在，一个纯粹的怪影，而被归结为观念之连续的历史，也就变成了一组幻灯片¹⁷³。

个方面，即个别人的私人利益和所谓普遍利益，总是互相伴随着的。象通常一样，他发现这一事实是在错误的形式，神圣的形式下，从理想的利益、圣物、幻觉的角度去发现的。他问：普通的利己主义者，个人利益的代表怎么会同时受共同利益、教书匠的统治，而处于教阶制的权力之下呢？……如果把桑乔的问题从那种浮夸的词藻译为普通话，那末它‘应该这样说’：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既然被确定为普遍利益，就可以由意识想象成为理想的，甚至是宗教的、神圣的利益，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个人利益变为阶级利益而获得独立存在的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异化，同时又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些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因此这些力量在观念中就成为‘神圣的’力量，这是怎么回事呢？……但是，即使根据桑乔从中体会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矛盾的那种荒诞粗鄙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形式，他也应该看到，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因此桑乔指出的两个方面就是个人发展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同样是个人生活的经验条件所产生的，它们不过是人们的同一种个人发展的表现，所以它们仅仅在表面上是对立的。……他们（共产主义者）知道，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个人利益的代表是‘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这只是因为他必然与共同利益相对立，这种共同利益在现存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范围内以普遍利益的形式获得独立存在，从而在人们的观念中获得了理想利益的形式和意义。共同利益的代表是‘自我牺牲者’，这只是由于他同以私人利益形式确定的个人利益相对立，只是由于共同利益被确立为普遍的和理想的利益。”

173 参阅同上书，第210页：“这个施蒂纳式的‘我’（它的来临意味着迄今存在的世界的终结）不是‘有形体的个人’，而是按照用同位语作支柱的黑格尔的方法构成的范畴。”

参阅同上书，第208页：“神圣的战士现在已征服了历史，把历史化为思想、纯思想、仅仅是思想的思想，在日子结束时同他对抗的是一支仅仅由思想组成的军队。”

正如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不过是精神的自我创造那样，在施蒂纳那里历史则是作为利己主义的体现的我的自我创造¹⁷⁴。历史在他那里比在黑格尔那里还更具有思辨的性质。施蒂纳利用他所认为的历史给纯粹思辨提供了一片基地，他走得比黑格尔更远，因为他赋予这些纯粹的思辨以一种外观，使人以为它们忠实地表现了历史的真实发展。

黑格尔经常在努力使他的思辨同历史的真实进程协调起来¹⁷⁵，而施蒂纳对这一点却毫无所知，竟把观念与确定观念的种种社会关系分开，以致他描述历史的那种专断方式超过了一切想象¹⁷⁶。

174 参阅同上书，第42页：“这种观点仍然可以被思辨地、唯心地、即幻想地解释为‘类的自我产生’（‘作为主体的社会’），把所有前后相继、彼此相联的个人设想为从事自我产生这种神秘活动的唯一的个人。这里很明显，尽管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但是他们并不象圣布鲁诺胡说的那样，或者象‘唯一者’、‘被创造的’人那样创造自己本身。”

参阅同上书，第131—132页：“思辨的观念、抽象的观点变成了历史的动力，因此历史也就变成了单纯的哲学史。然而，就是这种哲学史也不是根据现有材料所载的真实面貌来理解的，至于它如何在现实的历史关系的影响下发展，则更不用说了；它被理解成现代德国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理解和阐述的那样。而从这些阐述中所采取的也只是那些能够适合当前目的的东西……这样，历史便成为单纯的先入之见的历史，成为关于精神和怪影的神话，而构成这些神话的基础的真实的经验的历史，却仅仅被利用来赋予这些怪影以形体，从中借用一些必要的名称来把这些怪影装点得仿佛真有实在性似的。”

175 参阅同上书，第190页：“如果人们要象黑格尔那样第一次为全部历史和现代世界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那末没有广泛的实证知识，没有对经验历史的探究（哪怕是一些片断的探究），没有巨大的精力和远见，是不可能的。反之，如果只满足于利用和改造现成的结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用个别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这种观点，那就完全不要求有任何历史知识。”

176 参阅同上书，第137页：“关于现实的世俗的历史，很信神的圣麦克斯……却谈不出任何现实的和世俗的东西，他只能经常把这种历史命名为‘自然界’、

既然历史在他那里比在黑格尔那里还更是一种哲学史，就是说，是一种观念的连续的展现，因此也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不是以对于真实的事实的认识为对象，而是以对于真理的发现为对象¹⁷⁷。在施蒂纳那里历史之所以具有目的论的性质，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其实，历史的目的不过是给人们为通向他们真正的王国开辟门户¹⁷⁸。

正如在布鲁诺·鲍威尔那里一样，这些就是意识的成就，意识被赋予有改变人的权力，改变社会关系的权力，从而也就有了决定历史进程的权力。

人类是如何通过意识的发展而得到改变，关于这一点，施蒂纳是按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阐述精神的发展的方式来解释的。精神最初是在不与自己的对象有所区分的可感意识的形式下

‘事物世界’、‘儿童世界’，把它和意识对立起来，把它当作意识的思辨对象，把它当作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尽管不断被铲除，但仍继续存在于一种神秘的朦胧中。”

参阅同上书，第200页：“在思想家们假定观念和思想支配着迄今的历史，假定这些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就是迄今存在的唯一的历史之后，在他们设想现实的关系要顺应人自身及其观念的关系，亦即顺应逻辑规定之后，在他们根本把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的历史变为人们的现实历史的基础之后，——在所有这一切之后，把意识、观念、圣物、固定观念的历史称为‘人’的历史并用这种历史来偷换现实的历史，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圣麦克斯比他的所有前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对这些观念，甚至在它们同它们所由产生的现实生活任意脱离的情况下，也毫无所知。”

177 参阅同上书，第181页：“为什么凡是照黑格尔那样理解历史的人，到最后都不得不达到作为全部以往历史的结果的、在思辨哲学中才完成和就绪的诸精神王国呢，‘施蒂纳’可以毫不费事地在黑格尔那里找到谜底。为了得到这种结果，‘就必须把精神的概念作为基础，然后指出历史是精神本身的过程’（《哲学史》第3卷第91页）。在‘精神的概念’被悄悄地塞给历史作为基础之后，当然就很容易‘指出’精神的概念到处显现，然后就让这一过程‘得到合适的秩序’。”

178 参阅同上书，第164页。

出现的，之后，是由于意识与世界的对立而以自我意识的形式出现，最后，当精神意识到是它构成一切事物的本质的时候，它就以精神的形式出现了¹⁷⁹；同样，在施蒂纳那里，人最初是作为在本质上并不与自己有所不同的自然的统治物出现的，之后，人通过将世界予以精神化而从这种统治中把自己解放出来，但这又使自己屈从于一种新的统治即精神的统治，最后，人终于从这种双重的统治中摆脱出来，这是由于人意识到自己的真实的存在，意识到自己的具有一致性和绝对自治性的我，并完全按照我的本性行事。

首先，施蒂纳借助于人的生物学的发展阐述了人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人从儿童变成青年，然后变为成人¹⁸⁰。在他的阐述中，他把儿童、青年和成人转变为一种思辨结构。事实上，在他那里，人的发展正如在黑格尔那里的精神的发展一样，都归结为在儿童、青年和成人面临世界时所产生的意识的不同的态度。他们之间的不同因此也就归结为他们对于世界所抱的不同的观点。

处于自然影响之下的儿童是现实主义的；青年不同于儿童，他设法弄明白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结果在精神中看到了这个本质，因此他是唯心主义的；在他把世界予以精神化的同时，他从自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又落到精神的统治之中；而作为利己主义的成年人则不但摆脱了自然的统治也摆脱了精神的统治，他使自然和精神都从属于自己的意志。人的生物学的发展就这样归结为世界观的形成和改变；儿童、青年和成年人都变成了形而上学家，都把世界作为他们思辨的对象¹⁸¹。

179 参阅同上书，第163页。

180 参阅同上书，第119—131页：《创世纪，即人的生活》。

181 参阅同上书，第129页：“因此，‘可以做出结论’，‘人的生活’的全部历史可以归结如下：

施蒂纳在这里所用的办法，同他在处理历史时所用的办法是类似的，在他那里，历史同样以说明人如何自行改变并在改变的过程中成为完美无缺的利己主义者为目的。

施蒂纳把历史分成三个大的时期：古代，即人类的儿童时代；中世纪，即人类的青年时代，以及近代，即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类由于变为成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本质并且去实现它。

在这里，这三个时期仍然是以意识在面对世界时所持的态度作为标志的；在古代，它的态度是现实主义的，在中世纪，它的态度是唯心主义的，而在近代，它的态度则是利己主义的。用这种三个一组的办法（儿童、青年、成人——古代、中世纪、近代——

（1）施蒂纳认为人生的各个阶段只是个人的‘自我发现’，而这些‘自我发现’总被归结为一定的意识关系。这样，意识的差别在这里就构成个人的生活。至于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产生意识变化的物质变化和社会变化，施蒂纳自然都不管了。因此，在他那儿，儿童、青年和成人总是发现世界早就是现成的——就象他们只是‘发现’自己‘本身’一样；至于有什么可能‘被发现’，对这点他们坚决地什么也不做，丝毫不关心。即使意识的关系本身，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而只是遭到思辨的歪曲。因此，所有这些形象同世界的关系也都是哲学的：‘儿童同世界的关系是唯实主义的’；‘青年同世界的关系是唯心主义的’；成人则是二者的否定的统一，是绝对的否定，这在以上的结论中已经说出来了。这里揭穿了‘人的生活’的秘密，这里表明：‘儿童’只是乔装改扮的‘唯实主义’，‘青年’只是乔装改扮的‘唯心主义’，‘成人’只是乔装改扮的想解决这种哲学对立的企图。现在已经清楚，这种解决办法，这种‘绝对的否定’的产生只是由于：成人盲目地相信儿童和青年的这些幻想，从而相信自己已经克服了事物世界和精神世界。”

参阅同上书，第131页：“第一部分‘人的生活’之所以称为‘创世纪’，是因为它包含着唯一者的全部家政的萌芽，它向我们提供了直到最后时刻，世界末日来临之际的整个后来发展的原型。唯一者的全部历史是围绕着儿童、青年和成人这三个阶段兜圈子的，这三个阶段又具有‘各种转变’，兜着越来越大的圈子，最后直到事物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历史被归结为‘儿童、青年和成人’为止。”

现实主义、唯心主义、利己主义)，施蒂纳毫不疲倦地重复了又重复，并加以无穷无尽的变化（例如，黑人、蒙古人、高加索人等等），他能够随心所欲地去构造历史¹⁸²，而用不着费力去研究它¹⁸³。正如在描述人从儿童到成人的过程中，他忽略了那些伴随着这一发展的生物学上的变化一样，在他描述历史的时候，同样避而不谈社会关系和分工的变化、各民族的形成以及对它们形成的过程起决定作用的阶级¹⁸⁴。

由于他赋予历史以目的论的性质，因此，这就导致他事实上把历史分为两个大的时期：预示时代——古代和中世纪——，这还是一个不完善的时期，因为人在这个时期中还没有达到真正的自我意识；以及完成时代，即近代这个时期，人在这个时期中实

182 参阅同上书，第132页：“在这种试验中，我们的圣者经常露出马脚，写出关于怪影的露骨的神话。

“我们认为圣麦克斯的这种编造历史的方法是最幼稚的，最简单的。作为儿童、青年和成人而出现于我们之前的三个简单范畴，即唯实主义、唯心主义和作为两者的统一的绝对否定（这里称为‘利己主义’），被当作全部历史的基础，并挂上各式各样的历史招牌；这些范畴和它们的恭顺的随员即辅助范畴一起，构成所描绘的一切伪历史的阶段的内容。圣麦克斯在这里重新表明自己的无限信仰，他比他的任何一个前辈都更加相信德国哲学家所制造的思辨的历史内容。因此，在这种庄严而庞大的历史结构中，一切都归根到底是替三个范畴寻找一系列冠冕堂皇的响亮的名称，因为这三个范畴已经非常陈旧，以致根本不敢以本来的名称公开出现了。”

参阅同上书，第132—137页。

183 参阅同上书，第130页：“既然圣麦克斯没有注意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并且也根本没有谈‘生活’，所以他完全合乎逻辑地撇开了历史时代、民族、阶级等等，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他夸大了他周围与他最接近的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并把它提升为‘人的生活’的正常意识。要摆脱这种地方局限性和教书匠的学究气，他只要把‘他的’青年跟随便什么样的青年办事员、英国工厂的青年工人、青年的美国人作一个对比，至于吉尔吉斯青年牧民就用不着说了。”

184 参阅同上书，第137页。

现了自己的真实的存在¹⁸⁵。

施蒂纳不去分析古代世界如何在生产力、分工和所有制的改变的影响下发展和解体的，而只满足于把它描绘成是人类的儿童时期，这样来说明它的特点，比如人是受自然所统治的，他的意识只对他与自然的关系有所反应等等¹⁸⁶。其结果是：他把古代的历史归结为他的哲学史，特别是斯多葛、伊壁鸠鲁、怀疑论派的学说史，他把哲学史同真实的历史割裂开来，因此对哲学史也作了虚假的解释¹⁸⁷。

他以同样的手法描绘出中世纪的特点，即中世纪作为人类的青年时期，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唯心主义时代。

他说，中世纪是被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家、特别是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论派的哲学家们准备好了的；这些哲学家脱离了世界，力图洞察构成世界的真理是什么，他们在精神中发现了这个真理，这样，就为通向对世界持唯灵论看法的基督教铺平了道路。由于施蒂纳把这些哲学家当作是一些探寻古代世界的真理的唯心主义者，因此他没有看到他们的态度是被这个世界本

185 参阅同上书，第119页：“‘圣书’本身，象‘永垂千古的’圣经一样，分为‘旧约’和‘新约’……。第一部分是逻辑范围内的历史、受过去时代束缚着的逻辑；第二部分是历史中的逻辑，即已经解放出来的、和现时代斗争着并战胜着现时代的逻辑。”

186 参阅同上书，第142页：“这些例子很足以证明：力求‘尽快地摆脱’经验历史的乡下佬雅各如何颠倒事实，如何让观念的历史来产生物质的历史……我们自始就只听说过，古代人据说如何如何对待他们的世界：他们作为独断主义者，和古代世界，即他们自己的世界相对立，而不是以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的姿态出现。这里谈的只是意识对事物、对真理的关系问题，因而也只是古代人同他们的世界的哲学关系问题，——在我们面前，古代哲学史代替了古代历史，并且这种哲学史也只是圣麦克斯按照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观点想象出来的哲学史。”

187 参阅同上书，第142—150页。

身、被当时走向解体的这个世界所决定的¹⁸⁸。

作为历史上唯心主义时期的中世纪，照施蒂纳的说法，主要是以基督教作为标志的；基督教在把世界予以灵性化的同时，也就把人从世界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了，但是，相反地它又把入交给精神去统治。对于基督教的这种看法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驳斥，认为这种看法纯属思辨；这种看法实际上把世界归结为一种对于世界的抽象观念，这就免去了施蒂纳去分析在什么条件下世界向前发展和改变的麻烦。

基督教产生的真正的原因，事实上并不是想把世界予以灵性化的这种意向，而是在罗马帝国中继续普遍的掠夺和私人财产大量集中之后所产生的无边的苦难¹⁸⁹。

188 参阅同上书，第140页：“一旦非真理性在他们的世界后面产生（也就是说，一旦这一世界本身由于实际冲突而解体；而对这种唯物的发展作经验的考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古代的哲学家便力图洞察真理世界或他们世界的真理，而到那时，当然发现它已非真理了。他们的探寻本身就已是这一世界的内部解体的征兆。乡下佬雅各把唯心主义的征兆变成解体的物质原因，他以德国圣师的姿态迫使古代自身寻找自身的否定——寻找基督教。他这样来安排古代在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是必然的，因为古代人是力图洞察‘事物世界’的‘儿童’。乡下佬雅各只要把古代世界变成后来的关于古代世界的意识，当然就可以从唯物主义的古代世界一跃而转到宗教的世界，即基督教。”

189 参阅同上书，第204—206页：“古代人在古代世界末期完全变为‘世界的任何覆灭〈世界到底要覆灭多少次？〉也不能打破其宁静的斯多葛派’，这同古代末期罗马人和希腊人的现实情况符合到什么程度。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琉善的著作。罗马帝国曾遭受到强大的机械推动力，这是一些由于罗马帝国被许多罗马皇帝的内战所分裂，由于财产特别是地产在罗马大规模集中和由此而引起的意大利居民减少，以及由于匈奴和日尔曼人的攻击而受到的机械推动力，这些推动力在我们的神圣的历史家看来，‘不再起作用’。……古代基督教徒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所有物，因此他们满足于自己想象出来的天国的所有物和自己的神的财产权。他们不是使世界成为人民的所有物，而是宣布自己及自己的贫苦伙伴是‘属上帝的子民’（《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基督教关于世界的观念，在施蒂纳看来，就是古代世界消融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其实，

最初的一些基督教徒从来没有奢想去做世界的主人，象施蒂纳想象的那样；他们原是一些贫苦可怜的奴隶，他们心中所想的解放，就是彻底地远离尘世，重享天上的生活，正是这些东西赋予他们的思想以一种唯心主义性质。

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照施蒂纳的说法，同样也是由意识对世界的态度的改变、由宗教意识向哲学意识的转变所决定的。这一点，其实新教早就第一个这样做了的，它在把宗教予以灵性化的同时，又用宗教使人和宗教真理建立了关系，这个宗教真理不再是从客体的形式下去理解的而是在精神的形式下去理解的真理，这样，新教就标志着宗教思想向哲学思想的演化¹⁹⁰。

哲学继续对世界予以灵性化；它神性化了精神，把精神造成一个超越的存在，成了世界的创造主。这样，精神便取得了一种绝对的性质，观念也变成为实体，变成为固定观念，这些东西，就在世界精神、普遍意识、人的本质、国家等等形式之下，统治并且压迫着每一个人。于是世界就变成了一个种种精灵和怪影的世界，而作为这些怪影的崇拜者的人们，则变成为着了魔的迷妄之徒¹⁹¹。

固定观念所取得的这种神圣的品格构成了固定观念的特殊标志，正是从这种神圣的品格中产生了一种对于世界的普遍的神化和圣化。施蒂纳把这种神圣的性质不分青红皂白地赋予一切固定观念，看不到他给予观念和制度的这种神圣的品格，是随着每个

这顶多是古代观念的世界消融于其中的幻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基督教徒能够靠信仰的力量移开大山，感到自己强大有力。……早期基督教徒在乡下佬雅各的想象中是古代世界的所有者，实际上他们大部分是隶属于所有者的世界的，他们是奴隶，而且可以被拿到市场上去卖掉。”

190 参阅同上书，第185—188页。

191 参阅同上书，第166—177页。

人和每个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¹⁹²。其次,他也没有研究在什么条件和什么场合之下,某些社会关系和某些制度取得了一种理想的品格,而且在人看来似乎是一些无上的势力。譬如说,如果他曾分析过在什么条件之下个别利益才转变为从表面看来似乎与每个人无关的普遍利益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懂得,何以某些社会关系在一些确定的场合中是能够被理想化,并且和作为独立的和陌生的势力的个人是相对立的。这样,他就可能会从思辨的领域转到现实的领域中去,在人们所想象的东西的后面发现他们所想象的东西的真实意义和真实原因,因为,在人看来似乎是他们意识的产物的东西,实际上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¹⁹³。

从对于固定观念以及对于它们所代表的东西的神圣化中产生的社会的教阶制,是对个人进行压迫的主要工具¹⁹⁴。在教阶制

192 参阅同上书,第318页:“第一个困难的产生大概是由于圣物的内容太繁杂了,因此在批判任何一个确定的圣物时也必须抛开神圣性,而只批判这个确定的内容本身。圣桑乔绕过这块暗礁的方法就是:他把所有确定的东西都只当作圣物的‘例子’来引用。”

第320—321页:“第二块暗礁(当圣桑乔在进行某些思考时必然要碰上的这块暗礁)就是他本人的论断,每个人都是和其他的人完全不同的唯一的个人。既然每个人都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另一种东西,那末在一个人看来是异物、圣物的东西,对另一个人说来绝不应该是——也根本不可能——异物或圣物。象国家、宗教、道德等等这些一般的名字,决不会使我们感到迷惑,因为这些名字只是许多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抽象。由于唯一的个人对待这些对象的态度完全不同,所以对每一个唯一的个人说来这些对象又变成了唯一的对象,即只是名同而实不同的对象。”

193 参阅同上书,第273—274页:“如果桑乔哪怕有一天懂得这样一事实,就是在一定的、当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内,总有某些异己的、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统治着人们,……他就会从思辨的王国降临到现实的王国中来;就会从人们设想什么回到人们实际是什么,从他们想象什么回到他们怎样行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必须行动的问题上来。他也就把他觉得是思维的产物的东西理解为生活的产物。”

194 参阅同上书,第187页:“教阶制是思想的统治,精神的统治。至今我们是有

这个名目下，施蒂纳把专制主义的一切形式如宗教、极权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都包括进去，固定观念正是通过这些形式实行着它的统治。他从中世纪借来了这个符合于当时社会机构的教阶制的概念，认为它本身就是体现了权威的一种形式，并且硬把它说成是近代的特征¹⁹⁵。

在施蒂纳看来，教阶制的基础就是对于固定观念和建立在固定观念上的各种制度所表现的尊重。所以，人们所受的压迫既然不是来自经济和社会关系，而是来自种种固定观念以及由它们所产生的教阶制，而后者本质上不过是人的意识的产物，因此得到这样的结论：个人的解放只能通过冲破固定观念的统治来实现，人们只要对这些固定观念拒绝表示尊重就行了¹⁹⁶。施蒂纳因此号召人们从一切固定观念、圣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样，才能使他们认清自己真正的本性，成为合理的利己主义者，如实地自

教阶制的，我们受那些以思想为依据的人压迫。”

参阅同上书，第186页：“接着他把‘圣物’、思想、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对经验世界的这种统治，描写成当前存在的历史关系，描写成圣者、思想家对世俗世界的统治，即教阶制。”

195 参阅同上书，第189、190、191页。

196 参阅同上书，第317页：“因为圣物是某种异物，所以一切异物都变成了圣物；因为每一件圣物都是枷锁、镣铐，所以一切枷锁、镣铐都变成了圣物。由此圣桑乔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他看来，一切异物都变成了一种假象，一种观念，他摆脱这种观念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对这种观念提出抗议并声明他没有这种观念。恰恰和我们曾在非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身上看到的一样：人们只要改变自己的意识，世界上的一切就会安排得 all right [很好]。”

从我们的全部叙述中可以看出圣桑乔如何通过对一切现实关系的批判，把这些关系宣布为‘圣物’，而把他同这些关系的斗争归结为他同他关于这些关系的神圣观念的斗争。这一套把一切变成圣物的简单戏法之所以会出现，正象我们在前面已经仔细看过的，是由于这位乡下佬雅各诚心相信哲学的幻想，把现实的那种脱离经验基础的、思想的、思辨的表现当作现实本身……因而才会设想此种神圣本质只与思想和观念有关。”

己肯定自己¹⁹⁷。

人类活动的目的既然主要是把人从他的幻想中、从他的虚假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因此现实的冲突就转变为思想上的冲突，而这冲突只有在精神的领域中去加以解决¹⁹⁸。

要想以消除人对世界所形成的种种虚假观念这个办法去使个人得到解放，这个想法是绝对地荒谬的，因为这种虚假的解放方式丝毫改变不了决定个人生活的实际条件；不管怎么样，只要不把使这些想法和观念得以产生的社会关系消除掉，就是想不让它们继续存在下去也是不可能的¹⁹⁹。

197 参阅同上书，第279页：“这位哲学家在这里转弯抹角地承认一定的意识也是有一定的人和一定的情况与之相符合的。但是同时他又认为：他向人们所提出的要他们改变自身意识的道德要求，会引起这种改变的自身意识，而在那些由于经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人们中（现在这种人所具备的当然是另一种意识了），他所看到的只是那改变了的[意识]，此外再没有别的。”

198 参阅同上书，第324页：“‘另一个例子’，即把世界神圣化的一个最一般的例子，就是把实际的冲突（即个人和实际生活条件之间的冲突）变成思想的冲突（即这些个人和个人自己产生的或自己塞进自己头脑中去的那些观念之间的冲突）。……正象圣桑乔以前曾把个人的思想变成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的情形一样，他在这里又使现实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离开了这些冲突本身并使这种思想上的反映成为独立存在的东西。个人所遇到的现实矛盾变成了个人和自己的观念的矛盾。……这样一来，他就狡猾地把现实的冲突，即它在思想上的反映的原型，变成这个思想上的假象的结果了。于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问题不在于实际消除实际的冲突，而仅在于抛弃关于这种冲突的观念。他以一位道貌岸然的道德家的姿态号召人们抛弃这种观念。”

199 参阅同上书，第506—507页：“桑乔所理解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极端荒谬的。他以为：到现在为止人们总是先给自己制定人的概念，然后取得自由，而自由的程度取决于实现这个概念时的需要；人们取得的自由的程度每次都由他们关于人类理想的相应观念来决定；同时在每个个人身上必然会保存着和这种理想不符合的某种残余，因而这种残余作为‘非人的东西’还没有得到解放，或者说只有 *malgré eux* [违反他们的意志]才得到解放。当然，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

这种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同怀疑论派、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以及基督教的思想很接近。这一思想不过是奴隶道德的一种表现。这种奴隶道德只是满足于在理论上反对现存事物的状况，而在实践上如何消灭这种状况则丝毫无所作为。这一思想归结起来不过是对于自我进行统治的一种号召²⁰⁰。

在施蒂纳看来，对于固定观念的统治的斗争构成人类史前期的分界。在现代，通过对布·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所开始的这个斗争，其矛头是指向一些最危险的教条，是指向他归结为自由主义的一些政治和社会教条的；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指的不仅是政治的自由主义，而且也指的是社会的自由主义即社会主义，以及人道的自由主义即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

B) 政治自由主义

施蒂纳变成为反动的以后，就象布·鲍威尔一样，对普鲁士国家不再进行斗争，而是把他的批判的矛头指向一切进步倾向和进步运动，并且首先指向政治的自由主义。

他对政治的自由主义并不从它同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的关系方面去进行研究，就是说，他并不把政治的自由主义看成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斗争的政治形式，而是把它看成是精神领域的一种个别形式，一种导致国家权力至上的等级的个别形式²⁰¹。

施蒂纳关于这个运动和国家统治的考察的思辨性质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他把政治的自由主义连结于资产阶级的种种现实联系弄颠倒了，因此他在政治的自由主义中只看到标志着并决定着资

200 参阅同上书，第 285 页。

201 参阅同上书，第 352 页。

产者的因素,这样,他就是在公民这个抽象的形式下去对资产者进行考察,没有认识到公民不过是理想化了的形式,一点也没有接触到资产者的真正性质。他对政治的自由主义的批判,从根本上说,不过是对于作为统治工具的国家的一种批判。在这个批判中,他自己站到没落的中产阶级特别是柏林的庸人的观点方面去了,而柏林的庸人在他看来乃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对由上升的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艰苦的斗争毫无所知,以为这个阶级对于国家不感兴趣,因为它只是在需要国家来保卫它的阶级利益的时候才对国家表示关切。实际上,对国家漠不关心的是中产阶级,因为它对国家所给予它的压迫是不敢反对的²⁰²。

202 参阅同上书,第215—216页:“如果象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如果不幸,甚至对于这种浸透市民精神的自由主义所知道的,也只是黑格尔以及完全在他影响下的教书匠们所给它的那种远离实际的形态,那末就会得出完全属于圣物领域的结论。这一点我们马上可以从桑乔的可悲的例子中看到。

“近来自由主义者和资产者被等同起来,这一点没有为我们的这位教书匠所忽略。但由于圣麦克斯把资产者和善良的市民、德国的小市民等同起来,所以他不理解他仅仅从别人口中得知的那些词句的真正意思,不理解一切权威作家所说出的那些词句的意思,就是说不理解自由主义的词句是资产阶级的现实利益的唯心的表达,反而认为资产者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为完善的自由主义者,国家的公民……因此,他可以把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资产者与作为经验的资产者的资产者分开,从而把资产者变为神圣的自由主义者,就象他把国家变为‘圣物’,把资产者对现代国家的关系变为神圣的关系、变为膜拜一样,这样一来,他其实也就结束了他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他把政治自由主义变成了‘圣物’”。

参阅同上书,第272—273页;第411页。

既然施蒂纳不懂得国家的形成、它的性质和发展是被社会关系所决定，不懂得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在普遍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形式下来保卫自己的私利，所以，他就象小市民那样，把国家看成是普遍利益的体现，并且甚至把国家看成是一种与它所统治的个人无关的超绝的权力²⁰³。

这样，国家似乎就象本着一种纯粹的意志在行动着。可是，这种情况是多么少有呵！事实上，它是怎样被社会关系所决定并从属于后者呵！每当它想要颁布一些违反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时，它看到自己是遭到怎样的失败呵²⁰⁴！

²⁰³ 参阅同上书，第402页：“在每一个国家中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知道国家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国家里并通过国家他们自己具有什么意义，桑乔由此得出结论：国家是凌驾于这些人之上的权力……乡下佬雅各还始终在梦想，国家仅仅是一个观念，并相信这一国家观念的独立权力……黑格尔把那些还是从个人——尽管仅是从这些个人的意志——出发的政治思想家的国家观念理想化了；黑格尔把这些个人的共同意志变为绝对意志，而乡下佬雅各则 *bona fide* [真心诚意地] 把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观念化看作是正确的国家观，并且在这种信念下，声称绝对就是绝对的，用这样的方法评论这种国家观。”

参阅同上书，第411页：“至于统治阶级把本阶级的共同的统治组成公开的政权、组成国家这一事实，桑乔却把它理解为并且以德意志小资产阶级的方式曲解为：‘国家’是作为第三种力量组成起来反对这个统治阶级，并为对付这个统治阶级而攫取全部权力的。”

²⁰⁴ 参阅同上书，第377—380页：“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內容总是决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这是由例如私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此外，当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实现这个意志以前，这个‘意志’的产生也只是存在于思想家的想象之中，当关系发展到足以实现这种意志的时候，思想家就会认为这种意

施蒂纳否认国家的权威，同样也就否认了法和法律的权威，在他看来，后者同样也是本着一种纯粹意志来行动的。把法和法律同决定着它们的种种社会关系分割开来，他就看不到法和法律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而把它们看成是国家的绝对意志的种种表现²⁰⁵。事实上，法和法律完全和国家一样，是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的；当它们同社会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时候，它们便失去了一切现实内容而只保持一种纯粹形式的性质²⁰⁶。

对于犯罪，施蒂纳也象对于反对圣化了的观念的一种背叛或罪孽一样，同样是以思辨的方式进行考察的，罪恶则将作为罪恶受到惩罚²⁰⁷。

他对政治自由主义进行批判，不仅因为这个主义便利了国家的专横统治，而且还因为它保证不了所有个人的私有财产的增进。诚然，国家承认它和占有地产的人属于一类性质，不过，既然它让

志纯粹是随心所欲的，因而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情况下都是可能的东西……实际上，不是国家由于统治意志而存在，相反地，是从个人的物质生活方式中所产生的国家同时具有统治意志的形式。”

“就是对任何立法，例如对各国的济贫法作最肤浅的研究就可以看出：当统治者想象只要通过自己的‘统治者的意志’，也就是说仅仅要什么就能实现什么的时候，他们究竟完成了一些什么。”

205 参阅同上书，第379页：“我们早先已经看到，在一些哲学家那里，由于思想脱离了它们的基础，即脱离了个人及其经验关系，才产生了纯粹思想的特殊发展和历史的观念。同样，在这里也可以使法脱离它的实在基础，从而得出某种‘统治者的意志’，这种意志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在自己的创造物即法律中具有自己独立的历史。结果是政治史和市民史就纯观念地变成了一个挨一个的法律的统治史。”

206 参阅同上书，第379页：“法和法律有时也可能‘继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不再是统治的了，而是只剩下一个名义，关于这种情况的明显例子，我们在古罗马和英国的法制史中可以看到许多。”

207 参阅同上书，第387页及以下诸页。

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去任意使自己致富,那么,为了取得私有财产,在人与人之间便产生了一种残酷的竞争,其结果就是大多数的人都被剥夺了私有财产,因而也就不能确立起他们自己的人格²⁰⁸。

由于施蒂纳不理解存在于生产与财产之间的关系,由于他看不到财产只是由于生产才存在,一定形式的财产适应于一定生产力的发展,而前者是随着后者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的,因此,他对财产问题,同样也是从思辨的观点去进行研究,认为财产是每一个成为有产者的人的绝对权利,并对私有财产应予保障²⁰⁹。

既然是国家来保障私有财产,因此施蒂纳认为,私有财产所从属的各种条件是由国家来调节的,法则是构成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但实际上,那不过是对私有财产加以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承认罢了²¹⁰。这就使他有了这个想法:唯有国家才是真正的有产者,而其他一切有产者从私有财产中获得的好处都是靠不住的²¹¹。

²⁰⁸ 参阅同上书,第220—221页。

²⁰⁹ 参阅同上书,第410页:“假使圣桑乔把法学家和政治家关于私有财产的那些流行的看法以及针对这些看法进行的争论暂时放下,假使他从私有财产的经验存在以及私有财产同个人的生产力的联系方面来考察这种私有财产,那末他现在向我们显示的他的全部所罗门式的智慧就会化为乌有。那时他就未必看不出……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的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阅同上书,第468页。

²¹⁰ 参阅同上书,第412页:“因为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和在其他一切时代一样,财产是和一定的条件,首先是同以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程度为转移的经济条件有联系的,而这种经济条件必然会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表现出来,于是圣桑乔就天真地认为‘国家使财产的占有……与某些条件联系起来,正如它使一切——例如婚姻——与某些条件联系起来一样’(见第335页)。”

参阅同上书,第419页:“在法律上对私有财产的政治承认被说成是私有财产的基础:‘私有财产靠法的恩惠而存在,只有在法中它才有保证’”(见第332页)。

²¹¹ 参阅同上书,第411页:“由于圣桑乔竭诚接受把一切经验关系颠倒过来了的

可是，施蒂纳用肯定个人的私有财产是不可让与的权利这一点来对抗这一事实。私有财产，正如一切创办的事业一样，它的基础既然是建立在对私有财产所表现的尊重上，因此，施蒂纳就以为，只有在对于作为唯一有产者的国家所拥有的特权全然不表示尊重，个人才能使自己对于私有财产的权利得到完全的实现²¹²。

对于渴望看到自己微薄的财产得到保障的中产阶级极为关切的土地分割和土地垄断的问题，他也以类似的方式进行研究。他解释说，土地的集中和垄断说明大地主对小有产者缺乏尊重，他号召小地主们起来对大有产者全然不予尊重，以此来保卫自己²¹³。

事实上，土地的分割正如土地的大量收购一样，乃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产物²¹⁴。施蒂纳并不知道，土地的分割是分两次并且以不同方式完成的。第一次是在资本主义形成以前，主要是由于贵族在从事巨大的农业剥削方面缺乏必要的资本，这次分割便利于创造一种农业权威，它贪得无厌，想尽可能地对土地进行垄断²¹⁵。第二次则是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后，这一次对一心想要削弱贵族势力的资产阶级大为有利。与第一次的土地分割不同，这一次由于竞争，以致使无能扩大自己的财富、不能使农

那些政治家、法学家和其他思想家的幻想，而且还以德意志方式又加上了一些他自己的东西，因此私有财产在他那里就变成了国家财产，从而变为合法的财产……”

参阅第415页：“私有财产变成国家财产的看法最终归结为这样的想法：资产者只是作为属于资产者类的一分子而占有财产，而这个资产者类的总称就是国家，它把财产作为采邑分给个别的人。”

212 参阅同上书，第411页。

213 参阅同上书，第409、411页。

214 参阅同上书，第407页：“也不必对他解释，这种转变的各种形式如何决定于一个国家的工业、商业、航运等的发展水平。”

215 参阅同上书，第410—411页。

业剥削的方式现代化的小农濒于破产，同时，由于使用了大量资本，从而造成了土地的垄断。

关于竞争，施蒂纳既不研究它的性质，也不考虑它的条件，而只把它归结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一种斗争。由于对资产阶级和在竞争的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无所知，他在这场斗争中，就只看到职工与官吏之间的斗争，实际上，这种斗争在竞争的发展中是起着次要的作用的²¹⁶。

由于把个人在竞争中所起的作用提高到首要的地位，这样，他就是使竞争依赖于个人在攫取财富方面的能力的大小。这种看法，对于竞争的原始形式——譬如抢掠——是对的，但对于它的近代形式则并不适应²¹⁷。

在接着研究与生产成本和竞争紧密相连的价格的时候，施蒂纳认为它是由生产者所任意规定的²¹⁸。另外，他还认为存在着一些神圣化的财富——譬如幸福、自由——，它们并不具有可以买卖的性格，尽管它们本身也是由社会关系和竞争所决定的²¹⁹。

²¹⁶ 参阅同上书，第430页：“他忽视了首先由竞争造成的一切关系，如地方局限性的消失、发展交通、分工的发展、世界贸易、无产阶级、机器等等，而以哀伤的眼光回顾中世纪的小市民生活。他只知道竞争是‘敌对、较量和比赛’：他对于竞争和分工的联系、和供求关系的联系等并不感到兴趣。”

参阅第436页：“要求用人的手段而不用物的手段来进行竞争，这就导致一种道德公设，这种公设是说，竞争和决定竞争的关系应当得到的不是那些它们必然产生的结果……不取决于个性的竞争‘手段’是人本身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这些条件在竞争的范围内对人表现为独立的力量，表现为对人说来是偶然性的手段。”

²¹⁷ 参阅同上书，第435页：“如果桑乔想用人竞争代替物的竞争，这就意味着他想回到竞争的起点；他以为，以他的善良意志和他那非普通的利己主义的意识就可以改变竞争的发展方向。”

²¹⁸ 参阅同上书，第430页。

²¹⁹ 参阅同上书，第432页。

既然特别对不具有获得财富手段的个人一心要加以维护²²⁰，施蒂纳就要求国家在这方面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方法，他完全不了解，取得财富的条件和必要的手段是由生产和商品流通所决定的，它们既不取决于个人的意志，也不取决于国家的意志²²¹。

施蒂纳对于政治自由主义和国家的所有激烈的评论隐藏着他要对小有产者予以保护的愿望；既然这种愿望必需要得到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支持，他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全部批判事实上就不能不是虚幻的。

C) 社会自由主义

施蒂纳对社会自由主义的态度，是同他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态度一样反动的。他的怨恨特别倾注在社会自由主义上(社会自由主义在他的理解中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尤其指的是后者)，因为在他看来，社会自由主义所产生的社会专政比国家的专政更为可恶。

在这里，他还是以思辨的方式进行考察。正如他在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中把国家作为个人所从属的一个固定观念一样，在他对社会自由主义所作的批判里，共产主义则成了一种压迫个人

220 参阅同上书，第 436 页。

221 参阅同上书，第 434 页：“这些物包括：竞争者生活在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里，享有与他同时存在的竞争对手所享有的同样的好处；城乡的相互关系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他是在良好的地理、地质以及水文地理条件下进行竞争的；在里昂，他是丝织厂主，在曼彻斯特，他是棉织厂主，而在早些时候他在荷兰又当过船主；在他的生产部门中也象在完全不受他影响的其他生产部门中一样，分工有了高度的发展；交通工具保证他得到同他的竞争对手所得到的一样的廉价的运输；他找到熟练的工人和老练的监工等等。这一切为竞争所必需的‘物’，以及一般说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能力，他既不能靠‘人的力量’取得，也不能靠‘国家’的‘恩赐’，‘作为礼品而获得’(见第 348 页)。”

的特殊等级形式。

他主要指责社会自由主义阻止个人人格的自由发展，由于把一切权利给了社会，这就使个人变为奴隶²²²。这种自由主义，或说得好一些——共产主义——，既然忽视个人的独立自主性而只重视社会活动，这就导致他只从功利主义的观点去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判断。

功利主义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经济社会学理论²²³，施蒂纳用它来说明社会自由主义具有的一些特色；为了证明他对个人的态度是合理的，他指责社会自由主义以功利主义作为根据。社会自由主义由于把财产社会化，就比国家还要厉害地阻止个人取得财富，同时也就加重了压在个人肩上的专横²²⁴。

由于禁止取得财富，社会自由主义就把困苦和贫穷普遍化了，使每个人都成了穷人。

施蒂纳把贫困的部分责任也归之于危机，而危机的产生，他认为这是由于缺少金钱，但实际上危机是在商品失去其交换价值时发生的。为了消除苦难并且同贫困作斗争²²⁵，施蒂纳只是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办法。他想，为了摆脱困苦，应该战胜金钱的势力。既然他认为所有的统治都是建立在人们对金钱所表现的尊重上面，他就号召穷人们拒绝相信金钱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恩

222 参阅同上书，第 228 页：“但社会改革家向我们鼓吹某种社会的权利，这样个人就成为社会的奴隶”（见第 248 页）。

223 参阅同上书，第 480—484 页。

第 484 页：“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但在桑乔那里，它失去了任何积极内容；桑乔的功利论抽掉了一切现实关系……”

224 参阅同上书，第 226 页。

225 参阅同上书，第 465 页。

格斯曾有过说明：金钱并不是人们可以任意创造的一种东西，也不能随意把它消灭掉；它是一定的生产形式和商品流通的必然产物。只要后者存在一天，它便一天不能消灭²²⁶。

为了消灭贫穷，施蒂纳建议国家固定工资的上升，但是他没有看到这种上升并不依赖于国家的意志，而是依赖于劳动市场以及在工人彼此间所造成的竞争²²⁷。

在他看来，消灭贫穷的主要方法就是劳动自由，因为它可以允许工人充分利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同他所想的正好相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充分的劳动自由，这一点从存在于工人之间的竞争这一事实即可看出，但是，劳动自由远远没有帮助工人改善自己的命运，而是在他们竞争的同时加深了他们的苦难。事实上，解决贫穷问题的办法不是劳动自由，而是消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那样的劳动方式²²⁸。

在施蒂纳考虑贫穷问题的时候，他所着眼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破了产的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摈弃在阶级之外的工人——Lumpen-proletariat（流氓无产阶级）、游民，后者在近代只不过是一种次要的社会现象²²⁹。

226 参阅同上书，第221页：“在第150页上说，现存社会关系的一切罪恶归根到底在于：‘市民和工人相信金钱的真理’。乡下佬雅各以为，在散布于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中的‘市民’和‘工人’的权力下，有朝一日突然会这样记载：他们‘不相信’‘金钱的真理了’，他甚至深信：如果这种胡思乱想可能的话，那就会有所收获。他相信：任何一个柏林的著作家都能象他在脑中消除神的‘真理’或黑格尔哲学的‘真理’那样容易地消除‘金钱的真理’。至于货币是一定的生产和交往关系的必然产物并且只要这些关系存在时货币总是‘真理’，这一点当然跟圣麦克斯这样的圣者毫无关系，因为他两眼朝天，把他的世俗的臀部对着世俗的世界。”

227 参阅同上书，第429页。

228 参阅同上书，第222页。

229 参阅同上书，第219页：“整个无产阶级是由破了产的资产者和破了产的无产

施蒂纳把无产者和游民混同起来，因此他指责无产者不该奴隶般地接受他们这种生存条件，以致不能自己解放自己，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些远不是心甘情愿去当奴隶的无产者却是一个革命的阶级²³⁰。

施蒂纳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认为共产主义者是在梦想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事实上，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同时诞生并确立了无产阶级斗争目标的共产主义，与空想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实际上，同施蒂纳所想的相反，共产主义者决不是梦想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而主要是想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用一种新的制度和一个新的社会来取而代之²³¹。他们决不鼓

者、由大批游民组成的，游民在各个时代都有过，而在中世纪制度崩溃后他们的大批存在先于普通无产阶级的大批形成，就象圣麦克斯根据英国和法国的法律以及有关文献就会深信的那样。我们的圣者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同‘善良的安逸的市民’特别是‘忠诚的官吏’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完全一样。他始终如一地把无产阶级和赤贫现象等同起来，实际上赤贫现象只是破了产的无产阶级所处的状况，是已无力抵抗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者所沦落到的最后阶段，只有这种精疲力竭的无产者才是赤贫者(参看：西斯蒙第的著作、威德的著作等等)”。

230 参阅同上书，第234页：“施蒂纳在此认为，那些使社会革命化并把生产关系和交往形式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即置于作为新人的他们自己、他们的新的生活方式之上的共产主义无产者，依然是‘旧人’。这些无产者的不懈的宣传，他们每天彼此之间进行的讨论，都充分地证明：他们本身是多么不愿再做‘旧人’以及他们是多么不愿人们再做‘旧人’，只有当他们和桑乔一起‘在自身中寻找过错’的时候，他们才会依然是‘旧人’；但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会不再是‘旧人’，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坚决地去改变这种环境。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

231 参阅同上书，第230页：“由于在社会中出现了最严重的弊病，所以特别是<I>被压迫者<I>想到一切过错都在社会，并给自己提出发现真正社会的任务”(见第155页)。

参阅同上书，第243页：“接着圣桑乔硬叫共产主义者‘去寻找一种法律和一种结束这些动荡的新秩序’，关于这种秩序，据圣桑乔所确实知道的，共产

吹一种新的道德并要求人们成为真实的人，象施蒂纳所做的那样，因为他们知道，社会关系和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变只能是社会改变的结果²³²。

施蒂纳对社会自由主义的批判，正迎合了小资产者对无产者和共产主义的厌恶心理，小资产者对无产者和共产主义比对大资本还要更加憎恨，因为前者对私有财产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D) “人道”自由主义

所谓人道自由主义²³³，施蒂纳指的就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在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中，人成了一种固定观念、一种教条。在费尔巴哈那里，在人种这个普遍形式之下所观察的人，实际上成了绝对观念和普遍意识，成了一个象上帝那样在屈从于它的个体人的头上翱翔的上帝的代理人。费尔巴哈在把人的种种品质说成是神的品质时，他就是把人种予以圣化了：这些品质成了为人所崇拜的种的属性(宾词)。施蒂纳把这种玄秘之说扯得更远，因为在他那里，这些与人完全割裂了的人的品质竟然成了种种怪影²³⁴。

主义者应当高呼：‘愿这种秩序今后是神圣的！’”

参阅同上书，第240页：“只要共产主义者到了力所能及的时候，他们会毫不客气地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消灭它的‘幸福’。”

232 参阅同上书，第275页：“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因此，共产主义者并不象圣麦克斯所想象的……那样，是要为了‘普遍的’、肯牺牲自己的人而扬弃‘私人’。”

233 参阅同上书，第205—208页。

234 参阅同上书，第262—263页：“从费尔巴哈那里来的上帝的宾词，成了统治着人们的现实力量，成了主教，这样的宾词就是施蒂纳所发现的用来代替经验世界的怪物。……如果施蒂纳责备费尔巴哈，说他所得到的结果是无，因为他把宾词变为主词或主词变为宾词，那末施蒂纳就更不能得到什么结果了，

E) 唯一者

当种种固定观念和一切等级形式都已排除。那时，作为真正的利己主义者、作为在自身一致的绝对的我的人，他的到来的条件才算具备。

唯一者是以这样的方式自己创造自己的：在布·鲍威尔那里，自我意识是通过反对实体、通过扬弃所有不符合它的存在的规定这个办法来自己肯定自己的。

在施蒂纳那里也正如在布·鲍威尔那里一样，由于认为个体的生活条件不是由经济和社会关系而是由意识的改变所决定，因此，真实的斗争就变为精神的斗争；所谓精神的斗争就是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唯一者就是用否定它们的全部价值、对它们不予丝毫重视的办法，从这些错误思想中自己解放出来的²³⁵。

因为他把费尔巴哈的这些有关各种关系的词句恭顺地看作是现实的关系，并给它们加上‘神圣的’这个宾词，又把这个宾词变为主词，变为‘圣物’，这就是说，他所做的同他责备费尔巴哈所做的完全相同。在他用这种方法完全摆脱了这里所谈的那种确定的内容之后，他便开始了他的斗争，即放肆地‘仇视’这一‘圣物’，当然。这一‘圣物’永远是依然如故，在费尔巴哈那里还有这样的意识（因此他受到圣麦克斯的责难），即‘在他那里只谈到消灭某种幻想’（“圣书”第77页），虽然费尔巴哈过分强调了反对这种幻想的斗争的意义。而在施蒂纳那里，连这种意识也‘全部完了’，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

²³⁵ 参阅同上书，第209—211页：“桑乔·潘萨的英雄事迹在于：他是从整支思想敌军的虚无和空虚来认识这支军队的。他的全部伟大的行动并没有超出认识的范围，这种认识在日子结束时让事物的现状原封不动，只改变自己的观念——并且还不是关于事物的观念，而是关于事物的哲学词句的观念。”“在黑格尔看来，近代世界也已化为抽象思想的世界，黑格尔把与古代哲学家相对立的近代哲学家的任务确定如下：古代人必须把自己从‘自然的意识’中解放出来，‘把个人从直接的感性方式中清洗出来并把个人变为被思维的 and 思维着

施蒂纳的态度，同通过对尘世的否定而把自己从尘世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基督徒的态度相类似。象基督徒那样，他采用一种可以很容易地毫无区别地施用于一切事物的纯粹否定的办法，把种种固定观念予以扬弃，这样，就使他免去了对解放人类的现实条件作任何说明的麻烦²³⁶。

为要充分肯定自己是唯一者，个体人享有完全的自由还是不够的，因为从固定观念中单纯的摆脱出来只不过具有一种消极的性质，他还必须能够占有一切并随心所欲地享受它们²³⁷。

的实体’(变为精神)，而近代哲学必须‘取消僵硬的、确定的、不动的思想’。黑格尔补充道：这由‘辩证法’来完成(《现象学》第26、27页)。施蒂纳所不同于黑格尔的地方是：他不靠辩证法而完成了同样的事。”

236 参阅同上书，第313页：“这是我对世界的纯粹关系，即已经解脱了对他来说是现存的一切实在的关系的那种关系。这是一个适用于一切等式的公式，我们的圣者就是把现世诸概念都归入这一公式。”

参阅同上书，第511页：“如果桑乔谈到‘摆脱’问题的时候是要不仅仅摆脱范畴，而且要摆脱现实的枷锁，那末这样的摆脱又须以桑乔和其他大多数人共同的变化为前提，同时又引起世界面貌的一定变化，这种变化对桑乔和其他的个人来说又是共同的。因此，虽然经过了摆脱，他的‘我’‘仍旧存在着’，但这已经是完全发生了变化的我，这个我和其他的个人共同处在发生了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环境正是这个我和其他个人的共同前提，是它的和他们的自由的共同前提；因此，桑乔的‘我’的唯一性、无比性和独立性又化为灰烬。”

参阅同上书，第319页：“这就是说，国家和劳动先被列为一个按照这种方法预先安排好的圣物的特殊的种，然后这个特殊的圣物又被消融在一般的‘圣物’之中；这一切花招都可以做到，而关于劳动和国家却任何内容也没有说出。”

第315—316页：“我——不是国家

国家=非我

我=国家的‘非’

国家的无=我”

237 参阅同上书，第342页：“你要的不是享有这一切美好事物的自由……你要的是真正享有它们……把它们当作你的财产来占有……你应该不仅是自由者，你也应该是所有者”（见第205页）。

正如唯一者的解脱那样，唯一者对事物的占有也只是具有一种纯粹虚幻的性质。既然这种占有是按照它的解脱的方式即采用玩弄词句的把戏这个办法完成的——这些把戏使唯一者得以宣告世界是他的财产，那么，这个世界也只不过作为他的想象的对象、作为想象的财产为他所有罢了²³⁸。

唯一者从世界摆脱出来并占有世界，用社会革命的办法是实现不了的，因为社会革命从它的集体性来看是同唯一者的本性相违背的，但是，可以通过个人背叛的途径来实现，因为个人背叛并不象社会革命那样以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的真正改变为目标，而是只限于对现存事物状况的单纯而简单的否定²³⁹。

参阅348页：“相反地，独自性就是我的全部本质和存在，就是我自己。从我所摆脱的东西中获得了自由；我是在我的权力之下的或受我支配的那些东西的所有者。只要我善于占有自己，不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力量，那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我自己所有的。我不能真的想做一个自由的人，因为我不能……实现这一点。我只能希望这一点并力求做到，因为，这始终是一种理想、怪影。”（见第207页）

- 238** 参阅同上书，第332页：“现在，当一切都变成了‘圣物’，或者变成了‘人’的东西之后，我们的这位圣者就可以进一步用下述办法进行占有了，办法就是抛弃作为凌驾于他之上的力量的‘圣物’或‘人’的观念。由于异物变成了圣物，变成了赤裸裸的观念，被他看成是现实的异物的那个异物的观念，当然也就变成他的财产了。”

参阅第210页：“象基督教徒把关于事物世界的幻想‘塞进自己的头脑’，从而把事物世界占为己有一样，‘我’通过一系列关于基督教世界、思想世界的幻想就把基督教世界、思想世界占为己有。”

参阅第338页：“过去圣桑乔能够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存在于他之外的异物、圣物，同样，现在他又能同样容易地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他的作品，是由于他才存在的某种东西，是他的财产。”

- 239** 参阅同上书，第438页：“革命‘是现存条件、现存情况或 status [状况]的变革，是国家或社会的变革，因此它是政治的或社会的行为’。至于说到暴动，那末‘虽然现存条件的改变是它的必不可免的结果，但它不是从这种改变，而是从人们对本身的不满出发的’。‘它就是单个的人的反抗，就是不考虑将因而出现怎样的安排的一种奋起。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安排，暴动的目的

既然唯一者不能独自生活而必须同其他人发生关系，施蒂纳就不得不在他的体系中给社会关系让出一席之地。为了使这些社会关系不致损害我的独自性，他就把这些关系想象成比如说存在于一群赌徒之间的那种关系那样²⁴⁰。

施蒂纳从傅立叶那里借来联盟这个概念来代替他的体系中的社会的概念；不过，在傅立叶那里，人的新的联盟是以社会的深刻的改变为前提的，而施蒂纳则要把联盟建立在私有制之上。他把联盟理解为象傅立叶学说中法伦斯泰尔（Phalanstère）那样的一个有着平等权利的小资产者的联合，这些小资产者对各自的财产互相予以保证——实际上，这个保证只能由国家所给与。每个参加者都可以随意退出的这样的联盟，它们的普遍推广就可以建立起劳动组合，施蒂纳象当时所有的空想主义者一样，在这种劳动组合中，发现了可以医治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的一付万应良药²⁴¹。

则是使我们不再受别人的安排，而由我们自己安排自己。暴动不是反对现存东西的斗争，因为如果它发展起来，现存的东西就会自行灭亡；它仅仅是使我从现存东西的统治下解脱出来的一种行动。如果我不去过问现存的东西而听其自便，那末它就是僵死的，就会腐朽。但是，由于我的目的不是推翻存在的东西，而是我奋起凌驾于它之上，所以我的目的和我的行为丝毫没有政治的或社会的性质：它们只是针对着我和我独自性的，所以它们是利己的”（见第 421、422 页）。

“革命和施蒂纳式的暴动之间的区别并不象施蒂纳所想的，在于前者是政治的或社会的行为，后者是利己主义的行为，而在于前者是行为，后者不是行为。”

240 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象施蒂纳一样，存在主义者也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在存在着的人与他们在原则上摈弃的社会二者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参阅让·保·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巴黎，1961年版。

241 参阅同上书，第 487—488 页：“把整个社会变成各个自愿的组合这一思想，在这里是按照施蒂纳的方式改造过的，是根据传到柏林的流言产生的；这一思想原是属于傅立叶的。但是在傅立叶的学说里，这种思想是以彻底改造现

对一切事物可以任意地据为己有的这种能力，构成了我的无限权力和绝对权威的基础²⁴²。通过这种虚幻的、建立在对于选择的一种自认的完全自由之上的占有，唯一者成为世界的主人²⁴³。既然唯一者对于违反他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一切东西都具有自由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世界，那么他就能完全完全地沉缅于对于生活的享受了。其实，这种享受毕竟纯粹是理论上的，它和解脱与占有具有同样的虚幻性。

唯一者通过虚幻的、使他与其他人和世界隔绝的这种解脱和占有的办法所达到的自我规定，把他自己做成了一幅对于真正的人的讽刺画，一个纯粹的怪影²⁴⁴。

代社会为前提的，……是以批判这些‘联盟’的一切无聊为基础的。傅立叶在描述现今这些逍遥作乐的企图时，指出了它们与现存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联系，并且驳斥它们；而桑乔却远远没有想批判它们，他准备把它们全部搬到他那种给人们带来幸福的‘相互协议’的新制度中去，这只是再一次证明了他是多么坚决地充当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俘虏。”“桑乔表示了这样一种诚挚的愿望：在他那个以相互剥削为基础的联盟里，一切成员都想同样有力量、同样狡猾等等；因而每一个人都剥削别人，同样地也受到别人的剥削；因而任何人在自己的‘最自然和最明显的利益’上都没有受到‘欺骗’，任何人不会‘靠牺牲别人来满足自己的要求’。”

参阅同上书，第452—461页。

242 参阅同上书，第462页：“要知道你有多少权力，你就有多少货币，因为你为你争到多大的权势，你就有多大的价值”（见第353、364页）。

第337页：“法——人的权力}——{权力——我的法。

作为我的法的权力=我的权力。”

243 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选择自由在存在主义者那里和在施蒂纳那里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

244 参阅同上书，第268—269页：“思想深奥的雅各装出关于这个唯一者没有什么可说的样子，因为他是活生生的、有形体的、并非虚构出来的个人。但这里的情况大概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末尾所说的绝对理念以及《哲学全书》末尾的绝对个性相同，对于这二者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结构里面已把关于这些虚构出来的个性所能讲的全部包括了。黑格尔知道这一点，而且

施蒂纳对唯一者的这种辩护，不过是柏林庸人和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的唯心思想的反映而已²⁴⁵。实际上，唯一者对社会和国家的态度，不过就是小资产者对社会和国家的态度的表现。唯一者的反抗就是小资产者的反抗，后者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改变那压在他身上的事物的状况，只有大声喊叫他的人格不可触犯和自己的绝对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肯定自己的自主性，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²⁴⁶。正如唯一者的反抗一样，他那想要充分享受生活的妄想，也是小资产者种种不现实的渴望的表现。施蒂纳从18世纪法国哲学中抄袭来的享乐哲学，在当时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生活方式，而在他那里，却成了纯粹的空话，因为对于生

也不怕承认这一点，施蒂纳却伪善地断言他的‘唯一者’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不只是虚构出来的唯一者，而且是某种难于形容的东西，就是活生生的有形体的个人。但是，如果把这一切翻转过来，如果确定唯一者是所有者，并说明独自性这个普遍的范畴就是所有者的普遍的定义，那末这种虚伪的假象就会消灭。这样做不仅是把关于唯一者所‘能说’的一切都说了，而且也说明了他究竟是什么。”

参阅第157页：“这里谈到的是从无中创造自身的精神，即从无中把自己造成精神的无。”

参阅第295—300页。

245 参阅同上书，第296页：“而局限于地方范围的柏林教书匠或著作家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的活动仅仅是一方面辛苦工作，一方面享受思维的陶醉，他们的世界就限于从莫阿毕特区到科比尼克区，钉死在汉堡门以内，他们的可怜的生活状况使他们同世界的关系降至最低限度。在这样的人那里，当他具有思考的需要时，他的思维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和他本人以及他的生活一样地抽象，而且对于这个毫无抵抗的人成为一种惰性力量，这种惰性力量的活动使他有可能从他的‘丑恶的世界’中获得片刻的解脱，使他能得到瞬间的享乐。”

246 参阅同上书，第358—359页：“小资产者还这样自我安慰：尽管他们作为德国人也没有自由，但是他们所受的一切痛苦已经通过自己的无可争辩的独自性而得到了补偿。”

参阅同上书，第340页：“多情和吹牛的统一就是暴动。当暴动是对外即针对别人时，它就是吹牛；当它是对内即自鸣不平时，它就是多情。”

活的享受在唯一者那里不过是一种想象的产物而已²⁴⁷。这种大力宣扬能够任意占有一切事物的哲学，事实上是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家致富的小资产者的空想的表现。而为保障各自的财产组织联盟这一想法，同样也是反映了小资产者的愿望的，他们担心自己由于竞争会落得一败涂地，因此渴望看到自己的财产能够得到保障²⁴⁸。

满足于对现存事物的状况作系统的否定而对它并没有予以丝毫改变的施蒂纳，尽管摆出了一付西班牙喜剧中的勇士的神气，而骨子里却是一个保守分子。既然在事实上他愿意维护私有制、

247 参阅同上书，第488—489页：“在欧洲，宣传享乐的哲学同昔勒尼学派一样古老。在古代，这种哲学的创始者是希腊人，在近代是法国人，而他们成为创始者的根据也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气质和他们的社会特别容易使他们追求享乐。享乐哲学一直只是享有享乐特权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巧妙说法。至于他们享乐的方式和内容始终是由社会的整个制度决定的，而且要受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影响，则已经不用说了；一旦享乐哲学开始妄图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宣布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人生观，它就变成了空话。”

参阅同上书，第444页：“这种暴动的哲学，归根到底就是对暴发户（暴发户就是钻营到上层去的新贵、暴动者）的吹捧。每一个暴动者在自己的‘利己主义的行为’中都面对着一个特殊的现实，他总企图凌驾于它之上，却不考虑一般的关系。他之所以力图摆脱现存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是他的障碍，相反，在其他方面，他却力图尽快地把它攫为己有。”

248 参阅同上书，第488页：“桑乔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成为‘万能的人’，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在相互关系上都应当成为无能的人。根据桑乔的这种要求，人人具有的这种同等力量就是一个十分合乎逻辑的要求，它同小资产者对人人都在追逐利益的一个盘剥盛行的世界闲逸愿望是符合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位圣者无缘无故地突然假定存在着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每个人都不用‘牺牲别人’就能顺利地满足自己的要求，但在这种情况下，剥削理论又成为对个人彼此间的现实关系的一种毫无意义的义释了。”

参阅同上书，第468页：“这样，桑乔在联盟内由于社会组织而会 *malgré lui* [违反自己的意志] 失去自己的独自性，如果我们例外地把独自性当作个性的话。至于现在桑乔由于政治组织而放弃自己的自由，这一点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而且更清楚地证明桑乔多么热中于在自己的联盟内确立现代秩序。”

分工、货币和竞争，那么，这就必然会导致他去坚持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秩序²⁴⁹。

由于他没有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并且由于他把社会关系的改变归结为一种意识的改变，因此，他保留了哲学思辨的一切幻影，并且心甘情愿地满足于一些道德说教和抽象把戏，他的全部学说也就仅限于此。到施蒂纳为止，思辨哲学可以说达到了它的最后的极限²⁵⁰。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思辨哲学的批判标志着一个时期——在这时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反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论而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终结。相反，他们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论战则开创了他们的思想和革命活动的一个新时期，在这时期中，他们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并开始参与它的革命斗争，接着，取得了这一斗争的领导，而这这就要求他们

249 参阅同上书，第341页：“这位真正的利己主义者，正如以上所说的，是一个最大的保守分子，他终于搜集了满满十二筐‘人的世界’的破烂，……既然他的全部活动只限于就他从哲学传统中承袭下来的思想世界玩弄一些陈旧不堪的诡辩的把戏，所以不言而喻，现实世界对他说来根本是不存在的，因此也是不会继续存在的。”

参阅同上书，第467—468页：“他一点也没有触动旧社会以及个人对分工的服从；在这种场合，他就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分工以及由于分工使他所从事的特定工作和所处的生活状况不可避免地强加给他仅有的‘独自性’。”

250 参阅同上书，第286—287页：“桑乔反对欲望和思想的固定化的‘暴动’，可说是关于自我控制的无力的道德说教，并再一次证明他不过是赋予小资产者的最庸俗的念头以思想上夸张的说法。”

参阅同上书，第424页：“顺便指出，德国哲学是从意识开始，因此，就不得不以道德哲学告终……”

同只能阻碍革命斗争的一切教条主义和一切空想主义彻底决裂。

正如对思辨哲学的驳斥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一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的先决条件一样，摈弃一切空想则是合理地正确地领导这一斗争的必要条件。

他们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正如对思辨哲学的批判一样，是以他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作为根据的；而他们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首先指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它是空想社会主义在德国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散布越来越广，并且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的学说中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的分析为出发点的，他们保卫无产阶级化了的中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利益；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则不同，他们既不直接参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也不参与革命的手工业者和无产者的斗争，他们只是根据那些主要从费尔巴哈和赫斯那里抄袭来的哲学主题来建立自己的学说。由此也就产生了他们学说的特殊性：不同于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他们的学说由于缺乏一种坚实的社会基础，就表示出一种标志着思辨和空话连篇的倾向。

真正的社会主义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赫斯的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出发，把社会主义改变成为一种伤感的空想主义。这样，它给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造成的危险，就同它给德国无产阶级造成的危险一样大，因为那时德国的无产阶级正在形成，力量还很微弱。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向它进行战斗并予以批判，与此同时，也要批判给真正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原理的费尔巴哈和赫斯。

1. 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特别是对赫斯的批判，并不象他们对布·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那样具有系统性，而是写得非常简略。

在他们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恩格斯写的批判费尔巴哈的一些材料也加进去了；人们认为这些材料不能同他们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写的批判分开，而是它们的补充；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陈述的一些基本思想作为出发点的。虽然在他们写的批判中，比起对布·鲍威尔和施蒂纳这两个他们现在认为是有害的夸夸其谈的人的批判来，表现得并不严厉，可是他们对待费尔巴哈，还是象马克思在他的《提纲》中的态度一样，并没有过分宽容²⁵¹。

费尔巴哈的功绩在于：他从根本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哲学，指出观念并不是在自身存在着的，它们不是不依赖于孕育着它们的人而存在的，它们是人的思维的产物。此外，由于他从人的具体

25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541—543页；《德意志意识形态》(法文本)前引书，第604—607页；《弗·恩格斯—费尔巴哈》。恩格斯利用写费尔巴哈批判的机会，重读了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并且读了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宗教的本质》，发表于《爱比格尼》，莱比锡，1846年，第1卷。关于这本著作，他在1846年8月19日从巴黎写信给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37—38页)：“我在《爱比格尼》上粗略地看了一遍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这篇东西，除了有几处写得不错外，完全同过去一样。一开头，当他只限于谈论自然宗教的时候，他还不得不较多地守着经验主义的基地，但是接下去便十分混乱了。又全是本质呀，人呀，等等。我要比较仔细地读一读，如果其中一些重要的地方有意思，我就在最近把它摘录给你，使你能够用在有关费尔巴哈的地方。”

方面对人加以观察，即不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从人与其他的人的关系方面加以观察，他就超越了他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但是，他没有能够彻底地批判唯心主义，达到一种正确的唯物主义观点，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实践，考虑到人的生产活动，而人正是通过这种活动，才自己得到发展，同时也改变了自然的。他没有把人同时作为感性的对象和感性的活动去观察，从而他也不能够考虑到生产活动在人的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此看来，归根结底他实际上还是从人的普遍性方面来观察人，因此，他对于人的看法还是半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这一点说明了他的哲学的全部缺点所在²⁵²。

由于费尔巴哈不认识实践和生产活动——人正是通过实践和生产活动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自然以使之适合于自己的需要的——的革命作用，他就没有从自然的真实形式，就是说从那个被人的劳动所改变了的自然的去观察自然，而是从自然的原始形式——除了那荒无人烟的或未开化的地方以外已不再存在的那个自然的原始形式——去观察自然。他没有看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存关系是被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因此，他认为存在于人

²⁵² 参阅同上书，第50页：“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关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因此，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病的贫民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参阅同上书，第48页注。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由那种把人与原始的自然联结起来的一些同样的联系所构成的，这就使得他在人对自然的态度这个看法中带有根本的直观的和消极的性质。

要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在人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改变中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那么，只要看一看这个原始的自然，当它变为一个农业国家或更进一步变为一个工业国家时是被弄得怎样天翻地覆，也就够了。另外，如果人们停止劳动哪怕只是一年，这个自然将会改变到什么程度，那也是很难设想的。从费尔巴哈强加于人的这种对自然的直观态度中以及从之产生的人同自然的种种关系中，得出这样的结果：他按照原始氏族的样子把自然给神圣化了，他赞颂它的宏伟壮丽和无上权威。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在前一种情况下，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破坏着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为了消灭这个障碍，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哲学直观之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依靠商业的结果才在我们这个地区出现。由此可见，

樱桃树只是依靠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可靠的感性’所感知。”

“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例如，关于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就是这样……然而如果考虑到，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象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而这一切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²⁵³

费尔巴哈不认识实践的革命作用，因此在他看来自然不过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东西，同样，由于缺乏这同一认识，他在人身上所看到的，就不是一个凭着自己的生产活动在历史进程中自行发展、并且被由于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种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决定的存在，而是一个从永恒以来就被自己的本质所决定的

²⁵³ 参阅同上书，第48—50页。

存在，这就赋予了人以一种绝对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在《未来哲学原理》中他说得好：人的生活和劳动状况构成人的本质，但是，由于他没有看到这些状况是由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决定的，所以他这一断语毫无价值，从而也就产生了他的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抽象观念，以及他在全面驳斥唯心主义时的软弱无力，尽管他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²⁵⁴。

费尔巴哈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想法，是同他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想法相符合的。这些关系不具有社会的性质而具有人类学的性质；它们不是同人们要使自己的活动一致的需要相符合的，而是被归结为把社会上互不相关的个人连结起来的一些联系，也就是费尔巴哈神秘地说成是“我”和“你”的结合的那种联系²⁵⁵。他没有看到人们之间的关系乃是被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

254 参阅同上书，第48页：“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末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对费尔巴哈的总的世界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只能把它们看作仅仅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

255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541页：弗·恩格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的全部哲学总起来说是：1）一种被动的自然崇拜的哲学，即在自然面前，人们对它的壮丽和全能五体投地地予以顶礼膜拜；2）一种人类学，就是说：a）一种生理学，在这种生理学中，除去唯物主义者对灵魂与肉体的统一已经谈过的东西以外，不再谈论任何其他东西，而即使这一点，也不是以机械的观点予以说明，相反，是以更为神秘的方式去予以肯定的；b）一种对于爱的光荣大唱赞歌的心理学，这与自然崇拜是相符合的，而且并不包含任何新东西；3）一种道德学，它要求人们在活动时符合人的概念，事实上，不过说明在行动上的无能为力罢了。”

参阅第54节，第81页：“对于人的胃，人的道德和理性并不把它看成是一个动物的器官，而看成是一个人的器官……”

第61节：“作为道德的存在的人”以及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关于道德观念的一切胡言乱语。

的一些社会关系，并且他把这些关系归结为在人们之间自行建立的一些自然关系，因此，他所理解的人的共同体不是社会，而是他在其中看见所有个体人的真实本质的人类²⁵⁶。

由于把社会关系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维持着的一些自然关系，他就赋予了感性特别是友谊和爱情以一种决定性作用，不管在个人生活中还是社会生活中都是如此²⁵⁷。由此就产生了他对社会关系的想法，即这些社会关系主要归结为“你”和“我”通过友谊和爱情的途径来实现的一种结合。只有这种结合，在把自己的生活与人的共同体的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容许个人实现他那在类中得到表现的本质，并因此而成为一个真实的人。

这个由于把人同他的社会关系割裂开而使人成为一种抽象的人类学的观点²⁵⁸，是与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相符合的；

256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50—51页：“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

参阅同上书，第48页注。

257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542页：恩格斯：《费尔巴哈》：“如果费尔巴哈没有想到最能表示你和我结合的性的活动、生殖活动的话，那么，（关于你和我统一）这句话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社会成为实践的社会，则这个社会……将象产生肉体的人那样仅限于产生人，产生道德的人（第67页）。除去他在道德上和肉体上创造了一些人之外，关于人生产的东西何时将要完成，在这一点上他一个字也没有提。”

258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卷，第77页：“哲学家们

他的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使他不能懂得社会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也不能对这些问题提出正确的解答。

对费尔巴哈来说，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个人与类之间的关系的问題。他认为，人在生存的正常状况下作为个体的人是能够实现自己的本质的，就是说，能够过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类的本性的生活²⁵⁹。他把存在与本质、个人与类之间产生对立的情况看成是一种不幸的情况，而对这种不幸的情况，人们是很少能够补救的。

上述这种对立乃是正常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被迫通过社会革命去消除事物的现存状况，他没有看见并且拒绝去看见这种对立，因而他就否认这样一种革命的必要性²⁶⁰。

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

259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541页:弗·恩格斯:《费尔巴哈》:“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人只能在现社会的范围内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一般地说,人首先感到彼此的需要,人只有在彼此的交往中才能发展自己的需要和才能——这一事实,费尔巴哈是以如下的方式来表达的:‘从其自身来观察的个人是不具有人的本质的’、‘人的本质只包含在共同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这个统一只是建立在我和你之间的真实的差异上面的。人自身,是通常意义的人;与人结合在一起的人,即我与你的结合,乃是上帝’(即非通常意义的人)”,第61节,第83页。

260 参阅同上书,第543页:弗·恩格斯:《费尔巴哈》:“这是对事物现状的多么美好的赞颂啊。为数不多的那些反常的情况,避而不谈了,从七岁起,你就非常喜爱在一个煤矿里把门关上,独自在黑暗中呆上十四个小时,因为在那里才有你的存在,同时,也有了你的本质。”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7页:“我们举出‘未来哲学’中的一个地方作为例子来说明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这也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敌人的共同之点。费尔巴哈在这些地方证明: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人的‘本质’感到满足的东西。任何例外在

另外，具有特色的是，我们看到费尔巴哈对于存在与本质、个人与类二者之间可能出现的不和谐，不是从社会方面而是单单从宗教方面去加以考虑。实际上，他看到了这种不和谐的主要原因以及它突出地表现在宗教这个领域里；它之所以在宗教中产生，是由于人把自己的类的一些品质异化给上帝，只有用批判宗教的办法取消宗教，这种异化才能被制止。

费尔巴哈不是从历史的和社会的观点而是从人类学的观点去研究宗教问题，正如他研究其他一切问题一样，因此，他必然也会象一些唯心主义者那样被引到这种想法上来：宗教问题是只能在精神领域里予以真正的解决的。这样，他把宗教问题给移植到哲学和心理学领域里来了，这种移植赋予这一问题以这样的外貌：问题不在于如何从宗教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关系，而是宗教如何改变了人的本质这一抽象问题。费尔巴哈提不出什么是产生宗教幻影的社会原因这一有关宗教的根本问题，因此他不可能找到解决宗教问题的真正办法²⁶¹。实际上，他满足于强调这一点：宗教世界是一个虚幻世界，它是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给上帝的结果。他认为，

这里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这样说来，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足于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相矛盾……(手稿至此中断)”

261 参阅同上书，第261—262页：“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一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

要消灭宗教幻影没有任何需要去废止产生宗教幻影的那些社会关系；要消灭它们，只要使人们意识到自己真实的本质就够了。这样，就把宗教问题的解决引向如何改变人类意识这方面来了²⁶²。

阻碍费尔巴哈对社会问题作正确分析的人本主义立场，说明了他的历史观何以具有唯心主义的和目的论的性质，他的唯物主义何以具有形而上学性，以及何以在他的哲学里把唯物主义与历史割裂开来。当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并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而当他探讨历史问题的时候，他采取的观点却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唯心主义的²⁶³。在他对社会问题的分析里面，象一些空想主义者那样，他用一种理想的社会观同现存事物的恶劣状况相对立，并指定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这个理想，只有这个实现才能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过一种符合于他的本质的生活。

这种理想，费尔巴哈是在人道主义这个形式下把它表现出来的，它的实现，不是通过社会革命，而是通过训练和教育的普遍推广。这种感情的人道主义应当使一切人亲如兄弟，费尔巴哈把这种人道主义看成是与共产主义相似的东西，他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革命运动，而是一种人道主义倾向²⁶⁴。

262 参阅同上书，第47页：“他希望加强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不过，我们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在力图理解这一事实的时候，达到了理论家一般可能达到的地步，但他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

263 参阅同上书，第51页：“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264 参阅同上书，第47页：“从这全部分析中还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犯了多大的错误。他（“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2卷）借助于‘社会的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把这一规定变成‘人’的宾词，认为这样一来又可以把表

费尔巴哈哲学的人道主义性质，说明这一哲学最终将变为一种道德学说，就象基督教一样，号召人们成为一些真正的人，这样做，由于排除了一切革命行动，只不过是招认自己的无能为力罢了。

由于归根到底历史的实现被归结为意识的发展，费尔巴哈的哲学尽管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其实它是与思辨哲学一脉相承的，而且，它具有保守性质，虽然它与思辨哲学的方式有所不同。它实际上肯定只有时间才能超越存在与本质之间可能出现的对立，而这就是对于已建立的秩序重新给予确认²⁶⁵。

2. 对莫泽斯·赫斯的批判²⁶⁶

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赫斯曾同他们合作过，并且，那时他同他们的联系也还是很密切的，但是，毕竟因为深受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赫斯和费尔巴哈一起

达现存世界中一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变为一种空洞的范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立即用费尔巴哈关于共产主义者的观念来代替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样做的目的多少是为了使他们能够象同‘产生于精神的精神’、同哲学范畴、同势均力敌的敌人作斗争那样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

²⁶⁵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543页:“存在并不是一个与事物分割开来的一般概念。它与存在着的那事物是一个东西……它与本质混为一体。作为我的本质的东西就是我的存在……只是在人的生活中,而仅仅是在一些反常的、不幸的情况中,存在才与本质割裂开来……而且,由于这种分裂,人不是真正地同他的灵魂在一起了,而是事实上同他的肉体在一起了。你是你自己,只有你的心在你那里的时候。但是,除去一些反自然的情况,一切事物都喜爱在它们存在的那种境况中存在着,满足于它们之所以为它们。”(见第47页)

²⁶⁶ 关于赫斯的思想体系的发展,请参阅本书第1章。

给真正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还是进行了批判，不过，老实说，比起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来，他们对赫斯的批判就远不是那么具体了。

赫斯在建立自己的学说时是以这一思想为出发点的：只有用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去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批判，人们才能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实践上正确地解决社会问题。他认为，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缺点在于：他们没有对人的本质以及人的本质被异化这方面作过认真的思考；这就使得他们找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他们所考虑的只是社会问题的实践这一方面。

费尔巴哈的功绩就是：他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指出人如何由于宗教以致异化了自己的本质，并且强调指出，现实所提出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人能通过废除这种异化而重新找到自己真实的存在。他的学说的缺点是从这儿来的：他没有看到人的本质事实上是由人的集体活动构成的；这说明他的人道主义主要是理论性的。

为了使这种理论的人道主义转变为实践的人道主义，只要把费尔巴哈批判宗教时所用的原则，施用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中去就行了。资产阶级社会才是人的异化的真正原因，这种异化不再是理论上的，象在宗教中那样，而是具体的、实践的。

赫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是以这样的思想为出发点的：构成人的本质的自由而和谐的活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因为追求利润和竞争使人成为孤立而利己的个人。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本来同快乐不可分的人的自由活动被一种使人感到负担的活动、一种强制的劳动所代替，使劳动成为一种受剥削的、奴隶的劳动。其结果就是劳动产品不再属于创造这个产品的人，它变

为商品因而也就是变为货币，货币成了人的唯一的上帝，成了奴役人和压迫人的上帝。

由于劳动与其产品分开了，在社会上也分为占有者和非占有者，并且还产生了占有者对非占有者的无情的剥削，它使资产阶级社会变成了一个野蛮的、充满不公和掠夺的世界。

人们只能通过消灭资产阶级社会来改变事物的现状并用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来代替它。这个代替不是采用暴力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通过劳动组织、通过教育和训练的普遍推广逐渐地、和平地实现的。

共产主义将要重新建立人的自由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由于消灭了竞争和占有者对非占有者的剥削，共产主义社会中将要充满着同在自然中存在的一样的和谐，而劳动将不再与快乐分开。

从赫斯否认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作用、经常向教育呼吁、以及他对爱的神奇力量的信仰看来，他的学说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感情的人道主义和道德说教。由于这个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被用来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不能不同赫斯疏远了，尽管那时有一些原因使他们和他还保持着联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对赫斯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辛辣的批判——因为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而只是间接地宛转地提到他。这说明为什么在偶然的场合他们指出：他们对赫斯的著作不负任何责任，而且在理论范围内与赫斯无关²⁶⁷。在另外的地方他们责备赫斯在思想上没有取得任何进步，因为他满足于不断地重复同样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起初还有趣，但后来由于重复而

267 参阅同上书，第113页：“‘莫·赫斯’（对于他的著述，恩格斯和马克思完全不负任何责任）……”

变得陈腐不堪²⁶⁸。

3.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 几个不同先知的批判

对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不过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序幕。真正的社会主义到了赫斯那里已把社会主义变为一种感情的人道主义，它已表现出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是再危险不过的，因为德国无产阶级那时正在形成，对这种学说似乎是很容易接受的。

这个批判，恩格斯在出版《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一书的前言和结束语中曾简略地叙述过；全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批判《莱茵年鉴》上的两篇文章；第二部分是批判卡尔·格律恩。

A) 《莱茵年鉴》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

对《莱茵年鉴》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发表在这个期刊上的两篇文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两篇文章特别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特色²⁶⁹。

在他们的批判中，他们是从说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特性和

268 参阅同上书，第580页：“二者都是从赫斯那里抄来的，格律恩先生总是以最冠冕堂皇的手法来转述赫斯。赫斯的东西虽然已经带有非常模糊的和神秘主义的性质，但是最初——在‘二十一印张’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它只是由于有人在它已经陈旧了的时候还在《德国公民手册》、《新秩文集》和《莱茵年鉴》上不断地加以重复，因而才变成了枯燥的和反动的东西。”

269 参阅H. 塞米格(H. Semmig)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载《莱茵年鉴》，1845年，第167—173页。——R. 马特海(R. Matthäi)的《社会主义的基石》，同上期刊，第155—166页。

参阅《德意志意识形态》(法文本)，前引书，第500—533页。

它所以产生的环境开始的。正如德国的自由主义在初期只是作为英法革命的资产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具有唯心主义性质一样，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为英国、法国和德国刚刚兴起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与英法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二者间存在着的差异，跟德国自由主义与法国自由主义在最初时期二者间存在着的差异，是相同的²⁷⁰。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着眼于在自己的时代中产生实际行动，因此在他们的思考中，是从对他们当代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的批判的分析出发的，与此相反，作为思想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则是一下子跳到思辨的领域之中，自以为这样是为了永恒而思索、而写作²⁷¹。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通过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而到达社会主义，这一事实就说明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辨性质。在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支持，以致他们不能被引导着去研究这个运动的发展所处的环境，并从而去分析种种经济的和社会的事实，所以，为了建立自己的学说，他们自然而然地向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思想求救，这就不仅说明了

270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卷，第535页：“我们在第1卷中（参看“圣麦克斯”、“政治自由主义”）考察过的那种迄今存在的德国自由主义和英法资产阶级运动之间的关系，在德国社会主义和英法无产阶级运动之间也存在着。”

271 参阅同上书，第544—545页：“最后，在下面这个经典性的论断中，简略地叙述了我们的作者、所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思想家和其他民族的现实运动之间的对立。德国人是 *sub specie aeterni*（从永恒的观点）根据人的本质来判断一切的，而外国人却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存在的人们和关系来观察一切的，外国人思考和行动是为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德国人思考和行动却是为了永恒。”

他们的思辨的倾向，也说明了他们的形而上学的倾向²⁷²。

他们按照思辨哲学家同时也是按照费尔巴哈的样子，把社会关系变为从共性方面去观察的抽象的人与世界的一些关系，并且认为，个人从自己的生存条件方面获得的观念乃是这个抽象的人所专有的观念。他们照一些思辨哲学家的方式借助于范畴和概念进行思维，把概念的发展同现实的历史的发展混淆起来。从这里就产生了他们的历史观的唯心主义的和目的论的性质，这种唯心主义的和目的论的性质，正象在所有空想主义者那里一样，是被他们为历史所指定的目标先天地决定了的。

他们的学说是仿照赫斯的学说建立起来的，是费尔巴哈的一些基本原理同某些从法国社会主义者那里抄来的概念的奇异的混合物，对于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毫无所知，只不过从施泰因和埃尔克斯所编选的东西那里知道一些而已²⁷³。

在他们的思考中，他们也象赫斯那样，是从人只是作为人、

272 参阅同上书，第537页：“由于德国现在事实上存在着的各种关系，所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这个中间派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想把共产主义和流行观念调和起来的企图。同时，以下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许多曾以哲学为出发点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正是通过这样的转变过程走向了并且继续走向共产主义，而其他那些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的人，将终生宣传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参阅同上书，第536页：“他们把一定的、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各生活领域的意识同这些领域本身割裂开来，并且用真正的、绝对的意识即德国哲学的意识的尺度来衡量这个意识。他们始终一贯地把各个具体的一定的个人间的关系变为‘人’的关系，他们这样来解释这些一定的个人关于他们自身关系的思想，好象这些思想是关于‘人’的思想。因而他们就离开实在的历史基础而转到思想基础上去，同时又由于他们不知道现实的联系，所以他们也就很容易用‘绝对的’或者另外的思想方法虚构出幻想的联系。”

273 参阅同上书，第535页：“除德国共产主义者之外，还出现了许多著作家，他们接受了英国和法国的某些共产主义思想，把这些思想和自己的德国哲学前提混为一谈。”

只是通过他的自由活动——即把劳动和快乐与之联系在一起的自由活动——才能真实地表现自己这一概念出发的²⁷⁴。人们的现实的不幸，是因为他们的活动已变为一种奴隶的劳动，而在这种劳动中，快乐不见了。在劳动与快乐之间出现的分裂是财产私有制的产物，这种私有制引起追逐利润和竞争，把人与人彼此孤立起来，并使利己主义、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强者对弱者的剥削普遍产生，这样，就摧毁了本来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和谐²⁷⁵。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再也找不到种种必需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本质了，这个社会也不再是他们真正的共同体的、他们的类的存在的表词，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和抱有敌意的权威。

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废除私有制、利润和竞争，人的活动才会重新变为一种把劳动和快乐结合在一起的自由活动，以前在社会中曾存在过的那种原始的和谐才会重新建立起来，就象存在于自然界中的那种和谐一样。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把自然看成是一个由一切存在物组成的有机的和谐的整体²⁷⁶。他们有这种观念，是因为他们把人的一切性质赋予了自然，以致于自然竟成了人类的被理想化了的反映²⁷⁷。这就使得他们可以在自然界的和谐这个问题上随便发表

274 参阅同上书，第545页：“活动和享乐在人的特性中是一致的。二者都是由这种特性来决定的，而不是由我们之外的产品来决定的。”

275 参阅同上书，第546页：“我们从作者那里认识到，社会野蛮化了，因此，组成这个社会本身的个人遭受到各种痛苦。社会跟这些个人隔开而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它按照自己的方式野蛮化，正因为这样，个人才因它的野蛮化而遭受痛苦。”

276 参阅同上书，第559页。

277 参阅同上书，第558页：“‘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从必须消灭生活和幸福之间的二重性这样一种思想出发的。为了证明这一论点，他求助于自然界，断言在自然界中不存在这种二重性，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人同样是自然界的

议论，其实，在自然中到处都充满着为求得生存而进行的无情的斗争²⁷⁸。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在把自然和原始社会予以理想化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如自然界给植物提供了比较好的发展条件一样，社会也应该给个人提供较好的生存条件，既然在原始时期情况就是如此；而这，正是每个个体人有权向社会要求的东西²⁷⁹。对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反驳说：不要说植物不能向自然界要求它所需要的生活条件，就是个体的人同样也不能要求社会满足他的需要和愿望。说个体的人不能要求社会满足他的需要和愿望，这里包含着一个前提，即个体的人应该向社会要求那些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的東西，而革命，只能是个体的人的行动²⁸⁰。

物体，并具有一切物体所具有的共同特性，因此人也不应当有这种二重性。……我们这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样把自然界神秘化之后，又把人的意识神秘化，把人的意识变成被他们神秘化了的自然界的‘镜子’。不言而喻，如果以意识的表现——有关人的关系的那些虔诚愿望的思想表现——来代表自然界，那末意识就会只是自然界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镜子而已。”

278 参阅同上书，第557页。

279 参阅同上书，第561页。

280 参阅同上书，第562—563页：“因为社会毕竟还是不符合自己的原型，不符合自然界，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要求’社会依据自然界来安排自己，他用植物这个倒霉的例子来证明自己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第一，植物根本没有向自然界‘要求’上述的一切生存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那末，植物也就不会成为植物，而仍旧是种籽。其次，植物的‘枝叶、花朵和果实’等的特性密切地依赖于‘土壤’、‘热度’等等，一句话，是依赖于它所生长的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因此，妄加在植物身上的这种‘要求’被归结为植物对现有的生存条件的完全依赖；但是，根据这一个要求，我们这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认为自己有权来要求把他的个人的‘独自性’作为社会机构的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是以椰子树的这样一个想象的要求为基础的：椰子树要求‘总合的生命’在北极地区给它提供‘土壤、热度、阳光、空气和雨水’。”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里，个人和社会变成一些抽象、一些范畴，而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则变为一些范畴之间的关系。个人成了个别性的体现，社会成了普遍性的体现，而它们的关系则被理解为个别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这样，对于构成个人和社会的真正性质是什么、它们的真正关系和发展等这些问题，人们就不再费心去思考了²⁸¹。

对于被认为是劳动与快乐之结合的人类的活动这个问题，也是以同样抽象的方式来进行研究的。事实上，他们对于人类的活动并不是从它与生产的关系这方面去加以分析，而是把它看作人

参阅同上书，第563页：“关于自由地发展天资的原理也得到了自己的正确的表达和真正的论证。这个正确表达就是这样一种胡说八道：构成社会的个人可以保持自己的‘独自性’，他们可以希望保留他们现在的样子，同时却又要求社会来一个只有在他们自身发生变化后才会发生的变化。”

- 281** 参阅同上书，第561—563页：“象我们已经在上面看见的一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某些思想强加于自然界，他想要在人类社会中看到这些思想的实现。以前单个人被宣布为自然界的镜子，而现在则是整个社会被宣布为自然界的镜子。现在可以根据强加于自然界的各个观念作出关于人类社会的进一步的结论了。由于作者满足于这种空洞的类比，没有深入去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以不清楚为什么在任何时代社会都不是自然界的正确的反映。因此，认为社会是同个人对立的限制性力量的说法等等就可以运用于一切社会形态。……我们的作者不是把社会、‘总合的生命’看作它赖以构成的‘单个的生命’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只是把它看作还同这些‘单个的生命’发生特殊的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如果这种论断也有一点和现实关系的联系作为基础的话，那末这只是一种关于国家对于私人生活具有独立性的幻想，只是把这种表面的独立性看作某种绝对的东西的信念。其实，这里象在整篇文章中一样，所指的不是自然界和社会，而是个别性和普遍性这两个范畴，这两个范畴被赋予各种不同的名称，并且说这两个范畴是对立的，因而调和这种对立是非常需要的。”

“上面所谈到的那种单个人对社会的要求是由形而上学的两面即个别性和普遍性的虚构的相互关系引伸出来的，而不是由社会的现实发展所产生的。为此，只需要把个人宣布为个别性的代表、它的体现，而把社会宣布为普遍性的体现，整个戏法也就变成了。”

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性质。作为这种活动之组成因素的劳动与快乐，同样也是被抽象地理解的，不管是对于它们自身，还是对于它们的关系。这样一来，劳动就成了一个不分青红皂白地适用于一切劳作和劳动的一切发展阶段的范畴。从这方面来看，劳动就是被归结为自由的和纯粹的活动、被归结为活动自身，它既没有具体的实在性，也没有物质的成果。这种纯粹的活动，不是被一些具体的动机所规定，而是由这个纯粹活动的主体的自由意志所规定；而这个活动的主体，并不是被种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所决定的真实的人，而是人自身，即抽象的人，这样，这种纯粹的活动也就同精神的活动混为一谈了²⁸²。

从把物质的活动予以精神化这一点中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即当这种活动取得一种物质的性质的时候，可以说，这种活动简直就是被玷污了的。这说明何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总是轻视这种活动及其产物²⁸³。

真正的社会主义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及其对社会主义的

²⁸² 参阅同上书，第571页：“为了要证明作为生活的表现的劳动应当提供享乐，因而就假定，生活在自己每一个表现中都应当提供享乐，由此得出结论说，生活在其作为劳动的表现中也应当提供享乐。”

参阅同上书，第570页：“劳动是从关于人和自然界的纯粹抽象的观念中构想出来的，因此，用来给劳动下定义的方法既适合于而又不适合于劳动发展的一切阶段。”

参阅同上书，第548—549页：“此外，这里我们还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由活动’。我们的作者不小心，泄露了自己的秘密，他说，自由活动就是‘不决定于我们之外的物’的活动；这就是说，自由活动是纯粹的抽象的活动，只不过是活动的那种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它又被归结为‘纯粹思维’的幻想……因此，作为这种纯粹活动的基础的主体，决不可能是实在的有感觉的人，只能是思维着的精神。这样用德国方式来解释的‘自由活动’只是上述的‘无条件的、无前提的自由’的另一种表达形式而已。”

²⁸³ 参阅同上书，第549页。

想法，就正是建立在对人类活动的这种观点上的。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志而同时也是构成这一社会的主要缺点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个建立在私有制和竞争上面的社会中，劳动和快乐，生产者和劳动产品，都被彼此给分割开了。从此就产生了这个社会中的占有者与非占有者的对立，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这种对立归结为闲逸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对立的原始形式，——这是他们从最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从圣西门那里抄袭来的²⁸⁴。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看到，只有真正的私有制重新建立起来，社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种私有制产生于人类的自由活动，通过这种自由活动，生产者和他的劳动产品的结合才会得到实现。根据真正的私有制是同虚假的私有制相对立的这样一种思辨的观点，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真正的私有制必须对所有一切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一点，就正符合了小资产者愿意看

284 参阅同上书，第546页：“真的，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如此野蛮化了，有些人（食利者）象野兽一样贪婪地向他人的劳动产品猛扑，让自己的固有本质由于游手好闲而腐化；这一情况的必然结果是：另一些人（无产者）被迫象机器一样地工作，他们的财产（他们固有的人的本质）之所以丧失，并不是由于游手好闲，而是由于过度的疲劳……”

参阅同上书，第547—548页：“很可以代表我们这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一点就是：他在食利者和无产者的对立中看出了‘我们社会中的两极’。这种对立差不多在一切比较发达的社会生活阶段都存在过的，而且从远古时起，所有的道德论者就广泛地谈论过这种对立，而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期，当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有共同利益的时候，这种对立又重新被提出过。请看一看科贝特和保·路·古利耶或圣西门的著作，圣西门最初还把工业资本家列入和oisifs（游手好闲者）即食利者相对立的travailleurs（工作者）。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中达到完备地步的德国科学的彻底性，在这里，也象在任何其他场合一样，可以归结为如下一点：它不是用普通的语言，而是用神圣的哲学语言说出这种关于无产者和食利者对立的滥调，不是用恰如其分的词句，而是用空洞抽象的词句表达这种幼稚的思想。这里做的结论达到了这种彻底性的顶峰。”

到公正的财产可以得到保证的虔诚的愿望²⁸⁵。用真正的私有制去代替虚假的私有制，这将是社会主义所要做的工作。

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赫斯的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中受到启发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置无产阶级斗争于不顾，而且实际上部分地吸取了小资产者的思想意识，他们把社会主义归结为一种符合于人的类的本质的人的笼统的共同体。他们把自然的本质同人的本质统一起来，认为人的本质通过由于社会主义而重新建立起来的人的共同体而将重新得到实现，因为社会主义将摧毁那个产生非人道和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²⁸⁶。

他们按照空想主义者的思想方式，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他们使之与现存社会相对立的一种理想。他们象思辨哲学家们那样确信精神的万能，认为社会上的矛盾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些观念的对

²⁸⁵ 参阅同上书，第554页：“这种真正的所有制的理论把至今存在着的一切现实的私有制只看成是一种假象，而把从这种现实的所有制中抽象出来的观念看成是这种假象的真理和现实；因而这种理论彻头彻尾是思辨的。这种理论只是更明确地表现了小资产者的观念，这些小资产者的博爱的意图和善良的愿望也就是要想消灭没有财产的状况。”

²⁸⁶ 参阅同上书，第566—567页：“从普遍的本性引伸出‘人类平等’和共同性。因此，一切人所共有的关系在这里成了‘人的本质’的产物、人的本性的产物，而实际上，这些关系象对于平等的意识一样是历史的产物。但是我们的作者不满意这点，他这样来论证平等，即认为平等是完全奠定在‘共同的存在基原’上的。……我们知道了自然界是‘一切生命的基础’，因而是‘共同的存在基原’。因此，我们的作者完全胜过了法国人，他‘作为社会的一个有意识的成员’，不但证明了人们彼此之间的平等，而且证明了他们对任何一个跳蚤、任何一个墩布、任何一块石头的平等。”

“我们乐于相信，我们这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一切社会美德’是以‘对人类自然联系和一致的感觉’为基础的，虽然无论‘封建义务’也好，奴隶制也好，或者历来的一切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好，都是以这个‘自然联系’为基础的。”

立，而这些对立是能够通过精神的途径解决的²⁸⁷。另一方面，他们同慈善家和改良主义者一样，认为社会问题能够并且应当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用不着经济的和社会的深刻革命，因此，在社会改革中，他们特别重视诸如劳动组织、尤其是教育、训练以及人类博爱的普及这类治标的办法。他们认为教育、训练以及人类博爱的普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人的自由活动重新建立起来了，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个体的人就可以过一种符合于他的类的本质的和谐的生活，而大地对于人就将重新变为天国，变为一个新的乐园²⁸⁸。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唯心的、空想主义的性质，说明了它的思辨的、感情主义的倾向，从而，也说明了它的华而不实的空谈的倾向。由此也就产生了这样的事实：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谈话的对象，与其说是无产阶级，不如说是一些被哲学的神秘之光所照耀着的人们；在他们的通俗著作中，与其说他们是诉诸读者的理智，不如说是诉诸读者的感性²⁸⁹。

²⁸⁷ 参阅同上书，第551页：“我们从第172页上知道，‘经院习气的最后结果就是生活的分裂，而赫斯已把这种分裂消灭了。’因而，理论在这里被说成是‘生活的分裂’的原因。如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哲学家们认为所有现实的分裂都是由概念的分裂所引起的，那末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般还谈论社会。既然他们充满了关于概念能够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这一哲学信念，他们当然也就会认为某一个人能够通过消灭某种概念而消灭生活的分裂。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象所有德国的思想家一样，经常把文献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当作意义相同的东西而混淆起来。这种手法在德国人那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始终非常丰富的幻想和现实等量齐观，以此来掩饰他们在现实的历史上曾经扮演过的并且还在继续扮演的可怜的角色。”

²⁸⁸ 参阅同上书，第569页。

²⁸⁹ 参阅同上书，第537页：“‘真正的社会主义’硬要人们相信，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其实，它本身首先就是某种神秘的科学；它的理论著作只是对那些熟知‘思维着的精神’的秘密的人才存在的，但是它也有公开的著作；它既然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满以为构成他们学说的这种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大杂烩乃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最高形式²⁹⁰。他们对这个学说感到非常自负——这个学说可能是德国的真正科学的表达，只有它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种种社会问题给以正确的解决²⁹¹——；他们沾沾自喜，并且傲视英国和法国的那些空谈共

关心社会的、公开的关系，也就必须进行某种宣传。在这种公开的著作中，它就不是诉诸德国人的‘思维着的精神’，而是诉诸德国人的‘心灵’了。而这样做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说来是再容易不过的，因为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因此，它不是向无产者，而是向德国人数最多的两类人呼吁，就是向抱有博爱幻想的小资产者以及这些小资产者的思想家，即哲学家和哲学学徒呼吁。”

- 290 参阅同上书，第536—537页：“他们赋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那个‘真理’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对他们来说却是完全不可解释的，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这些思想的纯粹文献上的联系甚至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是由于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们对这类文献的错误了解。本来这些共产主义体系以及批判性和论战性的共产主义著作不过是现实运动的表现，而他们却把这些体系和著作同现实运动分裂开来，然后，又非常任意地把它们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

“这样把法国人的思想翻译成德国思想家的语言，这样任意捏造共产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也就形成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它被大声地宣布——如同托利党人谈到英国宪法时所说的一样——为‘民族的骄傲和值得所有毗邻各国人民羡慕的东西’。

“总之，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人的精神太空（这点我们马上就要看到）和德国人的心灵太空中的变形而已。”

- 291 参阅同上书，第535—536页：“他们对‘不科学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所采取的行动，就是首先激起德国读者们对这些外国人的皮相之见或‘粗俗的’经验主义表示应有的轻视，歌颂‘德国科学’，而且还硬说它负有使命要向世界揭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理，揭示绝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于是他们立刻开始工作，想以‘德国科学’的代表者的资格来完成这个使命，尽管在大多数场合，这个‘德国科学’差不多象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原著一样（他们仅仅根据施泰因、埃尔克斯等人所编的东西才知道这些原著），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

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²⁹²。他们把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著作同社会运动——正是社会运动使这些理论家们得以产生，而这些理论家们的著作正是社会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割裂开来，因此，他们在这些著作中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些目的在于改变社会关系的革命的理论，而是一些旨在确定未来社会的一般概貌的学说，就象他们自己所做的那样²⁹³。他们对待共产主义态度特别严峻，他们谴责它的教条主义、它的唯物主义以及它的低级的实用主义性质；这些性质主要表现在：比社会主义者更进一步，共产主义只关心实际问题，这就使得它不可能接触那些单一的、真正的伟大课题——人的真正活动的问题以及人的本质的问题²⁹⁴。对于这些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回答的：共产主义特别是法国的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

292 参阅同上书，第555页：“德国人以极其自满的情绪把这个虚无缥缈的王国、‘人的本质’的王国同其他民族对立起来，宣布这个王国是全世界历史的完成和目的；他们在一切领域都把自己的幻想看成是他们对其他民族的活动所下的最后判决，因为他们到处都只能是观察者和监视者，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对全世界进行审判，断言整个历史过程在德国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这种傲慢的和无限的民族妄自尊大是同极卑贱的、商人的和小手工业者的活动相符合的。”

293 参阅同上书，第535页：“这些‘社会主义者’——或者象他们自称的那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外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并不是一定的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而纯粹是些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完全象他们所设想的德国哲学体系的产生一样，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即使这些著作是在宣传某些体系，它们仍然是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是以一定国家里的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的总和为基础的。他们把这一派中的某些著作家的幻想信以为真，似乎这些著作家所谈的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定阶级和一定时代的需要。”

294 参阅同上书，第541页：“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上根本没有了解社会主义的实质……甚至激进的〈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也远远没有克服劳动和享乐的对立……没有上升到关于自由活动的思想……共产主义

的、教条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性质，实际上是来自这样的事实：它并不象真正的社会主义那样是一种唯心的、空想的学说，而是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不知的现实社会斗争的表现²⁹⁵。它是在工人阶级还不怎么发展的这样一个时期中形成的，因此传播它的观点的最有利的形式就是空想主义的小说，在当时这类小说是最符合工人阶级的意识的²⁹⁶。

和小店主世界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在共产主义中，现实的人的财产的全部转让应当是摆脱了任何偶然性的，即应当是理想化的。（“德国公民手册”第43页）

因此，我们这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这里责难法国人，说他们本来应当帮助‘人’意识到‘自己的本质’，而他们却正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实际的社会状况。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于法国人的一切责难就在于：法国人没有以费尔巴哈的哲学作为自己的整个运动的最高原则。我们的这位作者是以关于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分裂这一现成的命题为依据的。但他不是从这个命题开始谈起，而是在思想上把问题倒转过来，一开始就说什么人没有意识，并由此作出了关于‘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的推论，接着就强使这种依赖在‘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分裂’中得到实现。”

- 295 参阅同上书，第540页：“共产主义，如同它在自己的主要中心即法国实际上所表现的一样，是同小店主国家利己主义瓦解现象的粗暴的对立；它没有超越这种政治上的对立，没有达到无条件的、无前提的自由。”（同上）

Voilà [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提出的‘无条件的、无前提的自由’的公设，这种自由不过是表达‘无条件的、无前提的思维’的实践的公式。法国共产主义确实是‘粗暴的’，因为它是现实的对立在理论上的反映，在我们的作者看来，共产主义应当超越这种对立，要达到这一点，只须把这种对立想象成已被克服的就够了。可以参看一下‘德国公民手册’第43页。”

- 296 参阅同上书，第543页：“至于说到体系本身，那末，差不多所有的体系都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开始时出现的，当时它们通过民间小说的形式来为宣传事业服务，这些民间小说同刚刚参加到运动中来的无产者的尚未成熟的意识是完全符合的。卡贝把自己的‘伊加利亚’称为 roman philosophique [哲学小说]，我们在把卡贝作为一个派别的首领来加以评价时，不应当根据他的体系，而应当根据他的论战性的著作和他的整个活动。在这些小说中间，有一些，例如傅立叶的体系，充满了真正的诗的色彩；另外一些，例如欧文和卡贝的体系，则缺乏任何的幻想，而带有商人的斤斤计较的痕迹，或者从法律上狡猾地迎合那个需要感化的阶级的观点。”

事实上，各种共产主义体系尽管具有专断的性质，但是它们毕竟是同使它们受到启发的无产阶级的生活境况密切地联系着的。我们在魏特林的例子中便看到这种情况，其他的体系也是如此。由于当时在德国并不存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因而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并没有尖锐的斗争（在英国和法国则情况正相反），所以，魏特林为要建立他的体系，就只能从他所从属的那个阶级即手工业阶级的情况中去汲取资料。

这说明他的体系是采纳了一些符合于手工业者的生活条件和精神状态的法国共产主义的思想的²⁹⁷。

随着无产阶级逐渐强大，革命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起来，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空想就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至于象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类缺乏社会基础的种种空想，就更不必说了。

B) 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²⁹⁸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那种华而不实的空谈倾向到卡尔·格律恩

297 参阅同上书，第544页：“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只是说所有的体系都是独断的和独裁性的，这丝毫没有说明共产主义体系的这种基础和内容。德国人没有英法两国人所有的那种发达的阶级关系。所以，德国共产主义者只能从他们出身的那个等级的生活条件中攫取自己的体系的基础。因此，唯一存在着的德国共产主义体系是法国思想在受小手工业关系限制的那种世界观范围内的复制，这是十分自然的事。”

298 参阅同上书，第573—628页。

那里达到了顶点²⁹⁹。

这本关于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的书，是把青年德意志派文学所专用的虚伪辞藻和人道主义揉合在一块而写成的。在这本书中，原来在真正的社会主义那里的已经很不固定的东西竟全然不存在了，这一点，和格律恩的那些伴之以大吹大擂的胡言乱语，好象在传达什么神奇的启示似的，同样给人以极不愉快的强烈印象³⁰⁰。

他的全部科学是汲取自费尔巴哈和赫斯。费尔巴哈启发给他：宗教是由于人的本质异化给神才产生的，而摆脱了异化的真正的人才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真正的人的实现乃是历史的目的³⁰¹。另一方面，他从赫斯那里还承袭了这样的观点：人的本质的异化的主要形式就是在货币中自行产生的那种形式，因此这种异化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予以废除³⁰²。

299 参阅同上书，第537—538页：“此外，‘真正的社会主义’显然是给青年德意志派的美文学家、魔术博士以及其他著作家开辟了利用社会运动的广阔场所。德国原来没有现实的、激烈的、实际的党派斗争的这种情况，在开始时甚至把社会运动也变成了纯粹的文学运动。‘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社会文学运动的最完全的表现，这种运动是在真正的党派利益范围外产生的，现在，在共产党形成以后，这种运动还想不顾共产党而继续存在。当然，从真正的共产党在德国产生的时候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愈来愈多地只在小资产者中间寻找自己的群众，而在那些萎靡和堕落的著作家中寻找这些群众的代表。”

300 参阅同上书，第573—575页。

301 参阅同上书，第575页：“‘当人们谈到费尔巴哈时，从而也就谈到从维鲁拉姆男爵培根起到今天为止的全部哲学活动；同时也指出哲学所要求的是什么，它归根到底意味着什么；指出人是世界历史的最后结果。与侈谈工资、竞争、以及对宪法和国家制度的不满相比，这是对待问题的更可靠的——因为这是更切实的——态度……我们找到了人，即找到了已摆脱宗教、已摆脱僵死的思想、已摆脱一切异己的东西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实际后果的人。我们找到了纯粹的、真正的人’”。

302 参阅同上书，第575、576页。

装备了为德国学者所专有的这种全能，他以极其自满的情绪谴责那些他认为不过是微小精神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们，并请他们到人道主义中去寻找启示，以便做出点有益的事业来³⁰³。

此外，他对法国的理论家们毫无直接认识。他对比利时和法国社会主义所谈的那一点点东西，还是从施泰因和雷博那里抄来的，并且用赫斯的一些思想去补充他自己的想法³⁰⁴。

由于他不肯对法国的学说从它们同社会的联系这方面去进行分析，他的书比施泰因的书还要低劣，因为施泰因至少还曾试图在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同法国的社会发展二者间建立一种联系³⁰⁵。

他对法国不同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批判，并不比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括的阐述好多少。他对圣西门的批判，不过是无耻地抄袭了施泰因和雷博对圣西门的批判³⁰⁶。他傲慢地

303 参阅同上书，第578—579页：“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使徒的格律恩先生，不满足于象‘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其他使徒那样，把德国人的全知和其他民族的无知对立起来。……强迫各种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政党的代表服从自己……然后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使徒的角色在他们面前出现。他唯一的任务是教诲他们，把关于自由人类的最深远的启示传授给他们。”

参阅同上书，第577—578页，卡尔·格律恩的引文。

304 参阅同上书，第580页：“我们首先指出一个图式，它和两三种陈旧的思想一起构成格律恩的著作的要点。二者都是从赫斯那里抄来的，格律恩先生总是以最冠冕堂皇的手法来转述赫斯。赫斯的东西虽然已经带有非常模糊的和神秘主义的性质……而在格律恩先生那里则变成了十足的无稽之谈。

赫斯把法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德国哲学的发展综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把圣西门和谢林、傅立叶和黑格尔、蒲鲁东和费尔巴哈综合在一起。……正是赫斯所提供的那种公式主义构成了格律恩著作的全部内在联系。区别只在于，格律恩先生没有忘记给赫斯的论点涂上一层美文学的色彩。”

305 参阅同上书，第580页。

306 参阅同上书，第581、615页。

对待卡贝,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智能有限的人,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卡贝的文章进行剽窃³⁰⁷。在他对蒲鲁东的批判中,关于蒲鲁东想要用一种系列辩证法去取代黑格尔的建立在概念发展上的辩证法的这个企图何以必然归于失败,这一点他并没有指出³⁰⁸。当然,这首先要求他能够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这一点连费尔巴哈都没有成功,格律恩自然也就更无能为力了³⁰⁹。

他对傅立叶的主要责难是:傅立叶也象费尔巴哈一样,没有寻找到构成人的本质的东西是什么;这说明他对宗教和政治作为人的异化的原因的分析以及对社会的分析是很肤浅的³¹⁰。但是,他承认傅立叶的功绩在于宣告劳动和快乐在人的活动中应当是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生产和消费彼此不可割裂开来,因为它们互相制约的³¹¹。格律恩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全部思考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庸俗的观察:应当有一些人生产商品,在生产中人们消费原料,而且,更一般地说是在消费生产费用³¹²。

307 参阅同上书,第579页。

308 参阅同上书,第627—628页。

309 参阅同上书,第556页。

310 参阅同上书,第609页:“从这个陈旧的命题的例子可以看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如何为了对抗法国社会主义者对现实的描绘,而把德国哲学家的思辨词句作为最高真理提出来,而且竭力把自己的对象,即人的本质,同法国人对社会的批评的结果联系起来。不言而喻,如果宗教和政治被当作物质生活关系的基础,那末在最终的审判中一切都会归结为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即归结为人关于自身的意识。”

311 参阅同上书,第610—611页。

312 参阅同上书,第611—612页:“格律恩先生首先证明,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一般地存在着一种关系。他谈论的是:如果没有生产大礼服和面包,他就不能穿大礼服或者吃面包,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有生产大礼服、鞋子、面包的人,而另外一些人则是这些物品的消费者。格律恩先生认为这个观点是新的。”

“……格律恩先生的另一个论点是:当他生产的时候他也在消费,即消

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理解成劳动和快乐的一致性的那个生产和消费的一致性，在格律恩看来具有一种绝对相等的价值，这就是说，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永远是相符合的³¹³。事实上，在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绝对的等值——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正是根据这一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会有生产过剩也不会有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生产和消费不是以同样的速度发展的。举例来说，面粉最初是以手推磨来生产的，后来是用风力磨或水力磨，而现在则用蒸气磨。面粉的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并不取决于面粉的消费；一般地说，这种改变有赖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变化，生产和消费之间产生的种种矛盾只有通过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才能得到解决³¹⁴。

费原料和一切生产费用；一句话，不能无中生有，人需要材料。在任何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关于再生产的消费那一章中，他都可以看到，在这种关系中产生出多么复杂的相互联系，只要不象格律恩先生那样满足于没有皮革就制不出皮鞋这样一个庸俗的真理。”

313 参阅同上书，第 613 页。

314 参阅同上书，第 611—612 页：“因此，格律恩先生方才已认识到：为了消费，就应当生产，在生产的时候要消费原料。当他想证明他消费时就在生产的时候，他就要遇到真正的困难了。在这里格律恩先生毫无成效地企图多少弄懂一点需求和供给之间最平凡最普通的关系。他理解到：他的消费，即他的需求，产生新的供给。但是他忘记了，他的需求应当是有效的需求，他应当为他所需要的产品提供等价物，以便由此引起新的生产。经济学家们也援引消费和生产的密切联系，援引需求和供给的绝对同一性，而他们正是想证明，永远不会有生产过剩；但是他们并没有象格律恩先生那样，讲出这样一些不通的和庸俗的话来。……格律恩先生还忘记了，现在生产面包是用蒸气磨，而从前是用风力磨和水力磨，更早的时候是用手推磨；生产面包的这些不同的方式完全不取决于他吃面包这一简单的行为，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生产的历史发展，而‘大规模生产的’格律恩先生却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格律恩先生甚至也没有想到，随着这些不同的生产阶段产生的还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各种矛盾；他没有想到，如果不研究这些生产方式中的每一种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就不可能了解这些矛

格律恩最大的缺陷是来自这一点：在他考虑经济问题时不是从生产而是从消费出发。如果从生产出发，那么必然就会考虑人的生产活动以及生产活动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弄明白并且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果相反地从消费出发，就用不着对生产方式和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关系进行分析，这样，就要陷于空谈；格律恩所做的正是这样³¹⁵。

他对存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真实关系一无所知；他没有看到：他认为必需的那种存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绝对的等值不可避免地要引向生产的停滞，而超过需求的那种商品的生产过剩——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一种正常现象，它影响交换价值——，必然地要引起危机³¹⁶。为了支持他的生产和消费、劳动和快乐的一致性这个论点，他终于不得不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关于人的消费所说的那些胡言乱语求救，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人的消费才符合于

盾，而这些矛盾只有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和这种制度的实际改变，才能得到解决。”

315 参阅同上书，第 614—615 页：“如果从生产出发，那末就应当考虑生产的实际条件和人们的生产活动。如果从消费出发，那末可以满足于宣称现在人们不‘象人一样地’消费，满足于关于‘人的消费’、关于用真正消费的精神进行教育的公设以及诸如此类的空洞词句，而丝毫不去考虑人们的现实的生活关系和他们的活动。

“最后还需要再提一下，正是那些以消费为出发点的经济学家是反动分子，他们忽视了竞争和大工业的革命方面。”

316 参阅同上书，第 613 页：“生产和消费的一致性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里最初的意思是：活动本身应当提供享受（当然，在他们那里这纯粹是一种幻想的观念），后来这种一致性却被格律恩先生解释为：‘消费和生产从经济学上来说应当彼此抵销’（第 196 页），不应当有超过直接消费需要的剩余产品，如有这样情况，显然一切运动都会停止。所以他傲慢地责难傅立叶，说他想以生产过剩来破坏这种一致性。格律恩先生忘记了，生产过剩只是由于它影响产品的交换价值才引起危机，然而不仅在傅立叶那里，就是在格律恩先生所建立的那个十全十美的世界中也不见这种交换价值。”

人的本质³¹⁷。

C) 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
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新世界或
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³¹⁸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以一篇对格奥尔格·库尔曼的批判作为结束的。格·库尔曼是奥地利的雇员，以受到天神感应的先知者的身分奔走于瑞士，目的则是在于使德国的手工业者们背离共产主义。这篇批判是赫斯的作品，他在很早以前就发表过一篇关

317 参阅同上书，第613—614页：“那末格律恩先生的全部活动究竟是什么呢？为了证明‘真正的社会主义’关于生产和消费一致性的原理，格律恩先生采纳了政治经济学关于需求和供给的最庸俗的原理；而为了利用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删去了其中必要的中间环节，从而把它们变为最纯粹的幻想。可见，所有这一切的中心思想仅仅是要不学无术地和空想式地把现存制度神圣化。”

“格律恩的社会主义结论是更具代表性的，它仍然是他的德国先辈们所说过的话的结结巴巴的转达。生产和消费是各自分开存在的，因为我们的颠倒的世界把它们彼此割裂开来。我们的颠倒的世界怎样作到这一点的呢？它在二者之间插入了某种概念。因而把人分为两半。”

“在竞争的范围內，每个人的消费plus ou moins [或多或少地]是以一切人的不断的消费为前提的，正如每个人的生产以一切人的生产为前提一样。问题只在于，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怎样发生的。格律恩先生仅仅用关于人的消费、关于对‘消费的真正本质’的认识的道德公设来回答这个问题（第432页），由于他对于生产和消费的真实关系一无所知，所以他只好躲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后避难所——人的本质——中去。”

318 参阅同上书，第629—640页。关于对格·库尔曼的这篇批判，可参阅W. 芒克的《莫·赫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合作》一文，载《Annali dell' Istitut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吉昂加科摩研究所年鉴》）米兰，1963年，第438—509页。在这篇文章中，对库尔曼本人及其活动作了详细的分析。文章肯定，这篇批判的作者是莫泽斯·赫斯，他在1845年第6号《社会明镜》期刊上就曾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题目是：《共产主义先知们的阴谋》。关于库尔曼，也可参阅本书第2卷，第34—35页。

于库尔曼和在瑞士的其他共产主义先知的文章。这篇文章错误地被列入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般的批判当中。实际上,库尔曼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信徒,相反地倒是同瑞士的手工业共产主义有着联系。瑞士的手工业共产主义是在魏特林和奥·贝克尔的影响下形成的,曾倾向于阿尔勃莱希特的先知主义。共产主义的这种蜕化变质说明了在瑞士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到了库尔曼,这种蜕化变质的情况就更突出了。事实上,那些在阿尔勃莱希特那里不过是表达一种狂热的宗教倾向的东西,在库尔曼那里却成了纯粹的欺骗。他妄用了在瑞士的那些德国手工业者的无知和轻信,他用一个新的人间天堂即将来临这样的幻象眩惑他们的眼睛,以便一步一步地使他们背弃革命斗争³¹⁹。他甚至成功地使奥·贝克尔相信:他已决定性地解决了社会问题,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到了他手里才诞生的³²⁰。事实上,我们在库尔曼那里既找不到对于社会关系的分析,也找不到任何具有独创性的思想;所有的不过是夸张之辞和废话。他的一些说教是对被他庸俗化了的拉梅耐的《一个信仰者的话》一书的一种讽刺的摹拟。他摆出一副能够显示灵迹的神学博士和先知的架势,宣告一个崭新的人间天国即将来临,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将享受幸福³²¹。他用田园诗般的笔调描绘当前的社会如何过渡到未来的社会,这个过渡用不着通过一场社会革命,而是采取和平的方式就可以完成。在深情地安抚了统治者和占有者以后,于是请他的听众和读者在忍耐和平静中去期待³²²。

319 参阅同上书,第629—634页。

320 参阅同上书,第629—630页。

321 参阅同上书,第632—633页。

322 参阅同上书,第639页:“你们不要破坏和消灭挡着你们去路的障碍物,而要绕过和抛弃它们。只要你们绕过和抛弃它们,它们将自行消失,因为它们再也得不到食料了。”

他所说的天国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伪造罢了。共产主义者认为,能力的不同不应该带来在满足需要方面的不同,而他则与共产主义者相反,认为由于能力的不平等,特权必须受到维护,而且,在这些特权上面还要建立一个理应构成新社会的基础的等级制,而在这等级制的最顶端,他将自然而然地找到他自己的位置³²³。这个宣扬人类不平等的永存性的学说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受剥削的辩护³²⁴。

‘如果你们寻求真理并散播光明,虚伪和黑暗就从你们中间消失。’³²³

323 参阅同上书,第636—639页。

324 参阅同上书,第636页。

结 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就，在1845和1846年初，是以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为标志的。这些原理的制定，同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使他们越来越紧密地和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并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定正符合无产阶级的需要，由于排除了唯心主义、专断主义和空想主义，就给无产阶级提供了唯一能够胜利地指导它进行斗争的理论基础。

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使他们具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的想法，这个最初的想法是在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剖析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时就产生的了。

马克思在他发表于《德法年鉴(1844)》的几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当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行动的重要性，号召用共产主义革命来消灭这个制度。但是，在这里他对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仍然带有半抽象的性质，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带有一点观念-力量(*idée-force*)的意味，而共产主义革命这个概念则似乎是个定理。

在同一《年鉴》中，恩格斯则进而明确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主要的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指出由于竞争和危机——这二者使中产阶级衰落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激化——的日益严重，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必然要导致共

产主义革命。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他那几篇文章之后不久，就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着手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更为深刻的批判。他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异化的思想，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毛病在于产生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劳动使所有的人特别是无产阶级非人化，从这里就产生了用共产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

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既然显示出劳动在决定人的生活和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他就在实践即生产劳动这个概念上建立了一种新的具有辩证和历史性质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阐明了不同于动物的人如何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自然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以及这种通过劳动而产生的自然与人的同时的改变如何构成了历史的主要内容。

这部著作建立在与真正的劳动和真正的人相对立的异化的劳动与异化的人的观点上，因此证明它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把历史分成以私有制和异化劳动为标志的非人道时期，以及必将随之而来的通过共产主义革命使异化劳动归于消灭的人类再人道时期，说明他还是多少有一点以空想主义者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的《手稿》完成不久恩格斯就发表了《英国状况》（1844）一文，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些资料，使马克思得以纠正他的仍然带有空想的和抽象性质的历史发展观，指出在目前这个时期，这个国家的状况是怎样由工业革命的发展来决定的。

在《神圣家族》（1845）一书中，通过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哲学的批判和对某些哲学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的分析，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已从抽象和空想主义中解脱出来。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的远为深入的思考，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之保持经常关系的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德国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因此，有必要来认识一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便弄明白何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是同他们的时代的总的状况分不开的。

在四十年代，作为英国状况的标志的，是工业革命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经济上和社会上的深刻变化。由于机器和作为动力的蒸气的日益广泛使用，工业革命使得手工业者和小工场主逐渐破产，使拥有新的工业生产工具的大资产者成了主要的领导阶级；但是，由于买进大量土地、改良农具和垄断煤、铁和铜这些与工业发展有关的矿藏的缘故，地主贵族阶级的势力仍然是很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之间的对立在政治上的反映，是辉格党人同托利党人的斗争。另外，大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阶级在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则又联合起来。在由于小农和农场主的破产而产生的农村无产阶级的一旁，又形成了为数越来越多的一批城市无产阶级，这是大工业急速发展的结果，是贫困使他们走向暴动的。由于取得了联盟、罢工和选举的权利，英国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在工会方面同工联一起，在政治方面同宪章运动一起，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对自己有利的斗争。

四十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差不多已达到顶点，而在法国和比利时还处于发展阶段，在德国则只不过刚刚开始，由此，这些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方面就跟英国的不同。

在法国，农业生产仍然占统治地位，工业生产总的说来还保留着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不过已越来越明显地向大工业

方面发展。在1789年的大革命中丧失了自己财产的贵族，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已逐渐衰弱，而在1830年的大革命以后，就不再起着领导阶级的作用了。

由于贵族和僧侣大量收买土地，就形成了一个由中农和小农结成的人数众多的阶级，但是这个阶级反对农具的现代化，结果，土地无限地分割为小块，它的势力也就日渐削弱。

当时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的手工业，由于手工业工场和机器工厂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也在走下坡路。手工业工场和机器工厂的急速发展，壮大了工业和银行业的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后者终于在1830年的大革命中取得了政权。它统治着国家，并且凭借纳税选举制度的限制，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政权中排挤出去。在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中产阶级同当时主要由越来越无产阶级化了的手工业者形成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并且既不能在工会里也不能在政治上自行组织的手工业者和无产者们，为了使自己的合理的要求得到充分的满足，便求助于非法的罢工和暴动，这些罢工和暴动是他们和那些秘密团体中的小有产者的革命分子共同组织起来的。

比利时在工业革命的发展方面也比英国落后，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总的说来是同法国相类似的。政治斗争在保守的大地主和自由的大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着。正如在法国一样，由于纳税选举法的规定而被排除于政权之外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趋向于互相联合起来，对国家进行共同的斗争。

在四十年代，德国比起法国和比利时来，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國家。工业革命的发展，由于受到半封建状态和国家分成很多小邦这种情况的阻碍，进度是很迟缓的，直到1834年成立了关税联盟，才给大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大工业出现

在西里西亚、萨克森，特别是在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至于在易北河东岸，仍然有半封建的大土地所有者，而在德国的中部和南部，则小农和中农的势力仍然占统治地位。

大资产阶级在势力逐渐壮大起来的同时，加强反抗封建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残余势力，它要求一种自由的制度，就是说要求建立一种纳税选举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至少部分地使它能够参与政权。

医生、律师、教授、记者等等这些中等阶级的进步分子，为了争取种种民主改革（不是自由主义的改革）而进行斗争，因为他们相信国家的民主化可以解决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们这种社会化的倾向，正如在法国和比利时发生的情况那样，使他们在思想上多多少少地逐渐同工人阶级紧密联系起来。

织工的暴动所煽起来的社会骚乱，使贫穷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于1844年末引起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在德国的典型形式——的运动。因为当时既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也没有一个革命的中等阶级，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依靠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由此也就产生了这一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性质：它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从哲学的概念出发的。它以赫斯的学说为基础；赫斯认为，现社会的最大弊端就是由于竞争而产生的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普遍化，因此，他把消灭利己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此外，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把这个学说予以极端的庸俗化，把爱情说成是改变社会的主要动力，这样，它就陷入了纯粹的空想和无稽之谈。不过，恰恰由于它处理社会问题的这种唯心主义的和诉诸感情的方式，尽管书报检查很严，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是成功地广泛传播了直到那时为广大群众所不知的社会主义思想，

并以间接的方式为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正如手工业者和无产者的革命暴动在社会上而不是在思想上为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道路一样。从德国手工业者同法国的革命的手工业者和无产者在巴黎的接触中诞生的德国手工业共产主义，在“正义者同盟”遭到搜捕以后，在英国、比利时、德国和瑞士开始传播开来，而且，由于各国无产阶级各有不同情况，它在每一个国家中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英国，德国手工业共产主义者由于受到强有力的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首先从空想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在法国、比利时、德国，特别是在瑞士，手工业生产多少还占统治地位，所以那里的德国手工业共产主义还保留着空想主义的性质，它是随着革命的手工业者参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而逐渐摆脱了这种性质的。

在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只是在1844年织工暴动时才算真正开始。以前不过是一群可怜的、被动的乌合之众的无产阶级，是在不可忍受的苦难达于顶点的时候才零零星星地起来暴动，而在这次大罢工——这是它的革命行动的起点——之后，才开始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在斗争中，它同手工业共产主义运动联合在一起，它们在社会领域里互相配合的行动则为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正是在这个总的形势下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以之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并且，为了反对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开始组织一个国际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起初，他们还是很孤立的，但是，渐渐地他们同一些倾向于共产主义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如威·沃尔弗、格·维尔特、约·魏德迈、以及卡·德斯特尔等等联合起来，这些人的思想转向他们，并在斗争中同他们站在一起。

在写完《神圣家族》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分头从事于新的思想的探索，住在巴门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住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都做了这样的工作。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全摆脱了费尔巴哈的影响，他从他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强调过的生产活动即实践的重要作用这一思想出发，不仅批判了仍然处于半形而上学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且，由于同费尔巴哈针锋相对，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反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的批判》所刚刚做的那样，还摸索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

因为费尔巴哈不理解生产活动即实践在人类生活和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对自然、个人和社会，从而也就对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都产生了错误的想法。他对感性的实在只从对象的形式这方面而不是从人的生产活动的形式这方面去观察，因此，他不是把自然看做一个人类活动的对象，而仅仅看做一个给人鉴赏的对象。这样，在他看来，自然并不是越来越被人的劳动所改变的那个自然，而是从开天辟地以来就以其原始形式呈现在人面前的那个自然。

对于实践的作用的无知，说明了何以他对个人和社会的思想同样是错误的。事实上，对于个人，他从个人同其他人的自然关系方面观察的较多，而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观察的较少，由此，就产生了他对于人的人类学观点，以及把社会看成是类，就是说，看成是一个在社会方面毫无区别的个人的自然共同体这样的观点。因此，他不可能理解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真正关系，不可能懂得和解决社会问题；他把社会问题主要归结为从心理学

观点去处理的宗教问题。而且，他也不可能懂得和解决理论问题，特别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

人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正确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才能正确理解从其社会关系方面去观察的个人、作为这些关系之总和的社会以及宗教问题。宗教问题的性质与其说是心理的，毋宁说是社会的，而且，它是只能通过社会的变革来解决的。同样，通过实践，人们才能把握思维同存在的关系，因为思维不过是人类活动的反映，是人类活动在自然和社会领域里带来的变化的反映而已。

在对于费尔巴哈的批判中，马克思找到了一个新的唯物主义的某些基本特点，从这个新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的、辩证的和革命的性质方面来看，它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完全相反的。

这种思想在《提纲》中只是一个雏形，毫无疑问，马克思在《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中把它明确了并且发展了，那时候他正在写这本书，但是没有出版，而且散失了。

不同于马克思——他在比利时由于受到约束不能参加任何革命活动——，恩格斯一回到巴门，便迫不及待地积极投入了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但是他感到失望，因为在这里也跟在英国一样，他没有找到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却找到一个由于贫困以致道德败坏了的工人阶级，而对这样一个阶级，共产主义宣传显然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于是，他和赫斯一起，利用贫穷问题在当时引起激烈争论的这一事实，拐弯抹角地争取开明的资产阶级走向共产主义。在爱北斐特由他组织的几次集会上，他一再指出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同赫斯一起创办了一种期刊《社会明镜》，来加强这一宣传。这个期刊是他所创办的第一个德国无产阶级的机关刊物，在刊物上他不仅介绍了德国的，而且也介绍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人阶

级的生活状况。

他居住在还很落后的德国，这种生活以及他同赫斯联系所产生的影响，使费尔巴哈的思想在他那里仍然在起作用，而且在学说方面他仍然处于某种摇摆不定的情况，别的不说，这种情况在他同马克思关于施蒂纳的通信中便有所表现，和马克思相反，他认为人们可以利用无政府主义这个理论去为共产主义服务。

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写作该书的时候，他摆脱了这种影响。通过他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所作的不断的分析，事实上，他是一直保持在他在这个国家里所曾经达到过的那种思想水平上的。

这本书差不多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同时完成。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苦难、它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阐明了共产主义革命乃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而且在两个主要之点上，超出了他在《英国状况》一文中所陈述的观点。事实上，他以一种更加深入而明确的方式，叙述了那些产生于工业革命的英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状况，并且还更加强调地指出这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后果。他指出，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必将在中等阶级败落的同时，使大资产阶级通过资本集中和生产工具的占有而变得强大起来，并使遭受无情剥削的无产阶级——他必须把自己的劳动作为商品出卖，并屈从于种种支配商品的生产 and 出售的法则——的队伍扩大。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情况：他的身体、智力和道德衰败了，但是，他要摆脱那种强加给他的非人生活条件的愿望却强烈起来，而且也加强了他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尽管英国资产阶级使用了种种手段，但是它没有能够阻止这一斗争的日益尖锐化。得到工联和宪章运动支持的

英国无产阶级，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并且认识到只有通过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才能解放自己，因此，它越来越坚决地投身于革命斗争，并作为社会的一种基本力量取代了直到那时为止起着历史推动作用的资产阶级。

在这部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一段历史时期第一次作了伟大分析的书中，恩格斯几乎完全摆脱了费尔巴哈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他完全独立于马克思、并且在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所从事的另一个领域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制定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在这里，正如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以及在《英国状况》一文中所做的那样，他在具体的方面对马克思的理论上的观点作了补充。

诚然，他在对英国状况的分析（老实说，他的分析不是有系统的，而且与其说是明确的不如说是含蓄的）中着重指出，只有深刻分析经济的和社会的状况，同时排除一切唯心主义的和专断主义的考虑，人们对于历史才能有正确的理解。历史的进程，事实上主要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来决定的，这个生产力，连同新的分工和新的所有制形式，带来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状况的改变。因此，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状况来说，是具有阶级性的，而且只能从它同阶级斗争的关系这方面去认识。由此可见，归结为一种观念的发展的唯心史观，以及更广泛一点说，一切置身于社会生活之外的学说，统统是荒诞无稽的。

如果说，恩格斯在理论上不能同马克思相比，还不能够把自己的思想提高到象马克思那样的概括的高度，那么，相反地，他在分析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方面，却比马克思精确得多。虽然马克思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高而宽广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决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状况，

在细节方面却没有恩格斯看得那样清楚。

当1845年4月他们在布鲁塞尔相遇的时候，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一些新的看法的广度和深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通过他的书，自己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历史研究的范例，从而在丰富他的朋友的思想方面做出了贡献，这样，正如他已经做过的那样，在马克思的思想正处于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的时候，他再一次地对他朋友的观点做了补充。如果说，在写作《神圣家族》一书的过程中，他们能够在各自分别取得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曾经合作得很有成效，那么，在他们的思想互相补充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水平的现在，他们合作起来就会更好。

他们一同到英国去旅行，想必使他们得以扩展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而且，由于同“正义者同盟”和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取得更为紧密的联系，他们能够开始对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施以直接的影响。

他们越认识到这一斗争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就越增强了这样的信念：无产阶级要想使自己的战斗得到胜利，就必须完全彻底地摒弃唯心主义、专断主义和空想主义，这些东西只能阻碍它去进行斗争。

这就是促使他们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深刻的理由；这本书的撰写不仅使他们能够对历史唯物主义给以完整的阐述，而且使他们得以清除当时在德国传播最广的唯心主义、专断主义和空想主义的两种形式：思辨哲学和真正的社会主义。

起初，他们的目的是想完成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已经开始的对于黑格尔以后的思辨哲学的批判。这就要求事先做到熟练地掌握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而这，就是题为《费尔巴哈》一章

的目标。他们抛弃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观点，这些历史学家不重视历史的真实基础——即人的物质生活的创造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取得的——，而是把历史的进程归结为宗教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不断继续，甚至也是那些把历史归结为思维发展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的斗争的继续。在制定学说的过程中，他们从马克思刚刚确定了的那样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根据这一观点，按照恩格斯不久前提供的那个好方法，分析了历史上的几个重大时期，对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指出代表这一时期的生产方式，以及劳动分工和由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所有制形式，并且，通过生产方式来说明这一时期所特有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状况。

根据这个观点，历史分为两个大的时代。在第一个时代中，人们依靠自然以直接的方式呈献给他们的产品（摘采、打猎、捕鱼）生活；在第二个时代中，人们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自然以满足自己的需要。

这第二个时代本身又分为四个重大时期，它们是以生产力、劳动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的特定发展为标志的。

第一个时期，即部族的集体所有制时期，它是与生产方式的尚属原始的阶段相适应的。

第二个是古代的、公社的和国家的集体所有制时期。私有制是在所有制的集体形式的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奴隶制开始普遍起来，伴随着这种奴隶制，产生了第一次重大的阶级斗争，即奴隶主同奴隶的斗争。此外，也产生了第一次大的分工，其标志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在城市中，则又产生了工业与商业的分离，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

第三个是封建时期。农业生产在这时期中占有压倒一切的地

位。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占有土地并垄断农奴（他们取代了古代的奴隶）的贵族扮演了统治阶级的角色；另外，也出现了农奴与贵族之间的一种新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城市中，工业和商业是在手工业的形式下自行发展的，生产者自己可以出卖他生产的东西。正如在乡村一样，城市里的社会组织也是分等级的；比如在行会里边，就有师傅、帮工和学徒的分别。商业超越了城市界限，越来越具有了城与城之间的贸易的性质，因此成了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了扎根城市中的资产阶级的势力，在城市中，它不仅要与贵族的统治作斗争，同那些受贵族剥削的帮工作斗争，同时也要同城市中开始形成的平民作斗争。资本在当时既然主要是由地产或作坊产业构成的，就仍然具有固定资本的形式，这就说明在生产和分工方面的进步何以如此缓慢。

第四个时期的标志是：手工业生产过渡到由于流动资本的逐渐积累而得到促进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并且商业，特别是海运贸易，发展了起来。海运贸易在殖民地开辟之后突飞猛进，因此成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流动资本由于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造成的越来越迅速的积累，导致金融市场的形成，以及银行、纸币和公债的出现。与此同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变革，其标志是：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重要性相对来说减少了，大资产阶级的势力和作用增长起来。

既然手工业工场再也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它的产品就逐渐被大工厂的产品取而代之，在大工厂里劳动是借助于机器来完成的，而且在那里蒸气越来越被用作动力。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促进了交通和运输工具的改善，加速了流动资本的扩充，并给社会交往方式带来深刻的变化。

社会交往丧失了它自己的个性，被那种以金钱为手段的商品交换取而代之；在它被如此普遍地物化了的的同时，我们看到在社会机构中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

大工商业的越来越迅速的发展，加快了贵族和手工业者的衰落，这对那个正在变成统治阶级的大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它使国家的政权以及每个国家中的其他阶级都从属于自己的利益，这样，不仅在一国之内而且还在国际范围之内，就象昔日的贵族那样，决定了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状况。

大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它支配资本的力量、国家的力量以及宗教、道德和政治经济的力量，使这些力量都以各自的方式证明大资产阶级合理并支持资本主义制度。不过它遭到了和它同时但以对立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越来越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随着无产阶级的苦难日益深重而趋于激化，而在斗争中，无产阶级也就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

对无产者来说，劳动并不是由人自己决定的一种自由的生产活动，而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劳动，一种奴隶的劳动，人越是生产，这劳动便越是使他受到耗损；为了要活着，他不得不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并且服从种种支配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的法则。只有通过一场无情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斗争是和古代的奴隶主和奴隶的斗争、中世纪的贵族和农奴的斗争一脉相承的——，他才能从他所忍受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

这个斗争必然要导致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与以前的种种社会革命的根本不同之点是：它要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以前的社会革命则满足于用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来取代这一个阶级的统治，是丝毫无损于私有制的；这样，工人阶级只是在

另外一种形式下不断地受到剥削。

共产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实现以下三个条件：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得到充分发展；这场革命的发动不能是地区性的，必须是全球性的，因为不这样肯定会遭到失败；最后一条，无产阶级必须充分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这就要求必须消灭一切可能阻碍它的革命行动的幻觉、蒙蔽和空想。

在当代，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自己的斗争，才能象在它以前的资产阶级那样，起着决定历史进程的作用。

通过那个将要消灭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以及将要把生产力引向无限发展的共产主义革命，个体的人才会和谐地团结在社会组织中并得到完全的自我发展。事实上，生产力的无限发展，将使得以分工为特征的社会劳动缩减到最小限度；这种活动的限制，将容许一切个体人能够利用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生产力的整体，象傅立叶所想的那样，去从事最适合于他的活动，由于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homme universel*)。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真义正是在这里。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将支配事物世界而不受事物世界所支配——这样的共产主义制度将标志着人类的一个新纪元的开端。

在这个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作的概括性阐述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就已经不再是以片断的方式，象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那样，而是系统地、完整地清楚地给我们展示出来。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对于历史的分析中，不应当采取唯心主义的办法，象思辨哲学家那样以意识和精神作为出发点，把它们看成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或者象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那样，把历史归结为宗教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不断的连续，相反地，而是应当以具体的人——这种人

可以从其经济和社会活动这些方面去观察——为出发点，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的个体人的生存，才是历史的基础。

人跟动物不同，他通过劳动能够改变自然使之满足人的需要。因此，在人的心目中，自然就越来越不象仍然以其原始形式展现给动物的那个自然，而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由于人的劳动而变为人化了的自然。

人在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他自己。在生产活动过程中，自然和人的这种同时改变，构成了历史的主要内容，因此，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乃是生产力以及由此引起的交往形式的发展。

人们既然只有在劳动中共同合作才能生活，他们的生活就必然具有社会的性质。从这种合作中产生的各种交往形式，是被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

事实上，一些为人们所适应了了的交往形式是与一些确定的生产力相符合的。

生产力、分工与由此产生的所有制的方式的发展，在决定经济状况的同时，也决定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状况，并且从而甚至决定历史的进程。

在私有制下面，生产力集中在少数占有者手中，因此就出现这种情况：社会分为占有者和非占有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阶级斗争。

迄今为止，历史的进步主要是由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辩证的发展所取得的。交往形式符合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这些交往形式起初还是适应的，但它们随着需要的增长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改变而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此，现存的交往形式必须为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而这只能是由于阶级斗争激化所产

生的一场社会革命的结果。

生产力的发展在决定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的同时，还决定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说，决定人的意识和思维的改变。人的精神生活是同他的物质生活紧密联系着的；事实上，他并不是作为抽象的人而是作为被他的生产活动所决定的具体的人产生自己的意识和思维。因此，人们不能把意识和思维同经济和社会状况分开，意识和思维乃是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反映；这种反映并不具有消极的性质，象人在面对自然界采取直观态度时的情形那样，而是说明了人通过劳动给自然界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变化。因此，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宗教、道德、哲学、法等等——，并不是他那存在于经济和社会状况之外的意识和思维的一些抽象形式，而是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产物。它们的性质和变化，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分工和所有制方式的发展；它们随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改变而改变，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何以某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常常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最初，精神生活同人的生活本身一样，都具有一种原始的性质；在这方面，人之有别于动物，就在于一种初级形式的意识代替了本能。

意识和思维是与生产力和分工同时发展的。从分工的多样化中产生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裂；正是这个分裂，决定了在个体人当中形成一个特殊的范畴——即思想家这个范畴，他们把自己囚禁在抽象的领域中，以致致力于种种精神事物为己任。因此，便出现了这种情况：在思想家们那里，存在与精神、物质的实在与精神的实在都给割裂开了，而这就是把现实歪曲地再现的意识形态的来源。由于把存在和精神的关系颠倒了，思想家们才认为，不是存在，就是说，不是具体的人去决定精神，相反地，是精神

决定存在,并且还认为,精神活动才是人的最主要的活动。这就导致他们认为精神——就它本身来看——乃是脱离物质生活的一种实体,是人的生活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历史被归结为观念的连续,这就又使得这些思想家们认为,仅仅凭着精神的活动,凭着对现存事物状况的单纯的批判,人们就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

摆脱了唯心主义、专断主义和空想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可以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直截了当地对思辨哲学进行清算,并开始从事于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了。

对思辨哲学的清算是通过一篇批判来进行的,这篇批判现在与其说针对布鲁诺·鲍威尔,不如说针对麦克斯·施蒂纳,因为比起布·鲍威尔来,施蒂纳可以说是黑格尔以后哲学的更具有典型性的代表。这一派哲学是反映了德国落后状况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顶峰。德国资产阶级与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不同,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上升很快是同它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曾坚决地投身于反对封建组织和专制君主政体的斗争并获得成功,而德国的资产阶级,自从标志着德国经济和社会的衰败开始的三十年战争起到关税同盟的创建时止,一直非常软弱,以致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这说明为什么在面对政治问题时它持唯心主义态度。自由主义本来是英法资产阶级为了保卫自己的物质利益而领导的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而德国资产阶级攻击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运动不过是一场为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原则而进行的斗争。

这种唯心主义倾向,在18世纪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在康德那里得到了表现;他把一些自由观念说成是道德原则,把英法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政治和社会目标说成是纯粹意志的一些规定。后来的思辨哲学家们,特别是黑格尔,从康德的唯心主义中受

到启发，把历史归结为精神的发展，认为历史是观念的连续，通过这些观念，精神才逐渐地得到自我实现。

布·鲍威尔和施蒂纳，由于倒退到费希特哲学而赋予黑格尔哲学和辩证法以主观性，从而使这一思辨哲学达到了顶点。他们把黑格尔的既是主观同时也是客观并通过一种内在的辩证法而自行发展的绝对精神加以改造，布鲁诺·鲍威尔把它改造为意识自身，施蒂纳把它改造成绝对的我，这个意识自身或绝对的我的自行发展，并不象黑格尔的观念那样是同作为观念的一部分的世界紧密相连的，而是与世界处于经常的对立之中。把绝对精神和辩证法主观主义化，说明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是如何以幻想的办法来处理历史的；这种处理的办法并不象黑格尔那样以渊博的知识为依据，因此在他们那里就成了精神的一种纯粹的虚构，从而转变成为无稽之谈。

布·鲍威尔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同时把世界——即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整体——归结为实体这样一个抽象概念，以之作为自我意识的对象。借助于自我意识和实体这两个永远处于对立状态的抽象，就象费希特的我与非我那样，布·鲍威尔建立起他的体系，他在这个体系中指出，意识如何象费希特的我那样逐步地从实体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永远向着更高程度的自我发展前进。

他不把意识和实体的关系看做是黑格尔哲学中探讨的一个问题，而把它看成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历史意义的普遍性的问题，是一个有关人类未来的问题。

他和黑格尔一样都相信精神能够决定历史的进程；他认为历史的进程能够通过对于错误观念的单纯的批判而被固定下来，因此，他给批判规定了这样的任务：要把意识从实体中，主要是在宗教、国家和“群众”的形式下体现的实体中解放出来，因为这些东西

阻碍了意识的发展。

麦克斯·施蒂纳的学说标志着黑格尔的哲学和辩证法的主观主义化达到了顶点。他把从其统一性这方面去观察的个人自身作为绝对的我，同经济和社会关系割裂开来，使之作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在施蒂纳看来，历史的意义和目的就是形成这个绝对的我，形成使自己的存在得到实现的唯一者，同时摈弃所有在固定观念的形式下阻碍我这样来肯定自己的一切东西。因此，历史被分为两个重要时期：一个是史前期，在这时期中，这个我摆脱了自然和精神的统治，逐步地在自己规定自己；一个是从其统一性方面看，我得到了充分的实现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本身又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人类的幼年时期，在这时期中，人还不能摆脱自然的控制；一个是人类的成年时期，在这时期中，摆脱了自然的统治的人又陷入精神的统治之中。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的标志是，人在面对世界时持现实主义态度；第二阶段的标志则是他持唯心主义态度——这就是把世界变成一幅幻灯画，把人变成为中魔者的那些固定观念的来源。

要摆脱在宗教、政权、或社会统治的形式下来压迫人的那些固定观念的影响，对个体人来说，只要否定它们的神圣性质就够了。这样一来，人们为了自己的解放曾经进行的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现实的斗争，在施蒂纳那里也正如在布·鲍威尔那里一样，都变成了精神的斗争。

在当时，这一斗争的主要目的就是拒绝那种导致国家统治的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用社会统治来取代国家统治的社会主义、以及人道的自由主义、把个人从属于人类的人道主义。

摈弃了种种固定观念，这就使得我在拥有世界的同时使自己的存在得到了实现。既然这是通过想象的途径实现的，那么这个

唯一者不过是世界的想象的主人，对于通过自己的劳动在世上产生实在影响的真实的人来说，不过是一种讽刺。随着施蒂纳的唯一者的出现，黑格尔以后的思辨哲学达到了极点。

布·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假革命的哲学，正如在它之前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一样，反映了德国的还很落后的状况，特别是反映了一些小有产者和德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这些人满足于肯定自己的独立性和无上的意志，其沾沾自喜的程度，同他们事实上在改变他们身受其害的事物状况的全然无能为力的程度，是同样之深的。

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掌握，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在清算了黑格尔以后的思辨哲学之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德国空想社会主义所表现的专断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真正的社会主义。

如果说，对黑格尔以及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彻底清算标志着一个时期——在这时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可以说，同上述哲学形成了对立面——的结束，那么，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则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一个新的时期的开端。这一新时期的标志是：在越来越紧密地参与他们开始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同时，他们对转移无产阶级斗争方向的空想主义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同时，为保证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确立了必要的条件。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被证实是非常紧迫和必需的，因为它在德国工人阶级当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正如他们在对待思辨哲学时所作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分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形成的条件，然后指出，它的形成是如何同德国自由主义的形成相近似的。正如德国自由主义最初不过是英法资产阶级为取得政权所领导的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样，真正的社会主义乃是英法无产阶级已经展开而在德国不过

刚刚开始^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同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相反。英法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以及对这一制度进行的斗争，来有效地保卫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正象他们之前的德国资产阶级所曾作过的那样，把阶级斗争移植在精神领域之中，同样认为阶级斗争主要是一些理论上的问题。

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个学说是建立在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上面的，而且赫斯还给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加上了一层共产主义的色彩，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同时，不得不批判一下费尔巴哈和赫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并不象马克思在《提纲》中写得那样有系统，可以说只是提了一提，虽然象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所写的那章的标题指出的那样，费尔巴哈起初很可能是象施蒂纳那样的被深入批判的对象。

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提纲》中所阐述的一些基本观念出发的。费尔巴哈由于忽视了实践的革命性作用，不能把他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进行到底，这就是他的唯物主义中还保存着半形而上学性的由来。他用可感的自然和具体的人去反对把人和自然精神化的唯心主义，作得是很对的；可是，他把感性的实在单纯地看作是客体，而不看作是主体，即从人的生产活动的形式下去观察的主体，因此，不管对于自然还是对于社会，他都同样地采取了一种直观态度。

他的错误的自然观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对于自然，他没有看到它是越来越深刻地被人的生产活动在改变着，他所看到的，只是自然的直接的和原始的外貌。他对个体人和社会的人类学观点同样也是从这里产生的。他只从自然关系这个观点而不从社会关

系这个观点去观察人，因此他把人归结为抽象的个体人，从社会方面看这些个体是毫无分别的；另外，他把社会理解为这些个体人的总体，把它归结为人类。

他反对那种歪曲人的本性的与世隔绝的作法和利己主义，他认为，人只有在被他归结为你和我的结合的共同体中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存在。在他的哲学思想中，社会关系中的友谊和爱情的突出作用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这种人类学的观点，说明为什么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同历史被割裂开了。诚然，他的唯物主义缺乏历史性，他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象一些空想主义者一样，他认为人的目的就是通过消灭宗教幻影来实现自己的存在——也就是他所想象的通过一种广泛的人道主义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存在。

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说明他不可能懂得社会问题的真正性质，也不可能正确地解决社会问题，何况他已经先验地排除了任何革命的前景。事实上，他认为人的生存条件一般地说是这样：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是相符合的。如果在存在和本质之间产生了不谐调——这只能是一种不幸的偶然的情况——，那么，唯一能够消除这种不谐调的，就是时间。费尔巴哈所强调的唯一的最大的不谐调系来自宗教，对这个问题，与其说他是从历史的和社会的观点、不如说是从心理学的观点去进行研究的；宗教是应该被摧毁的，但不是靠消灭那不谐调赖以产生的社会关系，而是通过教育和训练。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赫斯的批判则更要简短得多。赫斯曾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中引出了一种感伤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从这个主义中得到很大鼓舞。

赫斯认为，人们只有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出发，才能不仅

在实践上而且也在理论上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赫斯就是从这个原则出发，批判了英国和法国的那些忽视这一观点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家们的不足之处的。对赫斯来说，正如对费尔巴哈来说一样，根本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消灭异化而重新使人恢复其真实的存在。

和费尔巴哈不同，赫斯认为异化不是以它的宗教形式而是以它的社会形式进行的，比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就是在劳动和金钱中自行产生的。在这个制度中，促使人孤立和利己的利润和竞争在统治一切；这个制度不容许人有自由劳动，而人只有通过自由劳动才能肯定自己是人。事实上，在这个制度中人的活动乃是奴隶的活动，从而排除了快乐。劳动产品在这个制度下转变成商品和金钱；对人们来说，金钱变成了统治他们和奴役他们的上帝。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分离了，这就产生了社会的分化：占有者和遭受无情剥削的非占有者。这种状况只有用共产主义社会去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办法才能被消除，而这种取代，将通过教育和训练的普及逐步地得到实现。

消灭私有制以及由私有制产生的竞争和利己主义以后，共产主义就建立了，这时才可以发展自由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劳动和快乐结合起来，并且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和谐的合作。赫斯号召人们重视教育、训练和爱情，从而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感情的学说，这个学说只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一种障碍。

对于费尔巴哈的明显的批判和对于赫斯的含蓄的批判，只不过是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的一个序幕，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思想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从赫斯那里抄袭来的。

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由于把社会关系变为以抽象的方式去观察的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从而一下子把自己置于思辨的领域之中。他们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赫斯的共产主义出发，而到达的终点却是对于自然、个人和社会的一种形而上学观。他们在自然中看到万物都在和谐地生存着，并且以为在接近自然的原始社会中，人和人彼此之间也是和谐地生活着的。但是，这种和谐被私有制摧毁了，由于追逐利润和竞争，私有制引起了人的孤立状态和使人们分化的斗争。在这一论点中，个人和社会是以抽象的方式去观察的，个人成了统一性的体现，社会成了共同体的体现，而它们的关系则被归结为统一性和共同体之间的对立。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原始的和谐打破了，随着建立了私有制，因此，根本的问题是必须用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产阶级社会以便重新建立这种和谐。这样，就可以使人的自由活动去代替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那种奴隶劳动，通过劳动与快乐的结合，自由活动就使人可以充分实现自己的存在。

劳动，正如个人和社会一样，如果从它自身去加以观察，就变成了一个抽象范畴：既没有实体性也没有现实性，它可以毫无分别地适用于任何方式的劳动，当人的创作本身被归结为一种抽象时，它就只能是这样的。

正是在对于个人、社会和人的活动的性质的这种唯心主义的想法上面，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建立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的基础。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志，在他们看来，主要就是劳动和生产方式；这种劳动和生产方式不仅败坏了人们，同时还通过占有者和非占有者这样的对立来使人们分化。由于共产主义的建立将一举消灭私有制、竞争、人的孤立状态和利己主义，人们将能在爱的号召下重新过一种符合于他们真正本性的和谐生活。

真正的社会主义，连同它的形而上学性和夸夸其谈的倾向，到卡尔·格律恩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卡尔·格律恩为德

国的科学辩护，以极其高傲的口气谴责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说他们忽视了考察人的本质，因此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只能达到极为肤浅的水平。

最后，到了格·库尔曼那里，社会主义则简直变成了江湖医生的骗术。

由于清算了唯心主义、专断主义和空想主义，并且更概括地、更深刻地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根据历史本身的性质确立了历史的普遍法则，这一点是他们的巨大功绩。直到那时为止，历史的发展一直仅仅是用一些抽象的理由——比如神的意志、实现真或善的必然性——或者用一些诸如宗教斗争或政治斗争这类次要的现象来解释说明的。由于指出对历史的了解只能是对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深入分析的结果，这样，他们就从对历史的了解中排除了专断主义和思辨。

他们的思想发展是同他们的革命活动相联系着的。下一个阶段，他们将不仅参与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而且还要着手掌握这一斗争的领导权。

组织这一斗争，导致他们创立了“布鲁塞尔国际共产主义通讯社”（后来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代替）、继续对所有形形色色的空想主义特别是对蒲鲁东的学说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扩充共产主义的宣传工具（创办《布鲁塞尔日报》），以及给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发出在他们所进行的斗争中的战术和战略方面的指示。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在爆发了1848年革命的那个时候出版的《共产主义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汇集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课题，和他们在这个时代的革命动乱中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